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好莱坞十大影后



我要做个演员

一个伟大的演员
——费雯·丽

好莱坞十大影后

银幕第一夫人： 葛丽泰·嘉宝

她是孤独的，孤独地来，又孤独地去了；同样，她也是令人难忘的，不仅由于她的表演，而且由于她的生活。

她曾撑着一把小雨伞在斯德哥尔摩的雨中行走，也曾独自一人漫步在纽约的街头；她曾乐而不倦地闲逛古玩店和艺术画廊，也曾在好莱坞山上创造神秘：她曾在《大饭店》里冷漠残酷，也曾在《尼诺奇卡》中开怀大笑……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梦里寻花，她实实在在地已经离我们去了。

才华卓绝，美艳绝伦，超凡脱俗，圣洁明朗，她那细如凝脂的皮肤，风姿绰约的身材，慵懒娇憨的声喉，楚楚动人的形象，不知令几代观众为之倾倒。她，永远是影坛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安祥女神”、“银幕第一夫人”。

从瑞典到好莱坞

1905年9月18日，嘉宝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产院里。他们是家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哥哥斯凡，姐姐阿尔娃。嘉宝原名葛丽泰·洛维莎·古斯塔夫森，她父亲卡尔·古斯塔夫森在该市清洁队里干活，收入菲薄，无论刮风下雨都得外出工作。但他却有近乎女性的、极为俊秀标致的五官，嘉宝正是继承了父亲眉清目秀的特征。她的母亲安娜·洛维莎是一个农场的厨娘，母亲把修长的四肢、平坦的胸脯和宽得足以套拉重挽马车的双肩，遗传给了她的小女儿。这一点是很让人感兴趣的，嘉宝的身躯在静止状态时不十分雅观，但当她行动时，她的形象便产生出一种美感，给人以一种傲然于世的感觉。正是这种动态的美，使第一次看到她的美国观众对她的体态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也许正由于这种直接的、强烈的印象，人们往往认为她是一个身材魁梧、具有男子形体的人。其实她并不高，四十年代当她申请美国国籍时，自称是五尺七寸，大约是一米七，这就很难算是高大了。

葛丽泰出生后不久，她家就搬到一座经济公寓，这地方十分狭窄、拥挤，不利于健康，室内宽大的窗户虽然可以提供新鲜空气，但也送入寒冷的北风。一家五口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葛丽泰睡在中间一张行军床上。屋里只有一个炉，既烧水又做饭，还要烤木柴。厕所在外面院子里，这一家总是过着忍饥挨饿、麻木潦倒的生活。

嘉宝从小就表现出一种内向的性格特征，但她日后却把这种性格变成了一种武器。她在很小就喜欢孑然独处，她常常钻到一个角落里去思索，或者遐想，她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她的父母说：“应该允许孩子们随时思索，即使对于幼小的儿童来说，思索仍有极大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思想培养下，嘉宝从小就生性高傲急躁，寂寞孤独，每自内省。她日后的许多性格和怪癖，比如愤世嫉俗，害怕甚至厌恶群众，都可以从幼年找到映照并是从小形成的。

嘉宝14岁时，五月的一天，她父亲重病到一所公立诊所就医，他们排队候诊，好容易挨到窗口，里面的人要她父亲脱掉帽子，并问了近百个问题，其意向她暗示，医院主要关心的是否有能力付款。在整个询问过程中，葛丽泰感到她父亲几乎要死在她身边，也确实在几天以后，他就与世长辞了。一个很了解嘉宝的朋友说，医院的这件事可能就是她愤世嫉俗态度的最早起因。

因为家境的贫寒和生活的艰辛，葛丽泰 15 岁时就开始赚钱养家。最初是放学后她到小巷里一家理发店打下手。 1920 年 7 月 26 日起，她开始在一家百货公司的女帽部当学徒，每周工作六天，周薪 35 美元，在当时，对一个女售货员来说，这样的工资就相当不错了。

嘉宝读书并不很用功，她感兴趣的是舞台和电影，但因为没钱买票看戏，她就经常站在剧院的后门听剧中人物的台词。但电影当时还是无声默片，票价便宜，所以她看得更多的是电影。她特别爱看玛丽·壁克馥的表演，她主演的《可怜的小阔姑娘》嘉宝至少看了两次，反复领悟其演技。当她知道玛丽这样一个 24 岁的少妇竟能扮演一个年仅 11 岁的小姑娘，这使葛丽泰想了很久，她总是想，作为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为什么就不能象壁克馥那样在银幕上表演得那么好呢！她真渴望能在银幕上露一面。此后，葛丽泰曾和她的一位好友伊丽莎白试图步行到郊外利丁岛上的一家制片公司寻找拍片的机会，但却因一场暴风雪而告失败。嘉宝幼小的心灵里已经埋下了电影的种子，但当时没人能够为她指引影星事业应该如何开始。

机会终于来了， 1921 年初，商店老板准备拍一个 10 分钟的广告片，为公司的春季商品做呢帽、草帽广告，其中规定所选演员一定要是本店职工。葛丽泰这时 16 岁，身高 1.70 米，金发披肩，面貌娟丽。于是生性腼腆、固执、孤僻但又心怀憧憬的她偷偷地坐在角落里。可是试镜头后，选中的偏偏是她。这是第一次参加职业性的摄影活动，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与银幕打交道。此后，一位广告片导演又选中她在喜剧片《不要这样穿着》中表演，这也是公司的一部短小广告片，葛丽泰在片中穿上各种荒唐可笑的怪模怪样的服装，表演各种滑稽可笑的愚蠢动作。几个月后她为一家面包房拍了一部喜剧片广告。

当时，一位低级喜剧片导演正要拍《流浪汉彼得》，嘉宝鼓起勇气去试了镜头，导演看到葛丽泰那丰满的体态，同意要她，于是她马上辞掉了工作，声称“要去从影”，这的确是一个大胆且浪漫的誓言。葛丽泰在这部片中，充当一名滑稽表演团的沐浴美女，她除了那丰满的体态外，几乎没有什么可展示的，无论是她穿上丝绸运动短裤表演柔软体操，还是穿着齐大腿根的游泳衣在湖边表演时，都不能让人感到满意，但导演后来说：“她当时很有一番雄心。”能说的和需要说的也就这些了。但她毕竟还是自信、执着、迷人、热情、善于主宰命运的不凡女子。为了实现自己梦中的理想，在离开售货员职务整整一年后，她来到瑞典皇家戏剧学院所设的十二个招生处中的一个招生站，报考了免费学习生，并且有幸被录取了。纵观嘉宝日后所拍影片，直觉在她的表演中占着主导地位，她每拍一场戏，“几乎不需要加以任何指导，她只要一走上拍摄现场，就已捕捉到她所扮演的人物，并且能够完完全全地变成了那个人”。她在戏剧学院所受的教育进一步锻炼了她的直觉，使她能够在银幕上取得极为杰出的效果。

戏剧学院本应学习两年，但葛丽泰只读了大约十五个月就又投身影坛了。一天，饮誉欧洲影坛，赫赫有名又善于交际的著名导演斯蒂勒到表演艺术班为筹拍《科斯塔·伯林的故事》物色女主角。他有一个特点，喜欢起用没有经验甚至天真的演员。于是，四肢发达的葛丽泰走进他的办公室，不料，这一次却成了决定葛丽泰一生命运的会见。

其实，斯蒂勒早在葛丽泰拍的广告片中认识了这位做泳装模特儿的金发姑娘，他记得她膝盖突出，两脚太大。斯蒂勒在嘉宝走进他办公室时，象一

架摄影机似的长时间直瞪瞪地望着她，使她感到惴惴不安，窘迫万分。斯蒂勒对于她的不安与窘态十分粗暴和不耐烦，他命令她脱去帽子和大衣，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然后随便地问了一下她的电话号码。等她走后，斯蒂勒对他的助手说：“这个人有点与众不同的劲头，我必须观察一下她在哪点上与众不同”。几天后葛丽泰来面试，他让她表演晕倒，哪知她的倦容在紧张和压抑的情况下却能通过摄影机变成一种渴望爱情的激情。斯蒂勒说：“象这样的面孔，你一百年里只能遇到一个。”他找到了一副面孔，至于感情，他可以提供，于是斯蒂勒决定起用她，这样便开始了两个天才之间的合作。

对于嘉室的成长，斯蒂勒是至关重要的，他是塑造银幕上嘉室形象影响最大的人物。斯蒂勒当时 40 岁，比嘉宝大 22 岁，出生于芬兰赫尔辛基的犹太区，当时是沙皇的疆域，他

的妈妈自杀了，爸爸在他幼年时就离开人世，根据犹太人怜悯同族的习俗，一位世交收养了他，这位世交是一位制帽商，他的家里终日堆放着艳丽华贵的衣料，这使年轻的斯蒂勒很早就对雍容华贵的仪表和潇洒大方的举止具有无法抑制的爱好。他是个放荡不羁、孤芳自赏、异想天开的人物，也许还是个同性恋者。他具有犹太人善于做买卖的天性，会耍尽一切花招使事情对自己最为有利。他虚荣心强，野心勃勃，酷爱表现，具有一种诱使或者迫使他人为自己服务的能力，并能够自欺欺人地假装有办法实现诺言，然后再运用浑身解数达到目的。

1920 年，斯蒂勒导演一部《好色的人》，叙述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年轻少妇和雕刻家私奔，而她的丈夫又和他自己的侄女出走的故事，反映了一战后社会习俗和两性关系的解放。这之后，《好色的人》片中女主人公的形象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使他念念不忘。当女性的天性屈从于男性意志时，她们不仅满足了他的虚荣心，还帮助他勾画出他理想中的自我形象。他喜欢女人听命于他，力求改变她的衣着、外表、谈吐、举止，使她们合乎他的理想。于是他命令该片编剧再创作一个相似的故事，他们在这种心理之下开始了《科斯塔·伯林的故事》一片的创作，物色演员和拍摄工作。

为了拍好这部片子，他还对编剧说：“首先我们给片中的女演员取一个名字，一个现代化的、漂亮雅致的、具有国际性的名字，不论在伦敦、巴黎、布达佩斯或纽约，听起来都同样响亮悦耳并具有相同的含意”。他们既强调实音，又注重其臆想中的音色。从 17 世纪匈牙利一位国王贝兹伦·嘉鲍的父名上得到灵感，斯蒂勒很欣赏地把这个名字在嘴里来回念叨着，尝试着各种重音，尝试着嘉鲍的各种拼法，终于他找到了“嘉宝”，因为这个名字一来可以说成是与皇族有关，二来这这也是一个极为少有的名字。在 1919 年度的斯德哥尔摩电话簿上，“古斯塔夫森”及其异体共占了 29 页，但却只有一个“嘉德宝”、一个“嘉宝姆”，根本不存在“嘉宝”两字，于是“嘉宝”就成了葛丽泰的艺名，它在挪威语中意为“安祥的女神”。而葛丽泰也同意，说它有个好处，使她不必改变她个人用的床单上的缩写字母。

斯蒂勒还要求嘉宝减肥，以适应片中人物需要。同时，他还以极大的耐心对这位无名小辈严加训练。他教她走路、表演、穿戴、化妆、掌握灯光。

《科斯塔·伯林的故事》上映后，果然反响热烈，受到了广泛欢迎，至今这部影片还被认为瑞典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嘉宝因此也崭露头角。

嘉宝在欧洲小有名气了，为了参加该片在柏林的首映式，她第一次出国访问西德，这也是她第一次作为明星而出现。影片甚至在德国引起更大的轰

动，发行商在一周内就把投资收了回去。好莱坞米高梅公司驻柏林代表注意到这一巨大成功，恰好这时，1925年，好莱坞大亨梅耶周游欧洲各国，会见导演、明星，并观摩新片。他访问罗马、巴黎之后就到了柏林。他很快找到了斯蒂勒，并第一次见到了嘉宝。后来他们在旅馆附近的乌发电影公司租了一间放映室看《科斯塔·伯林的故事》。看完影片后，梅耶喜出望外，大为夸奖这部影片，并邀请斯蒂勒前往好莱坞，周薪1500美元。斯蒂勒思考了一会儿说：“那嘉宝呢？”“你不能到哪儿都带着这个姑娘，她腿太粗了”。“不聘她，我就不去”。斯蒂勒坚持要与他这颗慧眼赏识的未来明星一起去闯好莱坞，他要帮她攀登艺术的顶峰，他要用自己的才华和智慧浇灌这颗苗。在他的执意要求下，梅耶只好说：“好，我用她六个月，周薪350美元”。临走时，梅耶扫了嘉宝一眼，据说劝她节食，因为美国男人喜欢较纤细消瘦的女人。

在柏林期间，嘉宝还拍了一部电影《没有欢乐的街》，然后回到了斯德哥尔摩。1925年6月，嘉宝在斯蒂勒的陪同下，哭哭啼啼地和她的母亲、哥哥、姐姐告别，登上开往哥登堡的联运火车，然后航海赴美。她说：“妈妈，我一年后回来”。

银幕上的“梦幻公主”

自孩童时代起，嘉宝就抱着从影的理想，现在有了亲身到电影帝国去闯荡的机会，她更是兴奋异常，踌躇满志。在去美国的船上，嘉宝想象一定会有成群的花束和欢迎者在纽约码头等着他们。斯蒂勒甚至还教了嘉宝应付记者的话：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愿上帝保佑美国。可是使她大吃一惊的是，当他们1925年7月6日下船到达纽约时，居然没有人群前来迎接，而且又遇上纽约市一次最严重的热浪，米高梅公司纽约办事处显然事先并未得到通知说有一对男女根据合同前来美国，只好临时招集起假期中稀少的人员，派去了一个会说瑞典语的低级职员，又匆匆忙忙花了二十五美元找了一个无固定职业的自由摄影师，赶去拍摄嘉宝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时的倩影，聊表欢迎。嘉宝和斯蒂勒兴致勃勃在轮船栏杆旁摆好姿势，她根据斯蒂勒教她的办法，使身体成弓状，以便使臀部看上去消瘦一点，她的臀部从正面看是比较宽大的，他们那身时髦的欧洲大陆服饰和他们本人一样，同这个酷热的陌生城市颇不协调。

更令人扫兴的是，他们到纽约后，好莱坞米高梅公司也许是为了煞一煞斯蒂勒的威风，公司几个星期都让他们无所事事，嘉宝十分烦恼，最后实在受不了，她决定到航运公司去打听回国的船期，可巧碰上斯蒂勒的老朋友——歌唱家玛莎·赫德曼女士，她答应帮她的忙。玛莎立刻找到了摄影艺术家呵诺德·金瑟，这位出生于维也纳的摄影师，整整用了一个小时，从各种角度给她拍了大量特写镜头，照片突出了她那婀娜多姿的美态，朱唇微启，倦眼眯缝，额头舒展，柔丝蓬松，犹如戴上一顶金冠，她时而发出具有刺激性的挑逗力，时而又仿佛是一具超世的精灵。从金瑟的一系列照片看，似乎这并非是一个人的情照，而是五、六个不同的人，这些照片寄出去后，立即引起一阵骚动，金瑟把最心爱的一张——嘉宝用手托着下巴的特写——寄给了《名利场》，该刊马上登出，并配上了大标题：“来自北欧的新星——葛丽泰·嘉宝”。没想到，米高梅公司专管发现新人工作的人员马上冲到杂志社，

打听这位神圣的女人是谁，在什么地方，以便和她马上签订合同。“不知道他们手里已经有的是什么货”总是好莱坞制度中一贯存在的具有讽刺意义的事件，他们不知道，这正是已与他们签订了合同并正受着他们怠慢的嘉宝。

梅耶当即指示，马上让嘉宝到西海岸好莱坞来，令人高兴的是，这一次，在洛杉矶车站月台上，欢迎的人比较多，掌声雷动，花团锦簇，斯蒂勒和嘉宝穿着漂亮而华丽的西海岸夏季服装，两个浑身北欧式打扮的孩子给两人献了花，一切看上去却倒象是结婚典礼。嘉宝羞怯怯地望着别处，晕晕乎乎地回答着记者提的各种问题，有人问她近期有什么打算，她甚至说：“找一个和善的家庭，向他们租一间房子住。”这使米高梅的宣传部门很恼火，这不是成心败坏米高梅的形象吗？难道我们不会为你租房子？嘉宝注意到一些前来欢迎的人手里拿着小包，便问秘书：“这些是送给我的礼品吗？”秘书答道：“恐怕是吧。”然后大家都前往市中心一家旅馆，待两人梳洗一番之后，打开“礼品包”一看，原来是一瓶酒，外面包着不显眼的纸，为的是避开禁酒令执行人员的耳目。

更要命的是，到好莱坞后，公司仍不给他们安排工作，他们不明白的是，与在纽约不一样，这一次是公司的一贯方针，对于即使花了很多钱才弄到美国来的人，也要让他们闲上几个星期，因为他们必须进行自我调整，以跟上“影片公司城”的快节奏。而且，宣传人员也没有什么创造，他们认为嘉宝只是个喜欢运动，喜爱户外运动的美国式姑娘，只为她拍了一些运动型照片，这使嘉宝和斯蒂勒都很不耐烦。当然，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米高梅公司仍未对这位来自北欧的新星加以重视。

经过两人的东奔西走和大力争取，终于参加了《急流》的拍摄，这是嘉宝到好莱坞，也是她到美国后拍的第一部影片。她在片中饰一个由乡村姑娘变成大歌唱家的女人，她在片中真可谓是变化多端：一会儿是感情脆弱的情人；一会儿是看破一切的荡妇；一会儿是妒火中烧的情妇；继而成为一名大歌唱家，仁慈地委身于一个出身卑微的酒吧歌舞表演者；然后又一变而为一个手持长烟嘴周旋于王公贵族之间的、玩世不恭、老于世故的女人；最后成为献身事业、听天由命、孤独寂寞的美人。这部影片有时给人一种奇特的感觉，她在这部影片里综合了她以后所扮演的一切角色，她在美国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一次，梅耶不仅后悔，而且急了。就在《急流》开拍后不到一个星期，他从每天的样片里真正发现了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宝贝，于是紧接着让她拍第二部影片《妖妇》，由斯蒂勒导演。斯蒂勒得到工作高兴非凡，嘉宝也因能在他指导下拍片而喜出望外。但是，刚开始拍摄十天，斯蒂勒就被撤换了。其原因是：老板认为，他还没有适应美国制片公司的纪律，既不会发号施令，也不善于接受指示，由于他英语不好，他在拍摄现场语无伦次，指挥混乱，而且别人也听不懂他的话，搞得不知所措，呆呆地望着他，甚至放下工作。这个时候，他还十分傲慢无礼。更糟的是，他明确表示，他认为与嘉宝配戏的男主角莫雷诺是一个慕虚荣的花花公子。斯蒂勒命令他把头梳得高高的，以显得比嘉宝高，又命令他穿上靴子，以使他的脚相形之下显得娇小玲珑一点，所以莫雷诺指责他忽视他而突出女主角。最令米高梅公司气愤的是，他在拍摄中即兴发挥，这一点，好莱坞的制度是完全不允许存在的。因此，梅耶把他换下来，并且让他永远地离开了米高梅公司。斯蒂勒同时也鼓励嘉宝退下来，但后者却不愿放过任何一次上银幕的机会，她没有也是第

一次没有听从斯蒂勒的话，这一事件成了两个天才的合作的一个转折点，嘉宝从此与斯蒂勒分道扬镳，声誉显赫的大导演则开始悲观失望，走下坡路，而嘉宝则显露才华，日渐成功，并被米高梅公司作为一项投资而加以保护。当然，没有斯蒂勒在身边，嘉宝还很不适应，她一天拍片下来，总是不知所措，无精打彩。有一次她对翻译说：“我想我现在该回家了。不值得这么干，对不对？”这成了她的一句名言，后来被缩成了“我想我该回家了”，为众多的嘉宝仿效者所采用并且着手宣传她那倔强的脾气。

斯蒂勒后来又转到派拉蒙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但由于这个欧洲导演所具有许多特点和个性为好莱坞所不容，加之他非常固执，好高骛远，骄傲自大，很容易招致别人的报复和攻击。1927年11月，斯蒂勒终于在美国呆不下去，只好神情沮丧地、抱憾地返回瑞典。当然，这一次与他首次来到好莱坞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一年后的11月8日，他在潦倒中去世，也可谓英年早逝，只有45岁。消息传来，正在拍片现场的嘉宝十分悲痛，她马上终止拍片，在被米高梅停职停薪的情况下，赴美三年半以来第一次返回瑞典。

嘉宝对发现、提拔、培养自己的恩师始终怀着一种依依不舍的心情。她看望了存放斯蒂勒遗物的仓库，摸摸这个，又看看那个，围着家俱和画走来走去，说了许多伤心的话。而且当她得知恩师临死时手里还握着当年在美国金瑟为她拍的照片时，她更是悲痛万分。嘉宝还凭吊了斯蒂勒葬在犹太人墓地的陵墓。由于导师的死，她对犹太人始终抱有一种同情心，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作法深恶痛绝。她当时甚至想去见希特勒，用暗藏的手枪杀死他，为斯蒂勒报仇。失去了斯蒂勒，现在嘉宝拥有了米高梅。继《妖妇》之后，米高梅公司安排嘉宝主演《肉与魔》。正是在拍该片的过程中，嘉宝与吉尔伯特（在片中分饰男女主角）联在了一起。吉尔伯特是好莱坞最受崇拜的风流倜傥的人物，可能也是工资最高的男星，影坛上的“大情人”，他比嘉宝大八岁，当时29岁，已经结过两次婚。不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艺术生活中，他都是一颗不可救药的、不能自主的多情种子。对于嘉宝来讲，与这位“大情人”相遇对她有着巨大影响：“嘉宝此时正处于事业上寂寞孤独的时刻，导师被迫离她而去，而吉尔伯特是她认识的第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他天生有一种为工作拼命的火热劲头，他那种不断产生于内心的能量，对于一个精力很容易衰竭的女人来讲，具有极大的影响。”

嘉宝和吉尔伯特在《肉与魔》中创造着梦幻。两人初次相遇在花园中，灯光照射得几乎园中的每片树叶都在摇曳着，闪烁着同情的光芒。当吉尔伯特划着火柴，点燃了那支从他干涩的嘴唇移到她渴望的嘴唇上的香烟时，燃着的香烟亮光也在黑暗中抖动，人们似乎都感觉得到他们俩内心的激情。

与银幕上那心荡神怡的热烈场面、那沁人心脾的长久热吻、那久久萦绕的柔情蜜意相比，银幕下的爱恋似乎更令人神往。吉尔伯特和嘉宝一起外出吃饭，一起在好莱坞山上野餐。他称她为“弗丽卡”（瑞典语“姑娘”），并把他的纵帆船根据她的最新片名取名为“妖妇”。而她也叫他“亚基”，并听任他称自己为“世界上最富诱惑力的人”，象魔鬼一样地反复无常、异想天开、变幻莫测。影迷们往往希望看到明星们不仅在银幕上，而且在银幕下堕入情网，嘉宝和吉尔伯特正是处于这双重的热恋之中，她感到愉快，有保障。嘉宝已深深地爱恋着他：“他是一个极优秀的艺术家。他激起我的情感，并使我的情感随他而上升。我不仅仅是在拍戏——我是在生活。”

爱情是一种力量，嘉宝在《肉与魔》中的表演，公司感到又惊又喜，影

迷们也兴高彩烈，她被人们誉为“安祥的女神”、“梦幻中的公主”、“爱的象征”，观众在向她欢呼，新闻界在向她赞美，嘉宝征服了好莱坞，从此一举登上了好莱坞明星宝座。

由于爱情的作用，吉尔伯特这位大明星同意让嘉宝在《肉与魔》的广告上与他并驾齐驱，名列头牌。但是，在好莱坞，一切都意味着金钱的价值。在拍完《肉与魔》以后，嘉宝这颗毫无疑问的明星的工资却与吉尔伯特相差太远。吉尔伯特的周薪为一万美元，而嘉宝却只有600美元，嘉宝想到这对她太不公平，于是，她坚决提出了周薪五千美元的要求，旋即回家等待答复。她等了很久，这是一场神经战。嘉宝在家完全没有工作呆了六个月，其间也没有人进行调解，但米高梅公司坚持不让步。最后，很可能是《肉与魔》的票房收入打破了这个僵局，此片于1927年1月9日上映，引起极大的轰动，公司认为与其拒绝嘉宝的要求而失去大笔财富，不如同意她再赚一大笔钱。因此，1927年6月1日，嘉宝与公司签订了一份长达12页纸的新合同。合同规定：自1927年1月1日起，嘉宝的周薪从6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第二年周薪4000美元，第三年周薪5000美元，第四年周薪6000美元。在好莱坞，只有吉尔伯特与公司签订的“百万美元合同”条件才比这优厚，对于一个在好莱坞则拍过三部影片、前来好莱坞不到两年的演员来说，居然能迫使最强大的影片公司就范并签订这样一份优厚合同，的确是很不错的了。

驾驭好莱坞的“瑞典女王”从1927年6月1日这份合同看，嘉宝从瑞典来到美国，作为一颗新星，已经征服了好莱坞，确立了自己的明星地位。从此后，一直到1941年嘉宝息影，她共主演了22部电影，平均每七个月就拍成上映一部。这期间，她已真正成了好莱坞的一号明星，好莱坞对她俯首贴耳，她成了主宰这个电影帝国的“瑞典女王”。

1927年11月29日，嘉宝主演的根据《安娜·卡列尼娜》改编的《爱情》一片首映。从这开始，嘉宝在影片片头上或广告上仅有“嘉宝”两个字，她不同于凡人一般有有名有姓，她没有必要再用其它字来代表自己，因为她已是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了。在这部影片中，嘉宝扮演的安娜渴望爱情，甚至把十岁的儿子当成了一个替代性的热恋对象，与他之间也有几场极富“性感”的戏。在拍摄过程中，嘉宝试图和吉尔伯特私奔，不过银幕下这场伟大的热恋史却成为人们引为笑料的喜剧。当他们跑到一位治安官在长滩的住所时，嘉宝突然害怕起来，她把自己关在厕所里，然后乘火车返回了家。

综观嘉宝主演各片，她扮演的总超不过情妇、妒妇、荡妇、淫妇等角色，她常为此而不满。1928年，她第一次演一个无懈可击的“好女人”，这就是《野兰花》。在这部片子中，她坚决维护自己和年老体衰的丈夫的婚姻，而不向少年英俊的爪哇亲王屈从。最使观众难忘的是，嘉宝在片中一反以往形象，活泼快乐、晶莹透明，优秀的灯光效果使嘉宝沉浸在各种不同的情绪中，其中包括影片中极具戏剧性的时刻：“当年轻的爪哇亲王打开卧室的门后，嘉宝全身沐浴在灯光之中，“他的身影爬上了她的身躯。”影片最引人入胜处不在于其情节，而在于对神秘的性心理的描写。当嘉宝看到爪哇亲王鞭打一个侍者时，她感到厌恶。那天晚上，一直渴望得到丈夫温情的她，梦见了那种鞭打，从恐怖中尖叫着醒来，她梦见了爪哇亲王，梦见了自己对他的渴望。

此后，嘉宝又主演了《神圣的女人》、《神秘夫人》、《风流女人》、《唯一标准》、《吻》等影片。这个时候，嘉宝已在好莱坞成为大红星，是

默片时代最受推崇的红星，被誉为“默片女皇”。

然而，这个时候，世界电影事业却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这场革命起源于广播事业的诞生。电台自1920年11月在匹兹堡成立第一家后，两年就发展到564家，广播员身价倍增，他们的收入超过当时红影星的六、七倍，人们惊呼：“全世界都被声音迷住了。”1927年，华纳电影公司推出第一部有对话声带的有声电影《爵士歌手》，观众排着长龙大队抢购该片影票。许多默片时代的大明星纷纷在银幕上开口说话。可以说，默片时代的江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同时许多红星也因此而倒台，嘉宝的恋人吉尔伯特就是其中一个。他曾是米高梅公司最卖座的头号演员，签有年薪150万美元的合同。可是他在拍他的第一部有声片《他的光荣一夜》时，吉尔伯特的声音虽清脆悦耳，但嗓子缺少共鸣声，导演安排他在片中不断喃喃重复“我爱你，我爱你！”刺耳的声调，引起观众喝倒彩。从此这位高居首位的演员直落千丈，米高梅公司再也没有给他安排角色。梅耶看到他已不具票房收入，为了撕毁他那份高酬合同，曾经阴谋暗算，让妓女把他拖下水，还在公众面前把他灌醉，借以破坏他的名誉，使他违反和公司签订的不在公共场合发生不名誉行为的条款。到后来，这个可怜的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没脸见人，再也不愿在公众面前出现，以后终于堕落成一个醉鬼。其实，在他的这部有声片之前，当吉尔伯特已经作好准备，要在南太平洋的一艘游艇上举行婚礼，搞得非常罗曼蒂克时，嘉宝却不干了。

在这种情况下，“默片女皇”怎么办？《吻》是米高梅公司拍的最后一部默片，人们普遍认为它标志着默片时代的正式结束。嘉宝如果再不说话，她将失业了。嘉宝尽管极为胆怯，极为紧张，她还是勇敢地接受了挑战，她试了音并主演了她的第一部有声片《安娜·克里斯蒂》（1930）。随着影片的上映，米高梅公司为此片推出的广告仅一句话：“嘉宝说话了！”嘉宝的崇拜者们潮水般地涌进剧院，热切地甚至有点担心地希望听听这位迷人影星有副什么样的嗓子。嘉宝在片中不仅演技精彩，维妙维肖，而且完全驾驭了令人生畏的有声电影。影片的开头，气氛异常热烈，而当镜头转向酒吧间观众第一次看见嘉宝时，一系列对话场面出现了。她的第一句话是尤金·奥尼尔笔下的郁郁寡欢的、仇恨男人的、在美国的瑞典人讲的话：“给我来杯威士忌，外加一杯姜汁啤酒，别小气啊，宝贝。”声调有点太高，语调也太平，讲出来不象出自一个自惭形秽、落魄潦倒的街头妓女之口，声调个别地方也有些走调，但声音却非常吸引人。有人说：“她的声音低沉沙哑，她那深沉的女低音所具有的魅力，和这位冷若冰霜的瑞典女王之成为世界影坛杰出女星所具有的诗意般的魅力，确实如出一辙。”这时，影迷们都如释重负。

嘉宝童年时代声调很高，1928年她回了一趟瑞典，就在这个时候，她已经决定采用更具有权威性的低沉的嗓音。此后，她把这一声调更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声音在观众心中唤起了某种奇特的情感，她的对白，不仅是表达情节的要素，还有一种感伤与不幸的味道。所以她日后所主演的有声影片，日益充满着悲观主义的色彩和一种极为哀婉的预兆。

1931年，嘉宝拍摄了在米高梅的第15部影片，扮演历史上最为放荡的一个荡妇——《玛塔·哈里》。然而，清洁脱俗的嘉宝主演哈里却起了净化作用，使这部片子未曾陷入罪恶的深渊。影片结束，大多数人记忆犹新的是这样一组镜头：这位穿着东方服饰的怪诞神秘、瘦骨鳞峋的女主角嘉宝，

扭动着屁股围着一尊巨大的东方塑像舞蹈求爱，这尊塑像也似乎淫荡地抱起她。最后，舞蹈以她戴着面具、背对镜头、小心翼翼地脱下衣服而结束。

1932年，嘉宝扮演她有生以来最受欢迎、但也是最短的一个角色，即《大饭店》中的芭蕾皇后克鲁金斯卡娅。该片写的是大萧条时期柏林一家大饭店里各色人物的不同经历。年事已高的芭蕾皇后的自杀行为使珠宝窃贼十分吃惊。她问：“你是谁？”“一个爱你的人”。对此的回答只能是：“我想一个人呆着。”该片演员阵容庞大、名优林立，但嘉宝所拿片酬最高，为608万美元，比另一位巨星克劳馥高八千美元。万人争看明皇大荟萃。然而奇怪的是，《大饭店》尽管获得了成功，但是奥斯卡评奖中仅获一个最佳影片奖，演员、导演连个提名都没有，这种情况在颁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回，也许明星大多反而互相抵消，结果大家只好坐冷板凳，这也是米高梅所始料不及的。

最能反映嘉宝在好莱坞所享受的帝王级待遇的，是她与米高梅公司续订的合同以及根据该合同而主演的《瑞典女王》。嘉宝在美国期间，始终只与米高梅签订合同。1932年4月24日与它的合同期满，之后又进行了续订，这份合同意味着米高梅公司内部已同意专门成立一个她个人的制片公司——峡谷制片公司。公司为了顺从嘉宝的意愿，合同连期限也没有，而且根据合同，公司将拍摄两部由她主演的影片，她有权根据自己的意见指定开拍日期。合同最后一部分规定是嘉宝的酬金，酬金高达帝王收入的水准，每片25万美元。但是同公司赋予嘉宝的权力相比，这笔酬金还是微不足道的，对公司所起用的导演，嘉宝有权不予同意或者自己提出候选人，她有权要求公司事先将影片中担任主要男女能的演员名单（限四名）让她过目。

在拍片上，最能反映嘉宝帝王级待遇的就是《瑞典女王》一片，在开拍前，根据嘉宝的意见，导演筛了又筛，换了八个人选才定下来。片中主要演员都是经嘉宝本人亲自圈定的。包括那位俘虏了女王并加速其退位的西班牙大使的扮演者劳伦斯·奥立佛。劳伦斯当时已是闻名英伦的明星，与嘉宝拍戏，他从一开始就胆战心惊，诚惶诚恐，因为当他第一次和她见面时，就意识到，他很难了解她——“她象羚羊一样的怕羞”。他曾试图和她搭话聊天，她却只用一、二个字来回答。他俩合作排练时，奥立佛说：“导演要我走上前去，温存地搂住嘉宝苗条的身躯，对着她的眼睛看，以此焕发她内在的激情……我进入了角色，用尽了浑身解数，但是只要我的手一碰到她的身体，她马上变得冰冷。我可以感到，她突然浑身肌肉都僵硬了。”他们排练了一次又一次，结果总是这样。导演把脚本一掷，叫声停拍，恼怒地大声喊道：“我的老天爷啊，这个女人能对哪一个男人热情温存呢？”这时一个技术人员开玩笑地嚷道，“约翰·吉尔伯特。”于是他们赶紧把吉尔伯特找来。开拍后的第十二天，嘉宝给公司法律部门送去了一份这样的备忘录：“特此证明我同意由约翰·吉尔伯特代替劳伦斯·奥立佛。”奥立佛是嘉宝亲自圈定的，也是与公司签订了合同的，但是嘉宝为了自己的异想天开，为了帮助昔日的情人，给这位已陨落的明星送来重登青天的云梯，却使米高梅公司赶走了一个年轻的明星，使奥立佛蒙受奇耻大辱，这在影片摄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稀罕事。同时也鲜明地反映了嘉宝在好莱坞的垄断地位。

《瑞典女王》于1933年12月26日首映，这部影片与其说是瑞典电影史上的一页，倒不如说是嘉宝神话的注解。编剧和导演把嘉宝所有的内在情绪堂而皇之公开加诸瑞典女王身上。最典型的，当然也是最伟大且最受人推崇

的还应数卧室里的那一场戏。嘉宝在卧室中抚摸每一件物品，似乎每一件物品是伊甸园里幽会之处的纪念物。这时，吉尔伯特似颇感兴趣，又颇为迷惑不解地看着嘉宝。嘉宝把手当作探矿的魔杖探索着爱情的源头，她抚摸四壁，象双目失明的阿特洛波斯命运女神那样旋转着纺机轮，似乎是在用大剪刀割断着命运之线。然后嘉宝又拥抱起那极象男性生殖器的、使人动情的锥形的未纺羊绒线轴，倒在床上，把面颊紧紧地贴在床单上，好象把它当成了情人的胸膛，然后她又象雷电般地漂越过宽大的床，把自己紧贴在床栏杆上，表现出当时好莱坞所敢于表现的一种近乎情欲高潮时的欢快。她的演技如此使人颠倒，因为她能在表演欢乐的同时也表现哀伤。当她说：“此时此地，这一切都将永远活在我心里”时，表现了一种黯然的悲伤，使人感觉出，她在感受一种难以名状的欢乐时便已准备承受某种损失与孤独了。

以后嘉宝又拍了《安娜·卡列尼娜》（1935）、《茶花女》（1937）、《征服》（1937），此时，在整个好莱坞，她是除了明星兼制片人的卓别林之外，酬金最高的天才艺术家，嘉宝正处于她的权势之巅和艺术鼎盛时期。

“一个谜语中的神秘事物里的谜”

邱吉尔曾对二战期间的一亿六千万苏联人作过评价：“这是一个谜语中的神秘事物里的谜。”嘉宝正是这样一个人，尽管她在事业上已成为全球关注、仰慕的对象，但她的私生活却极为隐秘，颇费猜测，人们始终觉得她就是一个谜。

谜中之一，在一个演员心中，观众就是上帝，然而在嘉宝眼里，观众却是一些十分可怕的人。她非常害怕群众。她从不喜欢人打扰，她在拍片的时候，和其他人一起看起来很从容，可是如果有个外来人，不管是谁，只要来现场偷偷看她一眼，即使离她有一英里那么远，她也会在一、二百个临时演员中发现那个陌生人，马上悻悻地回到自己的化妆室，不等到那个陌生人被撵走就不出来。

同时，她对公众没有起码的信任感，她使自己的任何情况都尽可能地不对外披露，她自己成名前的经历、自己的习惯爱好、自己的住址乃至最普通的家庭情况都不愿说。尽管这样，她却还是喜欢听别人对自己的评论，她虽然很害怕记者利用她的软弱之处，但她仍然喜欢阅读他们写的有关她的文章，直到晚年，她还是贪婪地阅读着，她母亲给她一捆捆地邮寄欧洲的杂志，米高梅驻各地办事处也给她寄新出版的法文、德文或瑞典文杂志。

嘉宝外出旅行，住旅馆总是使用化名，她几十年使用过许多化名，后来终于固定下来自称“哈里艾特·布朗”作为旅行用名。她进出旅馆时，一顶大草帽遮住了五分之四的面孔，连帽沿下那副太阳镜都看不到。上车时，她一个箭步就钻进汽车，进旅馆门时，“象一颗子弹一下射进电梯。会见别人时，她在毫无阳光的起居室里，脸还罩上一层面纱，使人想起一个修道会信徒式的人物。

谜中之二，嘉宝性格十分孤僻，不愿社交。她一般不与外界交往，她生怕自己被人注意，所以总是经常搬家，形成了一种搬家癖。每当她在一幢房子里住上一年多，这幢房子就会变得过于出名了，或者她还怀疑房子已太引人注意，于是，她就经常搬迁。她从不给人写信，也不阅读外界给她的信。她所有的信件，除有规定暗号者外，一律转她的代理人办公室。后来，瑞典

驻纽约领事馆也收转城市人寄给她的信件。有一次，她的侄儿给她写信，但对是否能收到她的回信却没有把握。她也从不接电话，她的管家得到命令，凡有电话都以管家的名义回答，除非发现打电话者是受欢迎的人。

嘉宝不愿社交是由于她害羞决定的。很少听到她宴请任何人，以致当有一次圣诞节，她的朋友接到她的邀请时，大家都感至十分惊讶，她一般也不参加别人的宴会。有一次，美国白宫方面请嘉宝的一位朋友代为说情，请她去参加肯尼迪总统宴请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宴会，嘉宝立即推脱说没衣服穿，朋友坚持说陪她上街去挑一件晚礼服，只需花 10 分钟就行了。嘉宝责备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十分钟？’你难道认为每天都可以见到女王的吗？”最终她还是没去谒见女王。她的这种习性已经众所周知。但是有一次她却主动要求去参加一次聚会，使众人都大吃一惊，可去了后她还是对众人的注意十分不快，独居一隅，最后也早早退场。

谜中之三，嘉宝有着一一种谜一样的性格和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癖。她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对她的性格作了典型的概括：“她是那样敏感、自私和天真直率，甚至还很固执倔犟，反复无常，完全象一个丝毫未受成人管束的任性的孩子。”嘉宝的生活方式极为惊人，表现出一方面以自我为中心，另一方面又茫无目标的生活态度。她虽周薪五、六千美元，但她的管家却得到命令，每日家用不准超过一百美元，幸亏嘉宝很少宴请别人！管家把所有单据一张张分别别在嘉宝给她用的一个黑本子上，供嘉宝查阅，嘉宝和许多不习惯大手大脚的人一样，对处理小笔钱甚为精明。据管家回忆说，有时他买了一些杂志回来，杂志上如果没有刊登有关他的这位著名女主人的文章时，他就得去退货。还有一次，她从柏林回斯德哥尔摩，一个职员送她上火车，当火车徐徐启动时，她突然想起来：“啊，我忘了付这项款子了，你替我付一下好吗？”这个职员一面把帐单打开，一面提心吊胆是什么昂贵的奢侈品，哪知却是一张修鞋的帐单，一美元！

在饮食起居上，嘉宝也很怪。她一日三餐早餐胃口特好，是丰盛的斯堪的纳维亚式早餐，水果汁、一个柚子、奶油牛肉片、炸土豆、一个鸡蛋、咖啡和咖啡蛋糕，她百分之八十的早餐都是在床上吃的。平时除了薰衣草香皂外，她不用面油和其它任何化妆品，除了梔子香水外，她不用别种香水，而且只用英格兰进口的春黄菊茶洗头发，这也就是她仅有的一点奢侈了。

嘉宝穿着朴实随便，生活简朴在好莱坞是出了名的，她的衣服简单得不能配套。由于实惠，她喜欢穿男睡衣，男衬衫，戴上领带。冬天她穿轻便毛袜，夏天她穿棉绒织的半统袜。嘉宝实在太美了，简直无懈可击，有人说她的一双脚很大，实际上嘉宝的脚长得很美，和她的身高比例是相称的，只是她有个坏习惯，总爱穿一双棕色的大拖鞋，给人的印象是：“莲船盈尺”。曾与嘉宝在《茶花女》中配戏的巨星罗勃·泰勒曾说：“她就是那个样子，爱情场面也好，生离死别也好，总是穿那么一件拖地的漂亮华丽大裙子，可是我知道，在裙子下面，她穿着一双肮脏的旧拖鞋。”

她那种随便的性格使她在社交场合也很随便。有一次她到一个朋友家做客，在园子里的橄榄树下一张旧桌子上摆了菜肴和美酒。宾主要用餐时，不料，天下起了阵雨，主人一边抓了几件东西，一边唤人把桌子搬到屋里去，而这时的嘉宝却泰然自若地说：“用不着，我们把酒菜放到桌底下，就在这儿吃。”于是，她在雨水象瀑布那样从桌面上流下的桌底下，自得其乐地、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谜中之四，嘉宝是孤独的，她也喜欢寂寞。她说：“对于一个瑞典人来说，孤独是非常自然的，就象美国人喜欢‘凑热闹’一样”。她锻炼时，也要在周围没有人，一旦发现有人在注视她，她就象受惊的小鹿一样跑了。她最喜欢的活动是，在雨天，穿上雨衣，戴上航海帽或打着雨伞在雨中行走；或者乘月夜在好莱坞近郊农村的地区漫步。她多次明确说过：“我愿一个人呆着。”也许正因为如此，她喜欢小动物。她有几个宠物：一只名叫“小小”的中国种狗；两只猫，一只叫“大品脱”，一只叫“小品脱”；一只鸚鵡叫“波利”，嘉宝试图教这只鸚鵡，让它在她工作完毕回家时，叫一声“葛丽泰，你好。”

谜中之五，嘉宝一生未婚嫁。她虽然和吉尔伯特有过一段激动人心的恋情，但终未能成眷属，吉尔伯特后来迅速和英娜·克莱尔结了婚，他因有声电影而倒台时，嘉宝还在《瑞典女王》里拉了他一把，但他却未能重振雄风，他日益堕落，大量酗酒，最终于1934年死于心脏病。此后她也经历了几次爱情波折，而且每次都笼罩着浓郁的神秘色彩，其中也不乏引人注目者。

1937年，嘉宝与一位暴君般的男人相遇引起了人们的无限兴趣，他就是好莱坞著名的音乐指挥和音乐歌舞片导演斯托柯夫斯基，当时55岁，比嘉宝大23岁，两人一见面就有着强烈的有选择性的相互吸引力。两人都狂热地讲究生活艺术。斯托柯夫斯基处于中年的危机时期，已和妻子离异，因此很关心健康问题，即如何保持青春。嘉宝一向在食品方面追求时尚，此时她正热衷于“瑜伽加酸奶”的经验。但斯托柯夫斯基是一个爱音乐、爱自己胜过一切的人。他曾在浴室模仿希腊雕塑的姿态，赤身裸体，手拿指挥棒，颇为得意地照了一张像。两人于1938年3月租了一栋别墅，开始同居。这一事件受到了国际新闻的包围，他们这种伴侣关系自然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终于达到了尽头。这种关系增加了彼此的吸引力，但最后也许使双方都精疲力尽了。

嘉宝是很特别的，但是她正是运用了这一独特性来发展和保护自己。她的成功就在于她的独特性的成功。她在给朋友写信时谈到好莱坞说：“他们这里没有我这种类型的人”。她那独特的气质和风格是举世无双的，也正是这使好莱坞对她着了迷。一位评论家说：“她代表了我们来十个著名明星的总和。”嘉宝日后并把这种独特性进行充分运用，她的演技，她的声音无不是她哀婉悲切，孤寂自在的内心流露，以致于后来，编导们为了迎合观众对嘉宝的了解（也许是他们心目中的嘉宝），越来越多地取材于她那郁郁寡欢的实际生活。

正因为嘉宝对自己的这种独特性的悉心运用和多方保护，她的古怪性格却为大多数人所喜欢。尽管别人与她交往时对这种性格感到很不舒服，很讨厌，但人们却只要一见到她就都原谅了她，并很快喜欢上了她，把一切厌恶忘得干干净净，这正是她那异乎寻常的天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观众也十分喜欢她，她的形象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价值。世界各地纷纷利用嘉宝的名气。美国公司用“嘉宝裙”做广告，古巴有一家商店做一种“美容粉”的广告说：“我（嘉宝）不可一日无此粉……我浴后用此粉就具有一种事业上的快感”；更有甚者，纽约某垃圾回收公司的专利权名单竟赫然印着“嘉宝”商标，引起了米高梅公司一阵恐慌，但他们也无可奈何：“看来……要阻止‘嘉宝’二字和垃圾筒联系是相当困难的，……但估计没有人会把两者混淆起来。”

然而，使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在她事业的巅峰时期，她一方面自己解开了“嘉宝之谜”，另一方面却又留给了观众一个更深更大的谜。

1939年11月9日首映的《尼诺奇卡》，用了巨型广告“嘉宝笑了”，它戳穿了“嘉宝之谜”。影片对嘉宝一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态狠狠开了一个玩笑，它把这种冷若冰霜的神态变成了多情的迷恋。“你愿不愿意孑然一身，同志？”一位滑稽的政委问。“不”，她一个字回答，打破了她的神话。嘉宝对导演设下的这个毫无感情的人物同样注入了自己的感情，这无疑是自身的表演和写照。

而她拍的最后一部《双面女人》则以她砸锅为代价，最终解除了她浑身所笼罩的一层神秘的光环。这部电影1941年12月31日首映。按照导演的要求，嘉宝专门进行改装，把头发剪得短短的，穿上袒露的服装以显示她的曲线，在某些场景中，还必须以一个酷爱户外运动的女郎的面貌出现，表演游泳和滑雪的动作。为此，她还专门请另一位巨星凯瑟琳·赫本从纽约把她那件因此而获极大成功的游泳衣寄来。而在室内的舞池里，她又得变成一性感明星，差一点成了供寂寞士兵钉在墙上观赏的妖艳女郎。但谁也没有料到，这部喜剧片招来了狂风暴雨般的指责。一位著名评论家攻击说，嘉宝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对待婚姻的态度是违背基督教规的，……厚颜无耻，含有猥亵意味……对公众道德有危害性，服装淫荡无耻。”（不是指游泳衣，而是指舞池里领口开得很低的晚礼服。）尽管这是一部没有真正性行为的喜剧片，但却是一部十足的色情喜剧片，道德协会强烈加以抵制。同时，由于嘉宝在同一部有声片中扮演两个角色，不论她的演技多么精湛，嘉宝所施放出来的魅力马上消失了，观众意识到这仅仅是“艺术”，一切有关她那种神秘性格的幻觉消失得无影无踪，幻觉消失了，嘉宝的神奇魔力也消失了。嘉宝是一个非常怕羞的人。敏感得象一座地震仪，评论界没有原谅她，嘉宝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她强烈地感受到了失望和痛苦，她在最后一部影片中说：“在这个苛刻无情的新世界里，再也没有我的一席之地了。”这句话颇象她的自述。就在这部片子拍完后，她在这种多少女明星可望不可及的荣誉巅峰之上，神秘地隐退了，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谜。

息影后的嘉宝

对于嘉宝的引退，她的一个朋友曾打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攀登过悬崖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正当他们在山顶上安静地休息时，偶尔朝下一望，会猛然一惊，患起眩晕症，他们顿时双膝发软，头晕心跳、胆战心惊地走下山来。嘉宝也许就是在她事业的高峰时产生了那种心情。他询问嘉宝为什么这个时候离开电影界。她仔细思量了一会，终于自言自语他说道：“我装腔作势地过够了。”

对嘉宝这一行动，好莱坞另一位巨星褒曼也大惑不解。她说：“你能想象到吗？她当时才36岁，这是一位极为美丽聪明的女演员，而从那天起，她就不干了。你能想象这些年来，她早晨起身后，做些什么？假使她有儿孙，那又当别论，但她却那样地寂寞啊……”

其实在这段时期，她并不完全是孤单一人独自生活。她经常有人相伴而行，但是从来没有永久性的固定伴侣。英国摄影师和服装设计师赛西尔·比顿爵士陪伴了嘉宝很长一段时间，并向她求过婚，嘉宝回答他说：“我们永

远不会相处得很好的。此外，你是不会喜欢每天早晨看到我穿一身老头穿的睡衣的。”“我也会穿一身老头睡衣。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相处得很好的——除非我在盥洗室里吹口哨可能会使你焦躁不安。”“你真是肤浅，一个人是不会根据别人在盥洗室里的习惯来计划自己的生活的。”“啊，不会——你只会因为我过分高兴而担心，你是我高兴的原因。”“真怪，除了你以外，我从来也不让别人摸我的脊椎骨，因为它们很容易错位。”

后来，乔治·斯切利又走进了嘉宝的生活。斯切利是一位金融家，操纵着嘉宝息影后的生活。他是俄罗斯人，学识渊博，和蔼可亲。他住在纽约，替他的妻子瓦伦蒂娜管理她所开的女式服装店。他能为嘉宝办一切她认为非常可怕的事情。他帮嘉宝安排与外界的各种联系，旅行沿途停靠的港口、海关和移民局，并保证随时提供昂贵的交通工具，如游艇、私人飞机和随叫随到备有司机的高级轿车。这就是嘉宝和斯切利长久密切关系的关键。所以，斯切利可以说是嘉宝理想的伴侣。她喜欢他那刚毅严谨、井井有条的作风，他们在一起很幸福。以后，她又搬去与斯切利夫妇一起住，以便能经常和他在一起。然而，1964年斯切利突然患心脏病去世，当时他正和嘉宝住在巴黎。嘉宝见他死去大惊失色，逃到了朋友家去住，完全由瓦伦蒂娜来料理后事。此后，嘉宝和瓦伦蒂娜虽然继续同住在一个公寓里，但却很少见面，嘉宝又一次孤独一人了。

嘉宝总是梦想过一种宁静甚至隐居的生活，她也有这个经济条件。据估计，嘉宝的个人收藏品至少价值3000万美元，她早在40年前就购置了一批雷诺阿、希勒、弗拉曼克、克里木特、亚夫伦斯基等名画家的真品。嘉宝很清楚怎样保存金钱的价值。自1933年起，她便开始在纽约和洛杉矶购买房地产，据说已经拥有相当一大片贝弗利山最豪华的商业大街——罗迪奥大街。嘉宝还在纽约市内最漂亮的公寓之一里拥有一座面向纽约东河与联合国大楼的七室套房。这是她在50年代中期花1.4万美元买下的房产，时至今日，一套相差无几的套房估价已高达220万美元，套房里还配有一批18世纪的法国豪华家俱。她的一位朋友说，他在40年代未曾有机会观赏到嘉宝的股票夹，说她那时就有10万美元的股票，由于她羞于与热衷于转手倒卖者为伍，所以那些票证历经半个世纪，现在价值已经高达100万美元。据讲，嘉宝的朋友兼营养师豪泽于1940年把贝弗利山的一块地皮作为礼物送给了她，只此一项，她每月便可得1万美元的租金。另据报道说，曾有一项信托专款保证嘉宝在50岁（1956）以后，每年支付她25万美元的生活费。早在1942年，嘉宝就是拥有好几百万美元的百万富翁了。嘉宝死前立下遗嘱，全部财产归其侄女赖斯菲德，侄儿斯凡却分文未得。

在生命的晚年，嘉宝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清晨，她一如既往地做瑜伽功。早餐和洗浴完毕，她爱站在凉台上看看天气，然后再穿戴打扮。她经常把整个上午都消磨在电话机上，与朋友们闲聊，或者出门去采购。中午在房间内吃饭。下午散步六公里是嘉宝每日必做的运动。有时有人陪伴，但常常是独来独往，“一天不散步，她就觉得离死神更逼近了些。”

嘉宝晚年最喜爱的另一项活动是逛商店和画廊。她穿着一件斗篷式的黑外衣，头上戴着可以遮住脸的帽子，有时还穿长裤。就年龄而论，她的步履尚属矫健，但后背已日渐微驼。她把大商店和小古玩铺都巡视一遍，但什么也不买，害得售货员空欢喜一场。她的另一种嗜好是追求唇膏和色彩明快的开司米高领套衫，并对此花了许多心血。不过，她对女士们几乎人人垂青的

香水和除臭剂却从不问津。她散完步后爱到别人家串门。她曾对朋友说过：“如果您听到不速之客按门铃，那就一定是我，您不会拒绝请一位年迈的女士喝杯茶吧。”

近 20 年来，嘉宝每逢春季都要应维那泰尔的邀请到瑞士去，在山中别墅躺在一把铝制长椅上晒太阳，然后到希腊、法国、英国周游一番，再回到纽约去收拾那一大堆她从来就懒得看的来信。

进入 70 年代，嘉宝明显变得衰老起来。她长期忍受着结肠憩息的折磨，并患有关节炎。到 80 年代，这些症状日趋严重，随着急性神经衰弱的发生，又出现了复杂的综合症状。1987 年春季，嘉宝在客厅里被吸尘器绊倒，扭伤了踝骨，从此不得不把坚持了近 50 年、每日 6 公里的散步放弃掉。她想起许多旧友都已故去，不觉风烛残年之感顿袭心头。1989 年 9 月初，她结束了最后一次瑞士之行，赖斯菲德和她在新泽西当牙科医生的丈夫唐纳德，每周三次派车准时接她上医院作透析治疗。去世前 4 天的星期三，她再次被送进医院，一位跟踪她 11 年的摄影记者最后一次目送她离开住所，随着快门启动的喀哒声，底片上永恒地留下了一副老年妇女无可奈何的顺从表情。

1990 年 4 月 15 日深夜 11 时 30 分，世界影坛最伟大、最杰出的女演员之一，葛丽泰·嘉宝在纽约溢然长逝，终年 84 岁，当天，几乎各国的报纸都以醒目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这条新闻。虽然她患有关节炎和胃炎，但最终致命的却是肾病。死后第二天，尸体在新泽西火化，她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夙愿——永远不再被任何人打扰了。

“奥斯卡”钟情的影后： 凯瑟琳·赫本

1982年3月29日晚，洛杉矶地区风雨大作，前来参加第54届奥斯卡颁奖仪式的影星们下车后急急奔进会场。然而最使他们难忘的是，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妇人居然使众多艳丽的青春红星黯然失色。她荣获本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这是她自1933年来第12次被提名，第四次摘取此桂冠了。不仅在好莱坞，而且在世界电影史上，这都是绝无仅有的。她，凯瑟琳·赫本，以她那长久的艺术生命和耐人寻味的表演成就在好莱坞影后谱里占着独特的一页。

我要“吉米”和戏剧

1909年11月9日，凯瑟琳·赫本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在诸多好莱坞巨星中，她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赫本的父亲汤玛斯·诺瓦尔·赫本毕业于霍普金斯医学院，是哈特福德有名的外科医生，泌尿学专家，性卫生研究的开创者。他风流倜傥、身高体壮，能打一手好高尔夫球，在朋友们中间是一个极受欢迎的人物。母亲凯瑟琳·休顿是一位知识妇女，毕生最热心的是政治活动，曾为改善妇女工作条件在白宫前示威过。赫本夫妇共有六个子女，赫本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赫本父母对教育孩子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不知不觉地传给了儿女们。孩子们刚会说话，父母就鼓励他们就各种题目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一定要把这个问题争论透彻，直到大家都精疲力竭为止，以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一种坚强的韧性。他们还大力鼓励孩子们投身生活，热爱生活。赫本四岁时，母亲就把她带到公共场所去宣传妇女应该从家庭琐事中解放出来的道理。父母还培养他们一种信念，只要奋斗就有成功的希望，任何东西都是经过刻苦努力后获得的。

赫本小的时候性格比较淘气，具有很多男孩子的性格。她喜欢男孩子所喜欢的一些活动，比如踢足球，她常和男孩子们在一些沙场地里踢球，有时甚至把男孩子们撞倒，很有些“假小子”的味道。她很喜欢打架，因为常和男孩子一起玩，所以处处都表现出一种男孩子的风格，无论什么事都要自己赢了才罢休。与姐妹们争论时，非要她胜了才行。与别人打架时，没有打赢，她会使尽全力跟别人打下去。为了打赢，她在夏天还把头发全部剪光，让别人抓不住。有一次，邻居说她小小年纪，身体又纤细又虚弱，她很生气，为了显示自己有力气，她把头一低，勇敢地向一棵树冲去，把头撞得鲜血直流，然后把脑袋转过来说：“我比树还硬。”赫本还希望自己能真正成为一个男孩子，那该多好啊！于是，她给自己取名为“吉米”，在美国，这是一个只有男孩子才用的名字。

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是康涅狄格河航运顶端的入口港，气候凉湿，夏季多炎热，赫本在这里养成了一种自幼喜爱并终身受益的习惯——喜欢游泳和洗冷水澡。她只要有时间，就和小伙子们跑到康涅狄格河里去畅游一番，在水里嘻笑逗闹，赫本快活极了。她因为喜欢游泳，也养成了一种洗冷水澡的习惯。即使在冬天，她也会“扑通”一声跳进冰凉的水里。在家里她总是用凉水洗澡。一出浴缸，她母亲就用大毛毯裹住她赤裸的身子，把她抱到火

炉旁取暖。喜爱游泳和洗冷水澡，使赫本自幼锻炼出一种不怕苦的良好品格，但却同时也使她从小很任性。

凯瑟琳自幼就酷爱戏剧，尤其是莎士比亚剧。她常常和兄弟姐妹在家里演戏，因为兄弟姐妹多，所以演戏剧成了他们家里经常性的娱乐活动。赫本总是扮演主角，如若不然她就不干，因为她是最大的女孩，没办法，大家总是让任性的凯瑟琳演主角。有一次，在家里演《鹅妈妈的故事》里的“蓝胡子”，赫本扮演那个谋杀妻子的丈夫。房门紧锁，禁止出入，赫本戴着一个用染料染成的蓝胡子，煞有介事地把妻子全部杀掉。她还组织孩子们进行义演《美女与野兽》，她在剧中扮演一个获得美女爱情的野兽。整场表演、特别是最后美女在花园里的石洞旁找到奄奄一息的“野兽”那一段，她演得精彩极了！观众都被感动了。演出取得了成功。这是第一次登台，赫本增加了自信。此后她更是对戏剧如醉如痴。

1924年，赫本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莫尔学院学习。其实，赫本非常讨厌学习，只是对戏剧表演有兴趣。但是为了争取能在学校里参加戏剧演出，她还是不得不考一个好分数。老师对她很头疼。知道她不喜欢读书，但她每次考试分数都很高，老师也奈何不得。她在学校里除了学习外，一切时间都花在学习戏剧表演艺术上，甚至都有点走火入魔了，言行举止模仿着戏剧人物的姿势。有一次，她走进学校餐厅时，完全象一个剧中主角走上舞台一样。她骨瘦如柴，但却把身体挺得笔直，头抬得高高的。见到此情形，满屋子人都莫名其妙，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搞不懂这是什么一个人物。终于，有一个学生忍不住说：“臭美！”全餐厅的人哗然大笑起来，本来内心就恐慌的赫本立即兔子似地逃走了，甚至接连好几个月都不敢迈进这个餐厅。但是她由于成绩好和酷爱戏剧，而且精力充沛、活泼好动，终于得以经常在学院里参加演出，特别是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其中最有名的是1928年她临毕业的四年级时的一次演出，那天演出《月亮里的女人》，她扮演潘多拉，打着赤脚，身穿一件白长袍，头上戴着一顶花冠。她把剧中潘多拉时而沉默不语、时而羡慕虚荣、时而又英勇好斗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赫本精彩的表演赢得了全院师生的热烈掌声。这使赫本大受鼓舞，她发现自己不仅对戏剧和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也有在每出戏里演好角色的信心。于是，她决心大学毕业后矢志从事表演艺术。可以说是兴趣鼓励着她，是成功坚定了她，这时，她不满19岁。

虽然已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可是赫本对自己的长相和身材一点信心也没有。正是女孩子都亭亭玉立、如花似玉的年月，她却长得骨瘦如柴，满脸雀斑，而且声音特尖，刺耳沙哑，会令许多人感到不舒服。但是，另一方面，或许是由于经常从事戏剧表演，为剧中人物所潜移默化的结果，赫本这时候已经很有些雍容华贵、气质高雅了，充满着十足的贵族小姐派头，所以在大学里，倒也有不少男孩子追求她。但是，在与小伙子的约会中，她也总象是在舞台上，她总是在象背诵台词一般，兴致来了，有时她甚至独自讲上好几个小时，可怜的小伙子连说一句表白的话的机会都没有。然而，当她发现自己讲得过多而停下来时，马上又觉得时间不早了，于是她马上命令：“我们回家，马上走！”弄得小伙子哭笑不得。而且，她严正地洁身自好，绝对不允许男方有任何一丝邪念，甚至接吻也只是蜻蜓点水似地来一下，弄得小伙子索然无味，或者敬而远之，或者退避三舍。

不过，固执任性的赫本最终还是在大学里爱上了一个男生。那是在临毕

业的一次舞会上，一个举止高雅、风度迷人的高个子男孩向她走来，请她跳舞。他们配合得极为默契，谈吐融洽，而且赫本发现，自己同他在一起，完全没有了与别的男生在一起时的长篇大论和胡说八道。不知不觉地，赫本喜欢上了他。他是拉德洛·史密斯，29岁，来自费城的一个富家子弟，当时在布林莫尔学院寄宿学习。他喜欢那种贵族气派很浓的女人。此时赫本虽然只有19岁，但却也端庄矜持，气质高雅，不禁使他一见钟情。1928年12月，两人结婚了，这是赫本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她唯一的一次婚姻。然而，这不是一对如胶似膝的夫妻，尤其是赫本不愿意大学毕业后就被束缚在家庭里，做一个史密斯太太，她无法抑制自己对戏剧表演的强烈爱好，她渴望着登上舞台。所以，这对夫妻在度过短暂的一个月蜜月之后，赫本就搬出丈夫的家，离开费城，到纽约去寻找演戏机会。纽约有全国著名的娱乐中心百老汇，她向往百老汇。赫本在纽约住的是一间租来的简单便宜的公寓，与当初和丈夫两人住的豪华的别墅简直无法相比。但她还是走出了家庭。史密斯每个周末到纽约与她团聚两天，不过，夫妻关系当时仍然很好。不久，她经熟人推荐，加入了著名的巴尔的摩剧团，并随剧团参加了《查理纳》等舞台剧的演出。因为有自幼的戏剧熏陶和良好的素养，赫本的演技得到了人们的喜爱，赫本终于走上了自己的理想之路。1932年，赫本又主演了《勇士的丈夫》，在剧中扮演一个“清秀而骄傲的金发女郎”。赫本塑造形象极为成功，演出非常精彩，观众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从此，赫本在百老汇崭露头角，一举成为百老汇轰动一时的剧团新秀。

早晨的荣誉

正是戏剧舞台上的成功使她走上了银幕。在她演出《勇士的丈夫》时，好莱坞的雷电华影片公司正准备推出影片《离婚起诉书》，然而剧中一个神经错乱者的女儿这一角色人选却还未物色到。一天，该公司的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观看了赫本演出的《勇士的丈夫》后，发现她的性格与众不同，而且外表楚楚动人，他觉得她这种形象在银幕上可能更加吸引观众，于是便鼓励她来公司试镜头。谁知一试镜头竟大出著名导演乔治·顾柯的意料之外。她虽然是初次接触摄影机，表演显得有些笨拙、粗糙，让人多少很失望，但在摄影机前她却一点也不显紧张，并且比在舞台上更能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感情。顾柯说：“她非常了解摄影机，与我以前所见到的演员迥然不同。”起初，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她太古怪了，毫无可取之处。但是在一场需要浓厚感情气氛的戏里，她有一个动作——拿起一个杯子来，这时镜头正对准她的背。出人意料地，她使人产生了一种极为强烈的感受，她使你感觉到了她拿杯子的动作的份量。”顾柯认为她的那段表演说明她有很深的造诣，大卫·塞尔兹尼克也同意他的看法。于是，雷电华影片公司选中了赫本，这是她所接受的第一部片约。

在美国，搞戏剧的人历来瞧不起好莱坞，那里就好比世界的尽头，但是雷电华决定以周薪一千五百美元雇用她，这使她简直不敢相信。她想，既然对方肯出如此可观的薪水，倒不妨到那个被人鄙视的、粗俗的好莱坞走一趟，看看它究竟怎么样。这样，1932年7月1日，凯瑟琳开始了对她来说意义重大的好莱坞之行。她带着笨重的行李，红头发随便地梳成个结，身上穿着件不太合身的灰色丝绸衫，头上带一顶不伦不类的平顶帽，从纽约来到了好

莱坞。

初到好莱坞，凯瑟琳心都凉透了。雷电华是好莱坞最荒凉的角落，使人感到十分压抑。更糟的是，这部影片从开始拍摄就风险很大。赫本在剧中的角色关系到整个影片的成败，而这部影片的成败又关系到凯瑟琳的银幕生涯能否走下去。影片开拍时，拍摄脚本还没有最后完成，编剧只好坐在摄影机后面，一边拍戏一边把脚本打印出来发给演员们熟悉台词，这对于习惯舞台演出的凯瑟琳来说，是难以适应的。重要的是，凯瑟琳完全不喜欢，甚至极端蔑视好莱坞的浮华和鄙俗，处处有意显得自己是个职业的反叛者。第一天拍片中途休息的时候，与她搭档的好莱坞著名男影星约翰·巴里摩尔请凯瑟琳到他的更衣室去。凯瑟琳去了，可巴里摩尔突然把全身的衣服脱光。凯瑟琳大吃一惊，吓得连连退缩，在墙角里站住。

“我亲爱的，”巴里摩尔说，“每一个年轻姑娘跟伟大的约翰·巴里摩尔做爱都会感到很刺激。”

“我可不行！”凯瑟琳惊恐地说，“我爸爸不允许我生小孩！”

接着，巴里摩尔伸手去捏她的屁股。“住手！你要再这样，”凯瑟琳说，“我就罢演！”“哦，是吗？我还不知道你已经演戏了呢，我亲爱的。”巴里摩尔尖刻地说。接下来，他挨了一顿揍。

《离婚起诉书》如期在一个月后拍完。凯瑟琳虽然是初上银幕，但凭她的天才和本能，她表演得还是很出色的。影片一开场是她从楼梯上走下来，并叹了一口气，凯瑟琳未着一言，但仅此一走一叹即魅力四射，征服了乔治·顾柯的心。样片预演时，是凯瑟琳最紧张的时刻，有一个观众喊起来：“好一张难看的脸！”但当样片放映结束时，大卫·塞尔兹尼克描绘了当时的情形：“每个人都惊得傻了眼。现在当然人人都承认这张使人惊叹不已的脸了。就在那场戏中，赫本走过了一个大布景房，巴里摩尔从这间房里走出来，说他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于是她抓起一个枕头，独自在橱柜边躺下了。观众这会儿才第一次看清了她，他们看见了她漂亮的动作。此刻她成了一个伟大的人物，成了一个影星，一个杰出的影后。就在这几个简单的台步中，一颗明星诞生了。”

对于赫本初次走上银幕，这些可能是最直接、最有权威性的回忆了。它真实地反应了一个新手是如何打响第一炮。正是这出师的成功，使她坚定地走上了表演之路。

1933年，赫本主演了《早晨的荣誉》（又名《惊才绝艳》）一片，她在片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疯狂的、但却又天真浪漫而且卓有天才的女演员，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因此而获得了1933年度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对于她的获奖，当时好莱坞许多人感到不悦。凯瑟琳自1932年到好莱坞以来，至今刚刚一年，仅主演过两部影片，这第二部就轻松地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但是赫本讨厌好莱坞，不愿与人交往，即使成名以后也很少出入社交场合，这使人们与她疏远。另外，凯瑟琳衣着随便，嗓音高尖沙哑，家中还养着一只猴子，这些都为好莱坞的太太小姐们所不齿。所以，在一开始走进好莱坞并步入影坛时，赫本就轻易地摘取了好莱坞影后的桂冠，这要得益于《早晨的荣誉》，而对赫本来说，亦可称为是“早晨的荣誉”。而同时，她也开始为许多好莱坞人所不容。

人们既不喜欢她，她也没来领奖，这使得颁奖现场十分尴尬，于是在颁发最佳女主角奖时，司仪只好把另外两位获提名的女主角叫上台来，送她们

每人一束玫瑰花，来宾们这才被逗得开怀大笑起来。

“此后赫本又主演了一系列影片，其中1934年拍了《小妇人》、《烈性子女人》、《心碎了》。在最后这一部影片里，赫本扮演了一个女作曲家。这个女作曲家始而背叛自己担任乐队指挥的丈夫，继而又徘徊于丈夫和一个年轻的追求者之间。由于凯瑟琳以充分的精力表现出人物鲜明的个性，加上导演构思成功，使这部情节平平的影片获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1935年，由著名导演乔治·史蒂文斯执导，赫本主演的《爱丽丝·亚当斯》开拍了。这是一部受到普遍欢迎的喜剧片，赫本在片中扮演一个出身卑微、但一心想跻身上流社会的年轻姑娘。片中凯瑟琳演得格外温柔可爱，各种细节处理得恰到好处。她以多姿多彩的演技，把一些难度极大的戏处理得十分适度。在朝圣者的舞会上，她轻浮挑逗地四处东张西望，双眼充满了粗野的欲望，搜寻着能跟她跳狐步舞的男人。导演觉得非常难拍的门廊那场戏——她百般地讨好她的未婚夫，以便让他高高兴兴地跨进她父母的那间破旧而阴暗的陋屋，凯瑟琳也演得十分成功。她凭自己的技巧，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票房毒药”找到了解毒药

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凯瑟琳的从影生涯出现了极大的波折。

1936年，凯瑟琳在约翰·福特执导的《苏格兰的玛丽》一片中扮演玛丽这个角色。福特1935年曾因执导《告密者》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当时，他穿的是一件蓝布衬衣。这一次，福特从头至尾都穿着它，迷信能够因此而给影片带来运气，引起轰动。然而这部影片却无情地失败了，公演后票房收入极低，影片老板都怨声载道。因为这一部片子，赫本被票房老板称为“票房毒药”。这个词起初是嘉宝走下坡路时出现的。在嘉宝从影的后期，她所主演的悲剧已经不再吸引人。有个剧院老板甚至咒骂她是“票房毒药”，于是后来，这个词就一直用来称呼那些不卖座、票房收入不高的演员，而赫本这个时候也得到了这一个“雅号”。

1937年，赫本主演《一个叛逆女性》，也遭到同样的厄运。1938年她又主演了《育豹记》，这部影片刺激又辉煌，受到了舆论界的盛赞。但是对广大观众来说，它未免太深奥了些，在中小城市放映的票房收入勉强收回制片成本。这几乎就等于失败。“独立剧院所有者联合会”董事长哈里·布兰特气得大发雷霆，公开称凯瑟琳跟嘉宝等人一样，是“票房毒药”。雷电华公司觉得赫本两年来演技毫无起色，再使用下去不利于公司，于是他们单方面撕毁合同，开除了赫本。她在好莱坞已无法立足，无奈，赫本接受了雷电华公司支付的20万美元解约款，回到了纽约的百老汇，再找机会。

赫本回到百老汇后，仍继续从事舞台剧演出，同时也不断寻找各种机会重上银幕。为了与挫折作斗争，她接受了哥伦比亚影视公司的邀请，主演菲利普·巴里的《假日》，由乔治·顾柯执导。凯瑟琳在片中表演得很出色。为了消除在电影院老板中广为蔓延的对凯瑟琳的坏印象，哥伦比亚公司特为电影广告牌精心设计了这一条标语：“赫本是票房毒药——他们对她的评价正确吗？”但遗憾的是，这一计划在好莱坞影城的效果却适得其反。正好，这个时候，大卫·塞尔兹尼克和乔治·顾柯正发起一塌声势浩大的挑选《乱世佳人》女主角的宣传活动。一方面，赫本曾与他俩合作拍过片；另一方面，

她也尝试着能否借机会重返好莱坞。鉴于这两方面的考虑，赫本也投入了这场轰动一时的角逐之中。但是，因为《苏格兰的玛丽》的惨败，塞尔兹尼克对使用她并无多大把握，而且他觉得赫本缺乏魅力，不招人喜欢，难以让一个男人追求10年。但是，如果一时找不到理想的人选，他也并不排除让赫本演郝思嘉的可能。只是后来从英国来的费雯·丽力挫劲敌而当选，赫本也失去了这一次十分有利的机会，未能扮演郝思嘉，这不能不说是赫本很惨重的一次损失。

但是，赫本毕竟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女性，她时刻期待着重返好莱坞。最终实现她这一愿望的是影片《费城故事》。角逐郝思嘉失败后，赫本请求《假日》的编剧、剧作家菲利浦·巴里以赫本自己为原型，编写一个喜剧剧本《费城故事》，由她来主演。该剧编成舞台剧后，1939年在百老汇首场演出相当成功，赫本声誉鹊起。她把剧本的改编权以17.5万美元卖给了米高梅影片公司，并指定要在她的处女作《离婚起诉书》中引导、启发她的顾柯执导该片。1940年，米高梅公司把这出舞台剧搬上银幕，同样起用赫本为主角。

这次，赫本是与两个当时默默无闻的男演员詹姆斯·史都华和加利·格兰特合作，这无疑为凯瑟琳的表演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影片《费城故事》对赫本是重要的，它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年轻漂亮的阔小姐特蕾西·洛特过两天就要结婚了，这算得上费城的头号新闻了。在费城郊外那座豪华的洛德庄园，一辆辆满载结婚礼物的汽车接连不断地开进去。其实特蕾西小姐也不是第一次结婚。两年前她曾和一个叫做德克斯特的小伙子私奔，到了马里兰州。然而不久他们散伙了，特蕾西小姐一个人回到了费城。他们的姻缘是怎样结束的，谁也说不清楚。是因为德克斯特喝酒太多，还是她太任性？反正都是他的错。特蕾西小姐从来也没有想过她自己或许也有一点责任。她现在的未婚夫乔治就好多了。他白手起家，不喝酒，头脑始终清醒，不顾一切地爱她。而那位德克斯特在南美住了一年多，一直不敢回来，但还是忍不住回来了，现在正在悉尼·基德的《秘闻》杂志编辑部门前徘徊。基德不肯放过洛德家大小姐出嫁这一重大事件；他要登一篇耸人听闻的“秘闻”，让杂志销路大开。但此时杂志名声不好，所以，他请德克斯特把两个采访记者作为朋友介绍给洛德家。这样，作家迈克就可以用他那辛辣的笔调写下洛德家的事，而摄影师丽丝再配上无与伦比的照片，独家新闻肯定轰动。如果德克斯特不答应，悉尼就抛出一篇文章，攻击特蕾西的父亲。为了洛德家的名声，德克斯特只好答应下来。但特蕾西小姐从电话里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做好了应付的准备。

那天下午，特蕾西小姐在德克斯特面前落落大方、谈笑风生、婀娜多姿，使一直想忘掉她而又忘不掉的德克斯特感到重新爱上了这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他后悔莫及，苦恼不已。而丽丝起初时对特蕾西甚为藐视，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脸力，反而，地成了朋友。至于迈克，他完全被迷住了。当然，丽丝才是他真正的女友，但他一听说这位费城大家闺秀读过他写的文章，不禁飘飘然起来。他紧紧地追随这位知音，这不但使丽丝醋意大发，还把马上要当新郎的乔治气得够呛。在迈克眼里，特蕾西小姐成了世界上最完美的天使，他再也不愿为《秘闻》杂志社写那种尖酸刻薄的文章了，他情愿写揭发悉尼的东西。正当他和德克斯特声讨悉尼的罪状时，喝了一夜闷酒的特蕾西小姐出现了。迈克让丽丝迅速打开那篇揭露悉尼的文字稿，自己应特蕾西小姐的要求陪她去游泳。没想到，特蕾西小姐刚下水，喝了一夜的酒猛地涌上来，迈克只好把她救上岸，将她抱到她房间里。这一幕正好被德克斯特和乔治看见。

待特蕾西酒醒后，婚礼已准备就绪。可目睹了特蕾西的所作所为，新郎决定不结婚了。他要新娘保证以后再也不沾酒。“什么？喝一次酒也这么大惊小怪！”特蕾西大叫起来，德克斯特在旁边笑笑。特蕾西沉思着，目光在乔治身上停留了好半天。然后，她向德克斯特转过身来，忽然向他伸出纤细的手。德克斯特握住了它。姑娘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德克斯特也笑了。

他们什么也没有失去，他们开始补他们私奔去马里兰州所没有举行的婚礼，这是他们曾答应亲友而没有兑现的婚礼。迈克和丽丝成了滨相。音乐响起，庄严的时刻到了。他们再一次结婚，这一次他们再也不会错了。

剧本中的特蕾西是根据赫本的原型编写的，加之三位名星的配合默契和精湛的表演，影片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首映那天，正是舞台剧《费城故事》最后一次演出。演出完毕谢幕时，赫本深情地对观众说：“这出喜剧挽救了我的艺术生命，真希望这大幕永远不要落下。”这一点也不夸张，很精确地反应了当时的实际情形和赫本的心境。临下场时，赫本拿走了做道具用的一只花瓶和一对壁炉架以作纪念。电影《费城故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该片在无线电城音乐厅头六个星期的预映里，票房收入达 59.4 万美元（该舞台剧曾使凯瑟琳个人获得约 44 万美元的收入）。该片不仅使凯瑟琳成了最富有的女人，也使她重新受到人们的欢迎。观众对影片反映十分热烈，凯瑟琳被提名为奥斯卡奖候选人。这时，好莱坞重新展开双臂欢迎赫本归来。一家报纸赞扬她的表演“令人心醉神迷”。另一家报纸戏称：“票房毒药找到了解毒药。”影迷们也欣喜若狂，把她叫做“新凯瑟琳·赫本”。只是赫本的老朋友、艺术领路人乔治·顾柯的评价比较客观：“毫无疑问，她的演技更趋成熟，而她的为人，则比八年前刚来好莱坞时更聪明、更讨人喜欢了。”

四位情人在《小姑居处》

凯瑟琳·赫本一生只结过一次婚，那就是 1928 年与拉德洛·史密斯的婚姻，但是 1934 年，两人由于生活不和谐，性格不相容，而且他们长期处于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状态，“连续分居达 300 天之久”，终于离婚了，前后时间才六年。

在为拍《早晨的荣誉》作准备工作时期，凯瑟琳与利兰·海沃德的交往增多了，他是她的代理人。对一个还不成熟、易受影响、轻率地闯入好莱坞电影圈子的年轻姑娘来说，利兰·海沃德的吸引力是难以抗拒的。海沃德那种幽雅、温和而又文静的气度，正是凯瑟琳所缺少的。他的服装剪裁得非常合体，头发梳得无懈可击，皮鞋擦得锃亮。他的笑是会心的笑——甚至远不止是会心。这种笑，具有一种水恒的平和的魅力；这种笑，一个人一生中也许只能遇到三五次。在纽约，他开一辆豪华的罗尔斯——罗伊斯小卧车；在好莱坞，他开的是希斯帕诺——休札牌汽车。他驾驶自己的汽车往返于纽约和好莱坞之间。

他动不动就拨长途电话，而当时能这样做的人为数并不多。他对于自己有关的每个人、每件事都了如指掌。他说话快而直率，颇有鼓动性和说服力。他爱过很多女人，但都爱得不真。他还拥有一个金矿。

在凯瑟琳眼里他不仅精力旺盛，而且他代表他的委托人（包括他的情妇玛格丽特·萨拉文）所从事的那一残酷无情的交易，同样是很吸引人的。她一贯崇拜力量，尤其是那种锋芒毕露的力量。利兰使她着迷。用当时人们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头号花花公子”，一个爱高谈阔论、空话连篇、聪明圆滑、铁石心肠、背信弃义的男子汉。在年轻姑娘热切渴望的聚光灯下，他是个明星。他经常背着凯瑟琳去找别的女人。而她那无畏而纯洁的心并不计较这些。他属于她的时候，她爱他，仅此而已，但就是在这种时候，她觉得自己生命中充满了辉煌。

在凯瑟琳爱上了利兰·海沃德的同时，与她共事的小道格拉斯·范朋克却偷偷爱上了凯瑟琳，他是好莱坞著名影星兼制片人老道格拉斯·范朋克的儿子。他说：“我一开始并不喜欢凯特（凯瑟琳的昵称），因为她在这里是个不折不扣的晚辈，可她的名气却远远超过了我！当我真正了解她以后，我爱上了她，爱得非常深沉。我约她幽会，她拒绝。我没有放弃努力——直到影片拍完。最后，她同意跟我出去吃晚饭。晚饭才吃一半，她说她头痛。我开车送她回家。不过我没有马上离开，我想在外面坐一坐，回味一下与凯瑟琳的约会，回味一下想她、看她、听她和感受她的滋味。我多么希望屋子里的灯很快熄灭，她该睡觉了。突然她家的门猛然打开了，凯特飞快地跑出来。我没注意到，在我前面路旁的树下，还停着另外一辆汽车。她跑过去，钻进了那辆汽车。这时我才发现驾驶座上坐着一个男人，但没有看清他的脸。他开着车从我身边过去，根本没理我。她呢，开心的大笑起来，那头红发被风吹散遮住整个脸！难怪她中途结束我们的约会！我还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但是，凯瑟琳与利兰·海沃德之间持续了很久的浪漫友情最终还是彻底崩溃了。在乔治·顾柯举行的一次晚会上，凯瑟琳从收音机里听到海沃德与玛格丽特·萨拉文结婚的新闻。这个消息，如同给了她当头一棒。出于她的性格，她还是给萨拉文小姐发去了一份贺电。萨拉文小姐收到贺电后，轻蔑地把它撕得粉碎，扔进了废纸篓。

这时，凯特结识了霍华德·休斯。她是雷电华影片公司的幕后资助者和董事会成员。有一次他到公司去观看拍摄现场，恰巧赫本正在拍《西尔维亚·斯科利特》，这位大亨对赫本的表演大为赞赏，并对她一见钟情，从此他派人每天给她送花。

凯瑟琳也深深被他吸引住了。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完全孤独的人，一个疑心很重的人。凯瑟琳从内心里感到应该关心和爱护他。他是位著名的飞行员，每次驾机飞越她的房子，他都要倾斜机翼，向她致意。1938年7月10日，休斯决定一人驾驶“洛克希德，14型飞机进行环球飞行。他的目标是要打破林德伯格创造的历史性飞行记录。他在众人的欢迎下，从纽约机场起飞，他这次飞行创造了只用91个小时14分的新纪录。在飞机飞越长岛上空时，突然向赫本的住处俯冲了一下，因为赫本那时正站在桥头边，狂热地向休斯挥手致意。

休斯甚至还教赫本开飞机，但他俩之间的共同情趣和爱好并不多，他喜欢打网球、高尔夫球，喜欢游泳，这一点凯瑟琳也都喜欢。他们俩在一起，双方都感到很愉快。从体型上看，他俩似乎很相配，都是细挑个，瘦瘦的，棱角分明的身材。他们频繁的交往和亲密的关系，社会舆论纷纷传闻，他们似乎快要结婚了。为了不引起公众的注意，他们不得不东躲西藏，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跟嘉宝一样，反而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最使他们恼火的还是那些新闻记者，他们象影子似的无时无刻不跟着他们。另外还有许多爱请别人签名的人老跟在他们后面，赖着他们签名。他们只好象掸去被子上的尘土一样，粗鲁地将他们轰走。这对瘦削的男女经常一起打网球、打高尔夫球、开飞机、跑步、游泳、嬉戏。他们身穿三十年代中期流行的长至踝骨的长服，犹如弧光灯下的两只长脚蜘蛛，实在难以躲过人们的眼睛。

然而，休斯不久渐渐对凯瑟琳失去了兴趣，到拍《费城故事》时，他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别的女人。这个时候，进入凯瑟琳生活中的著名导演、

年轻人乔治·史蒂文斯。他们俩第一次相遇是为了拍摄《艾丽丝·亚当斯》，在讨论该片时，凯瑟琳推荐由史蒂文斯执导。但史蒂文斯当时完全没有看过这剧本，而且他被叫来时，又是刚从拍摄现场下来，浑身泥浆加黑灰，身边还围着一帮子杂技替身演员，在等着他发落。他起初吞吞吐吐，似同意又似不同意，但当他被问到是否喜欢这个剧本时，他撒谎说：“喜欢”。在马上就要开机拍片之前，史蒂文斯才赶紧回去仔仔细细读了一篇小说，并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做出了决定，同意任该片的导演。

在合作中，凯瑟琳完全被史蒂文斯迷住了。他看上去慢条斯理，感情内向，迷迷瞪瞪的，实际上他头脑清晰，与好动活跃的顾柯截然不同。他也被凯瑟琳的魅力弄得神魂颠倒。他认为凯瑟琳“应该相信自己对男性具有吸引力，完全用不着强求”，“不要认为爱情戏就是跟某个男演员直挺挺地站在一起，对他说了些火辣辣的情话，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拍片中，两人的交往渐渐增多。

自拍《名门街》以来，凯瑟琳和史蒂文斯开始经常幽会。这是在她与霍华德·休斯的恋爱结束了之后。很多人认为他们俩已经相爱，可又没有充分的事实证实这种推测。其实，他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他们不可能发展成为那种性爱关系。虽然史蒂文斯很喜欢凯瑟琳，但她的尖刻与放肆实在使他忍受不了。史蒂文斯温和、忧郁、沉思和内省的性格，注定了他们这种敏感的友谊不可能维持长久。

在与史蒂文斯短暂的情史结束后，在凯瑟琳后半生中占据着牢固地位的是好莱坞著名的男影星、米高梅公司麾下的斯潘塞·屈赛。在《费城故事》中，特蕾西前夫这个角色本来是由他来扮演的，后来才改由加利·格兰特扮演。其实，赫本早在1933年就在《惊才绝艳》中与屈赛合作过了。那时，他的表演给赫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发现，自己与屈赛在性格、经历以及表演风格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就萌生了一丝仰慕之情。后来，1935年他转到米高梅影片公司，并且两次荣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而这时恰好是赫本在电影事业上不得意的时候，赫本想摆脱困境，也想进米高梅。所以，赫本此时很想能与他再次合作，为了能进米高梅，她甚至愿意当他的配角，并看了许多屈赛主演的影片，如《旧金山》、《怒海余生》等。未能在《费城故事》里与他合作，她感到很惋惜，不过她仍然等待着机会。

终于，赫本如愿以偿了。1942年，米高梅拍《小姑居处》一片，由屈赛和赫本分别任男女主角。这个时候，赫本33岁，而屈赛已经41岁了。为了给屈赛留下一个好印象，在第一次见面时，赫本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气度不凡，脚穿一双四英寸的高跟鞋，还把头发高盘在头顶。在招待会上，赫本对身高为5.9英尺的屈赛说：“我看起来好象比你高些呢，屈赛先生。”屈赛凝视了她一会儿，宽阔的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容，他说：“别担心，赫本小姐，我会把你削到我的高度。”两人这种戏剧性的见面不仅使赫本心花怒放，而且也使屈赛对赫本有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在拍摄《小姑居处》时，两人表演风格十分相似，再加上两人经历都曲折坎坷，有着相同的性格，这使两人合作得很愉快，在表演中配合相当默契，而且，赫本发现自己在拍摄中从身心上都爱屈赛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所以，她把对屈赛的仰慕融进了影片的表演之中。很自然地，这部影片公映后取得了很好的反应。而从此片的拍摄中，赫本也狂热地爱上了屈赛，她对他的爱情是不顾一切的，谁也阻挡不了，而且为了事业上的考虑，她也强烈需要与

屈赛呆在一起。所以，从此，赫本和屈赛不仅成为银幕上长期合作的最佳搭档，而且成为生活中相濡以沫的理想伴侣，两人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67年屈赛去世。

与赫本一样，屈赛也是一位献身电影艺术的优秀演员，他也是当时唯一荣获两次奥斯卡奖的男巨星。但与赫本不同的是，在电影界，屈赛以性格倔强、难以合作和喜欢酗酒而出名。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从影初期极不顺利。斯潘塞·屈赛出生于1900年，30岁时，这位胸怀大志的青年去投考电影公司时，米高梅、环球、二十世纪福克斯和华纳等大影片公司竟没有一家肯雇佣他。不过幸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名导演约翰·福特在百老汇观看过他的演出，遂邀请他来参加拍摄《向上游驶去》一片，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才很勉强地雇佣了他。这样，这位前程远大的明星才未遭被埋没的命运。

此后的1931—1936年中，屈赛在福克斯公司拍了无数影片，可是由于目光短浅的福克斯公司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屈赛在影片中多半是扮演歹徒、赌棍、顽固汉之类的反面角色，而且戏也不多，他没有放出更大光彩。更令公司头疼的是，他嗜酒成性，性格倔强，难以合作，不仅得不到老板的青睐，也无法很好地与其他演员融洽相处，1935年拍完《它是个小世界》一片中的外景后，回到公司因酗酒闹事而被拘留，公司遂将原定由他扮演的主角分配给别人，把他降为配角，他不堪忍受屈辱，愤怒地向公司提出抗议，结果被老板开除出福克斯公司。

不久，经朋友推荐，屈赛才转到米高梅公司。米高梅看到屈赛几年来所拍的影片，改变了以前对他不公正的态度，遂大胆起用他，给他安插略种重要的角色，屈赛从此也大显身手。1937年，他主演了《怒海余生》，在其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葡萄牙渔夫，并因此而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颁奖那一天，屈赛正在医院动阑尾炎手术。米高梅公司的老板梅耶代他领奖时信口说到：“屈赛个好演员，但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为什么要听老板的话。”屈赛听到此话后倏然问道：“这是恭维还是威胁？”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1938年度，他又因主演《孤儿乐园》而蝉联了奥斯卡影帝桂冠。

1940年，斯潘塞·屈赛终于在票房纪录上超过了一直与他合作的克拉克·盖博，首次进入该年十大名星之列。此后一直到1951年，他又曾6次当选为十大名星之一，这一段时间也是他叱咤风云、新片迭出的时期。

从1942年起，屈赛开始与凯瑟琳·赫本合作，并成为她生活中的伴侣。赫本对屈赛的爱热烈而疯狂，相比之下，屈赛却冷静得多。屈赛是有家室的人，他一直与路易斯保持着夫妻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早已名存实亡，但路易斯长年在家照顾他们的一个聋哑女儿，屈赛很感激她，也不忍心与她分离。而且，屈赛信仰天主教，天主教是不允许教徒离婚的。所以，他与赫本的相爱是有极大阻力的，但是赫本却不管这些，她自从与屈赛合拍《小姑居处》之后，就决定无论如何要与他呆在一起，哪怕过一种暧昧的不公开的生活。好在新闻界同情屈赛婚姻名存实亡的痛苦，路易斯也未从中阻挡，他俩的关系一直保持了下去。

未曾是妻子的遗孀

赫本对屈赛的爱是影坛众人皆知，且传为佳话的。关于他们的关系，数年之后凯瑟琳是这样说的：“婚姻问题，一直是人们觉得有刺激性的、乐于

争论的问题……我和斯潘赛在第一次合作演出时就是这样认为的……问题是人们总要首先考虑性生活。因为它是生活的动力，你无法否认躺在你所爱的人的身上所感受到的那种满足、愉快和心花怒放的刺激。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对性生活的了解并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四十年后，你可能同第一次听到它时一样迷惑不解。我父亲自己也承认，到了八十岁，他也对此懂得甚少。这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你不可能象研究人员所要求的那样，把它明确他说成是白的或是黑的；你无法解释魔术，你无法去估算它……至于斯潘赛嘛，他只会煮咖啡，他煮的咖啡是世界上最好的。”

她还补充说：“人不能不做出某些牺牲。演员就不应该结婚，哪怕与另一个演员结婚也不行。作为一个演员，需要更多关心的是你自己，工作特别需要你，因此你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去关心另一个人。无疑，这必将使另一个人产生被遗弃感，还会感到很伤心。我们决不可以让别人伤心。生命太短暂了，它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凯瑟琳和斯潘赛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很不寻常。由于酗酒成性，斯潘赛的身体已大遭损伤。每当他病倒，作为一个医生的女儿的凯瑟琳便以满腔的柔情和怜爱，专心致志地护理他。他喝醉了酒，不见踪影，米高梅公司的人无法找到他时，又是凯瑟琳四处奔走，把他找回家，悉心照看他。虽然在客人面前，他对凯瑟琳显得有些近情理，不过在他那“令人难为情”的幽默中却潜存着他无限的赞美和钟爱。他有时把凯特叫做“瘦猴子”，但从内心深处，他非常敬佩这个女人。

他们之间常见的相互嘲弄，既充满柔情，又有些令人难以接受。连他们的朋友——编剧兼导演加森·卡宁和乔治·顾柯，编剧、制片人兼导演切斯特·厄斯金，还有其他好些人都无法理解。有时候，他们外出旅行途中，凯瑟琳完全听屈赛的，好象她甘心情愿永远受他的支配。除了他父亲外，他是她完全信赖、尊敬和崇拜的唯一的男人。他不仅是她爱慕的伴侣，而且也是她完全信赖的人。他说她演哪个角色合适，她就演哪个。他的话就是法律。

他那令人不可思议的坦率和明澈，最使凯特着迷。他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他心里想的。他不是演角色，而是生活在角色之中。他对凯特的爱跟凯特对他的爱同样深沉，只是不能用公开、激动人心的话语来述说而已。他生活在对她的爱之中，这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一种表白，而是，犹如他的才华一样，已植根于他的骨髓。

凯瑟琳一再坚持说屈赛既坚强又勇敢。当然，这只是出于爱情的夸张。事实上，她要比屈赛坚强得多。屈赛非常象爱尔兰人：忧郁寡欢，好讽刺挖苦人。他非常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并不够充实，他蔑视自己是个演员，可以说内疚和忧虑始终困扰着他。但是如果说他的生活凄惨，那就错了。他具有风趣的幽默感和浓厚的娱乐兴趣。这就用不着他的朋友分担他那感伤的重负了。

凯瑟琳以她的清教戒律，以她的精力和魄力，以她对生活天真无邪的热爱（这是屈赛不可能有的），以她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关注，鼓舞着屈赛，使屈赛懂得了：季节，天气，花鸟，走兽，以及那奇妙、复杂而又独特的人的魅力。也正是这些，使他从他自己的牢狱中解脱出来。

她对屈赛总是非常崇拜，对他那男子汉的外表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自豪感。有一次，有人问她屈赛穿的衬衫号码，她微笑地说：“17号。屈赛有公牛般的脖颈，17号才是男子汉的尺码！”1942年，两人在乔治·丘克

高级宾馆租了一套房间，虽然屈赛每个周末都去看望妻子和女儿，但是赫本成了他日常的妻子。50年代赫本出演《非洲皇后号》，但片中男主角的人选却使屈赛很伤心。屈赛很想参加该片拍摄，但他和亨弗莱·鲍嘉（曾主演过《卡萨布兰卡》等）都在考虑之列，鲍嘉和屈赛是很好的朋友，可最后导演却选中了鲍嘉，这使屈赛很苦恼，而且，赫本与鲍嘉在片中珠联璧合，配合得相当默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赫本为了抚慰屈赛受伤的心灵，更是无微不至地爱抚他，并小心谨慎地处理好与鲍嘉的关系，使这两位好朋友一直保持良好的友情，直到1957年鲍嘉患癌症去世。

赫本出于对屈赛的爱，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和部分事业。1961年，赫本在拍《长夜漫漫路迢迢》时，她在纽约，而屈赛却在西海岸的好莱坞，而且当时又值肺气肿严重发作。同时，赫本的父亲又得了重病，需要她照顾。赫本只好每周星期五晚上赶回到父亲家，在那儿过一个星期六，当晚再飞往好莱坞，与屈赛团聚，星期日晚上又得赶回纽约，以准备第二天早晨的拍摄，影片拍摄中的几个月，她一直是这样度过的，她的献身精神为许多人所敬佩。

赫本还体贴入微地关心屈赛的健康，1961年赫本52岁，看上去仍成熟美丽，凤韵犹存。而屈赛已61岁了，满头白发，患有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和肺气肿。为了恢复屈赛的健康，赫本拍片一完就回到他的身边，决心以自己的爱慰藉他的心田，一起战胜病魔。她亲自为他安排烹调日常饭菜。两人有时碰不上头，她就把饭菜烧好后盛在篮子里，留放在他的房间门前。1963年夏天，屈赛身体日益虚弱，甚至突然失去知觉，昏倒在海滩上，赫本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并立即给他的妻子路易斯打电话，请她马上到医院来。在屈赛住院的两个月里，赫本都一直与路易斯一道在床前轮流守候，悉心照料屈赛，终于使屈赛康复回家。1965年，屈赛又患上前列腺病，且出现并发症，但经过赫本的精心照料，第二年即奇迹般地康复了。

当然，屈赛也给予了赫本许多。赫本是一位渴望家庭宁静和幸福的女性，屈赛也尽量满足她的这一需求。赫本由于自1942年起与屈赛长期合作，耳濡目染和接受屈赛的仔细指导，不仅在生活中日趋成熟美丽、幸福满足，而且在演技上也更加精湛，她已经完全消除了早期那种有些矫揉造作的痕迹。自1942年合拍《小姑居处》以来，她又主演了许多影片，其中有《舞台门小卖部》、《龙子龙孙》、《无情无义》、《潜流》、《草的海洋》、《联邦一员》、《夏季的疯狂》、《雨缘》、《夏日痴魂》等。但是，她与屈赛合演的几乎每一部影片都以自己纯熟的演技而受到人们的欢迎，其中《火的保存者》（1943）、《合众国》（1948）、《亚当的肋骨》（1949）、《巴特和迈克》（1956）等都使观众永久难忘。

两人相伴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合作拍片计九部，最后一部是著名的《你猜谁来吃晚饭》。当时屈赛身体时好时坏。在拍完《这是个疯狂的、疯狂的、疯狂的世界》一片后，屈赛因病休养了四年。1967年，赫本和屈赛的好朋友、制片人兼导演斯坦莱·克雷默请赫本出演《你猜谁来吃晚饭》一片，并且看到屈赛病情有好转，也请他与赫本同台演出。或许是对赫本的爱打动了屈赛，他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此片的拍摄。在拍片过程中，屈赛身体仍十分虚弱，但他仍一丝不苟地参加每场演出。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导演克雷默瞒着老板只让他工作半天，然而不幸的是，片子完成后仅十天，1967年6月10日，屈赛便在家中溢然长逝。临终前，陪伴着他的是他事业上的最好搭档和挚友、生活上的伴侣和情人凯瑟琳·赫本。

赫本对屈赛的死悲痛万分，她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拒绝会见任何人，但是她向路易斯表示了哀悼和慰问，然后返回老家。她无法面对社会，也不知道世人将如何看待她，但是影视界对她是公平的；路易斯收到的是同情和吊唁，赫本却被看成是屈赛真正的遗孀！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这对情侣合作的最后这部影片取得了很大成功。屈赛因此在死后获得了第九次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提名，并且在一年后，学院仍追授他为最佳男演员，开创了一个演员身后获奖的先例。赫本也因此第二次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影片拍摄时机恰当，对美国社会所严重困扰的种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在颁奖仪式前四天，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在田纳西州一家旅馆被暗杀。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好莱坞亦不例外，而《你猜谁来吃晚饭》正是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的影片，所以在延期两天后进行的颁奖仪式上，学院院长格里高利·派克首先上台致词，他高度评价了这部影片：“这是美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一周，两天的延期表示了学院对金牧师的深切悼念。本届最佳影片的两部提名作品《炎热的夜晚》和《你猜谁来吃晚饭》，在抗议种族歧视这个问题上展开角逐，这一事件乃是金牧师竭诚尽力的最好证明。”

当授奖人拆开信封宣布道：“获奖者是凯瑟琳·赫本。”全场先是一阵惊愕，然后又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一次赫本又未参加领奖，顾柯替她领奖时说：“这是个很不容易的选择。”而当赫本在法国尼斯听到这个喜讯时，她还在蒙头大睡。她高兴地说：“真带劲！不过我吃不准这奖到底是给我的还是给斯潘赛的。”这位59岁的老演员眼泪晶莹，不知是由于屈赛去世的悲痛，还是自己再次获奖的喜悦，她用颤抖的手在给学院的感谢信中说：“我非常感动，无法也无须掩饰欢愉和幸福的情绪。他们是并不经常给老姑娘授奖的。对于凯瑟琳·赫本的获奖，一定既令人欣喜，又让人吃惊。我觉得我从同行那里得到了紧紧的拥抱。”

好莱坞祖母级明星

赫本给学院的信使人印象很深刻，但真正使人感到既欣喜又吃惊的是，第二年即1968年第41届奥斯卡颁奖仪式上所发生的奇迹。自从屈赛离开人世，赫本便埋头拍片，把一切都融进了表演之中。在《冬天的狮子》一片中，她扮演十二世纪英王亨利二世的王后爱莲娜。因表演出神入化，她第11次获得奥斯卡女主角奖提名，并第三次摘取奥斯卡影后桂冠。

当颁奖人英格丽·褒曼打开信封宣布获奖者时，她失声惊叫起来：“哎呀，是个双主角！获奖者是《冬天的狮子》中的凯瑟琳·赫本和《滑稽姑娘》中的芭芭拉·史翠珊。”人们先是一愣，然后是不绝于耳的掌声和叫好声。两人所得的票数完全相同，都得到3030名学院成员的满票，这在奥斯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审计人员然后赶紧出来解释说：“我们通常都要复核一遍，可这一回我们复核了多少遍是可想而知的。”但新闻记者还是穷追不舍，他们挖空心思说：“还在年仅26岁的史翠珊拍她的处女作过程中，学院院长格里高利·派克就破例授予她学院成员资格而获得了投票的资格，她投了自己一票。如果她还未得到投票权，那么她这次即以一票之差落选！”穿了件半透明夜礼服的史翠珊接过金像时说：“你好，棒小伙子。”然后她又结结巴巴地对台下观众说：“能与凯瑟琳·赫本一同获奖真是不胜荣幸。”可是在

后台，史翠珊对记者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是吗？两个得奖人，可能你们也不会想到。说真心话，我的成就是最好的奖赏。”她没有想到这正好是赫本 28 年前失掉金像时说的话。赫本这一次仍未参加领奖，事后她不无感慨地对《冬天的狮子》的导演哈维说：“只要能活到我这个年龄，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不久，她收到史翠珊发来的一封贺电：“与您同获金像真是件奇事。可您也在影片中唱歌了吗？”史翠珊是一位歌舞明星，这次她主演的《滑稽姑娘》也是音乐片。

赫本虽然三次荣登影后宝座，但这位“电影女皇”从来未曾在颁奖仪式上露过一次面，广大影迷十分渴望能一睹她生活中的风采。终于，赫本答应了学院的要求，1974 年在第 46 届颁奖仪式上主颁本届欧文·泰勒伯格纪念奖，获奖者是凯瑟琳的老朋友、制片人劳伦斯·温加顿。1974 年 4 月 2 日，当赫本穿着一套黑色衣裤，足登一双木底鞋出现在奖台上时，人们无不惊喜地起立欢呼。按赫本的要求，她颁奖的消息事先严格保密，连讲话稿都是她自己撰写的。这一届颁奖仪式被人们称为“R 级的狂欢节”，然而整个晚上，赫本都独自坐在专辟给她的化妆间里，颁完奖后她对温加顿说：“现在你再不需要我了。”说完便坐车回家了。前后露面仅几分钟，让人们翘首以待，却又匆匆而去。

赫本不仅生性羞怯，而且，她也最不愿见记者和影迷。她经常被影迷们围住，但她却又总是极力向大家解释，其实，她在解释的同时早已把名签完了。她的头号英国崇拜者约翰·马尔文曾讲过他自己的一段经历：“她在英国巡回演出期间，我去看她，在她住的旅馆后门等了足足有好几个小时，她出来看见我后，态度极为粗暴。三天后，正碰上她从市场回来，我又请她签名。她问：‘周围没有人吧？’我说：‘没有。’于是，她把书抓了过去，签了个名，重重地把书合上，抛给我，结果弄得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几年后，她再次来伦敦，我又见到她。我珍藏着她一张很漂亮的照片。我等啊等啊，终于有机会见到她。她坐在汽车里，拒绝在照片上签名，说这不符合她的天性。我引用《非洲皇后号》里的一句对白回答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克服自己的天性。’她极其厌恶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举起网球拍在我的肩上打了一下。她关上车门，汽车开走了，但又在红灯前停了下来。我看见她向我招手。结果她在照片脸部签了名，把照片给毁了！”

60 年代，赫本又拍摄了《特洛伊的女人》、《微妙的平衡》、《射手》。在 70 年代，赫本继续活跃在舞台和银幕上，成为一名影剧双栖明星。同时她也首次涉足音乐舞台剧，1970 年，她在《可可》中任演员。另外，70 年代她还开始拍电视片。她在《废墟上的爱情》、《禾苗青青》中出演，尽管这时她大大拓宽了自己的表演路子，但最令人吃惊的还是 1981 年，72 岁高龄的她因主演《金色池塘》而第四次荣登奥斯卡影后宝座。

《金色池塘》原本是 1972 年 2 月末在百老汇上演的一出舞台剧，作者汤姆森当时还不到 30 岁。因为演出相当成功，著名女影星简·方达代表印度支那和平运动影片公司买下了该剧的拍摄权，也可以说是为她父亲和她买下这个剧本的。她父亲亨利·方达从影一辈子，却未曾获得过一次奥斯卡奖，简就是希望履行为父亲争一尊奥斯卡金像的诺言，让父亲最终实现登上影帝宝座的夙愿。《金色池塘》讲的是一个退休老教授的晚年生活，体现两位垂暮老人的痛苦心情和迷茫惶惑。人，无论是谁都会老的，那么人将如何度过晚年时光呢？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男女们，将以什么样的心情走过这人生的最

后旅程呢？《金色池塘》以两个垂暮老人的心情及其与儿女的冲突展示了这一切。在影片的最后，凯瑟琳·赫本用她那铿锵有力、带着浓厚鼻音的音调，对诺曼说出她那最后一席活来：

“自从我认识你，你就一直谈论死亡，这是你关心的问题。我不得不考虑这两件事。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还有你的哥哥，他们的妻子，我们最好的朋友，以及所有以前住在金色池塘的人，如今几乎全部死去了。我见过人死亡，还接触过死人。但是今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死亡。”

这也正是生活中的凯瑟琳的体验。

《金色池塘》是赫本生活的写照。72岁高龄又一次让人们大感意外，当主持人宣布这第五十四届奥斯卡奖评选结果时，人们发出一片惊叹，主持人说道：“我想在座的与在电视前的每一位都会赞赏这一选择所包含的爱戴与感激之情。”这位颤巍巍的老妇人居然使众多的艳丽青春影星黯然失色。然而，她仍未来领奖。凯瑟琳·赫本成为奥斯卡历史上最年长的影后，也是唯一一个四次获得奥斯卡奖的影后，她确实使全球影迷为之倾倒，在人们的亲切议论中，她被称为“好莱坞的祖母级明星”。在众星耀眼的好莱坞影坛，她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凯瑟琳·赫本从影五十年，一生共得四座金像，她把前面得的三座献给了纽约帝国大厦的“吉尼斯世界之最展览会”，至今它们仍陈列在衬有赫本肖像的展品柜中。在说明栏中，《惊才绝艳》、《你猜谁来吃晚饭》和《冬天的狮子》这些片名格外醒目。至于第四座，即《金色池塘》那座，赫本就留在寓所做镇宅之宝了。

献身艺术的丽质佳人： 费雯·丽

有人说她的美，令人想起冬夜的上弦月；也有人说她的美，就象五月熏人的微风吹拂下摇曳多姿的黄色菩提花；还有人说，她的美丽使翡翠钻石都黯然失色，只有璀璨晶莹的珍珠可与之媲美。

一位“乱世佳人”，一曲“魂断蓝桥”，迷住了近半个世纪的世界观众。她的艺术成就在英国戏剧史和好莱坞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她的一生仅追求两件东西：艺术的完美和爱情的真谛，而这一过程，充满着奋斗、追求和拼命，始终伴随着苦闷、孤独和磨难。

“我要做个演员，一个伟大的演员！”

1913年11月5日，正当夕阳从喜马拉雅山山顶的雪峰上消失的时候，山脚小城大吉岭镇的英国股票经纪人欧内斯特·哈特莱家中诞生了一个棕发绿眼的女孩。之后的几天里，哈特莱太太按照当地的习俗，总是望着那闪闪耀眼的于城章嘉峰和珠穆朗玛峰，请“她们”做未来的婴儿的保姆，据说这样可以给孩子带来惊人的美貌和善良的人品。她们给小姑娘取名费雯·玛丽。也许是母亲的心感动了上苍，也许是费雯自小就得到老天幸运的青睐，她出落得端庄美丽，成为好莱坞电影史上难得的丽质佳人。如果要举出好莱坞的三位绝色美女，我们不妨如此说，头号美女是犹如一朵带刺的粉红色蔷薇般的伊丽莎白·泰勒，二号就是在加州明媚阳光照耀下热情洋溢的玛丽莲·梦露，三号美女就是令人联想到银色丝缎的费雯·丽。

费雯出生不到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哈特莱本想回到英国去，但身不由己，他应召加入了骑兵部队当驯马师。哈特莱太太带着女儿跟着他来到了马苏里和乌吉加摩特。那里有业余剧团，有时也为儿童组织演出，费雯在这里显露了她的表演才能。3岁时的一天，哈特莱太太把女儿打扮成一个小牧羊女去演咱儿童歌曲《小绵羊》，小费雯拿着牧羊杖，戴着小红帽，鞋和裙子上都撒满蔷薇花朵，站在舞台中央，她对钢琴手说：“我要朗诵。”满脸的稚气，天真然而坚毅。

战争结束后，哈特莱从军队复员回来，又重操旧业，干了老本行——股票经纪人。在他的朋友中，那些居住在印度的英国人，他们把时间都花在一些贵族式的享受上，家里个个都是英国式的世外桃源：英国的花园，板球和马球，闲谈赛马会。但哈特莱对此却毫无兴趣，他完全醉心于另外一种爱好：戏剧，并且成了加尔各答业余演员中最著名的一个。也许是父亲的品质传给了女儿，费雯自幼就喜爱表演艺术，他们辞退了印度保姆，给女儿请了个天主教家庭教师。哈特莱太太也经常给女儿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路易·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查尔斯·金斯利和吉卜林的小说。母亲把这些故事讲给她听，还跟她一起扮演故事中的角色。有一次，母亲扮演预言家，费雯演只狮子，结果那头“狮子”真地咬了妈妈一口。她们没有更多的剧本，但小费雯却从此被吉卜林的故事和希腊神话给迷住了。

1920年，哈特莱获得休假，他带着妻子和7岁的女儿回到了祖国。趁此机会，哈特莱太太把费雯送到了英国洛咸顿圣心教会学校去学习。那里的人穿着是那样呆板，修女们穿黑的，女学生穿暗蓝色制服，矮小笨拙的楼房还

是十世纪那种式样。简陋的寝室灰不溜秋的，房间中央用两排屏风隔开，每边都放着小铁床、椅子、梳妆台和脸盆，就连成人到了这里也会感到无精打彩，从小天真活泼的费雯怎么能习惯这一切呢？这个可怜的小姑娘一边哭着，一边哀求母亲把她带回印度去，她的哀求谁听了都会动情的。可哈特莱太太却是铁心了，她想要女儿养成绝对驯服和善良的天性。

在洛咸顿的寄宿生活是极其独立、寂寞而有规律的，尽管后来她也慢慢习惯了，但还是对那个地方的规矩懂得很少。她不懂为什么当地人洗澡不光着身子，而要穿着衬衣？为什么出门时不能穿擦得光亮光亮的皮鞋？

不过，幸运的是，在这儿，她对艺术的喜爱和对表演的兴趣进一步得到了发展。费雯·丽在好莱坞的巨星中，属于那种从小立志并且毕生献身演艺事业的一类。在学校，她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摩琳·奥萨丽文，比费雯大两岁，她们相互之间无话不说。有一次摩琳说：“我将来离开学校以后，我要去飞行，我要做个飞行员。”而费雯则无限憧憬地说：“我要做个演员，一个伟大的演员！”

这不是想入非非，她为了天真的理想进行着可爱的努力。每年在学校的一切选拔活动，比如选举最受欢迎、最机智、最有才干的学生等，她常常名列榜首。教师们则埋怨她自由散漫，她还经常拉小提琴和大提琴给女伴们听。而且，在每年学校业余戏剧爱好者组织的演出中，费雯已经扮演过好几个角色了。然而，这所古怪的学校里居然没有戏剧和舞蹈课。费雯也许是儿时经常听母亲讲故事的缘故，她很有讲故事的天才，也有做孩子首领的才能。她还喜欢一个人孤单地站在湖边，沉浸在冥思遐想之中。有一天，院长嬷嬷问她：“你干吗不跟别的姑娘在一起呢？”她说：“我喜欢看树木在水中的倒影，它们跳着多么优美的芭蕾舞！”她还参加了合唱团和戏剧表演团，大家都认为她多才多艺，将来一定大有前途。

然而，费雯只是表面上恭顺地遵守着洛咸顿的教规，她容易冲动，好发脾气，又充满幻想，她强忍着这些日子，可是在内心，渴望当个演员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折磨着她。起初她写信给父亲，倾诉自己多想跟爸爸一块同台演戏，费雯能几个星期地给人讲《哈姆雷特》的故事，这是母亲带她去看的一出戏，戏里那个被人杀死的国王的幽灵是如此令她震惊！她分别给爸爸和妈妈写信，每次都表示想回印度去。天主教会是永远不会使费雯变成一个虔诚的教徒的。幽居的生活使她的内心同外界更加隔绝了，甚至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连必修的意大利语也不及格。然而，孤独也给费雯带来了好处。她幼年早熟，很早就学会了阅读各种书籍，听音乐，感受着一个她的小伙伴们望尘莫及的艺术世界里的各种情感，而她们进入这个境界还得好几年呢。可以说，这段时光对小费雯是很重要的。

15岁那一年的夏天，哈特莱带着女儿到欧洲去旅行，费雯得以参观了许多大城市。费雯终于说服了母亲去找在巴黎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挺时髦，还有法兰西喜剧女演员安东妮来上课，她们还可以尽情地看戏。她在这里过得很愉快，她的性格充分展露，穿着相当大胆，整天忙干青年们热衷的派对中。可是，不知是谁向哈特莱太太告发，说看见费雯来剧院里竟穿着袒胸露肩的礼服，还擦口红涂脂粉哩，这一次，父母又不顾女儿的反对，硬是把她转到了靠近奥地利边境的一所学校里去了。

开始，费雯对被迫离开巴黎很不高兴，但到新学校却喜出望外。学校靠近音乐之城维也纳，她有空可以到那里欣赏歌剧。莎斯堡离学校只要乘一

小时车，她更可以常到那里去参加音乐节。虽然她的身体平衡器官有毛病，一向不擅滑雪和骑自行车，但她却崇尚高山，喜欢在雪地里跋涉。她常常对人说，“在阿尔卑斯山顶，比去任何一个教堂都更能接近神。”这最后的几个学期，是费雯·丽一生中最快的时光。

身陷围城 矢志不移

1931年冬天，她们全家搬到英国西部的台蒙特去，那儿的生活费比伦敦要低些。毕业后的费雯，仍然一如既往地喜爱阅读、艺术、音乐、戏剧和宴会。她每天维持六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第二天又神采奕奕，毫无倦容，充分显示了追求理想的不懈态度。费雯为了使父亲高兴，坚决要求进皇家戏剧艺术学院，这是英国一所由国家资助的最古老的戏剧学校。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在一次舞会上，她邂逅赫伯特·丽·霍尔曼，两人一见钟情，并且密切交往起来。

赫伯特·丽·霍尔曼是伦敦一位法学家、律师。他长着一张大嘴，眼睛有点鼓出，脸上总带着难为情而又笨拙的笑容，算不上是一个美男子，但他的才华出众，为人忠厚，稳健老练，深得人们的好评。时年他32岁，在包围着费雯的众多仰慕者中，他当然是其中的佼佼者。自从初次看到这个迷人的姑娘沿着英国西部的乡村小道走来以后，只有几天他就跟她在舞会上跳舞了，他知道费雯想去伦敦，为了不错失良缘，他开始主动与她约会。

而这个时候，18岁的费雯已出落得亭亭玉立，她那纤细动人的身材，鹅蛋型的脸庞，雪白光润的皮肤，线条优美的脖子，加上一双变幻着灰、蓝、绿三色的迷人的眼睛，令走在街上的许多陌生人情不自禁地驻足回眸。

她唯一的缺陷是手掌太大，她总是想掩饰这一缺陷，把手放在口袋里，或者戴着手套，有时轻握双拳，以回避人们的注意。尽管这样，她的大手仍给她带来无穷的困扰。她的衣服大多袖子很长，加上褶边。她出现在街上、宴会上、或彩排时，会戴上手镯或手套。她为了自己的大手和洁癖，有一个时期，竟备有75双手套。

这时的费雯认为，真实的丽·霍尔曼与她以丰富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形象完全吻合。而实际上，霍尔曼对妇女平等的主张一点好感都没有。在他看来，戏剧简直就是小孩子奇奇怪怪的癖想，他认为，要过家庭生活，就必须终止想入非非的念头。然而不管怎样，他们还是继续热恋着。霍尔曼把费雯向自己的朋友作了介绍，并且正式提出了求婚。

作为一个母亲，应该为有这样一个女婿而感到高兴：优良的家谱，剑桥大学毕业证书，还有个自己的事务所。何况因为眼下生意不景气，欧内斯特·哈特莱的经济拮据。但是哈特莱太太却反对这门亲事。她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判断女儿的婚姻是不会令人满意的。她首先警告女儿：爱情是不能当作一种兴趣爱好来看待的；然后她又力图说服女儿：霍尔曼似乎跟她不相配，两人相差14岁，无法分享共同的乐趣；最后，她还提醒女儿：天主教徒是不许离婚的。但是，费雯并不理会母亲的规劝，一定要嫁给霍尔曼。

1932年12月20日，费雯·哈莱特和丽·霍尔曼在西班牙的圣詹姆斯天主教堂举行了婚礼，费雯·玛丽·哈莱特变成了费雯·丽。其中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小插曲。费雯在洗手时，不经意地取下了结婚戒指，回到宾客面前被母亲发觉，她惊慌地大声说：“太不吉利了，太不吉利了。”这段小插曲

也许与她日后的离异不无关系。在婚礼上，朋友们说：“温顺腼腆的丽神奇地带回那么漂亮的新娘子。”在神坛面前，她紧靠着丽，完全象个大孩子那样望着他，这眼光，与其说是出自妻子的钦佩，还不如说是出于孩子对父母的顺从。那些来参加婚礼的人也看出来，费雯除了美丽的容貌外，还很脆弱。还在学校时，她就心肠软弱，温顺到常常受人欺侮打击。

婚后，霍尔曼律师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这很符合他那个圈子里人们的传统。丈夫在外面工作，妻子过着体面人家太太毫不拘谨的生活，年老的女管家很听话地料理着内务。丈夫是个善良的人，并且很爱妻子，他会安排好生活的，会让她过得很满意。然而无忧无虑的生活并不能满足费雯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的个性需要。他们夫妻之间从不谈论他的工作，因为法律上的复杂案子引不起费雯多少兴趣；他们也不谈论戏剧，这个话题也打动不了霍尔曼。生活的单调使这个家庭笼罩着一层阴影，空气十分紧张。费雯此时念念不忘的是实现当演员的梦想。1933年10月12日，在费雯20岁生日前的三个星期，她生了女儿苏姗·霍尔曼。由于照看房子和苏姗的事可以交给管家、新来的女仆和保姆，这恰好成了费雯走出去拍戏的一个好机会。

开始，费雯热衷于去拜访客人，同时也在家里招待他们。她的交际本领迷住了每一位客人，而不善交际的霍尔曼却常常被人们遗忘在冷僻的角落里，他们被人们称为“迷人的费雯·霍尔曼和她可爱的丈夫。”霍尔曼知道，妻子想出去拍戏，而只有通过社交才可以帮助费雯找到工作，当费雯提出要给一家商店做香烟广告时，他没有反对。

拍拍广告照片的事倒还满顺利，可这能满足她日夜向往要在舞台上创造伟大角色的欲望吗？一个他们很接近的朋友回忆说：“我们大家都明白，她忍受着甚至在家里也不能演戏的梦想的痛苦。”现在她终于明白了，当初她母亲是对的。以霍尔曼的那种思想意识和处世态度，他是不会觉察到她的超越之处的。他要用一股倔强劲，想法子把妻子的生活纳入自己的轨道里去。费雯简直觉得毫无希望了。别人都到学院去读书，到剧院去工作了，而她却被困在这舒适、但却不是她需要的家里，被捆在可爱的、但不理解她的丈夫和早产婴孩的身边了。她不甘心于陷在这个家里做一个玩偶，做个家庭妇女、霍尔曼太太，不甘埋没自己的才能，不甘毁灭那种蕴藏着的暂时还无法表露的天赋。

1934年，她通过毛遂自荐，终于在喜剧片《前途光明》中首次登上银幕，扮演一个仅有一句台词的角色。起初，她连制片人将什么时候请她去也拿不准。这个时候，霍尔曼却作了精细的准备，打算坐快艇从瑞典的哥德堡到丹麦的哥本哈根去旅行，而费雯却提出为了这句台词推迟行期。霍尔曼没有同意。更令他愤怒的是，到了哥本哈根，费雯一直等着电报。她甚至未能等到电报，只是简单地给霍尔曼打了声招呼，就动身回到伦敦去了，丢下了霍尔曼一个人在快艇上。这一次终于使霍尔曼明白，费雯抱着一种女人的奇奇怪怪的念头，而他自己对家庭幸福寄予的期望也是一种痴心妄想，他对于费雯的真实思想是那么不了解。几天之后，他给妻子拍了电报，但她没有回电。其实，费雯受到伦敦后却是大失所望：拍摄要延期到秋天。

9月，费雯终于被聘请去拍电影了。为了拍这部电影，她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不理睬丈夫的抱怨，在七点半之前就赶到电影制片厂去。秋天潮湿得很，就是在房间里也很冷。费雯在敞开的炉门前，边穿衣服边煮茶。然而，电影开拍，她又得冒着一丝寒气换上角色服装，她饰一个女学生，为此她必

须穿上夏季学生穿的连衣裙，即使紧裹衣服也很冷，她不得不挨着电炉取暖。

费雯在这里表现得既刻苦、虔诚，又有耐心，因此得到导演和人们的喜爱，于是又分给她一个配角。为了演好角色，她以自己特有的精细向摄影师和他的助手详细询问电影拍摄的特点，向他们讨教了很多好的建议。对于她这种行为，许多人不理解，为了这一个配角如此专心，到底是为了口袋里的钱呢，还是单纯地只是喜爱这个职业，因为那些日子到电影厂去拍个戏是上流社会的一种时髦事情。费雯的回答不是用风流夫人那种惯有的尖酸腔，而是相当严肃的。她永远不会把演员的工作看作是一种娱乐和消遣。不管怎样，费雯的电影生涯就从此开始了。

“一颗明星升起了”

接触了电影，费雯更加不能就此罢休，好运终于降临到她的头上。有一次，霍尔曼过去认识的女演员佩丽尔·塞姆森跟剧院的年轻经理约翰·格利登聊天。这位年轻而又谨慎的经理说他想物色可以成为英国电影明星的年轻人，塞姆森向他推荐了费雯。果然，费雯的外貌、才智和文化素养给约翰一个很好的印象，他欣然同意，甚至满口答应不到一年就让费雯演一个好的角色。他除了谈到酬金的提成，还提出一个条件，他觉得电影明星的名字应当带点诱人的异国色彩，建议费雯改名为艾普妮·莫琳，意思是“四月的早晨”，但霍尔曼表示反对。于是，佩丽尔提议把费雯的名字跟霍尔曼的名字联在一起。霍尔曼听了同样直摇头，他可不想听人提起他老婆的戏剧事业，但是，命运偏偏捉弄人，后来大名鼎鼎的她就是以费雯·丽这个名字载入影剧史的。

格利登说干就干，费雯跟他们一起参加剧院的首次演出，在时新的俱乐部或者最豪华的大饭店里吃饭。她每场戏都以漂亮的外表和新式打扮引起妇女们极大的兴趣。格利登经常碰见一些熟人，也大声地跟他们提起费雯，说不论是评论家，还是制片商，迟早总会注意她的。五个星期后，她被请去拍《乡下绅士》，这次她第一次演女主角——一个电影演员的姐姐。拍这部片子只用了一个月。

后来，费雯又在《君子协定》中演一个失业的女打字员。该片导演佩尔逊后来回忆说：“我定了扮男主角的演员，但无论如何找不到女主角。在经理那儿我察看了一张张照片，发现了一张惊人美丽和绝顶聪明的脸蛋，我就跟助手会见了照片里那位夫人——费雯·丽。她相当孤僻，显得有点不安，可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她那副绝代佳人的容貌打动了我。她那双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彩，显然，现在她还显得有点拘谨和胆怯。我很高兴。能够在摄制现场里监督她拍片，她能很快地掌握剧情和人物性格的特点，这可真叫人惊讶……拍片时她常常会一个人苦苦地思索着，蓦地回过头来问我：‘哎，难道我就永远不会成功吗？’我能体察到，也理解那种痛苦，那些话真叫人动心”。

之后，费雯又拍了《抬起头来笑》，同时，也开始在伦敦的戏剧舞台上崭露头角。5月，她参加了阿希莱·狄克斯的喜剧《道德的假面具》的排练，在剧中扮演四大主角之一——安利耶特·丘盖斯奴姬。演出那一天夜晚，春寒料峭，小剧场里挤满了人。丽·霍尔曼破天荒地第一次来观看她的演出，坐在第四排。他来，一定看到了海报上费雯的名字改成“费雯·丽”了，不知他心里是什么滋味。

费雯这次演出的效果是很好的，当然这部分要归功于导演，但她自己的表演总是出色的，她以一种娴雅、美艳的光彩吸引着观众，从而掩盖和弥补了技巧上的某些不足。她的声音并不高，但是，却带着一种相当柔和、迷人的韵味。有时候，她的形体动作还缺乏一个有经验演员的协调和分寸感，但是，因为她身段婀娜轻盈，这缺陷也就几乎看不出来了。演出极为成功，当帷幕落下来时，楼座观众的大声喝彩和池座观众的拚命鼓掌声汇成一片。可以说，自 20 世纪初梅基初次登台演出以来，还从未出现过象费雯·丽这样有希望的女演。

第二天一大清早，出租汽车就把霍尔曼夫妇带到弗利特街，去接受报界的采访。读者们所看到的是报纸的大幅标题：“新星征服了伦敦”、“年轻的新星崭露头角”、“费雯·丽演新剧光彩照人”、“一颗明星升起了”。记者还为她谎报年龄，说她才 19 岁，而实际上她已经 22 岁；他们说她是皇家艺术学院女演员中的佼佼者，甚至可以列入“法兰西喜剧”舞台的表演家行列，为了使文章更有说服力，还附有几张照片。

舞台上的成功给费雯·丽带来了好运。英国电影巨头亚历山大·柯达看了她演的《道德的假面具》之后，大为欣赏，亲自到后台向她表示祝贺，并当场与她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但柯达跟费雯谈话之初，他是一种保护弱者的腔调，答应每年给她付 750 英镑，还说什么“我不还价”，但最后当两个人谈话结束时，柯达不得不大大增加费雯的酬金，并允许她一年中六个月从事戏剧工作。

这一下，真地把受人尊敬的法学家霍尔曼对平静、舒适、安宁的生活所抱的希望全都埋葬了，特别是当费雯·丽有理智且有分寸地向读者谈起她丈夫总是帮助和激励她时，霍尔曼内心更是难以忍受。在任何时候，他都不希望她对事业和演戏迷恋到压倒他们的生活的程度。他甚至反对费雯与柯达签订的那份合同，他从法律的角度认为，那份合同对她太不公正。而费雯心里也不明白，难道他认为成功会改变她的性格，会影响他们夫妇的关系吗？演戏在她决不是满足虚荣的一种手段，而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她矢志毕生为之献身的事业。费雯自认为还不是一个卑劣、浅薄和冷酷无情的女人，她觉得爱情应该是终生的。但是，她与霍尔曼这三年的婚姻却使她困惑，她逐渐明白：爱情，就跟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总是变化、发展着的。她的家庭生活是被操纵在那种严格的教规之下的。最残忍的莫过于以个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甚至自己的一切强加于别人。自由滋养爱情，暴力毁灭爱情——尽管你将这视作道德、义务和习俗的象征。

罗密欧啊，罗密欧！ 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

费雯·丽早期在艺术上的成长足迹，亲眼目睹的已经很少了，他们也很少把当时的印象记录下来。有些评论文章说，她的成功取决于美貌和劳伦斯·奥立佛的帮助。

在费雯刚刚获得成功之初，劳伦斯·奥立佛已经是英国舞台上一位出了名的、卓越的、富于热情的明星。他便是费雯心中的偶像，千千万万的英国少女都倾慕他。1934 年，她看了奥立佛演的三个戏《传记》、《苏格兰女王》和《国王的剧院》，虽然劳伦斯的风格是倾向于追求外表效果的，但她来

说，他就是力量、勇气和活力的化身。

劳伦斯·奥立佛 1907 年 5 月 22 日生于英国，现在被誉为“当代对莎士比亚作品贡献最大的人”，闻名全球的莎剧演员，他在舞台和银幕上塑造的莎剧人物形象曾使全英国、全世界人民为之倾倒。他也是世界电影史上的泰斗之一。然而，费雯·丽不了解的是，她的偶像其实是诞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父亲是牧师，母亲在他 13 岁时就去世了，奥立佛的童年非常艰难。他对事业不懈的追求和永恒的功名心，都是由童年的贫困和屈辱酿成的，是在一连串的长久磨难之后练出来的。更令费雯感到惊奇的是，奥立佛几乎没读过什么书，他不熟悉艺术史，也不懂古典音乐，挫折使他变得更加孤僻、抑郁和暴躁。几年后在命运出现转机时，他曾用一种忧伤的语调回忆说：“只有傻瓜才会觉得自己走运呢。我想这大概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人应该追求些什么。每个小小的成功都会让他们欣喜若狂，我可不会那样。我总是聚精会神地探索一切，我对最高目标的追求决不会出现瞬间的满足。我希望一切都按我的目标去努力，而不愿随波逐流。”明白了这一切后费雯·丽更加钦佩奥立佛，越发仰慕他。奥立佛英俊的外表、魁梧的身材、出色的演技，曾迷住了无数少女。每当他演戏出来，剧场外总有数百名钦慕者在高喊：“我们要拉里（拉里是对他的昵称）。”费雯·丽看完他的演出后，也一往情深，她对女友说：“这才是我要嫁的男人！”可是，这个时候，她已经是一个一岁孩子的母亲、法学家的妻子。

有一次，费雯·丽到伦敦著名的萨沃伊饭店去吃饭，那儿是戏剧界人士常来常往的地方。有人就把她介绍给了奥立佛，当时，他跟妻子，一位叫琼·爱斯蒙的女演员，正在那儿吃午饭。过了一会，奥立佛就邀请霍尔曼夫妇到自己那所著名的“多弗尔大厦”去做客。这个时候，奥立佛刚刚上演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戏里饰演男主角，费雯·丽以亲切的诚意来祝贺他：“我真想说，您演得精彩极了。”

在拜访“多弗尔大厦”之后，奥立佛很快又跟费雯·丽见面了，共同商量以后的工作。费雯·丽想到美国去碰碰运气，她想在赖斯廉·霍华拍的《哈姆雷特》一剧中扮演奥菲丽娅。虽然美国之行未能如愿，但柯达打电话给她，通知她跟奥立佛一块演《英格兰大火记》。1936 年 8 月，影片开拍了。片子所有的角色都由著名演员担任，费雯·丽演王宫中的贵族少女西基雅，奥立佛演她的情人，一个虚构的英雄人物。

这样，两人又相会了，这次是在登海姆的柯达电影制片厂自助餐厅边的走廊上，费雯·丽只是出于一种礼貌，说：“很高兴能在一起拍片。”而奥立佛却回答说：“就算我们在拍片的时候相互讨厌，干脆就用打架来了事吧！”

一天，在拍摄分镜头的时刻，费雯·丽坐在奥立佛身边，膝上摆着一张纵横填字的字谜游戏卡。她身穿一件花领上衣，高高直直的衣领，紧紧围着她那细长的脖子，耳上戴着一对蝴蝶形的耳环，脖子挂着一串珍珠项链，上衣的腰身部位，缝着一块黑颜色的布条，胸襟前锈了一朵盛开的玫瑰，把她的容颜衬托得如同天使一般美丽可爱。

这部影片拍摄历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两个演员的生活完全改变了。看来他们确信彼此已经深深爱上了，但对于周围的人，他们会迅速掩盖这种感情，几乎严守着一种秘密。拍片休息时，奥立佛急忙赶到费雯·丽那儿去，讲点话，打闹逗趣，大笑一阵。要是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他们就跑到附近的酒吧去，不然就到当地的饭馆去。费雯·丽和奥立佛坐在一起，彼此完全陶

醉在爱情之中，这时候，谁也别想再到他们旁边去找个位置，他们周围仿佛只是一片广漠的空间。

奇迹，奇迹般地发生了。然而，这却是凄苦且艰难的，他们自己也没料到，这也是两人长期情感煎熬的开端。那些亲眼见过的人回忆他们之间的恋情时，用了这么一个字眼：“不可救药。”两个人如此无望地热恋着，而在实际生活中，琼·爱斯蒙就在这个时候生了个儿子。但他们又做不到不见面，于是奥立佛经常到霍尔曼家去拜访费雯·丽，可他要忍受女管家和保姆指责和怀疑的眼光，备受折磨。

《英格兰大火记》影片上映后，轰动一时，费雯·丽扮演的角色一直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年轻而又纯真，绝望地热恋着却又无法自己。

影片拍完了，奥立佛和费雯·丽面临着一次考验，奥立佛动身到喀普利岛去跟妻子会面，费雯·丽也到欧洲去和霍尔曼聚会。但就在他俩各自度假完毕后，由于他们在《英格兰大火记》中的完美合作，聪明绝顶的老维克剧团认为将这两颗明星推到一块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此后，费雯·丽又参加了《黑暗的旅程》（1937）、《茶杯里的风暴》（1937）、《圣马丁小巷》（1938）、《二十一天》（1938）、《一个美国人在牛津》等影片的拍摄。

一天早晨，费雯正在清理收到的邮件时，突然发现一个盖有老维克剧团印章的信封。她急忙打开读道：“丹麦当局非常希望你能前来扮演奥菲丽娅，我们也一定为此而高兴。”而劳伦斯·奥立佛则在《哈姆雷特》剧中演男主角。这一件事很有意义，因为英国的剧团最后一次在丹麦演出，还是莎士比亚时代的事。所以老维克剧团重返丹麦引起了国际反响。

这次丹麦之行使费雯·丽终生难忘，她是那么爱奥立佛。在她一生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比她渴望得到奥立佛的爱抚更为迫切了，费雯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当他们抵达丹麦时，两人已难解难分。在丹麦的那一周，他是重扮自己的《哈姆雷特》，而她则是初次扮演他的奥菲丽娅。在舞台上，哈姆雷特对奥菲丽娅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你可怀疑星星是火把，
你可怀疑太阳会移转，
你可怀疑真理是谎言，
可是我的爱永未改变。

而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朱丽叶则对她的罗密欧说：“我要说：罗密欧啊，罗密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

精彩绝伦的演出使观众越来越入迷，当每场演出结束时，观众起立鼓掌达15分钟之久。然而，台下的“戏”比台上的戏更为紧张。奥立佛与费雯的关系已经是剧团每一个成员都知道的公开的秘密了。人们经常看到他们溜达到城堡外的露台上，在一排满身铁锈的大炮旁边，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促膝而坐。他们还经常在海边防波堤上倾心交谈，或阅读报纸上，的剧评。北泽兰岛的微风吹拂着费雯那浓密的油黑卷发，而拉里则满怀柔情地把它们轻轻撩起，亲吻着它们。两人心中的激情之火就象远处水光中的灯影，跳动但却是明亮地燃烧着。

在丹麦的旅行演出，再一次表明，他们回国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回到他们原有的那种家庭生活的模式里去了。两人都开始明白，他们已经不能再返回原状——他回琼·爱斯蒙那儿去，她回丽·霍尔曼那儿去，只能期待着一种前景——生活在一起。所以，在丹麦，他俩就在考虑怎样通过他们的丈

夫、妻子、父母以及新闻界的种种“关卡”，顺利离婚。他们商量好，一回到家里，就向家里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简单明了和顺乎自然地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感情，以求得他们的谅解。

可是，涉及感情的东西怎么可能简单自然呢？这种消息，无论怎样小心翼翼地透露出来，总不免要让人伤心。任何经历过婚姻破裂的人都知道，“宽容体谅人的妻子或丈夫”通常是神话般的虚构。

费雯·丽回去不久就向霍尔曼说明这件事，说自感有罪，非常非常希望他能发发善心。同时奥立佛也告诉琼·爱斯蒙了。爱斯蒙和霍尔曼几乎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即暂不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在这种时候”都不愿去“考虑”离婚的可能性。爱斯蒙对奥立佛说：“请将你的申请再延长三个月。”霍尔曼也告诉费雯·丽：“三年为限，和他生活在一起，看能否长久。”他们两人想等候一段时间，也许以后拉里和费雯之间的罗曼史会象一场恶梦那样，也有它结束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态度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合乎逻辑的，生活不仅仅是一段快乐到极点的时间。这对有情人，各自都有了一个孩子，奥立佛的儿子才三个月呢！但是，理智、逻辑与爱情并不是一回事。

在这种局面之下，这对情侣终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费雯决定马上搬出去住，奥立佛也搬出“多弗尔大厦”，他们在切尔西找了一栋房子，开始了同居生活。费雯·丽给她丈夫写了一封信，请他原谅，告诉他不再回家了。朋友们虽曾极力劝阻他们这样做，但奥立佛认为，为了费雯的艺术生命，她决不能和厌恶戏剧的丈夫共同生活。

在切尔西，他们让每天的时间都按其自己的节律和速度自然地流逝，毫无计划，毫无目的。他们经常提一个篮子装上野餐食物，驱车到空气清新的海边，饱览大自然的美妙景色。偶而也与电影界的朋友相聚一起，边喝甜酒边闲谈。到这里来的人不是什么大名鼎鼎的人，而是那些谈论事业的、有才华的人们——艺术家、作家、记者、演员和作曲家们。这是个真挚的、没有庸俗市民气的团体，是一个有共同志趣的团体，它不是上流社会夫人太太们的“沙龙”，也不完全是慕虚名的小人云集场所。

偶而他们也出去拜访客人。秋天里有一天，奥立佛和费雯·丽去一个朋友家作客。在森林边散步时，客人们对一群在林边跑来跑去的乡村孩童很不高兴，他们盯着客人微笑着，咪咪地学着猫叫，嘲弄着模仿他们的伦敦口音，这时，费雯要试试奥立佛，她对他说：“你，优秀的演员，这是试试你运气的机会。对那些小家伙说点什么感化的话，叫他们住口。”奥立佛接受了“命令”，他向林子走去，用一种听了血都要凉的声音要求他们静下来，接着他又即席表演了几段莎士比亚的独白，尽管奥立佛竭尽全力，得到的却是更大声的嘲弄。费雯·丽对不好意思的奥立佛说：“我来看看该怎么做。”她双手伸向林子，声音颤抖着，这时，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感动，费雯恳求那些人安静下来，然而她也遭到了失败。回去的路上，他们一行人简直笑得要死。

一个传奇故事

丹麦之行结束后，费雯·丽还曾与奥立佛一起到意大利的威尼斯休假，就在这时，奥立佛接到他好莱坞经纪人迈伦·赛尔兹尼克要求他主演《呼啸山庄》的邀请，不久，他携费雯·丽来到好莱坞。奥立佛提出要求费雯·丽

能担任女主角演凯西，但是导演已经预先安排这个角色由曼儿·奥布朗来演，她饰伊莎拉·林顿一角。好莱坞制片人尽管力邀，但费雯的态度很坚决：“要么让我演凯西，要么就什么也别演。”

凑巧的是，当时米高梅公司的制片人、奥立佛的经纪人迈伦·赛尔兹尼克的哥哥，大卫·塞尔兹尼克正筹拍根据小说《飘》改编的影片《乱世佳人》。影片其他角色都已选定，男主角白瑞德，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提名克拉克·盖博来演，并且已经签订了合同。但是，唯独女主角郝思嘉却尚未找到合适人选。为此，塞尔兹尼克进行了美国电影史上最出色的一次宣传活动。这个出身电影世家、丈人又是米高梅公司老板梅那的制片人，靠着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犹太人特有的精明强干，三年前，就以空前的巨款五万美元的高价击败其他对手，从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契尔手中买下了《飘》的改编权，准备以400万美元（约合现在的一亿美元）拍完此片。

他向全国各阶层发出了数百万份咨询信件，结果反映之强烈连塞尔兹尼克本人都感到吃惊。据说，当时，每三个美国女人中就有一人想演郝思嘉，每两个年轻姑娘中就有一个相信灰姑娘的命运会落到自己头上。有幸参加试拍的人达1400多人，初选过关的有92人。当然三十年代是好莱坞的极盛时期，那时候，电影明星享有的威望要远远超过任何一位政治活动家。但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能使塞尔兹尼克满意。在好莱坞的大明星中，蓓蒂·黛维斯本来很有希望，大约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复信推荐她，她是好莱坞鼎盛时期的首席女星。但是她却两次失去了这个机会。第一次，华纳兄弟影业公司请她演郝思嘉时，她因要到英国去而拒绝了。结果，华纳兄弟公司没有得到版权。第二次，华纳向塞尔兹尼克提出一笔有利可图的交易，由华纳影片公司付全部酬金的25%给本公司的演员埃洛·弗林和蓓蒂·黛维丝，让他俩来演白瑞德和郝思嘉，大卫差不多同意了这个办法，但是黛维斯对弗林相当厌恶，不愿与他一起拍戏，所以她又一次拒绝了。米高梅公司的“皇后”诺玛·希拉这时37岁，私下里也试过镜头，但她的崇拜者们认为她这个专门演浪漫主义人物的明星并不怎么适合，她也就下决心不再违背这些影迷的意见了。凯瑟琳·赫本因为主演《苏格兰的玛丽》的玛丽这个角色失败了，被列入了最不受欢迎的演员名单，这次她也投入了轰动一时的争夺。但塞尔兹尼克觉得她不招人喜爱，“缺乏魅力，难以让一个男人追求十年。”还有，宝莲·高黛也有心问鼎郝思嘉，但她因与卓别林的关系暧昧而被排除了。另外，琼·芳登、琼·克劳馥等巨星也参加了角逐。

费雯·丽很早就想演郝思嘉这个角色，1937年2月，在《我们要这样》举行首演期间，费雯·丽给所有参加演出的人每人买了一本在美国刚刚出版的《飘》，她当时就已经读过这本书，她认为女主人公是现代美国文学最真实动人的形象之一。但当她的代理人格利登打听《飘》的角色请谁来演时，塞尔兹尼克的回答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希望。在横渡大西洋到美国去的旅途中，郝思嘉这个人物一直萦绕在她的脑际。在轮船上，她又重读了一遍小说；在飞机上，她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模仿米契尔笔下的女主人公，《飘》的作者，总是用“猫”来形容郝思嘉，费雯就在镜子前练习“猫笑”、“猫似的饥渴目光”、“利爪姿态的双手”等表情。到美国后，她又读了一遍《飘》，她手中的那本书已经被翻烂了，她认为自己就是书中的郝思嘉，下定决心非演郝思嘉不可。

她主动地找迈伦毛遂自荐，迈伦一见到费雯·丽，惊奇地喊出了第一句

话：“噢，天哪！你就是郝思嘉！”但此时，83《乱世佳人》已经开拍了，拍了相当一部分群众场面，而郝思嘉还未找到最佳人选。迈伦答应帮忙，要她见机而行。

那一天深夜，费雯·丽戴着一顶黑宽边帽子，一对灰绿色的大眼睛，描着细细的眼线，穿着腰部打褶的连衣裙，就象19世纪六十年代，郝思嘉那个时代穿着一样，神态是惊人的沉静。迈伦慢吞吞地喝完酒，满怀希望地驾驶着小汽车。这时已经快深夜一点钟了。海边刮来寒风，驱赶着低低的云层，卡维尔的上空辉映着一片熊熊大火的红光，影片正在拍“火烧亚特兰大”。在高高搭起的平台上，站着一大群记者、来宾和助手们。大卫·塞尔兹尼克本人也在那里。他中等个子，微微驼背，头发卷曲，透过一副厚重的镜片巡视着这场大火场景。迈伦不慌不忙地把他的女伴带到大卫跟前，大卫朝自己的弟弟跑了过去，他等了一个多钟头了，那些来宾跟好奇的记者们都疲倦了。迈伦一把抓住大卫的手，用嘶哑的声音高叫着：“喂，天才，我来给你介绍一位郝思嘉”。

当时正烈火熊熊，微风拂面，费雯·丽一手扶着迈伦，一手按着怕被风吹落的宽檐帽，仰着头，使大卫看不清她的面庞，迈伦朝大卫喊的时候，大卫闻声注目而望，这时费雯迅速摘下帽子，任大风吹起她飘舞的头发，场地的火光辉映着她那秀丽而矜持的面庞，越发娇艳动人，深邃的眼睛闪射出绿宝石般的光芒，伴以爽朗的银铃般的笑声。黑色的衣衫紧紧裹住窈窕的身躯，令人想起郝思嘉那只有17英寸的细腰来……大卫被这突然出现的“郝思嘉”吸引住了，而费雯·丽则激动不已热泪盈眶，因为，她渴望着创造郝思嘉，现在到了关键时刻。

谁也比不上大卫的灵巧、远见和才干，在他的事业中充满了许多浪漫的轶事趣闻，他本人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只稍看她一眼，就完全明白她是最合适的人选，至少从她的外貌就可以断定。如果你正在构思郝思嘉的形象，蓦地在你面前站着这个人，她将这个形象活灵活现地变成了现实，再也不用费尽心机去寻找了。很久以来我都不能摆脱这初次见面所产生的诱惑力。”实际上，经过这一次，大卫觉得不需要再试片了，然后，他们又到了导演乔治·顾柯那儿，顾柯请费雯朗读一段台词。如果不计较她那种英国方言的话（她担保在两周内掌握美国南方方言），费雯的朗读给人一种很有力的内在真诚感，独具一种绝大多数对手都缺乏的伤感情调，顾柯也体会到了这个女演员的气质跟米契尔笔下的人物吻合到了什么程度。他说，费雯·丽正是那种能给人一种“触了电、着了魔一般的感染力”的美人。对于费雯的入选，曾在《罗马之春》一片中与费雯合作过的英国剧作家莱姆贝尔特说：“这决定于她的独特气质——文雅的自制力和感情的爆发力的混合体——这跟米契尔笔下描绘的女主人公非常接近。可有一次费雯却说：‘我在郝思嘉身上怎么也找不到跟自己相象的地方。’在郝思嘉的性格中有一股不知怎么的倔犟劲和拼命劲，依我看，应该从她的内在精神去寻答案。”

一位著名的评论员1939年12月在《好莱坞专栏》中说道：“今年1月我用一整栏篇幅，以激烈、轻蔑的言词，谴责大卫·塞尔兹尼克制片公司以及大卫，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家里竟然挑不出‘郝思嘉’——因此选出了一位英国姑娘。而现在，天啊！我不得不祝贺她和每一个与挑选她费雯·丽有关系的人，事实上，她不是在演郝思嘉，而是她本身就是郝思嘉”。

费雯·丽入选郝思嘉，被人们称为是一个十分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它

的魅力就在于它有着许多令人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得到的东西。这场轰动一时的新闻几乎压倒了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重大国际事件。1939年1月13日，费雯·丽正式接到让她扮演郝思嘉的通知。两天后，影片正式开拍。

《乱世佳人》如今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这部巨片长达3小时40分钟。为了拍好影片，费雯·丽一边请人教她美国南方发音，一边深入研究郝思嘉这个人物，并抓紧一切时间进行排练。她每次发现排练与预期效果有出入时，便查对原著。按照对原著中郝思嘉这个人物的深刻理解，费雯·丽既赋予她以鲜明的个性和巨大的魅力，又着力表现了她精神败落的过程；她越是发疯地追求个人的爱情、富有和地位，她的心灵中便越是增长冷酷的情感。到影片结束时，她已变成灵魂深处极为空虚、冷酷无情的人了。正因为如此，费雯在片中的表演极其精彩自然。26岁的费雯不负众望，她扮演的郝思嘉被认为是该片最成功的一个角色，“没有费雯·丽，也就不会有《乱世佳人》的巨大成功。”她的表演，给人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据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所最近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美国民众最喜爱的银幕之吻，是《乱世佳人》里男女主人公的长吻，它被称为“永恒的吻”。影片中这一期待已久的拥吻，完成得庄重、理智、适度，让人回味无穷。

《乱世佳人》因为事前有巨大的宣传活动，所以在它公映前，盖洛普民意测验所说，大约有5650万美国人在翘首等待这部巨片。影片终于于1939年12月15日，在其作者玛格丽特·米契尔和她的主人公故里亚特兰大城举行了首映式，这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首映式。市长下令全市政府机关和学校放假一天，并专门组织了三天的庆祝游行，参加的市民都穿起南北战争时期的服装，费雯·丽和参加拍片的全体演员出席了这次庆祝活动。当他们走下飞机，踏上红地毯时，40名穿制服的乐队前导，演奏着《乱世佳人》中的乐曲给他们开路。当他们到达影院时，有30万人涌去表示欢迎。接着是一连串的庆祝活动、舞会、宴会等等。第二天，举行美国所有南方各州州长出席的宴会，介绍费雯·丽与玛格丽特·米契尔会见。费雯生平第一次领略了美国浩大宣传声势的滋味。但她并没有象第一次“一举成名”时那样激动，她在接见记者时说：“我不是一个电影明星，我是一个女演员”。

影片在纽约首映时，破例同时在时报广场的两家大影院举行首映式。它的公映，轰动了全美国和整个大洋彼岸，全美报刊大肆赞扬它是电影史上最辉煌的胜利。它的卖座成绩打破了当年的最高纪录。从此，《乱世佳人》成了美国电影史上影响最大的影片，历年评选十大最佳影片，它总是名列榜首。它的原底片至今保存在一个金罐里，成为一件珍贵的文物。无论在哪儿放映，观众与评论的热情都是空前的，片中费雯·丽的表演更使广大观众和评论界激动不已。她也因此而获得了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当她去领奖时，塞尔兹尼克特地陪同她到颁奖大厅，她显得格外光彩照人。演说却短得出奇。当她回到座位时，甚至连她的竞争对手、当时最红的女星蓓蒂·黛维斯也走上前来向她热烈祝贺。

“一个真正伟大的演员原来是这样的”

1939年9月2日，一行英国人登上游艇前往桑塔——卡塔利娜岛作航海旅行，游客中有奥立佛、费雯·丽和她母亲哈特莱太太。伦敦时间上午1点，游艇驶进了伊苏鲁海港，当时船上的旅客还沉浸在夜半梦乡中，第二次世界

大战爆发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米高梅公司邀请费雯·丽担任《魂断蓝桥》（原名《滑铁卢桥》）的女主角玛拉。这是伯恩哈特根据罗伯特·舍伍德的同名剧本改编的。剧中男主角由罗勃·泰勒扮演。费雯其实对这个角色并不怎么感兴趣，而且对与她不熟悉的泰勒搭档也不很自在。但抱怨归抱怨，她还是去拍由梅文·利·路易导演的《魂断蓝桥》，因为她毕竟已是个既有高超演技又有严格纪律性的艺术家。

影片描写的是青年军官罗伊与芭蕾舞演员玛拉的爱情故事，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许多多小悲剧故事中的一个。影片是在二战爆发后拍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映照”，而且费雯感到，影片故事就象是为她和奥立佛写的，甚至剧中两人一见钟情的浪漫情调，也跟她与奥立佛的初恋何其相似啊！所以，在拍摄中，费雯·丽给玛拉的性格增添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气质——追求独立，敢向世俗挑战，显示了以对忠实、爱情和友谊独到的见解来对抗环境的精神力量。

影片上映后，同样获得极大成功，并且成为美国电影史上另一部伟大的名片。它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费雯·丽，很难设想，要是没有费雯·丽，影片会拍成什么样子，谁也演不好这个角色，她只属于费雯·丽。费雯·丽真挚自然和富有特殊魅力的表演，将女主人公初恋时的幸福、激动、不知所措；在报纸上看到爱人阵亡消息后的悲痛欲绝；被迫沦为妓女后突然见到生还的爱人时的悲喜交加；在婚前宴会上那表面的微笑掩饰着内心的惶恐不安，表现得淋漓尽致，令无数影迷为之泪眼模糊。费雯·丽又一次显示了卓越的表演天才，继郝思嘉之后，又塑造了一个非常完美并使人信服、令人沉醉的角色。

影片拍完后，费雯·丽和奥立佛分别接到了自己丈夫和妻子同意离婚的通知，于是两人于1940年8月31日零时1分举行了婚礼。为了这次婚礼，他们等待了三年又三天，这正如《生活杂志》从前评论的“由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已订婚的一对情侣，表演着世界上最动人的爱情故事”。现在这个故事终于有了结果。也是好事成双，新婚夫妇度过了三天的蜜月之后，他们乘船返回洛杉矶，作为两位影坛巨擘和伴侣，在历史名片《忠魂鹃血》（又名《汉密尔顿夫人》）中分别饰演男主角、打败拿破仑的英国海军大将纳尔逊和他的情妇、著名美人汉密尔顿公爵夫人。该片拍得凝重而高雅感人，曾受到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赞赏，认为是他最喜爱的影片之一。

但是不久，奥立佛应召到英国空军去接受特种训练。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到40年代末，费雯·丽除了演出肖伯纳的舞台剧《医生的抉择》并到中东为士兵演出歌剧《春天舞会》外，还参加了《凯撒与克娄巴特拉》（1945）、《安娜·卡列尼娜》（1948）的演出。这时，条件相当艰苦，据费雯在同意演《医生的抉择》一片时说：“我跟丈夫已经一个便士也没有了。”她仍然坚韧不拔地从事着影剧事业。1948年9月初，奥立佛和费雯·丽还到新西兰作巡回演出，他们在六个星期跑了四个城市，演了四十四场戏。他们甚至连这个美丽的国家的景色风光都没有来得及看一眼，11月1日，又回到了祖国——英国。

还在旅途中，费雯·丽就透露要与奥立佛一起演根据古希腊索福克列斯同名悲剧改编的戏《安提戈涅》，伦敦的观众从来没有看到过两个名演员同时登台演戏，因此戏票早就预购一空，在票房前排队的那些戏迷就是通宵达旦也心甘情愿。

1949年2月6日，在“新”剧场里，《安提戈涅》公演。但从一开始观众就在担心：那婉转动听的女高音，那天真娇弱的少女神态，那令人销魂的淡然一笑，擅长演浪漫角色的费雯能够演好这个勇敢而刚毅，竟敢在深更半夜寻找时机一个人到荒野里去埋葬被害示众的哥哥的尸体的姑娘吗？但是戏演完了，观众也彻底被费雯·丽征服了。在剧场的走廊里人们谈论的只是费雯·丽，纷纷议论她演的悲剧感情真切。她演的安提戈涅情操高尚，也谈论着她的嗓音是多么动人心弦。有一个老戏迷对他的妻子说：“现在我懂了，一个真正伟大的女演员原来是这样的。”

50年代初，费雯·丽主演了根据美国著名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欲望号街车》。由于她在片中把一个昔日美丽富贵，如今破落早衰，但又不肯清醒正视自己生活的神经质的可怜女人刻画得维妙维肖、活灵活现，第二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在颁奖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当颁奖人考尔门宣布得主是费雯·丽时，好莱坞著名女演员雪莉·温斯特（因主演《阳光照耀的地方》而获提名）却听成了雪莉，她一直走到颁奖台前才有人拦住她。她发誓说，考尔门喊的是雪莉·温斯特，而全场来宾却听到的是费雯·丽。当喜讯传来时，费雯·丽正与丈夫在伦敦演出。她异常兴奋，二十名久候后台的摄影记者坚持要拍奥立佛吻影后的照片。夫妇俩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然后驱车直回公寓，两人只在家里“静静地庆祝了一番”。

暹罗猫在床边凄惨地叫着

在费雯·丽整个艺术生涯中，她与奥立佛的结合既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欢乐，也给他们留下了极度的悲伤。

早在1940年，他们经过长期风雨苦恋而终于正式结合时，爱情的潜在隐患已经逐渐滋长。费雯成名时，奥立佛已是大明星了。两人同居后，她成了他的属下，他成了她一切的主宰。为了使自己配得上他，费雯·丽陷入了痛苦之中，渐渐地，要和奥立佛并驾齐驱的念头胜过了对奥立佛的爱。

更为可怕的是，早在《乱世佳人》刚刚拍完之后，费雯就曾因辛劳过度而出现了精力衰竭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使她精神更加紧张，以至多次歇斯底里发作。有一天进晚餐时，费雯·丽情绪突然变坏，象关在笼中的老虎突然被放出来，声音又急又尖，和奥立佛大打出手，这时，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小时后，她又倒在地上歇斯底里大哭起来，不许奥立佛碰她。平静下来后，她把一切都忘了。这使夫妇俩都很不安，给他们的生活笼罩上了阴影。但又不敢声张，她既不肯去医院，又不肯找精神病医生，她不信自己精神错乱，实际上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她体重日渐减轻，面容苍白，一查才得知是患了严重肺结核病。1945年，在结核病疗养院休养了半年多以后，她患了狂郁型精神病。同时，因为拍片需要不断分别，奥立佛走出家庭到别处寻找宁静与慰藉。双方日益互相猜疑，加之费雯病情日见恶化，五十年代中期，一直被艺术界传为佳话的费雯·丽与奥立佛的爱情逐渐瓦解，终于发生破裂。费雯终身热恋着奥立佛，他们的离异对她是严重的打击。双方25年的共同生活终于结束了，但大家都不知道错在何处，费雯又一次歇斯底里大发作。

1960年5月，费雯收到奥立佛一封信，信中说，同他一起演戏的女演员琼·帕雷罗已经向丈夫提出离婚，因此，他要求费雯·丽给他自由。费雯尽

管很痛苦，但还是在 1960 年 12 月 2 日向法官申明了自己对奥立佛离婚起诉的态度：同意。她的声音低沉沙哑，但很镇静，只是用几乎觉察不出的动作轻轻弹去泪珠，把法庭门口围得水泄不通的记者拍到了一张她两眼发直、神经质地咬着戴白手套的手指的照片，这大概可以算是本世纪最轰动的离婚案了。

那真是些痛苦不堪的日子！孤独、病痛、年华消逝。有一次，当记者提到著名演员伦特夫妇时，她竟大哭起来：“伦特夫妇！他们能白头偕老，我和拉里为什么做不到呢？”在她这种境遇里，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都会消沉下去，因为命运的打击太残忍了，但费雯面对厄运挺住了。

就在费雯极度苦闷的时刻，美国演员、比她小几岁的约翰·梅里维尔不知不觉进入了她的生活，并且寸步不离。由于他在精神上的支持，费雯经受住了打击。当她患病时，他不容许她悲观绝望，梅里维尔总是坚持鼓励她，给她以战胜病魔、生活下去的勇气。因为他，费雯·丽的精神平静下来了。她开始和以前一样跟人们相处。她特别喜爱老年人。费雯有时也走进酒吧间，坐下来问人她可不可以尝点大麦酒，就跟别人聊起天来。有时候她只是静静地坐着。

即使这个时候，费雯仍想去演戏，她说：“做个电影明星，仅仅只想做个电影明星的话，那只是一种虚假的生活，那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一个职业明星的艺术寿命是不长的，真正的演员都不怕年龄增长，她总是有演不完的有趣的角色。拿我说吧，我就不打算退休，我要一直演到 90 岁。”正是由于梅里维尔的爱和她对戏剧事业的执着信念，费雯在极度痛苦的时刻仍参加了演出。1962 年，49 岁的费雯东山再起，又在田纳西·威廉斯探讨人性的作品《罗马在春》中扮演一位已近暮年的舞台名优。以后她又主演了《第十二夜》、《茶花女》、《伊万诺夫》等舞台剧。这时她的演技更加纯熟，在从影 20 多年中，她塑造了各种不同角色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尤其善于揭示人物内心复杂的思想情绪，成为演技派一代名流。但奥立佛与她的离异毕竟给她的精神刺激太大了。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到外地演出归来，常常是被人用担架抬回伦敦的。

1967 年 7 月 7 日，星期五，夜里 11 点刚过，演出结束后，梅里维尔从外地回到家里，他先看了下病着的费雯，就去厨房给自己弄饭去了。过了一刻钟，他听到一个奇怪的响声，急忙又回到房间去，费雯脸朝下匍匐在地板上，显然她还想挣扎着起来……她心爱的暹罗猫布·琼斯在床边叫着。从此，这位天才的演员就一直没有起来。

第二天早晨，她所有的熟人都来了，奥立佛也来了。楼下有一大群人，到处是鲜花……费雯好象睡着了，在梦里微笑，只是脸色惨白。墙上蒙着老式的鲜红玫瑰花纹的涂腊帷幔，床上也是同样的花布罩单。四周墙上挂着许多名画，仰面就是一张最熟悉的面孔——劳伦斯·奥立佛的画像。

整个晚上，伦敦都在为费雯·丽致哀，所有的剧院都熄灭舞台脚灯一分钟，“老维克”、“老维奇”、“凤凰”等大剧院都熄灯一小时，演员和观众一同默哀，悼念这位曾为他们树立了榜样并带来巨大欢乐的明星。时年她 54 岁。

费雯死前一年就立下遗嘱，所有财产都归女儿，全部物品一件不留都分赠给朋友们。她的第二个丈夫奥立佛得到她珍藏的绘画中最名贵的一幅——德加的《浴女》。遗嘱有一条令人很惊讶，费雯决定献出眼睛作角膜移植，

但因为她是死于肺结核，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更使哈特莱太太震惊的是，费雯·丽要求她的遗体火化。在影剧界举行的盛大葬礼上，丽·霍夫曼、劳伦斯·奥立佛都真诚地悲痛地悼念他们各自的前妻。火化之后，按照她的意愿，她的骨灰撒在提克利治磨场的小湖里。

天字号票房明星：

蓓蒂·黛维丝

不知读者是否还记得八十年代时，《尼罗河上的惨案》一片中那个时刻觊觎珍珠项链的斯开勒太太？这可不是一个寻常的群众客串演员。

一次，在世界各国电影名流云集的大会场上，人们不约而同地肃然起立，爆发出雷鸣般的鼓掌声和欢呼声。闪光灯从四面八方接连不断地向着走进会场的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妇人射出耀眼的光芒，整个会场顿时成了欢腾的海洋。这是1986年法国第十一届凯撒国际电影节的与会者欢迎美国著名演员蓓蒂·黛维丝莅临会场时的镜头。中国广大电视观众在荧屏上看到了世界影坛各位巨匠向这位卓越的戏剧和电影表演艺术家表示敬意的热情洋溢、真挚动人的场面。

这位老牌艺术家虽然高龄七十八，但在世界各地观众和艺术家心目中仍有着崇高地位。她曾因成功主演了《女人，女人》和《红衫泪痕》而两次荣获奥斯卡影后奖，并十次获得奥奖提名。在她出场前，大厅里放映了她生平拍摄的最著名的影片片断。当她缓缓步入会场时，全场起立，欢呼、鼓掌、飞吻，持续了好几分钟，人们向这位卓有贡献的艺术家表示深深的敬意。很多年里，她创造了美国影剧界最高票房纪录。并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堪称演技派杰出的代表人物。

自信与自卑：天鹅原是丑小鸭

在我们这辈人刚开始知晓世事时，黛维丝已经是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影后了。在世界各个地区特别是她的祖国，各式各样的评论家——不管他内行外行、挑剔苛刻或者是雍容大度宽厚解人——很长时期内给予她很高的评价，她已经获得了来自这个领域里的多项最高荣誉。各类观众，一群群或者一代代的影迷，通常只能在银幕上欣赏到她光彩夺目的形象，获得一种直接的愉悦和感受，然后齐声欢呼，齐声歌唱。但谁能够真正理解荣誉的滋味呢？

荣誉从来都不是天生的。真正的荣誉究竟凝聚着多少痛苦和欢欣，只有执着的跋涉者才能够独自品味。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艺术事业的成功者。与其他明星相比，相同的是票房收入和轰动、赞美，不同的是各自的追求历程、趣味、价值。结局的崇高完全靠过程的垒砌。如果不是研读和了解蓓蒂的有关生平和资料，我们很难想象她的起点和开端曾是一个灰姑娘的形象，生来平平淡淡，一无妖艳明星的出众美貌，也无性感明星的迷人姿态。所以各位读者在此千万别惦记着梦露和泰勒她们。她们可以参与改变政治生活，可以制造一系列爆炸新闻将美苏最重要的人物和事件踢出头版头条。我们确实需要换一种眼光和角度冷静地看待黛维丝。如果说那些美艳明星是天使，是宠儿，那么蓓蒂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艳星使人激动一时，艺术家却能伴随人的一生，不断地给人以启迪、鼓舞和力量。美国《时代》杂志1962年9月发表的文章指出：“蓓蒂·黛维丝赢得美国出生的天字第一号大明星的美名，并促使电影界巨头犹如大梦初醒，开始重视明星的才能和独立的人格，而不再一味讲究美貌，追求性感。”在这点上，她确实具有特别的意义。最重要的还是她那种驾驭和改变命运、决不低头的精神。反映在艺术

生活中；使人对她产生一种态度傲慢、不可一世的印象。她不论演出舞台剧或是电影，工作时态度毫无妥协余地。她曾说一个人想要成功，必须有胆量让人讨厌。

好莱坞著名摄影师莱里·席勒曾说过：“绝大多数女演员不愿让人在她行动时拍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身体某一部位的缺陷最容易暴露出来，泰勒的下巴是双层的，梦露的下巴有三层。蓓蒂·黛维丝是少有的几位能够接受自己的面相的女明星之一”。当然，这种接受只是一种精神品格追求的选择方式罢了。在主演一部大获成功的名片《慧星美人》后，蓓蒂对专栏作家霍珀说：“我不用担心我的容貌，要是我老是考虑容貌，演技早就扔到九霄云外了，玛戈·钱宁已经年过四十，我也年过四十，所以，我以自己本来的面目扮演钱宁就行了”。这个本来面目不是艳姿美色（这种东西本身不是立足之本），也不是初来好莱坞时那种憨厚拘谨的灰姑娘形象（这不叫演员形象），而是经过探索、体悟、锤炼而升华、超越了的形象，是按自己的本质特性进行必要的修饰，并赋予对象——角色形象以生命活力，从而使观众产生真情实感，进而达到情绪渲泄和享受。这正是蓓蒂成熟时期的形象，她可以有这种自信并必需有这种自信。

但是黛维丝开始时是很自卑的，这是自然的逻辑。一个人的自信既与先天条件有关，也与后天的努力奋斗相联，更与一个人不断取得的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自卑到自信，是一种过程，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目标、因果终点，体现了一个人的本色、气质、精神力量。

《女人，女人》，成功是成功之母

蓓蒂 1908 年生于马萨诸塞州。父亲在她 4 岁时便离开了她，她和妹妹靠母亲作摄影师的收入扶养成成人。少年时期她那颗多愁善感的心便日日夜夜地为表演艺术家们在舞台上和银幕上创造的各种人物形象激动不已并爱上了这个行当。她与好些演员一样从小就有个母亲支持、理解，并不断鼓励她勇敢地走下去。后来蓓蒂考进了纽约的一个剧团，在百老汇舞台上表演了戏剧《打碎的盘子》取得成功，又主演《南方诸州》，更是名噪一时，被好莱坞几家影片公司驻纽约的人看中，请到好莱坞试镜头。

环球影片公司的宣传科长勒鲁瓦派助手到火车站去接她。当助手回来时，手里的红玫瑰花早已枯萎了。他还抱怨说从纽约请的那位女演员根本没有来。此时电话铃响起来了，黛维丝用耳语般的声音对他们说，她已到了好莱坞广场旅馆，为什么没人接她呢？科长不耐烦地说，助手才回来讲，下车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女演员。她同样不耐烦地说：“我恐怕是没有穿貂皮大衣，不过我是带了一只狗一路到这里的，这一点应该能使你们认出我是一个演员！”这是 1932 年 12 月的事情。她到环球公司后，“职业杀手”们对她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杀威棒式的修整手术，这里可不是戏剧舞台。在这里必须丢掉某些东西，适应某些东西。叫她试妆时，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衣服（都是领圈太低，弄成大袒胸，使她羞得无地自容），颇有名气的导演威廉·惠勒认为她也不过是一个试图靠性感取得角色的好莱坞女人：“这些少女都袒露出她们的胸部，认为这样她们就能够找到工作。”这句话使她经历了毕生最痛苦的时刻。不过这位导演以后在黛维丝的艺术生涯中起了重要作用，并且在她的感情史上留下了很特殊的一笔。在纽约，她还以为自己的姿相不错，哪

知这里是别样的庙。本来安排蓓蒂主演的首部影片被惠勒否定后，她又被派到《坏姐妹》中扮演一个小角色。她和母亲去看首次预映时，有人说了句俏皮话，说她在影片上看来活象一只“风吹雨打”的落汤鸡。在她给婴儿（影片中的婴儿是男的，但在拍摄之前大家一直瞒着她）换尿布的那场戏里，竟羞得满脸通红，拍在影片上的两颊就成了两块深灰色。片子未完，她就一路哭着跑回家去了。在环球公司的合同期本来很短，看到这个姑娘“还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就暂时留用几个月，填补几个小角色的空。接着雷电华影片公司竟然还要借她去拍一部片子，公司头头暗想这是有利可图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又借去用了一次，仍无大的起色。她在好莱坞呆了九个月，拍了六部电影——全是失败之作。这么不成气候的人，当然就被解雇了。蓓蒂和母亲灰溜溜的，整顿行装，准备返回纽约。

收拾行李的时刻，电话铃响了。这是命运之神在叩门。黛维丝听到一个男性的声音说：“我是乔治·阿利斯，我要拍的下一部影片是《扮演上帝的人》，你能不能设法立刻到华纳影片公司来一趟，谈谈拍戏的事情？”她以为是一个朋友在开玩笑，就学着他的腔调回答说：“当然遵命，阿利斯先生，您真是太能为别人着想了。”双方你来我往地说了三四句俏皮话之后，阿利斯先生说：“蓓蒂小姐，我真是阿利斯，”她惊得目瞪口呆，倒抽一口气，然后才说：“立刻就到！”

仿佛是命运之神同情这个可怜的姑娘，在她即将作为一个失败者重返纽约舞台时拉了她一把。以前同她拍过片的默里·金内尔——这是一个多次改变黛维丝事业进程的杰出性格演员——真诚推荐她到阿利斯手下拍片。这位阿利斯先生年高六十四，拍片功夫炉火纯青，严以律己，温文尔雅，老练地扮演了各类银幕形象，无论演什么都具有一种富有概括性的父亲形象。他在黛维丝沮丧之时象一个圣诞老人似的给她一个富有转折意义的机会，并带来吉祥和美好的祝愿。他此后一直以慈父般的形象引导、教诲黛维丝，成了她的启蒙恩师，后来黛维丝能够立足影坛，多亏了他。

黛维丝此时来到华纳兄弟影片公司。这家公司是华纳三兄弟经营的，三人做生意个个精明能干，一毛不拔，他们能够当你的面把一块钱变成四块，可你一点也弄不清这里面的奥秘所在。在后来的蓓蒂笔下，杰克·华纳是与高德温·梅耶这些电影业大亨齐名的。黛维丝的演艺事业很大一部分要和这个公司纠缠在一起。

《扮演上帝的人》一片主要描写一个经常举行音乐会的杰出钢琴家蒙哥马利·罗亚尔。有一次，当谋杀一个国王的炸弹爆炸时，罗亚尔正在场，一下子被震聋了，从此再也不能演奏，内心十分痛苦，于是隐居在大楼平顶上搭出的一间小屋里。罗亚尔常从那里用望远镜瞧着下面公园里那些不幸的人们。后来他通过给那些人分发礼物而恢复了自信心。他通过观察他们嘴唇的动作和他们进行谈话，渐渐地了解了他们的痛苦。影叶中有一个女配角：被钢琴家爱上的年轻姑娘格蕾丝，她在他失聪以后不离左右地照料他。阿利斯知道，格蕾丝必须表现出百般的温存而又体贴入微，因为两人年纪相差很多，老夫少妻的事颇难处理，那个姑娘必须不仅把他作为情人而竭诚地爱他，还得把他当作英雄来崇拜，绝不能让观众简单地认为他们之间已有某种暧昧关系。扮演格蕾丝必须有高超的演技，否则人物就非常可笑。阿利斯当然是令人信服，蓓蒂胜任角色也绰绰有余，杰克·华纳看了样片当即与黛维丝签订长期合同。

倍蒂在环球公司时就表现出对报界的感情和谅解，曾被誉为合作小姐，现在更是坦然地对各种事情发表看法。她很喜欢举行不拘形式的记者招待会，并发表看法来解除工资微薄地位低贱的报界记者的困境。这些朋友不曾忘记她早年的这种友谊，所以到了四十年代末期当她的事业暂时处于低潮时，她在影迷杂志上一如既往地得到支持，当个人生活弄得狼狈不堪，几将演成富有刺激性的招供式丑闻时，报刊上依然没有出现一篇叫她难堪的文章。黛维丝的这种良好德性使她现在迅速赢得舆论界的善意好评，她的形象在报刊上顿时产生了光彩。在好莱坞明星制度的哺育下，她慢慢地开始成长。

接着她又获得机会在《有钱人永远和我们在在一起》中扮演一个配角。此片中大影星露丝·查特顿和乔治·布伦特联袂，他俩在影片中相爱，银幕外更是一见钟情、相见恨晚。这使蓓蒂只能痛苦地观望这场罗曼史，因为她早在一年前就暗暗爱上了乔治，而等了许多年后他才对蓓蒂产生同感。拍此片时，《扮演上帝的人》开始公映，获得普遍好评，其中蓓蒂最感得意的是阿利斯在自传中的评语：“她使我大吃一惊，这个小小角色变成了一种深刻而生动的形象创造。我完全出乎意料地从她身上发现了一种闪光，它照亮了台词，并且使台词富有情感。那是一种任何东西都遮掩不住的闪光。蓓蒂今天之所以成为影坛最重要的明星，我丝毫不觉得奇怪。”

华纳公司制片部主任扎纳克将黛维丝推荐给柯蒂斯（匈牙利来的最多才的导演），让她扮演《棉田小屋》中那个诱人的美女。暴躁的柯蒂斯却完全不能接受她，扎纳克极力坚持才使他勉强接受。片中种植场主的女儿玛奇（蓓蒂）爱上了场主大力庇护的管帐人。这部影片1932年9月在纽约公映时，评论界对她处理这个角色的方法表示赞赏。《纽约美国人日报》说：“那个光彩夺目的新手黛维丝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头等赞誉。她扮演了一个最有性格，最富有光彩的角色，这个姑娘的确身手不凡。”《纽约先驱论坛报》发现“黛维丝小姐出演那个迷惑人的富家姑娘时，体现出一种惊人的活泼欢快的气质”，后来她自己也觉得这个角色第一次显示了“我在银幕上可能有的地位”。柯蒂斯又导演了《纽约州的一万年》，片中黛维丝与米高梅公司借来的史宾塞·屈赛配戏，蓓蒂早在纽约时就爱上了他，两人之间的始初感情给戏里的那种离奇的罗曼史增加了令人信服的因素。他们二人具有同一个生日，蓓蒂对他是又敬又爱。可是刻薄而又冷酷的命运之神从没让她在一生中享有深深的爱的喜悦，这或许是她应有的。

黛维丝多次向华纳申请，允许她借到雷电华公司去拍根据毛姆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人性的枷锁》一片，华纳公司用她正在上路，哪肯放人，而且怎么也难以理解一个女演员想去演那种闻所未闻的罪恶形象。最后还是二家公司进行交换，才把她换到《人性的枷锁》中和著名演员莱斯利·霍华德合作，她当然是饰演米尔德丽德。这部片子对黛维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或者是一举成名，或者是一蹶不振。在片子尾部的一组镜头里，米尔德丽德患肺结核已到晚期，疾病和受轻视的双重痛苦使她衰弱不堪，蓓蒂用自己的化妆法表演了这几场戏。当她被人发现时，是住在一家廉价的旅馆里，然后被人送进了医院。她演得很逼真，看来活象一具死尸。

母亲和丈夫提心吊胆去看了预映，而她本人则吓得不敢去。丈夫回来后说：她这次的表演很真挚，令人痛苦地真挚，但它确实太令人痛苦了，所以他拿不准这次表演对她是有很好处呢还是有害。

1934年公映时，引起的轰动已永垂史册。霍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

评论文章代表了人们的观点：蓓蒂塑造的米尔德里德具有巨大感染力，这是一个女侍者，她不断地接受贾利的慷慨赐予和殷勤款待，后来却暴露出自己是毫无良心、忘恩负义的小人。戏里有一个形成高潮的插曲，在插曲中这个没有良心的小人居然大肆攻击贾利在艺术上所下的苦力，撕毁了他的医学书籍，捣毁了他的家俱，最后，她甚至焚毁了他的证券和私人文件，然后象龙卷风似地离开了他的住所。观众对这个悍妇的行为深感义愤。当贾利终于表示鄙视她的行为时，场内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此片后来在华纳公司和米高梅公司重拍过两次，都不及前一部。雷电华公司的这一部片子持续获得热烈好评，评论家认为应该获奥斯卡奖提名。黛维丝此时表演的角色形象触及到较为深刻敏感的人性问题，她的表演既有感染力又十分逼真。这个新型演员演的是别人没有演过的一种女人。影评家们看到在普遍的轻柔飘逸的窈窕淑女式的好莱坞风格之外又出现了一种颇具功底的踏实有力的表演时，都感到钦佩。蓓蒂相信她作了一次重大脱逃，惊险地逃过了扮演天真姑娘的可能性，所以一提到“天真姑娘”一词仍会不寒而栗，演过米尔德里德一角之后，她的名字就算从善于表演穿迷你彩裙的活泼可爱的年轻姑娘的名单上一笔勾销了。

《人性的枷锁》没有使她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几百名愤怒的演员都在选票上补填了她的名字。黛维丝对于未获奖感到万分痛心，因为就舆论界和朋友们的评价看，她理应获奖。所以蓓蒂由此深深感慨：一个人对任何事情都不能想当然。尤其是对奥斯卡奖！她感到气馁而又消沉，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初获奥奖的道路。

在下部片于《女人，女人》中，她演的是一个倒霉的名伶，一个曾经红极一时而今成了酒鬼的女演员，她想把她演成一个百老汇的落魄者，这是她在纽约时期熟悉的形象。这次竟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那尊为人崇拜的十四磅的金像。她知道，这个金像是为米尔德里德而颁发的，聊补旧过而已！

蓓蒂·黛维丝从失败的边缘折回身来，已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一般的人起初不是不想干事业，灿烂一生，但是环境的压力确实太大了。等他熬得不行时想到要有些支撑力，可是晚了。我们太缺乏机会，太缺乏成功的刺激，所以终不免英雄气短。英国学者汤因比提出的挑战与迎战理论以及常见的马太效应都破解了人类存在的命运之谜：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开掘人性的独特银幕形象

黛维丝通过一些年的演艺生活已逐渐认清了自己的戏路子，她想尽力去按照自己的艺术模式拍片，而不是听从老板的支使，叫她随随便便地扮演一些无聊的角色。她的傲慢与固执在好莱坞大老板面前特别是成了惯例和模式的明星制度面前可遇上了对手。于是爆发了一场震惊好莱坞内外的演员官司，因为“我再也无法忍受在我同华纳公司订有合同期间所给予我的那些剧本了。我被迫为自己的前程而采取了十分果断的行动”，而杰克·华纳则说：“这件事毕竟得有个原则——一位拿高薪的明星能不能指挥电影制片厂，能不能只肯拍他或她所喜欢的一些影片。要是这回蓓蒂胜利了，好莱坞就要天翻地覆，制片厂的老板和高级职员都得给人家踩死在脚下了。”官司最后的裁决是蓓蒂败诉。制片厂赢得三年的强制权，而蓓蒂则还得负责偿付华纳公司的诉讼费，连同自己的，总数是十万三千美元。

尴尬和困窘中的蓓蒂又受到慈父般的阿利斯的开导和关怀：“你已经把这场战斗进行到最后的关头。而且已经打了败仗，也许可以说这场战斗是重要的，但它的结果并不重要。你现在的全部想法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有害的情绪，认为吃了败仗是丢脸的事。超越这种想法，你就会比你走在阅兵式的最前列凯旋时更伟大了”。杰克·华纳主动与她和解了，并且由制片厂付了那笔诉讼费。1943年蓓蒂亲近的好友奥丽薇·德哈佛兰又同华纳公司打了一场相同的官司，这次不同于7年前的蓓蒂官司，一直拖到第二年3月才下达了判决书：法院宣称各影片公司是犯了要演员“卖身”的罪行。蓓蒂感激地说：“她使我们从监狱中，从卖身契中解脱出来，演员们将永远感激她。”

蓓蒂通过官司也为事业扫平了道路，制片厂在考虑剧本、角色、导演等问题时多少照顾了这个明星的要求，使她慢慢登上了事业巅峰，塑造了许多富有经典意义的形象。

1934年黛维丝在威廉·惠勒的手下拍摄《红衫泪痕》，这是她长达一年之久的一个梦想。杰克·华纳感到奇怪的是描写一个身穿红色连衣裙的姑娘参加新奥尔良的科摩舞会的故事竟然还可能招徕观众。因为按照习俗，总应该穿白色的连衣裙。这部片子与《乱世佳人》的结构框架有些相像，女主角拒绝了一个既有骏马又有猎犬的贵族，反而结交了一个叫普里斯顿的商界人士。这人本来就够糟的了，更糟的是他重视经济而轻视女人。为惩治普里斯顿，她穿着红色衣服参加舞会。为了惩治朱丽叶，普里斯顿拖住她跳舞，把她累个半死。那天夜里朱丽叶向普里斯顿所道的晚安是一记耳光，又实在又响亮，就象《乱世佳人》一片故事情节开始时郝思嘉打卫希礼的那记耳光一样。普里斯顿走了，朱丽叶深信他会回来的。一年后他果然回来了，但带来了一个北部的新娘。于是朱丽叶要尽她所能想到的各种手腕，试图满足自己的意愿和雪恨。这部片子的主角形象使她获得奥斯卡影后奖。

拍完《红衫泪痕》后她大半年时间被挂起来，在她最顺路的时候，虚度那么多好时光真是太令人心急了。直到接手《三姐妹》一片，这部片子提供了一个与以前截然不同的温顺娴静的新典型。她认为扮演新的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是有莫大吸引力的事。在该片中艾略特三姐妹分别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尝到了人生的苦与乐。其中严肃的露易丝（蓓蒂饰）和一位体育新闻记者结成夫妇，后者想做篇小说家而屡遭失败，于是借酒浇愁，终于抛弃妻子，当上一名海员，最后回来时已穷困潦倒，万念俱灰。蓓蒂扮演的妻子为养活丈夫四处奔波，经历了旧金山大地震的种种磨难，但她始终不渝。她的表演是那样异乎寻常地优美、微妙、突出，令人叹为观止，这个角色被誉为本年度最好的银幕形象。

1939年度蓓蒂迎来了事业上的高潮年。十二个月里她有四部票房价值很高的影片放映，并受到好评。《垂死的胜利》在这年3月向报界公映，《华里兹》在4月，《老姑娘》在8月，《英宫艳史》在9月。甚至美国某些地方，四部影片同时放映。她往后有十几部片子获得奥奖提名，成绩斐然，是由于她在1939年作出了真正巨大努力的缘故。《垂死的胜利》一片不是体现性格，而是描写一个普通的正常的女人。她毅然承受了命运给她带来的一切——人生的全部幸福与痛苦，爱情的全部欢乐与悲伤——她穿过了黑暗，散放出异彩。蓓蒂为这个角色等待了八年。1939年4月22日的《纽约人》说“黛维丝小姐在塑造一个为可怕的疾病所蚕食、为致命的热度所摧残的不久于人世的女士时，最能十拿九稳地显示自己的才华。在《垂死的胜利》中

她演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她那令人惊骇的痛苦必会拨动全国人的心弦……肿瘤影响了女主人公的视力，蓓蒂小姐用她完全是真实的技巧表现了那种行将失明时缺乏把握的动作。”

1941年制片厂买下了畅销小说的拍摄权。普劳蒂的畅销小说《苦恋》中将笔下几个人物点烟的动作描写得颇为新奇有趣，排练这个动作时大家都十分仔细：亨里德抽出一支烟，黛维丝划火柴替他把烟点着，亨里德把点燃的烟递给黛维丝。黛维丝再把这支点燃的火柴递给亨里德，让他点燃自己的香烟。以烟传情就是这样滥觞的。电影发行以后，全世界的情人都学会了《苦恋》中的这种递烟方式。

《苦恋》是一部真正的“女性电影”，它的卖座率达到了轰动一时的地步。在经受了各派评论家吹毛求疵的评论后，它终于名利双收，并作为当年影片的经典作品而名留史册。1942年理查·格特拉和小马丁·奎格利在《五十部优秀影片》一书中，把《苦恋》列为1942年最佳影片。

1949年制片部主任扎纳克又邀请蓓蒂出演《慧星美人》中的玛戈·钱宁。她收到剧本以后，很快发觉由她来演钱宁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剧中的对话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诙谐、巧台、悲哀全都融为一体。蓓蒂迅速就同意了。

1950年10月《时代周刊》扼要介绍了该片故事情节：《慧星美人》描绘了一位年轻的百老汇女演员伊芙·哈林顿怎样从一个想当演员的无名之辈扶摇直上，迅速成为明星的故事。影片开始时，伊芙正处在成功之巅，戏剧界的名流们打算授予她最高演员奖。接下去，三个不同的人物用倒叙的方法展现了伊芙成名的过程。伊芙的成名事实证明她不是灰姑娘，而是麦克白夫人一样的女人……黛维丝在精心设计的强光和写实的镜头中，虽然化妆得很不理想，仍然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也许这是她从影以来的最佳表演。她充分表现了一位令人无限折服的戏剧界第一流大明星爱吵闹、常发火、有时喝醉酒，还爱唠叨个没完的脾气。面对那个该受人鄙弃的人物，她不仅使观众洒下了同情之泪，甚至产生了不胜敬慕之情。《慧星美人》发行之后，一些戏剧爱好者在芝加哥成立了一个萨拉·西登斯协会奖，这是根据片子中的奖项命名的。每年举行一次授奖仪式。二十三年以后的1973年该协会授奖给黛维丝，表彰她多年来对电影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1950年，纽约评论界授给蓓蒂最佳女演员表演奖，以及其他权威评论界的奖项。以好莱坞的标准衡量，来得最迟的荣誉也终于授给了她：蓓蒂应邀到好莱坞大道上的格罗曼中国大戏院前庭的水泥地面上留下手印和足迹，这是一项特殊的荣誉。

《慧星美人》一片打破纪录获十四项奥斯卡奖提名。蓓蒂电被提名为最佳女演员候选人。

好莱坞的三十至四十年代，是蓓蒂的黄金岁月，挟影后之尊又多次提名之声势，她多年蝉联十大卖座女星首席，她那对迷人的蓝眼睛更是风靡了万千影迷。那段日子是蓓蒂·黛维丝一生最辉煌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在好莱坞所有的女演员中，她的演技出类拔萃。她甚至有华纳皇后和华纳“四弟”之称。

她也是当选为电影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第一位女演员，那是1942年的事情。

感情世界：竹篮打水一场空

日常生活中的蓓蒂，并不如她的事业那么顺心。她的婚史上经历了4次离合，另同6个男人生活过。这个在银幕上玩弄男人于股掌的“坏女人”，在真实生活中却一直没能驾驭男人，几度沧桑后，只能幸保伤痕累累的身躯和破碎的心。

她16岁那年遇上初恋情人哈蒙·纳尔逊。直到1932年嫁给他时，曾极其骄傲地说：“我可把保留了24年的童贞，留到新婚之夜才献给你！”她还调皮地强调：“真是急死人了”，妙语顿时遍传四方。婚礼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新郎和新娘以及她的母亲、妹妹等人象出远门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那样累得气喘吁吁，仅仅是极不情愿极不耐烦似地履行了一个简单程序，完全是默默无闻地进行的。黛维丝一生数次婚姻都是淡然处之，不事渲染。所以无法产生出什么重要轰动新闻。当然，她也并不是有什么怪癖。她说在牧师家举行婚礼时还不停地回想从前所经常幻想的自己做新娘时的模样——飘飘欲仙地穿一身白缎子衣服，戴两朵桔黄色的鲜花，按照门德尔松乐曲的节拍，沿着用白缎带结彩的侧廊走向教堂。存好莱坞生存，真要象泰勒、梦露那样个人生活受各界舆论及其工具的干扰、操纵，也是一种十分可怕的事。人多么需要属于自己的宁静和温馨啊。

但是这个哈蒙却不能善待他的大明星妻子。他逐渐变成一个嫉妒心重的男人，有时候哭哭泣泣的闹，有时候则会动手动脚的打。往日的浪漫情梦在现实的荡激下，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比纳尔逊坚强有力的男人，一个接一个地走进蓓蒂的生活中。

从小缺乏父爱的黛维丝，其实有深厚的“恋父情结”，她渴望有坚强的男人能做她的精神支柱，导引人生。但是第一个丈夫却是一个不能摆脱她的阴影的男人，他在女人面前（具体说来就是在这位大明星面前）还不能建立充分的自信与自持能力。这种现象在中外许多大影星身上都曾发生过，也不足怪。

那个天才导演威廉·惠勒来到了她面前。他曾拍出了数部名垂史册的经典巨作《罗马假日》、《魂归离恨天》、《黄金时代》、《忠勇之家》等，公认是巨匠中的巨匠。两人初识时，惠勒正好是英姿勃发，奋力向上的青年导演，蓓蒂则刚刚以《人性的枷锁》跃升为好莱坞巨星，睥睨群雄，不轻易服人。他们首次合作的片子是那部走红的《红衫泪痕》，惠勒的过人才气和择善固执、苛刻挑剔的脾气，最初在黛维丝心中形成极大的排斥感。她看不惯有人年轻气盛，比她还嚣张，所以她就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惠勒要她朝东，她偏向西，惠勒偏偏又不随意将就妥协，一个镜头反复重拍二、三十次如家常便饭，可是看样片时，大家都同意还是惠勒的那一套比较灵光正确，蓓蒂也不能不打心眼里折服于这位才子。

《红衫泪痕》替蓓蒂夺得生平第二座影后金像，她最感谢的当然是惠勒，可是在那种强烈刺激和兴奋的情况下她仍不敢上前拥抱他。蓓蒂事后承认惠勒是唯一强悍到足以控制她的入，她渴望生命中有强人指引航标，可是她又害怕再也逃不出惠勒的手掌心，只有任他宰割的结局。明知当时惠勒已与妻子离异，而且频频向她示爱，自己的婚姻也形同一张废纸，但她就是不敢去面对这份感情，左躲右闪，欲即却离，不肯作任何表示。

正当她闪躲惠勒之时，自称一生最爱女人，经营电影业和飞机制造业的百万富翁霍华·休斯也选中蓓蒂作为他的最新狩猎对象。蓓蒂从未细说过休斯是怎么“诱拐”她的，人们只知道蓓蒂曾经允许休斯在她丈夫外出上班时，

到家里探访她。据说休斯曾经扮成绣花枕头模样，在蓓蒂面前炫耀他空有金山银山，却治不好“性无能”之症，盖世英雄无用武之地！蓓蒂则信心十足地表示她有秘方可以治愈痼疾，于是休斯经常登门受教，请蓓蒂妙手回春。此类影坛艳事传扬都是神速，哈蒙·纳尔逊很快就听到了他们之间的丑闻，便不动声色地聘请了私家侦探，先在家中装设了窃听器，然后躲在户外车上监听录音，再选择一个紧要关头破门而入，只听到蓓蒂的失声尖叫，霍华·休斯则衣衫不整地夺门而逃。

纳尔逊原本想向新闻界公布这盘录音带，诉诸舆论，但很快他就想到道德制裁不如金钱诱人，灵机一动转而向休斯开口勒索。黑白两道都有势力的休斯立刻想派杀手把纳尔逊干掉，夺回录音带，杀人灭口。可是就在下手前夕，他发觉纳尔逊早已向警方报告，并与其好友商定，若遭不幸，千万要向休斯讨还公道。休斯无可奈何，只好乖乖付出7万美金的遮羞费，然后由蓓蒂监督纳尔逊毁掉丑闻录音带。

蓓蒂不愧是一代奇女子，情郎被老公敲诈勒索，她也觉得颜面无光，所以自掏腰包，还给休斯7万美元。离奇的是，腰缠万贯的休斯竟然毫不迟疑地收回这笔遮丑费，只是每年在“东窗事发”纪念日还赠蓓蒂一朵玫瑰花。面对生活中这两位毫无情义，只知贪恋钱财的男人，蓓蒂只有懊悔自己有眼无珠，遇人不淑。她很快就与纳尔逊签字离婚，但是纳尔逊又顺手要走了她的一半家当。

闹完这场丑闻后，蓓蒂却意外地收到威廉·惠勒的火急限时信。当时她对薄情男人的疑惧未消，对惠勒的痴情也不敢搭理，随手就把信放在一边。一周后，她突然又看到这封信，打开一看，原来惠勒与女星达莉雪的感情已到婚嫁阶段，可是他心中真正爱的人还是黛维丝，所以他写了这封信，要求蓓蒂一周之内接受他的求婚，否则，他只好带达莉雪进教堂了。

蓓蒂拆开信封，刚过了最后期限。蓓蒂只觉眼前一阵昏黑，天使在她耳边对她说：无知的孩子，就因为你莫名的骄傲，错失了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蓓蒂连着三天深锁房中，茶饭不思，徒自叹息世间情是何物。

她的第二任丈夫亚瑟是位风流的飞机工程师。有一天，他好端端地走在路上突然晕倒在地，不治而亡。经过法医解剖，发觉他的后脑勺曾遭硬物敲击，造成脑震荡。经过深入追查才发现，他前天与朋友妻子偷情，当场遭人捉奸在床，顺手拿起台灯狠敲他后脑，致使他两天后暴死。

第三任丈夫威廉·雪利是陆战队退伍的风景画家，人长得粗粗壮壮，个性粗暴，度蜜月时即曾把大皮箱朝蓓蒂身上丢，毫不讲怜香惜玉之道。蓓蒂曾为他生了女儿芭芭拉，但是雪利竟然一度想绑架女儿，诈骗她的血汗钱。

1950年黛维丝第四次披上婚纱，嫁给与她合作演出《慧星美人》的男演员盖瑞·马利尔。走进教堂之前，她曾告诫自己，这是此生最后一次拥抱爱情，所以她愿意格外地牺牲忍让，盖瑞好酒贪杯，酒后取闹，甚至会公然羞辱她，她都愿意忍受，可是整整熬了十年“黑暗时光”后，天使又在耳边告诉她：算了吧！你天生不是个做人妻子的料，还是自己过一生。她才走出爱情的迷宫，单独走完她那凄凉的最后29年人生旅程。

她晚年身边唯一的亲人——芭芭拉·黛维丝也未能体谅母亲的孤寂凄凉，还雪上加霜，大肆攻击和怠慢蓓蒂。她1985年叫出版商出了一本书《我母亲的守护神》，该书洋洋二十余万言，将母亲描绘成一个飞扬跋扈、蛮横粗暴的女人，并且常常与母亲吵吵闹闹。此书有些部分略具认识价值，即对

母女之间的矛盾的分析，认为根本上是人生观的矛盾。母亲的人生哲学是“奋斗哲学”；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要奋斗，艰苦奋斗，谋求胜利。女儿的人生哲学是“顺应哲学”；随遇而安，随俗浮沉，不亦乐乎！何苦要奋斗？可是母亲偏偏要求女儿按照她自己的“奋斗模式”去做人，去办事。女儿从不以为然。这就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析还是较正确的，母亲不是象女儿那样生活在一个优裕的家庭环境中，母亲是奋斗成家的，女儿则在浓荫庇护之下，当然难有共同语言。女儿不能带来珍贵的温情，却为她凭添一份悲哀。

一山不容二妇

蓓蒂·黛维丝和琼·克劳馥，这两位誉满全球的影后，在多年的演艺生活中争情人、争剧本、争金像奖，水火难容，誓不两立。她们两人又常常连在一起，在一个厂家，甚至一部片子之中拍片，颇有些一山不容二虎的味道，成为好莱坞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件轶闻，最后竟又化干戈为玉帛，真令人莫测其玄。著名传记作家肖恩·康西丁写了一部生动的回忆录，向世人披露了两位影后之争的内幕秘闻。

这种争执最初是由男演员弗朗肖·托恩引起的。1935年，琼·克劳馥成为明星已经7年，正跟道格拉斯·范明克斯办离婚手续，她跟克拉克·盖博的热恋也结束了。黛维丝在好莱坞的事业正步入低潮，同纳尔逊的婚姻也发生动摇。

托恩是刚来洛杉矶的新影星。他的才华和东海岸教养出来的气质吸引了蓓蒂，她选他做搭档一起拍《女人，女人》，“我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弗朗肖，不管在影片里还是在私下里，”她自己在回忆录里这么写着，“他每一处都显示一种高雅的风度，从他的名字到他的仪表。”

但是弗朗肖却早已被更具性感风采，无以匹敌的克劳馥俘虏了。琼渴望一个有迷惑力的男性伴侣，并且被弗朗肖的才能地位弄得神魂颠倒。珍·哈罗讲过琼最终怎样引诱弗朗肖上钩的故事。当时《女人，女人》正在拍摄中，蓓蒂对琼·布朗黛尔承认自己深深地倾心于弗朗肖。“蓓蒂来看我，她的眼睛溢满泪水，那样温柔，”布朗黛尔回忆说，“她完全一反常态，对我说：“我爱弗朗肖，我想他也爱我。”我心想：“哦，要是琼·克劳馥知道了，那就得发生一场战争喽！”

在拍《女人，女人》期间，琼突然宣布她和弗朗肖的婚讯，但蓓蒂并没有被打败。她要求剧作家增加了影片中她和弗朗肖单独相处的场面，添设了新的内容，迫使两人有更多的幽会。“她差不多疯了，拼命策划着怎样从琼那里夺回弗朗肖，”剧作家阿德拉·罗杰斯回忆道。他把蓓蒂和弗朗肖罗曼蒂克的新闻又传给了琼·克劳馥。

“啊”，琼听了惊叫起来，“这俗气的小东西不会跟弗朗肖成功的。”罗杰斯却对他说：“不过我倒觉得蓓蒂是个好演员，她将来会是个很大很大的明星。”罗杰斯回忆说：“琼明白蓓蒂的诱惑力不能跟她比，但是聪明才智呢？在这方面就象赛马一样，蓓蒂在赛场是个优胜者。琼心里明白这一点，弗朗肖也明白。所以琼得赶快制止蓓蒂和他之间的恋情，在《女人，女人》拍完之后第三天，她就带弗朗肖到纽约去了。之后就传来他们在新泽西结婚的消息。但是他们的婚姻维持不长，1939年终于离婚了”。

除了情人之争外，她们两人之间为角色也经常发生争执。1937年夏天，

蓓蒂要求购得《乱世佳人》版权，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也想签个片约，让她扮演郝思嘉，让艾洛·芙林扮演白瑞德，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克劳馥知道后说：“这是黛维丝小姐梦寐以求的，当然我得先去要求这个角色。”最后，这个众人争夺的角色为费雯·丽获得，任何人都没有她这种与郝思嘉吻合的气质。

她们两人的另一次角色之争是1943年，当时克劳馥离开米高梅公司进入华纳兄弟影片公司。蓓蒂在华纳公司是个赚大钱的人，克劳馥也想占领这个领域。琼请求将化妆室安置在蓓蒂隔壁，她给蓓蒂留下一个花篮和一张便条，希望两人能会会面，蓓蒂没有接受橄榄枝。克劳馥之所以到华纳公司去是因为她的事业一度出现了停滞，所以1944年秋天她接受华纳公司的邀请拍《欲海情魔》。据某些影评家的说法，这个影片所描写的就是琼本人的故事，它描述一个出身低微但野心勃勃的女人跟另一个爱虚荣，邪恶而又自私的女人争夺同一个男人。究竟蓓蒂是否想得到这个富有刺激性的角色呢？后来她曾再三说明当时她根本没有见到这个剧本，自从她跟制片厂闹过争执以后，她难得再作什么选择。而在导演选角色之前，克劳馥已经采取了一点小手腕，终于顺利地通过试镜头而得到这个角色。在拍片过程中，琼并没有显得庸俗和小家子气。她炫耀自己要去制定一批衣服，在腰部打上绉折，在肩膀上加一条窄窄的衬垫，以此更突出她那著名的“克劳馥式的双肩”。

与此同时，蓓蒂在拍一部片子《禾苗青青》，使她的银幕形象又添上一个光彩夺目的篇章。而克劳馥主演的《欲海情魔》则获得一片喝采声。但心高气傲的黛维丝认为自己的影片是严肃的艺术，而克劳馥的影片则是粗制滥造不登大雅之堂的，《欲海情魔》就是这么一部影片。但克劳馥偏偏靠这部影片获得了奥斯卡影后提名，而蓓蒂三部较成功的片子则未能获得这一荣誉。奥斯卡奖揭晓那晚，琼正患流行感冒躺在床上。她想自己大概是指望不大的，所以只是穿着睡衣，收听无线电广播。当主持人报到她获奖时，她尖叫起来，一下子跳下床去，大声喊着等候在隔壁房间的理发师和化妆师，给她打扮好，去迎接那些早已伺机窥目的记者们。

但是琼获得奥斯卡奖没有带来根本性的改观，黛维丝始终是华纳公司的天字第一号明星。

1948年蓓蒂生下芭芭拉·黛维丝，跟她母亲一样称作B·D。当新闻记者要母女俩拍个合影时，蓓蒂拒绝了。“我不愿公开地爱抚我的孩子，”她说，因为琼的两个孩子克里斯廷娜和克里斯托弗是领养的，所以她不想在报界夸耀自己亲生的女儿。“我之所以不想公开炫耀，理由就是我讨厌有的母亲想利用自己的这个身份。”

专栏作家洛依拉·帕森斯有一次去看过蓓蒂和她的女儿，她眉飞色舞地描述这位卓越母亲和她那个美丽的女儿。有一天当遇到克劳馥时，便毫无遮拦地赞叹道：“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最漂亮的小孩。”琼却冷冷地说：“难道有我的克里斯廷娜那么漂亮，有我的克里斯托弗那样聪明吗？”于是，出现了一个“惊彩”的镜头，琼趁着所有华纳公司的头头们都在场的时候，突然出现了，随她而来的是一个保姆推着一辆双人童车，里面躺着她的两个小宝贝，琼一下子同时抱起两个婴儿，一群记者拼命抢拍镜头，在场的其他人都目瞪口呆。

“这真令人作呕，她大概是在超级市场上买的两个孩子。”蓓蒂听到以后说。

数年后两个人都因为孩子而招来很大麻烦，熟悉内情的人谈到琼时说：“她养了一群小狗而不是孩子。”

最后将蓓蒂和琼撮合在一起拍片的是鲍勃·奥尔德里奇，他曾经导演过克劳馥主演的影片。“琼说她想跟蓓蒂在一起拍片，我还没有见过她们有什么合作，我准备导演《宝贝儿简怎么了》，”鲍勃说。这故事里描述互相憎恨的两个姐妹，都是昔日的影星，住在好莱坞一所阴暗凶险的公寓里。琼把剧本副本给了蓓蒂，蓓蒂一边看一边想：好家伙，这么拍出来，就全在这儿了——一个虚伪的琼和一个古怪的蓓蒂。

蓓蒂去见鲍勃，她谈起自己的顾虑：你以前跟她拍过片子，应该知道琼有这种癖好，她喜欢跟一起拍片的导演或男演员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这样她就有了可靠的支配权，“我不想牵涉到这种纠葛里头”，她说，“不过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机会。”

结果她还是同意这个合作拍片计划。签完合同开始拍照时，两人又各出心裁地抢占有利位置，以便新闻报道中排名次时能够排在前面，这种小把戏是某些女人惯常使用的节目，在我们中国人眼中应该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影片拍摄时，为了适应两个大影星，编剧又加了许多细节和情节。琼扮演伤残的布兰奇，被她邪恶的妹妹宝贝简活活饿死。简由蓓蒂扮演。

这一年蓓蒂因此片而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提名，琼落选了，但她作为《奇迹的创造者》中女主角班克罗夫特的代表参加颁奖仪式。颁奖晚会上两人都神情紧张地等待着消息。当宣布到最佳女演员班克罗夫特时，蓓蒂“差不多昏死过去，心情一下子垮掉了”，这是她后来的回忆。而克劳馥则傲慢自得地甩起了她那典型的“克劳馥式风度”，俨然是自己得了影后奖，这一夜是属于她的。

1977年琼病倒了，她没有将自己的癌症消息告诉任何人，不久便与世长辞。在她死之前那个圣诞节，琼在发出去的圣诞卡片上写着：“我与世无争，就是对蓓蒂·黛维丝也与人为善”。黛维丝说她也不明白人们为何要将她们两人联系起来。其实影坛这种带戏剧性的传闻轶事总是有神奇的发酵功能的，毫不足怪。人们没有恶心到将一位有魅力的女演员同一头强悍的雄猩猩总连在一起那才是真幸运呢！

生命晚唱

随着年华老去，蓓蒂的风光逐渐褪色，1951年至1960年的十年间，被她形容为“自己一生中的黑暗期。”她回忆说：“这些年间，我曾失去信心，因为除独立公司拍小成本的影片勉强雇佣我以外，其他大的公司几乎不约而同地给我白眼，为了维持生活，这几年间我变卖了所有的衣物。”

就在蓓蒂最暗淡的时期，一部小成本电影《姐妹情仇》竟奇迹似地改变她一生的命运。这部她主演的影片由于卖座奇佳，使得她也由黑转红，身价大涨。紧接着她又拍了几部电影，同时电视台也争相邀请她主持节目。于是她的生活由穷困潦倒而进入佳境，1963年她搬进新购置的贝佛莱山别墅，蓓蒂不堪回首话当年：“现在我总算有自己的家了。置身在电影界中，你非得有信心不可，干这行久了，我已变得屹立不摇，野心勃勃。”

1979年，蓓蒂录制了电视片《陌生人——一对母女》并荣获电视片最佳女主角艾米奖。1980年12月，在蓓蒂·黛维丝72岁寿辰时，好莱坞为她召

开了“蓓蒂·黛维丝从影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以表彰她在电影艺术上所做出的贡献。

重振声威后的蓓蒂·黛维丝，出了自传《孤独的岁月》。这本书中，她冷静客观地描述自己一生的坎坷际遇。就在这时，她意外地发现自己已患了肺癌。1983年6月，她接受切除手术，同时也因中风而半身瘫痪。

病痛未能打倒黛维丝，她以乐观和毅力走出不幸，1989年4月间，她又推出第二个著作《这些与那些》。书中凝聚了一个历尽沧桑的女人的人生经验。她战胜死神的故事，感动了美国60万读者，两万多封来自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等地区的信件纷纷涌到，都是残疾朋友向她倾吐心声的。对于自己的书能为残疾人带来启示，蓓蒂感到很欣慰，她说：“我的目的达到了。”

1989年8月6日，蓓蒂·黛维丝终于安祥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在巴黎的美国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1岁。她的一生际遇真正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传奇故事。

超时代的影迷偶像：

琼·克劳馥

琼·克劳馥认为她是应该得奖的。可他们会给她么？

无线电传来了查尔斯·鲍育文雅的声音：“1945年被提名为演技最佳女演员的有《圣玛丽的钟声》中的英格丽·褒曼，《欲海情魔》中的琼·克劳馥，《果断的山谷》中的葛里亚·嘉荪，《情书》中的詹妮弗·琼斯和《魂归离恨天》中的“吉恩·蒂尔妮。优胜者是……《欲海情魔》中的琼·克劳馥。”

由无线电传来的“中国剧院”中的喝彩声和欢呼声被布里斯托尔路克劳馥家的欢庆声给淹没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琼·克劳馥确信无疑他说。

假小子

五岁的琼·克劳馥（那时她的名字叫比莉·卡辛）站在舞台侧面，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上那个黑脸的喜剧演员令人眼花缭乱的舞步。看着看着，她的脚忍不住在地板上滑动起来，试着仿效演员的步伐。她是那么专注和忘情，以至忘了时间悄悄地从身旁溜走。

“哎！”那个喜剧演员干完了活，走过后台，拍了拍卡辛瘦小的肩膀，“再不回去，你就要挨揍了。”

“不！爸爸！我要陪你跳到结束。”小小年纪的卡辛扬起脸，倔犟他说。被称作爸爸的亨利·卡辛无可奈何地扬了扬手，“亲爱的，你知道我顾不了你，最好还是回去吃了晚饭再说。”他俯下身子在比莉胖胖的脸上亲了一下，“行啦，回去吧！我还有好一阵忙呐！”

比莉撇了撇嘴，嘟味着跑出后台门。太阳已经剩下最后一丝余烬，欲灭将灭地留在卡奇河的那边。她惊慌起来，在剧院里培养起来的愉快和兴奋立即被不安和恐惧所代替，一股莫名的力量迫使她急急忙忙地走上通往自家院子的泥土路。

当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掌灯时分了，妈妈生气地呆在厨房里，嘴里骂骂咧咧的，哥哥哈尔正伏在餐桌上，专心致志地对付着碗里冒着热气的牛奶，不时抬起下巴咬一口涂着黄油和红糖的白面包，屋子里有一种奇怪的气氛。比莉脱下鞋子，穿着袜子蹑手蹑脚地想穿过厅堂到自己的卧室里去。她顺利地站到了自己的房门口，拉开门正准备进去时，头皮一阵发麻，她不由得扭过头来，妈妈一只手抓着她的头发，一只手握着一根树枝，眼睛里愤怒的火似乎要喷出来。

一顿枝条雨点般地落下来，落在屁股和腿上，比莉只觉得火辣辣地痛，感到全身的血似乎要流淌个干净，眼泪不争气地顺着鼻梁往下淌，到嘴边她就负气地一口把它吞下去，并尽力控制自己不要哭出声，哈尔恶作剧地用勺子敲着碗沿，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好象在为她的挨揍敲着鼓点。她恶狠狠地朝哥哥做了个鬼脸，然后一门心思地想着刚才的舞步和卧室里的洋娃娃，来减轻此刻她身上的疼痛。

当她坐到床上从枕头下摸出镜子一照时，竟然发现嘴唇上有两条深深的牙印。

这一切对一个五岁的女孩来说实在不容易。说来也怪，她对这样的惩罚好象习以为常，而且一个星期里总有这么三两次。“比莉，我希望你和女孩子们一起玩。”妈妈这么命令她。她不听，总要设法跟在哈尔和他的朋友后边，妈妈听了哈尔的状词就拿枝条抽她。当同年龄的人嘲笑她的父亲行为不轨时，她就鼓起勇气和他们打架，不论男女，她为此没少挨妈妈的鞭打。

她不象一般的女孩子那么安分守己。既不主动为家里跑腿和做家务，也不那么温驯可爱。她天性活泼任性，勇敢而又大胆，尤其对戏剧和舞蹈着迷，只要有机会，就跑到剧场后台去看演出，学跳步态舞和动作复杂的踢踏舞。

有一次在学校上钢琴课，比莉听得昏昏欲睡，就决定到前面的草坪上去玩耍。当她从门廊上跳下去时；正好跌在碎玻璃渣上，割断了她的脚胫和静脉，昏了过去。后来给人救进了小屋并叫来了医生。

医生看了她的伤口就说这孩子将来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了。但比莉一点也不相信医生的结论，还有她的爸爸亨利·卡辛也认为她一定会好起来的。

在疼痛稍微减轻后，她就瞒着妈妈下床来走路，摔了跌倒再爬起来。几个星期后她就开始跳舞了，不停地跳，直到疼得厉害才罢休，歇几分钟再来跳。先是五分钟，然后是八分钟，到后来时间越来越长，长到她认为医生的话荒唐透顶。

她的童年并不幸福，不过，至少她认为她有一个体贴人的父亲，这一点精神上的安慰支撑了她很长一段时期，直到有一天哈尔告诉她亨利不是他们的爸爸，她听了十分生气，追着哥哥问是什么意思。

“咱们的爸爸在得克萨斯州，他的姓是莱苏尔，那也是我们的姓。看，这儿。”哈尔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发黄的相片，指着上边一位蓄黑胡子的男人，“那才是咱们真正的爸爸。”

这个打击对她来说太大了。比莉为此大半夜没睡着，她只知道有一个爸爸，那就是和蔼、乐观的亨利·卡辛。他拉着她的手把她领进了迷人的戏剧世界。他理解她，并尽量尽自己的力量保护她。现在她的哥哥却说他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这真叫人不可思议。不过，哈尔说的可都是实情：莱苏尔是个承包工人，他得不停出去打工，以便养活妻子和儿女，但后来他终于觉得负担太沉重了，于是便抛弃了他们，自己出走了。母亲为了使孩子们有新的依靠，就在洛顿认识了亨利·卡辛，并和他结了婚。

二十多年后，也就是1934年，琼第一次见到了她的亲生父亲，确切他说是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和照片，母亲确定了他的身份，他们就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五年后，哈尔打电话到琼的拍摄现场，告诉她父亲要来了。

他们父女见面时的情形，我们不可能知道得太多，她踌躇着走到这个高个子、外貌严肃的男人面前，父亲伸出他的大手握紧女儿的手并吻了手心，腼腆地说：“你好，孩子。”

这当然是后来的事。

在哈尔告诉了她事情的真相后，她开始处于痛苦和迷惘之中，周围的人对他们这一家也似乎格外冷漠，连小孩也不例外。他们不得不把家迁到堪萨斯城。比莉进了一家女修道会的学校读书，表面看去，修女们十分严厉和冷漠。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莉慢慢地发现：同学们都是来自穷苦的人家，并和她一样有过心灵的创伤，而且她感到修女们严厉的外表后面隐藏着慈爱的心肠和对姑娘们的幸福的真挚的关切。她开始喜欢这所学校及学校里的一切了。但随着卡辛爸爸的不辞而别，家里再度陷入难堪的穷困之中，于是，有

一天妈妈对她说供不起学费了，要她退学去帮工。比莉死活不愿意，最后和妈妈达成这样的协议：她整个星期呆在学校里伺候开饭以换取膳宿，周末回家里。

十一岁的比莉开始自己养活自己。每天她必须提前退出上午的课堂，安置午餐的桌子，下午第一节课前也要去洗碗碟。每天她总是第一个起床，然后去做早点，晚餐后也要工作。小比莉对这一切并不介意。她倔犟的性格支撑着她不仅能做完单调而繁冗的杂活，而且做得十分出色。尽管如此，小比莉发现了她和同学们之间的隔阂，虽然她们穿同样的制服，但态度明显有别于从前。她们把她看作是一个仆人而不是平等相待的同学。她给她们端饭菜，她们吃过饭后她来打扫清洁卫生，她要为她们服务，却不能参加她们的游戏，甚至不能参加她们的谈话。比莉因此而十分伤心，自尊心大大地受到伤害，一直影响到她的一生。

后来，妈妈带她去了另一所专供富贵人家的孩子们入学的上等学校，条件是干一些房舍周围的轻工作。这个所谓的轻工作并不轻，它需要清扫有十四个房间的大楼，还包括早晨叫醒小学生，给他们洗澡穿衣服，为三十个孩子做饭。校长是个非常凶狠的中年妇女，对比莉非常苛刻，她的工作稍有不如意地方，就会遭到扫帚把的抽打。如果说挨妈妈的打还可以忍耐的话，那么给这么一个凶狠的妇人毒打，在比莉看来是一种耻辱。她试着逃跑，结果被警察送了回来，又遭到了一顿毒打。后来又企图逃跑，等她一个人静神细想，却发现自己无路可走，妈妈也不会有好颜色，哈尔更会瞧不起她，甚至根本不会理她。还是面对现实吧，比莉把牙一咬又自己回到了学校。她决定忍受一切。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这里用在比莉的身上也是再恰当不过了。

美貌的安慰

十多岁的比莉在学校所遭受的一切没有可以倾诉的地方。她不敢告诉妈妈，担心传到校长耳里受到更多的折磨，何况她妈妈此时已和霍夫先生住在一起，比莉回家的时候，他就要板起脸严厉地盘问，故意挑错儿，或者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带有敌意地沉默，令比莉感受到无言的压力。哈尔呢，根本就不会过问妹妹的事情，他认为女人总是喜欢夸大其辞，女孩更是如此。他可不愿在这类小事上伤脑筋。这样的家还是不回的好，相反，呆在学校，虽然难免皮肉之苦，但毕竟还有自己的一块小天地——自己的房间。

在这所学校的第四年，生活对比莉似乎有了新转机。这是她十五、六岁时候的事了。青春期使她有了一种动人的美丽。脸蛋匀称，呈优美的椭圆形，细长笔直的鼻子和丰满而略带倔犟的嘴唇，尽管她的肩部较宽而臀部较窄，但她的胸部却骄傲地耸起，体现出发育期少女迷人的魅力。

有一天，学校里一个男生走到她面前，约她去附近跳舞，说他们注意她好长时间了，但愿能赏脸。比莉听了心花怒放，很兴奋地答应了，随即又有些后怕他说：“不过，你最好去问问校长。”

使人大感意外的是这位校长居然很干脆地答应了。或许在校长的心里这样认为：如果学校里富贵人家的男孩子喜欢比莉，那么，她的存在将会有利于学校的工作。校长既然心里存了这样的念头，比莉的挨打便慢慢地中止了。

比莉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期待约会时刻的到来。她的同班女生也为她高兴，其中一个女生自告奋勇地送给她一件蓝绸衣服，尽管腋下撕开了一点。比莉很快就使它完美了，她扑了点粉，把褐色的头发好好地梳理了一番，使自己看上去更加妩媚动人，然后在那位小伙子赞赏的目光注视下，从容地走下楼梯，嘴角泛着微笑，自信而迷人。

整个夜晚她都快乐异常，她不停地跳舞，合着节拍，以前的舞步训练使她的动作优美而和谐，令人赞叹不已。她意识到大家都注视着她，男生眼里闪着渴慕的光，女伴则羡慕地甚至略有醋意地观看她、品评她。无论如何，她要成为该晚的中心人物了。直到舞会结束，回到学校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她的心中还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静。多么美妙的夜晚，多么美妙的青春。比莉心中的快乐要赶上或超过以前到剧场后台学跳舞的时光了。

因为她的美丽，因为她的舞步，也因为校长的恩赐，随后的日子里，越来越多的人来邀请她去跳舞了。

现在，她可以光明正大地从大门出去而不必担心被人看见。校长不但不去责难她，反而大开方便之门，甚至还设法从廉价商店买了两件上衣送给她。妈妈也很高兴，看到女儿能够这样忍受以及新的生活的转机，对比莉也比以前关心得多了。她带比莉到百货公司的底层挑选了一件带褶的、绣着玫瑰花蕾、镶着银色花边的波纹绸衣服。比莉很喜欢它，穿上它在一家俱乐部第一次赢得了跳舞比赛的胜利。

她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尽管她从没失去过信心，但通过跳舞及比赛，她的自尊得到了保护。周围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在不断的跳舞活动中，她由盲目被动转入主动，并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评判和挑选舞场及舞伴，由快乐迷醉到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智，要做到这一点对她的年龄来说似乎显得过早了一些。

从学校毕业以后——如果说那也算毕业的话，比莉觉得她并没有学到什么，因为天天等待她的只是许多劳累的活儿，但她还是得到了毕业证书。然后，她就揣着它到一家小百货店里找到了一个卖杂货的工作，周薪十二美元。除了交出一半付给家里生活费用，这是那位沉默的和爱挑剔的霍夫先生的主张，剩下的钱可供她用来购买杂货店优待雇员的廉价衣服，作为她不断去跳舞的装饰之用。

她总在舞个不停，好象她的生命注定要与之结下不解之缘。一次她在堪萨斯城学院的体育馆举行的舞会上，结识了一个叫雷·斯特林的男学生。他是个有热情、有抱负、长得俊俏的白肤金发的青年。他先是惊诧于比莉的美丽奔放，为她热情、充满活力的躯体所倾倒，继而透过这些外在的东西意识到了她身上那股潜在的未为人知的巨大的潜力。他不愿意比莉就此沉寂下去，埋没了那股潜力，便极力怂恿她去读书，上大学，以便扩大其知识面。

比莉似乎一心想讨雷的高兴。她和他一起阅读，一起听音乐，听从他的劝告改变自己的习俗，诸如浓妆，大声说话，放肆地笑等，到后来，她干脆辞去了店员的工作，要去上大学了。

雷是她生活中给她影响极大的一个人。如果说没有雷，就不会有日后的琼·克劳馥，恐怕一点也不过份。正是他，使比莉能够正视自己，正视自己的不足并鼓足勇气克服，争取达到新的台阶。

另外一个对比莉影响巨大的人要算女子学院的院长詹姆斯·伍德博士了。

经过比莉的恳求，她的妈妈同意了女儿上大学的愿望，不过，附加条件是她必须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比莉就象以前在中学里一样，在这所女子学院做上了女侍的工作。这可是个美丽动人的女侍兼女生呢，所以，没有多久，闻讯而来的附近大学的男生便拥到了这个可爱的、有一双会跳舞的脚的姑娘的周围。生活似乎与以前没什么两样，但不久有一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比莉的心。

一天下午，学院里最受欢迎的一个女孩子要求她参加本校的大学女生联谊会。比莉早就盼着这份荣誉，便高兴地答应了。谁知这个女孩子这样来答复她，这个女孩是去请求了联谊会的负责人回来捎信的，“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是这样的，比莉，大伙儿知道你在学校做工，所以她们说不能欢迎你。”她说完就飞快地跑开了。比莉听了，感到一股凉意从脚底生起，直透脑门。她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外边，直到天黑也没有觉察。于是，她就决定逃走。她一个人拎了行李直奔火车站。在站台上等车时，伍德博士赶来了。他很严肃地看着比莉，只说了这么几句话：

“我从一开始就看出这一点：你不管打算做什么事，你一定会做好，而且永远不会认输，但不要逃跑，让你的经历为你作出最公正的裁决。”

比莉听了十分震惊。这些话她记住了一辈子，而且受益了一辈子。

正是在这些人的鼓励和帮助下，比莉开始了她个人奋斗旅程。

从歌舞女郎到在全国征名的影星

比莉听到一家旅行演出团正在招考演员，便急急忙忙地赶去了。她在空旷的舞厅中，在走了调的钢琴的伴奏下，仅跳了几个舞步，就被选中了。作为十六个歌舞女郎之一，每当歌唱演员在麦克风前演唱时，她们就在身后一边踢腿，一边合唱。可惜，这个演出只持续了两个星期就结束了。她用挣到的刚够买回程车票的钱乘火车回到了堪萨斯城，结果遭到了家人无情的嘲笑，比莉便把牙一咬，又返身登上了去芝加哥的火车。她要到那儿去闯天下了。她不能忍受别人的冷眼恶语，她要用自己的行动去给那些人——曾经伤害过她或将会伤害她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当她到达芝加哥的时候，举目无亲，口袋里只剩下两元钱，怎么过日子呢？从小就在困境中滚打出来的比莉这样采取了行动。

她很快找到了一位代理人厄尼·扬的办公室，不顾秘书的阻拦，闯了进去。

“我可能不象外面那些女孩子那样漂亮，”她进来的时候，外面有十多个漂亮的女孩子等着考试，“可我只有一两元钱，我回不去了，请不要把我赶出去。”

扬为她的直率大胆所吸引，作为一名代理人，他的眼光是敏锐的，他看出了比莉的潜力，便安排了她的试演，随后就给了她一份工作，周薪二十五美金。比莉学习了几次基本舞步后，立刻就能胜任了。一星期后，她就被派到俄克拉荷马城参加轻歌舞剧的演出，随后，就签到了一份在夜总会演出的合同。

比莉的悟性很高，又肯学习，再加勤奋努力，所以，不到两个月，她就成了最吃得开的演员之一，她的充满生机的舞步和台风、大嘴巴所表现出来的倔犟使观众耳目一新，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不久，她就有了双份工作的

机会，尽管这很累人，而且都在晚上，比莉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她是个吃得苦的人。

不久，米高梅公司的一个大人物哈里·拉夫看中了比莉，要她去试片，比莉还十分不愿意，因为她的愿望是当一名舞蹈演员，但是拉夫说服了她。

圣诞节来的时候，她收到了一封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电报，告诉她被米高梅公司看中了，周薪七十五美元，这可比跳舞强得多，比莉动了心，1925年元旦那一天，她乘上了开往加利福尼亚的火车。

她和米高梅公司签订了五年的合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高枕无忧。制片厂仍有每六个月一期的决定留用或解雇权。她的职位是否稳定将取决于她所拍影片的质量，而且在她到达制片厂的第二天，她就要面临更加全面的“试镜头”，要么中意，被制片厂留用，要么失败，拿上行李走路。摆在比莉面前的只有这么两条路。而对倔犟执拗的比莉来说，她不能失败，否则，无路可走。

她很快强迫自己镇静下来，把兴趣努力从舞蹈转移到演剧上。尽管米高梅公司给她的印象杂乱无章，匆匆忙忙，往昔她对好莱坞了解并不深，至今只看过八部影片，但是她在参观制片厂时，摄影场上那种扣人心弦的气氛，以及周围生气勃勃和目标明确的行动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总的来说，一切都还不坏，挺合胃口的，但是否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出人头地，则全取决于她自己了。比莉握紧拳头给自己鼓了鼓劲，然后走进了试场。

导演先是让她哭泣。她凭着对儿时的回忆，父亲的离去，学校的冷遇和挨打，家人的冷漠，眼泪一涌而下，不可抑制。导演十分满意，马上要她发怒，但比莉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脸上露出一一种与愤怒相去甚远的滑稽的表情，眼泪顺着脸颊流淌，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大嘴巴一抽一抽地不知要干些什么。

她的考试既不出色也不算失败，但保住了六个月的饭碗，因为她在哭泣过程所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了导演。

比莉回到自己的房间，仔细考虑了一下目前的处境；她和其它蜂涌而来的许多可爱的姑娘一样，并无独特的地方，尽管她有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但她的脸线条过于圆润而少特色。这样的姑娘，在制片厂一天可以抓一大把。如果不想想就这样混下去的后果，恐怕就不会有日后的琼·克劳馥了。

这个时候，比莉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勤奋地工作，在工作中学习，成长，显示自己。她每天将闹钟拨到六点半，闹钟一响，马上淋浴，换衣服，三口两口吃早饭，然后一路小跑跑向制片厂，然而，到了制片厂，她却发现无事可做，没有角色，也没有演出任务，米高梅公司似乎并不在乎每周付给她七十五美元。

这是比莉最害怕的东西。她比一般姑娘幻想的成分少得多。她从来就没梦想着某天一举成名，或被某个头儿看中而把她捧上宝座。没有工作经历，没有经验，没有本事，比莉就永远是比莉，决不会成为别的人。

她就去找宣传部主任史密斯。主任盯着她健康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想了一会，立即有了主意。他将比莉和另一位姑娘打发到海洋公园的沙滩上，到南加州大学的田径场上，还到格里菲斯公园，让她们做出各种运动的姿态，然后拍下来，送到报社去，立即为各家报社的编辑看中，被刊登出来，受到普遍的欢迎。广大的读者，包括影迷，最早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熟悉和了解比莉的音容形象的。

史密斯后来又安排了她在《夜女郎》中露面，仅露了一次面，名字还没有被登出来。比莉并不灰心。她现在已经敢独自钻到摄影场上去了，她象小时候钻到舞场后台偷看别人跳舞一样，大模大样地站在灯光后面看别人拍片，仔细琢磨每一场戏，观看别人尤其是那些有名气的演员的表演，然后回到自己房间里，对着镜子，用自己的风格来表演戏中的人物。每天如此，从不间断，她就靠这种精神逐步窥到了表演的门径，培养了自信心。由于她的勤奋和虚心，很快就引起了导演们的注意。不久，她就在好几部影片中担任角色，先是跑龙套，慢慢地因其独特的表演而进入较重要的角色，有些戏不需导演指点，比莉就能很有分寸地把握住人物的感情，作出适度的表演。人们开始议论她，注意她，认为她是个有成功希望的演员。但是宣传部主任史密斯认为有一件事会妨碍她的知名度，那就是她的名字，于是史密斯便着手给她改名字，取了好几个都不满意。后来干脆在《电影周刊》上发起了征名活动，每周登出一幅她的迷人的照片，留出一块空白，以备竞赛者填入一个新的名字。获得胜利的新名字是“琼·阿登”，比莉便改名为此名。可是，刚用了几天新名字，就有一个小演员抗议说那是她的名字。为此，他们选中了第二个名字：琼·克劳馥，为此命名的一位老太太因此得到了五百美元的奖励。

事业和爱情

尽管在全国范围为她征名，尽管其周薪从七十五美元提高到一百美元，但琼·克劳馥还是敏锐察觉到笼罩着周围的危机和压力。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和她差不多前后进公司的几个女演员都先后得到了重要的角色，正红得发紫，而琼·克劳馥似乎被放逐到了无关紧要的位置。她仔细分析了一下自己的处境和出路，并同那几个红演员作了一番比较，发现其中一位靠的是她的制片老板，因为她情愿嫁给这个糟老头，其动机不外权和利。另一位成了为她的影片投资百万的富翁的情妇。一切都明白显示，女演员想要发迹似乎只有一条捷径可走：出卖自己的肉体。琼不想这么做，何况她并没有什么保护人。但她为人热情真诚，有许多热心的朋友，尽管他们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他们关心她，真心地希望她成为大明星。

“让我来给你一些劝告吧，”她的一位朋友对她说，“你要使自己引起大家的注意。那里有五十个姑娘都想在影片中搞到角色，制片人看花了眼了。他们已分不出谁是谁了。因此，你一定要使自己让人们熟悉。”

琼睁大好奇的眼睛望着这位朋友。

“这很容易。你得利用你的特长，比如说去跳舞和找些公开露面的机会，让人们看出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个建议很合琼的口胃。当她在纽约的富人俱乐部出现时，她以她那具有专业水平的熟练的切尔斯顿舞和黑人舞显示了她勃勃的活力。她的双脚轻快地不停地跳动，其他跳舞的人都远远地站在她的后面以羡慕的眼光注视着她，惊叹她旺盛的精力。她开始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制片厂的老板开始把目光放到了她的身上，并给了她一个较重要的角色，让她和其它二位女演员出演百老汇音乐喜剧《萨莉、艾琳和玛丽》。这是个描写三个雄心勃勃的歌舞女郎的私生活的故事，对琼来说是很恰当的，她十分喜欢这个角色，因为她们似乎有很多的相同之处，所以在拍戏时，显得非常自信。但导演批评

了她，“你表演得太过火了。”不过，这位导演很欣赏琼的虚心和热情，他给了一些忠告，“你不能把每场戏都演得那么过火。你会把观众搞累的。要抑制，要学会控制情绪，遏制住的叫喊更富有感染力。”

琼觉得受益不浅，但并不意味着这对她有什么变化，就处境而言。

“你面部造型不错。”阿诺德告诉琼。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脸不同于任何其他女演员的脸。你脸部的轮廓很适宜于摄影机，只是有一点麻烦。”

“什么麻烦？”

“你必须减肥，摄影机才能把它拍出来。”

琼立即停止了淀粉类食物和糖果，早点只吃牛排和抽子，中饭是牛排和西红柿，晚饭也是如此。几星期之后，她的体重竟下降了二十磅，因而她的眼睛显得特别大，脸蛋不再是圆圆的苹果型的脸，而显出优雅的轮廓。米高梅公司的一位重要的领导人开始对她的进展发生了兴趣。在27年琼参加了六部影片的拍摄工作，她的名字开始和著名的男明星并列头牌。她的周薪调到了二百五十元。她的生活有了足够的保障，周围有一大帮朋友，前途似乎很远大，但美中不足的是差一点东西。差一点什么呢？当然是令人迷恋的爱情。

《我们跳舞的女儿》一片获得巨大成功。评论家们指出：“可以断定克劳馥小姐的经理将会继续为她寻找这类轻松活泼的小喜剧。她不出两年就会实现她那显而易见的向往：凭自己的本事登上明星的宝座。她有美好的仪容，生气勃勃，聪明理智，富有幽默的情趣。她的舞姿优美自如，花样繁多，她知道什么时候停顿和止步。”诸如此类的评论使克劳馥激动不已。她驾车驶过洛杉矶上演这部影片的那些剧院，用照相机拍下罩在剧院上方的大字名牌。年轻的妇女源源不断地写信来，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女性对她的成功极感兴趣，频频发问，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女人。琼·克劳馥亲笔回复每一封信。公司总裁十分欣赏她的成就和潜力，把她的薪水增加一倍，提高到每周五百元。

小道格拉斯·范朋克出身于世界十个最著名的名门望族之一。许多人认为他的父亲能与英国乔治五世、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和爱尔兰大作家肖伯纳相提并论。后来，老道格拉斯与小道格拉斯的母亲离了婚，母子俩远走他方。在1923年，有个叫拉斯基的人想出一个窍门，认为利用范朋克的姓氏可以赚一笔钱。他提出雇佣十五岁的小道格拍一部影片，报酬是周薪一千元。他们成了交，但老道格十分生气，指责儿子沾了家庭荣誉的光，儿子则谴责父亲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因而无权干涉他的事，他们互不让步，大吵了一架，结果，小道格故意跑到好莱坞要和父亲决一雌雄，而老道格则吩咐律师在遗嘱中除去儿子的名字。他们都在影坛从影，但互相持敌视的态度。

琼在参加小道格的《青年伍德莱》的首映式时，与小道格相识了，不过，那天宴会上的首次见面并没有引起小道格太多的注意，但伯恩在演出结束后把琼带到后台去，琼极力恭维了小道格一番，小道格因而对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琼又给小道格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小道格大为感动，立即打电话约琼一起吃晚饭。

于是，他们相爱起来。但当老道格听说儿子要和琼结婚时，暴跳如雷，可是，他们还是在1928年10月8日正式宣布订了婚。

米高梅公司的老板为了讨好与好莱坞第一家庭(老道格离婚后与玛丽·壁克馥结婚后组成的家庭,当时,他们有影帝与影后之誉)联姻的琼,又由于她拍的《公爵走了》大赚其钱,便把琼捧上了明星的宝座,并且宣布她的下一部影片是将由她与她的未婚夫小道格合演《我们摩登的姑娘》。

二十年代,似乎是琼最走运的时期,老板的器重,理想中的未婚夫,再加上名声鹊起,使得琼有些飘飘然起来,她还有什么不可以满足,不可以自我夸耀一番呢?她的确还是广交着朋友,但是,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以前是她地位低下而不得不求助于朋友的话,现在则恰好翻了个,是别人有求于她或仰慕于她,在一片赞扬恭维和喝采声中,琼开始有点颐指气使了。她习惯于成为人们议论的主题和注视的焦点,与之相悖的任何敏感的变化都会引起她的不快和大动肝火。

“琼是我们的女王,我们是宫廷女侍。”琼听到这些恭维话,高兴得不得了。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显得与众不同。在婚礼上,她是新娘,而在葬礼上,她则是那个死了的人。宫廷女侍们分享着女王的慷慨,她们到椰林茶室去参加茶舞时都围聚在琼的固定的桌旁,那个最靠近进出口处棕榈树下的桌子。有一天下午,琼发现那张桌子被人占用了,立即大发雷霆,把侍者领班叫来大骂了一通,领班没办法,只好重新满足了琼的要求,并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将这个座位安排给别人了。

格丽琴是个十三岁的姑娘,有一次,她缠着琼带她出去见见世面,结果,她那含苞待放一样美丽的容貌立即吸引了绝大多数男人的注意,而把琼晾在一边,琼忿忿地对女友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带格丽琴出来了。”她甚至不能容忍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或任何人与她共同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但这一切并没影响她的婚姻。

1929年6月,他们在纽约举行了婚礼。仪式很简单,来宾也不多,蜜月更短,因为米高梅公司给了他们新的角色。婚后的生活十分美满。这就是比莉梦寐以求的童话般的婚姻:这两个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人,他们迷恋于彼此的肉体,探索彼此的心灵。无论是在私下里还是在公开的场合,一个人总爱谈起另一个人。他叫她比莉,她则叫他多多。他们在晚宴上和晚会上似乎忘记了别人的存在,说着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懂的隐语,甚至谈到一些猥亵的事情和彼此的笑柄时会发出一阵狂笑。

小道格非常注意个人身心的修养,他力求成为一个美学家,他念诗,作画,参加一些高雅的聚会,培养自己优雅的谈吐和举止,但他并没有苛求琼。可是,琼最害怕的就是在这方面留给别人话柄,尽管她受过一定程度的大学教育,其实,在学校里根本没学到什么。因而,闯入影坛后,她历来注意自己同别人的差距。她也学着丈夫的样,努力改变自己的风度,在不大欣赏诗歌的时候。她就强迫自己听丈夫朗诵,出去应酬时,尽量使衣着得体,不再穿那种紧裹着丰满的大腿,曲线毕露的裙子,也不再习惯于不穿长袜了。她的目的不是想让人们目迷心移,而只是想让人大吃一惊:原来她是一个高雅的女性。

同样,琼在电影生涯中也在不断探索自己的风格。她认识到不仅她在变,时代也在变。经济危机给人们的心理蒙上了阴影,可是有声电影的势头非常汹涌,大有压垮默片之势。因此,不甘落后的琼又跻身于有声电影的画面中,1930年,她成功地拍了三部影片。其中《欠债须付清》上映时,赢得了观众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电影》月刊说:“你们就等着看琼·克劳馥的这一

震撼人心的角色吧。故事是引人入胜的，而琼的表演简直了不起。”《综艺》报也称赞道：“她的演技深深打动了我们，她象是在任何导演手下都能站得住脚了。”

琼的丈夫小道格的银幕生涯也有一些进展，不过，没有妻子那么大的进展。他主演了不少片子，但都很一般。这使小道格很沮丧。在他们结婚一周年之后，两人的关系便出现了紧张的气氛。他们两人都以飞快的节奏工作着，工作一天回到家里，全都筋疲力尽。琼越来越厌烦读诗，厌烦去拜访不得不去拜访的亲戚，而小道格则十分不耐烦琼的喋喋不休——制片厂里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琼的地位不但巩固，而且事业蒸蒸日上，在公司里的片酬不断提高，1931年，小道格的收入是七万多美元，而琼的收入则是丈夫的一倍多。

明星婚变

他们的分手已不可避免，用琼自己的话说就是：“由于童年时代的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不敢信赖任何人。但当我需要信赖一个人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时，我急于想在好莱坞结识的各种各样的熟人中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而结果呢，却和往常一样。”

也许是早期的生活使得琼具有双重性格，既容易为一些貌似真诚的东西所吸引，这是她一生中所极为缺乏并致力追求的，又因为通过她自己的亲身体会，从而发现真诚的东西实在难得而苛求于他人，使自己处在痛苦和孤独的折磨之中，她自己好强倔犟的性格也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鉴于上述原因，无论琼是否会遇到克拉克·盖博，她的婚姻注定是要破裂的。

“第一次遇到他时，我很害怕。”琼回忆说。“我一直在想，克拉克是个舞台演员，他懂得怎样念台词，相比之下我很难受。他会讥笑我的。”

后来克拉克也说了类似的话，“她是位明星，懂得电影的全部诀窍，她定会讥笑我。”

尽管他们彼此都感到害怕，但克劳馥和盖博所配的戏却一拍即合。他们那种粗犷的、无产者的风格与百老汇以及进口的英国演员的有声片形成鲜明的对照，绝对适应了1931年美国时代的步伐。他们先是主演了《笑着的罪人》，这是一部成功的影片。几个月后，他俩再度合演了《为卿倾倒》一片。在琼的职业演员生活的进展中，这部影片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她从此不再扮演那种热衷于跳舞、头脑空虚，享乐主义的银幕形象了，而开始扮演那些从社会底层发迹出来的姑娘，巧妙地体现出美国大萧条时期所淹没了的那个阶层的生活。这是对她的艺术生活而言，对个人生活而讲，她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克拉克·盖博。

他们在戏里演恋爱的镜头，在戏外也不甘寂寞，尽管他们都各自有着家庭，但无人出来干涉这一切。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幽会，驾车远游、没完没了地向对方倾诉衷肠。

“我们为什么不离婚？那样我们就可以结婚了。”琼建议道。

“听到你这么说，我太高兴了。宝贝。”克拉克双手摩擦着，一幅跃跃欲试的样子，然而，米高梅公司的老板路易斯·梅那插手干预了。他听到关于两人的罗曼史的报告后，大为恼火，立即派人把盖博叫来，命令他马上停

止同琼的关系，否则，后果自负。梅耶的话给盖博浇了一盆凉水，他想到自己不稳定的新星的地位，还不敢和老板对抗，于是盖博就心灰意懒地从情场上退了下来。

盖博撤退后，琼还是和小道格离了婚，随即他就结识了弗朗肖·托恩。

那是他们拍《今天我们还活着》一片时相识的。影片虽不成功，但其中两个演员的恋爱却相当火热。

琼还从没有结识过象托恩这样的男人，仪表堂堂，风度不凡，一举一动显得十分有教养。琼马上就为他所吸引。她非常欣赏他的热情奔放的谈吐，并决定尽心学习托恩的言谈风味。托恩也为她的勃勃的朝气所迷惑，他几乎马上就迷上了琼。

可是，琼在和范朋克离婚以后，曾经对知心朋友说过，“我这辈子决不再结婚了。忠诚和真正的爱情，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如果有人发现我再相信这样的事，我希望他在我的下巴上狠狠揍一家伙。”

她把这种诺言保持了三年之久，实在不容易。弗朗肖象个初入情网的小伙子，对她极为慷慨，不但坚持不懈地送鲜花给她；而且还不时会送给她一些珍贵的书籍和艺术品。他不去参加电影界的集会，而是陪她去看戏，听音乐、到雅静的餐厅去进晚餐。

琼有时也会去托恩的住宅幽会。为了确保不让人看到她，她盖着毛毯，睡在她开去的大型高级轿车的地板上。

这种小把戏当然瞒不过旁人的眼睛。当他们的老板得知这一情况时，不但没有去阻止，反而在两年内优先安排了这对情人合拍了四部影片，这似乎促成了他们的结合。1936年琼第二次结了婚。

但这次婚姻也没有维持多久。琼太要强，她要求托恩绝对的服从，有时甚至专横到丈夫下跪求饶的地步。托恩的自尊心大大地受到了伤害，何况他们一直没有孩子。她流了两次产，医生告诉她，她是不可能生孩子了。所以，有一次托恩正在和一位年轻的临时演员睡觉时，琼闯了进来。

“我想这类事情恐怕是经常发生的吧。”琼愤怒他说。

“当然！”弗朗肖也不甘示弱，“这种事天天都会有。我回家见到你之前，我必需证明自己依然是个男人。”

事情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离婚。时间是1939年。然而结局并非这么简单，琼在固定她的明星地位之后，现在开始走下坡路了。老板不喜欢她，或者说不重视她，和她同时成名的女演员看不起她，甚至拍片的导演有时也刁难她，而她在随后的几年中拍的片子，愈来愈不叫座。她又结了一次婚，结果也没有什么起色，所以她终于鼓起勇气，解除了同米高梅公司的合同，从合同演员一变而为独立的明星。她聘请了一位很有能力的代理人，专门为她寻找有角色给她主演的制片厂。第三个丈夫在事业上也不景气，连连受挫，似乎一切都已经过去了，那些好时光，令人回忆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激情，都成了历史。

最高荣誉和百事可乐

琼·克劳馥是个很有个性的好莱坞明星，她倔强、勤学，善于适应不同的环境。有个导演这样评论她：“她醒来象电影明星，她去厕所象电影明星。她给影迷们回信要换上一套特殊的衣服，吃午饭又换上另一套。”她似乎总

在扮演角色，每一个场景的变换她都要设法取得与场景的一致，所以她的性格也常常叫人捉摸不透。她喜欢驾驭别人（只有拍戏的时候才例外），喜欢热闹和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其实，这种表现既表明她对自己勤奋的果实的珍惜，同时也说明她害怕孤独和受伤害，这大概是童年生活在她心灵中留下的阴影吧！因此，当四十年代，观众追求新的女明星，而渐渐冷淡琼她们这批三十年代的名角时，当公司老板为了迎合观众的口胃，而忽视她们的存在的时候，琼倔犟好强的个性迫使她主动提出解除与公司的合同，这样，她就成了一个自由的女演员，她可以有相对的自由挑选剧本和制片老板，因为有不少的老板认为在琼的身上还是值得冒一冒险，何况，有这样的明星作后盾，可以要挟那些成了名的而又不太愿俯首听命的合同演员。正因为这样，她拒绝了许多不大适合的剧本，尤其是那些在她看来注定要失败的影片。也正因为这样，琼自己把自己推上了表演艺术的高峰。

当詹姆斯·凯恩于1941年发表了小说《欲海情魔》时，一些电影厂家尽管都认为这是个很好的电影素材，但因为其中混有不贞与凶杀的情节，不适合已婚成家的观众们观看，于是都不敢问津于它。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冒险买了这部小说的拍摄权。他们指定拉纳德·麦克杜格尔将其改写为适合琼的脚本。

当琼拿到剧本以后，立刻一口气读完了它，边看边说：“我喜欢它，我要的就是它。”华纳兄弟看到琼的反应立即松了一口气，并决定派最有经验的迈克尔·柯蒂兹来导演这部片子。但柯蒂兹很不情愿和琼合作，他在办公室里大叫起来。“要我来导演那个性情怪癖的女人！你就是拼了命我也不干！让她带着她那不可一世的派头和那该死的垫肩到这里来！我决不和她一起工作。她完了，她已经被淘汰了。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导演一个过时的红人？”

但琼认定这部片子会极为成功，而柯蒂兹也是最恰当的导演，她不愿放弃这次机会，所以，她走到导演的跟前，放下架子对他说：“好吧，我们先试试镜头吧！”当柯蒂兹还在导演一些廉价影片时，琼就已经是明星了，她这样和他说话，无疑是极大的让步。所以，柯蒂兹丢开了戒心。在他看了琼试镜头的样片后，咕噜了一句，“我看也只有是她了。”

后来，他们合作得非常顺利，琼在表演中一点明星派头也没有，完全尊重导演，甚至主动和那些毫无名气的剧组成员打招呼，谈得十分投机。柯蒂兹心悦诚服，工作得更加卖劲。当影片拍摄完毕，他们已经可以用亲密的语言交谈了，在庆祝摄制工作圆满结束的晚会上，这位导演说：“当我答应为克劳馥小姐导演的时候，我认为她是个固执得象骡子一样的女人，我下定决心非要以苛求的态度对待她。而现在我才知道她是多么和善可亲，多么谨守职业道德，多么具有才华。我完全收回我原来对她的看法。”

1945年10月《欲海情魔》一片首次上映，评论家纷纷加入赞颂的行列。《纽约时报》称克劳馥的形象为“真挚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形象”，《先驱论坛报》也表示赞同，“感情强烈而又有节制……她的表演是经过仔细揣摩的，毫无过火之处。”甚至连作家本人也为之倾倒，他送给琼一本皮面的《欲海情魔》精装本，题词是：“送给琼·克劳馥，你是照我所企望的那样，把米尔德里德带入我们的生活，你将得到我终生的感谢。”

然而最值得高兴的当然是琼本人，这一年她和四位新的明星，英格丽·褒曼、葛里亚·嘉荪、詹妮弗·琼斯、吉恩·蒂尔妮一起被提名为奥斯卡金像

奖演技最佳女演员。

琼·克劳馥一直认为她早就该获奖了，可是，命运却安排了一大帮强有力的竞争者，瑙玛·希拉、葛丽泰·嘉宝、珍妮·麦克唐娜。现在，她们都退隐了，而琼却东山再起，重新获得了成功，在世界舞台上她不曾出现已达两年之久，这在电影明星的生涯中确实是一个“可怕的冰冻期”。在这期间，她没有收入，而且第三次不幸的婚姻耗尽了她的储蓄。她等待了又等待，终于等来了《欲海情魔》。但能否获奖呢？能否和那些年轻的新垦一决雌雄呢？琼焦虑不安，六神无主。颁奖之日一清早，克劳馥就在电话里对代理人大声喊叫，“我不能去了。我害怕、我会输的。”不管代理人怎么劝，她死活不肯改变主意，最后竟发起四十度高烧来了。医生说她无论如何是不能参加学院授奖仪式了。

在中国大剧院，当颁奖人宣布克劳馥当选为影后时，全场掌声雷动，导演柯蒂兹代她领了奖。当获奖的消息通过电话传到克劳馥耳里时，奇迹发生了，她的病一下子全没了，她起床梳妆打扮了一下，准备接受祝贺者的“猛烈攻击”。

她的事业复苏了，现在面临的是需要解决她个人的生活问题了。她的第三个丈夫在事业上每况愈下，他们之间更多的时候是默默相对，一言不发。这不是心满意足的沉默，而是两人彼此再也没有共同语言的痛苦的表露，于是，他们很友好地离了婚。

琼获奖以后，艺术生命得到了新生。这之后，源源不断的剧本送来供她选择，而她此刻已具备足够的能力和目光去评定剧本的优劣，因此，到1952年《突然的恐惧》一片被提名为学院奖时，这一段时期，她共赢得了三次提名。另外一片是1947年的《为卿倾倒》。尽管如此，随着年事的增高，人们还是开始对她乏味了。尽管她与时间挑战的期间比大多数明星要长得多，但现在时间追上了她。她觉得太孤独了。她需要一个伴，一个可以使她从痛感年华逝去的苦楚和孤独中抽身出来的新环境。大约这是她第四次结婚的根本原因。

阿尔弗雷德·斯蒂尔是个满怀信心，稳操胜算的人。他和琼一样，是个胜利者。作为遍及各地的百事可乐企业的领导人，他使弱小的百事可乐在竞争中战胜了强大的可口可乐企业，从而确立了她的权威地位。他和琼的联姻，给百事可乐公司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琼一方面继续挑选剧本拍戏，一方面大力投入为百事可乐作广告宣传的演出工作。在一次九城市的巡回演出中，她总共出席了一百七十六次新闻采访，演出了四十一个电视节目和六十五个广播剧。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百事可乐的销售量已从1955年的八千七百万瓶上升到1957年的两亿五千六百万瓶，而且销售额还在继续增加。在打入国际市场方面也很有成效，特别是在非洲、亚洲和南美的一些国家里，百事可乐正在日益压倒可口可乐。这其中琼的功劳实在不可小看（他们结合于1955年）。

然而，好景不长，斯蒂尔由于心脏病于五九年的一个星期天早上离开了他的伴侣，到天国去安息了。

琼没有悲伤，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何况清算丈夫的遗产及账目和税款时，他已经什么都不剩了。琼在晚年仍不得不为她的将来做重新的打算。百事可乐公司为了表示他们不曾忘恩于琼·克劳馥夫妇，在斯蒂尔去世两天之后，将琼选入百事可乐董事会，这意味着，她还得继续干下去，使公司得以

发展。同时，她还得分出身心来拍片，以维持日见艰难的生活开支。这一切对一个老妇人来讲实在太吃力了，再加上她现在举目无亲，孤立无援，换了别人，恐怕早就吃不消了，但琼是倔犟的，她是靠奋斗一生过来的，这一切她都挺住了，而且干得并不算大坏。直到她临终，仍是如此。

孤独的晚年

公司里已经越来越不重视克劳馥了，在拍过《类人猿》之后就没有演电影的邀请了。尽管她曾经说过：“我喜欢竞争，竞争是生活中最伟大的挑战。”但现在，她没有了竞争的机会和场地了，她已经负担不了豪华公寓的开支了，虽然她可以从百事可乐公司每年获得五万元的酬金，外加一笔数目可观的利润，但是她没有了拍片的进项了。

所以，她搬了家，而且开始酗酒，一口一口地呷着伏特加，靠回忆往事来打发时光。后来，百事可乐公司认为她一钱不值了，撤掉了每年分给她的红利以及电话线，并要求她从公司退休。

她现在什么都没了，没有百事可乐，没有好莱坞的生活，生活中曾一度非常亲密的朋友也没了踪迹，记者的采访也越来越少了。

她吸烟、喝酒、深居简出，与外界只保持极少的通讯联系。她把自己关在大房子里，放映她主演的片子，一遍一遍地放，直到睡熟为止。1977年5月10日，这个倔犟的有个性的演员在孤独中离开了人世，享年七十岁。

艺海与情海的弄潮儿： 英格丽·褒曼

好莱坞王国是明星至上。群星之中有一颗璀璨闪亮的明星，这就是英格丽·褒曼。她以其朴素的风格，精湛的演技和严肃的创作态度而别具一格。鉴于她在艺术上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奥斯卡委员会曾三次授予她奥斯卡金像奖。可是她却不曾想到这种灿烂的明星之光所给她带来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她从未认真权衡过誉满天下的功名会带来相应的不良后果，也就是说真正的个人私生活已经不再存在。恰恰由于她历来扮演的角色使观众对她的玉洁冰清深信不疑，因而她的个人私生活要比其他任何明星更受人们的关注和非议。她的生活是属于千百万敬慕倾心于她的影迷的。

“爸爸，我要干的就是这个！”

1915年，英格丽·褒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个画师的家中呱呱坠地了。她是这个家庭中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一个孩子，在她前面的两个孩子都夭折了。她的降临给这个寂静的家庭带来了无比的欢乐，父母对她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她的父亲贾斯特斯·褒曼是一个成就一般的画师，他在一个树林里写生的时候遇上了从汉堡到瑞典避暑的弗里苔尔，也就是褒曼的母亲。他们一见钟情，相见恨晚，接着便订下了他们的终身。然而褒曼的外祖父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因为褒曼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个穷画师，而且还是个瑞典人，而自己的女儿则是德国布尔乔亚的一个大家闺秀。经过七年的艰难抗争，才终于使褒曼的外祖父、外祖母心软下来，玉成了他们的婚事。因此，他们对他们爱情的结晶——英格丽·褒曼无比珍爱。可不幸的是，褒曼的母亲在她刚满3岁的时候就谢世了，这令褒曼的父亲贾斯特斯伤心至极。从此，他把对亡妻的爱倾注在褒曼的身上。他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着褒曼，总是尽自己的全力使褒曼感到快乐、幸福，并力图避免给褒曼带来任何一点伤害。在父亲那里，褒曼深切感受到了人类最崇高的爱——父爱与母爱的完美结合。褒曼也同样深深地爱着她的父亲，完完全全地依赖着她的父亲并对他百依百顺。在后来，褒曼曾回忆道：“我是那么热爱我父亲，过惯了同他在一起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待我就象是哥哥。”他们父女的关系非常亲密和谐，在褒曼的一生的头十二年里，父亲贾斯特斯成了她唯一的真正的精神支柱。

贾斯特斯是一个生性快活，多才多艺的乐天派。他十分爱好绘画和艺术，喜欢音乐和歌唱，热衷于摄影，并且对拍电影也入了迷。他确信他的女儿早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表演明星。因为褒曼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她的艺术天赋。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老是想演个什么东西，一只小鸟啦、一个警察啦、或者是一只花盆啦……。而且她常常站在镜子前扮演着各种角色，从大狗熊、老太太直到年轻的公主，而所有这些角色都是她自己想出来的。这令她的父亲贾斯特斯感到无比的兴奋。他常常帮助褒曼乔装打扮，并且在褒曼表演得最精彩、最有趣的时候为她拍照，这使褒曼感到鼓舞，从而更增强了表演的欲望。

在褒曼8岁那年，父亲贾斯特斯就请人为褒曼上声乐课，并让她学习弹钢琴。他深信只有音乐才能使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并激发人的创造力和对美

的追求。为了在女儿脑子里建立起一个艺术家的概念，在褒曼 11 岁的时候，他就告诉她：“要当个艺术家，就要有创造性。”这在褒曼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一个关于艺术的深深烙印，并且影响着她的整个艺术生涯。褒曼的父亲虽然不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但他懂得只有感受到了艺术的美，才会对艺术有着狂热的执着和追求。在褒曼大约快要懂事的时候，一次父亲带她去剧院看戏，这是褒曼第一次看戏。这次话剧演出只看得褒曼两只眼睛都瞪圆了。她惊讶地发现：成年的大人竟在舞台上比划着她在家里为着好玩、灵机一动瞎编出来的花样把戏，而他们却还把这堂而皇之地称作为工作！一种似乎得到了社会认同的喜悦使褒曼激动不已，她感受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鼓舞，在第一场幕落间歇，她十分高兴地转过脸去冲着父亲嚷嚷道：“爸爸，爸爸，我要干的就是这个！”声音大得几乎能让整个剧院都听得见。散场出来之后，她一眼看到门口竖着演员们的名字，她再一次嚷嚷说：“这就是我想要干的，我的名字也要象这样竖立在剧院的大门外，被灯光照得通亮，我的名字要登到报纸上去。”她为自己这个奇幻而美丽的梦想陶醉了。虽然这看起来只是孩子气的想法，但褒曼的父亲仍然为之惊喜，他相信他的女儿一定会实现这个梦想。

尽管贾斯特斯自己平时的生活很随便，可是他却意识到一个人只有具有有条不紊的生活习惯，才会对待任何事情都严肃、认真。而在艺术的探索上需要的就是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年他都特意带褒曼去德国看望褒曼的外祖父母，并把褒曼交给外祖父家接受严谨的德国教育。正是在外祖父家褒曼受到了极为严格的传统德国教育。有一次，褒曼信手把一件裙衫乱搭在椅子背上，而没有叠得整齐。外祖母硬是在半夜三更把褒曼从床上叫起来，让她把裙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椅子上。然后外祖母又用手指着她的那双鞋，因为放得不齐。而在老人的眼里是应当并排放在一起，鞋头都朝一个方向的。正是这样严格的教育，使褒曼养成了日后有条不紊的生活习惯以及对每件事严肃、认真的态度。

贾斯特斯还很清楚地知道仅仅具备了这一点点成为艺术家的天才素质是远远不够的。家中的天地毕竟大小，无法激起一个人不断创造的欲望。他得把女儿放到一个大的艺术环境里去锤炼，让她不断感受到艺术的美并不断地发掘她的创造力。于是，他经常把他的女儿带到他的知心朋友贡纳尔·斯潘贝格那里去，贡纳尔开着一家花店，有不少男女演员是他的花店里的老主顾。差不多每到星期天他都要邀请他的朋友们到他家去吃顿晚饭。这正是适于褒曼的一个好环境。于是、贾斯特斯经常带褒曼到贡纳尔那里去，褒曼聪明伶俐非常逗人喜爱。饕餮之余，贡纳尔叔叔常常要她来上一段即兴表演，这就激起了她更大的表演兴趣。甚至后来她要是不自告奋勇演上一段，就感到技痒难忍，无法过瘾，所以每个星期天她都要大显身手表演一番，变换着嗓门把所有的角色行当都演到。她常常沉浸于她的角色中忘乎所以，手舞足蹈，如醉如痴，尽情尽兴地表演着她的独脚戏。久而久之褒曼就自然而然成了贡纳尔和他的客人们的即兴游艺节目主持人，在这个时候，褒曼有机会尽情地发挥她的表演才能和技巧。她的表演真实、自然、感人。她已经差不多能自由地操纵她的观众们的感情了。有时，她既可以逗得他们捧腹大笑，也能惹得他们潜然落泪。客人们很爱看她的表演，常常要求说：可不可以请你把那一段再演一遍？下星期天你务必再来呵！而褒曼所表演的这一整套节目都是她自己动脑筋编出来的故事和片段场面。这使得褒曼充满了无穷无尽的信

心。她开始觉得她能作一个好的女演员，而且她必须作一个好的女演员。

正当褒曼处于最幸福、快乐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又降临到了小褒曼的头上，在褒曼 13 岁的时候，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父亲贾斯特斯·褒曼的生命。可怜的褒曼在失去了母亲之后，又失去了她最亲密的朋友、老师、引路人——父亲。这令褒曼感到悲痛欲绝，褒曼的生活刹那间失去了最鲜丽的色彩。从此，她不得不独自一人艰难地跋涉，挺进在通往艺术殿堂的大道上。

父亲死后，褒曼就和她的叔叔奥托、婶婶霍尔塔生活在一起。叔叔、婶婶十分同情褒曼，把她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看待，虽然不得不精打细算过日子，但婶婶坚持让所有的子女都要受到良好的教育。婶婶老是说道：“我不在乎那样管教子女会不会惹得你们怨恨我，可是你们大家都得受到良好的教育。”

她把褒曼送进了吕塞厄姆女子学校，那是斯德哥尔摩首屈一指、收费昂贵的女子学校。褒曼在那儿受到了最良好的教育。但只要有时间，她仍是喜欢照样在自己的房间里表演表演。褒曼太酷爱表演了，童年的梦也越来越强烈地吸引着她。1929 年秋天，为了实现童年的梦，14 岁的褒曼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她要全心全意献身于戏剧，并且梦想着有朝一日她会站到奥斯卡剧院的舞台上，观众人头攒攒地坐在那里屏心静息地观赏着她的表演。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还有段距离，而这距离不仅需要超人的智慧，还须更多的艰辛、努力才能跨越。但是，她已经明确了自己将要干什么，献身于什么。希望之光一旦照亮了一个人的心灵，就会使一个人朝着预定的目标勇敢地走下去。褒曼似乎已经听到了艺术之神的召唤，她将努力地去寻觅艺术之神。

初涉影坛

1933 年的一个早晨，18 岁的褒曼步履匆匆地朝着海滨大道露天码头走去。她将去参加瑞典皇家戏剧学校的考试，此刻她心中忐忑不安，忧心忡忡。因为这天早晨是她一生之中最紧要的关头。倘若她名落孙山，失掉了这次机会，她就必须把朝思暮想的黄粱美梦统统忘个干净。她已经向叔叔奥托许下了诺言：要是这次投考失败的话，她可以去当售货员，或者当哪个人的私人秘书，至于演戏成名的渴望，那就只好都把它当作梦幻泡影，从此死了这条心，而且她确实地知道当年报名的考生有 75 人之多，而能够中选的幸运儿将只不过寥寥几个人，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她不知道她的命运怎样，但她却清楚地知道她必须考取。

然而，命运之神却跟她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那天，褒曼是第 16 个出场，在她前面的应考者一个个都平安地演完了他们的项目。轮到褒曼出场时，她疾奔直上，腾空一跳就站到了台口，娇憨地纵声大笑。她本来是想凭这个大笑不止的亮相震慑全场使台下寂静无声的。可是，就在她念完第一句台词往台下偷觑评考团的时候，她发现他们根本没在注意她。坐在第一排的评考委员们正在同第二排的交头接耳，叽叽喳喳他说着话而且还用手比比划划。褒曼顿时诧住了，头脑里空空如也。接着她就听到评考团主席的声音：“停住，停住，够了。谢谢你，这位小姐……下一个，下一个请出场。”褒曼顿时万念俱灰，“啊！前面的人都平安地演下去了，可是我还没演完，他们就让我下去，这下子我肯定完了。”她想到了自杀。她神色黯然地直奔码头而去。那儿，四周阒无一人。远处，几只海鸥尖声啸叫着在空中盘旋，有几只低低掠过水面。褒曼决定在这儿了结她年轻的生命，然而，水色是那样

乌黑发亮，浑浊不堪。莎士比亚名剧中的奥菲丽亚是荡漾在明澈如镜、散发着百合花芬芳的小溪上，而她却要把这种污秽不堪的脏水大口大口吞咽下去。这叫她怎么消受得了呢？她于是放弃了轻生的念头，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家里。然而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她还没回家录取通知就送到了。很多年之后，她才得知原来是在她出场的一刹那，她精彩的亮相就征服了评考团的委员们。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所以打断了她的表演，让她下场了。

现在，褒曼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瑞典皇家戏剧学校。她孤芳自赏地练习演戏，把全副身心都扑到戏剧上了。1934年的夏天到了，一个学期结束了，学校放假三个月。为了消遣时光，她去找了父亲的那位知心朋友贡纳尔叔叔，希望他能帮她到瑞典电影制片厂去当个无足轻重的临时演员。然而，结果大大出乎褒曼的意料之外，制片人古斯塔夫·莫兰德在看完褒曼试镜头的样片之后，马上改变了以前那种冷若冰霜、漠然相待的态度。他是一位独具慧眼的识货行家，只消瞅上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对方是不是个卓尔不群、禀赋独特的天才。他惊喜地发现褒曼具有“明星的素质”。可是褒曼看到自己试镜头的样片很不满意，认为糟糕透了。她悲观地问道：“我看起来样子很难看，是吗？我想要是再试上几次，往后我会演得更好一点的。”这句话成了日后她的口头禅，几乎每场演下来，她都要唠叨一遍：“我想，往后我会演得更好一点的。”

古斯塔夫听了更为放心了。“挺不错的。要记住这是你第一回上银幕。光线打得不完全对头。”

“可是……我演得不太好吧？”褒曼满腹狐疑，又盯住问了一句。

“你演得非常出色。”古斯塔夫反驳说。“你有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你会大有出息的。”

古斯塔夫不仅让褒曼演《僧侣桥的伯爵》中的一个小角色，而且决定让她当他下一部片子的女主角。他料定褒曼日后必成大器。他在褒曼扮演《僧侣桥的伯爵》中的小角色时，在她必经的小路上放置了两小盆鲜花，并在花枝上挂了一张便条：“凡是你足迹所到之处，大地必将鲜花盛开。”

在这第一部影片拍完之后，瑞典电影制片厂的所有制片人和管理人员都知道他们发现了一个后起之秀的年轻姑娘。

古斯塔夫，还有名导演伊伐尔·约翰逊等人一齐出马对她竭尽敦促劝导之能事，要她重新为自己的前途着想。经过与戏剧学校校长一番争执之后，她离开了戏剧学院，从此开始了拍电影的生涯，迈出了通往电影明星之路的最重要的一步。

然而，1934年第一部电影《憎侣桥的伯爵》所受到的对她的评论令她大为伤心，她泪流满面地去找自己敬爱的当时瑞典著名影星屈斯泰·爱克曼问个究竟，看看自己该怎么办。阅历很深、经验丰富的屈斯泰温柔地劝告她：“褒曼，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只要有人谈到你，文章里写到你，那就是一桩好事。要是他们闭口不提你，文章里也没有你的片字只语，那你才要担心焦急哩。”一直到1935年她的第一部由古斯塔夫·莫兰德导演的影片，也就是同屈斯泰·爱克曼联袂合拍的《父子科学家》发行公映后，褒曼才开始真正引起了影评家们的注意。1936年，她主演的《向阳山庄》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现在，褒曼在瑞典国内已经小有名气了。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瑞典电影制片厂毕竟不是当演员的最终归宿。世界太大了，天地是如此广阔，

她现在尚只是雏鹰试飞，她还有奋飞的潜力。她开始眺望大洋彼岸的好莱坞了，在《向阳山庄》之后，由古斯塔夫编剧并导演，褒曼与屈斯泰再次联袂拍制的《插曲》使褒曼不失时机地从一个名伶女优一鸣惊人，成为名闻遐迩的电影明星。正是凭这部电影，褒曼取得了进入好莱坞的门票。

带有英文字幕的瑞典版《插曲》刚在纽约和好莱坞放映，《洛杉矶日报》就大胆地宣布：这部影片不仅是迄今为止瑞典送到美国放映的最佳影片，而且起码也是可以同好莱坞当前电影市场上出品的任何影片分庭抗礼、相互媲美的，甚至还略胜一筹。这家报纸评论说道：“褒曼小姐固然姿态艳美，然而在美女如云的好莱坞，天生丽质不足为奇。她不仅长得秀丽，而且具有一种令人着魔的感情内涵，两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是极其罕见难得的。她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展成为一个出色的女演员，甚至是一个明星……。”

大卫·赛尔兹尼克这位好莱坞杰出的制片人发现了褒曼并决定聘请她去好莱坞拍片。褒曼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好莱坞。

然而褒曼当时英语还很蹩脚。早先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她是跟着一位从英国来的英语教员上课的。到了纽约，美国人讲些什么她连一个字都不懂。然而，要在好莱坞拍片，能说一口流利的美腔英语自然是首当其冲了，为了尽快闯过这一关，每天晚上她都上剧院看戏，不论戏好戏坏，她都坐在那里把三幕戏从头看到底，一字不漏地仔细听他们讲的每一个字。后来，又在她的语言辅导员鲁思·罗伯茨——一位瑞典人的尽力帮助下，她终于顺利地通过了这一关。

1940年，由于《利里臭姆》的导演将褒曼误作一个戏剧演员，使褒曼阴差阳错地扮演了这个话剧里面的女主角朱丽叶。并且取得了圆满成功。就是从这时候起，她可以比较放心地信赖自己。在拍片和剧院演出等重大场合里，可以做到临阵不慌和坦然自若。一到了台上，任凭天塌下来，她都能安之若泰，不会心慌意乱控制不住自己。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在她心灵深处有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心：她不光要当个出色的演员，当个称职的演员，而且要当个伟大的表演艺术家。这决不是不自量力，好高骛远。她将要披荆斩棘，步履艰难地攀登到这个顶峰，哪怕中途力竭心瘁，以身殉志也在所不惜。她在日常生活中那么拘谨慎微，只消一登上舞台，或者站在摄影机前，她就会变得毫不拘束、泰然自若、充满自信和果敢沉着。

婚姻变奏曲

褒曼19岁那一年，在她堂兄的介绍下，同彼得·林斯罗姆相识并相恋了。当时褒曼尚在瑞典皇家戏剧学校就读。虽然在此之前她也有过几回如痴如醉的恋爱插曲，但是由于她个头太高，为人太死板正经，又爱脸红，不懂得怎么谈情说爱，卖弄风骚，它们都没有成功。

彼得身材颀长，面目端正清秀，长相非常英俊潇洒，为人精明伶俐、老练洒脱。他不仅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牙医，同时还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并且他也很爱好戏剧，有许多艺术家朋友。

彼得出生在瑞典北部大约离北极圈以南一百英里的小镇上。那个小镇叫做斯多德镇，其实不过是坐落在那个地区的湖泊沼泽和大片红松森林中的一个大而疏落的村落而已。人们在那儿只有依靠顽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力才能挣扎生存下去，恶劣的环境赋予了他顽强的生存能力，也铸就了他极强的

个性。对于褒曼来说，有这样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在身边相助，有一个头脑精明的丈夫为她出谋划策确实是大有裨益的。褒曼十分相信彼得的判断力，即使在她同彼得订婚之前，她就对彼得言听计从，事无巨细都要征求他的意见，要他拍板。因为她需要的正是一个父亲般的丈夫，一个能像她父亲那样能令她百依百顺、全心依赖的丈夫。

父母之间真挚的爱情故事在褒曼心目中的影响太深刻了，她和彼得专程赶到她父母举行婚礼的那个汉堡小教堂去，在那里交换了他们的戒指。她心里祈求着他们爱情的永恒，期望他们的爱情如同她父母那样执着、热烈。

1937年6月10日，30岁的彼得·林斯罗姆和21岁的褒曼在彼得的老家斯多德镇上一个路德派教堂里举行了婚礼。

婚后，彼得与褒曼之间更是情深意笃，彼得对褒曼益发关怀体贴。就在他们婚后不久的那段时间，褒曼到柏林去给乌发公司试镜头，单人独身下榻在旅馆里。正当她百无聊赖不知怎样打发时间时，却惊喜地发现彼得来了。原来彼得担心她寂寞，便悄悄追随而至，在褒曼所住的高级旅馆对面一家三流旅馆里住了下来。他对褒曼说道：“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到你孤零零一个人必定闷得慌，再说我也放心不下；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所以我想还是来一趟的好，看看万一有什么要做的……你需要或干点什么事的时候，我就在你身边随时听候吩咐。你应该象个年轻女演员那样落落大方，信心十足。人家也期望你会有这样的风度。”

事实上，彼得的担心并非多余，尽管褒曼在舞台上或摄影镜头前能直觉地知道要做什么，胸有成竹地知道应该做什么，除了导演之外，用不着别人吩咐，但在个人生活方面，她自己却毫无主见，如果没有一个男人来吩咐她该做什么，她简直一筹莫展，寸步难行。

1939年，褒曼被邀请去好莱坞拍摄《插曲》。其时，褒曼和彼得的第一个孩子皮娅已经出生了，彼得非常豁达，很有气量，坚决主张褒曼非去不可。当时，彼得只说上一句：“我不想让你去。”褒曼一定会乖乖地听话不走。因为那时的褒曼的确优柔寡断，没有一点主见，而她对彼得的判断力是那么相信，对彼得又是那么百依百顺，没有彼得发话，她自己是下不了决心的。而彼得却执意要她到好莱坞去拍摄《插曲》。正是《插曲》这部影片使得褒曼石破天惊，名噪一时，引起了好莱坞的高度关注。好莱坞的大门向她敞开了。

彼得令褒曼乐于依赖，他自己也对此越来越自信，他从来不和褒曼商量什么。这样虽使褒曼卸去了许多个人生活中的负担，能够集中精力背台词，晚上能早点睡觉，第二天一早起来仍象出水芙蓉一样，可是这样一来，褒曼对于生活中许多事情就一无所知。而她一旦在社交场合中说错什么话，回到家里，彼得就会发火。当褒曼与彼得聊天的时候，彼得经常提醒褒曼的是：“别皱眉头。”“坐好，直起腰来。”这令褒曼不安地感到彼得并没有听她说话，而只是注意她的额头、手指的微小动作和坐的姿式。彼得太严厉了，他开始使褒曼变得怕他了。以至于当她被问到：“你接受这次采访吗？”她总是回答说：“等一等，我得给彼得打个电话。”他们婚姻的不谐音就这样慢慢地产生了。在褒曼的眼里，彼得多么像一个严厉的父亲啊！这不禁使褒曼想起了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同样令她百依百顺，完全地依赖。可是她的父亲却是多么的温和，更象是一个大哥哥啊！既然彼得已经令她那么害怕了，她终于喃喃自语道：“得离婚了。”当她问彼得：“我们离婚吧，好吗？”

彼得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离婚？为什么？我们没打过架，也从来没拌过嘴。”“是啊，我们没打过架，没拌过嘴。我和你打架、吵嘴有什么用呢？一点用处也没有。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商量过什么事情。你从来不买我的帐。所以我也不跟你争。意见不合，我就走开。”然而她从小就已经依赖惯了，她还没有勇气离开彼得而独自一人去面对陌生的现实世界。她只能等待机会，等待有人伸出手来，帮她摆脱目前的婚姻关系。禁锢太久的她需要的不仅仅是镜头的自由了。这时是1946年。

1948年春天的一个黄昏，褒曼由她丈夫彼得陪着踏进一家小小的电影院的时候，她已经是世界影坛上最吃香、红得发紫的女演员，其他任何一位演员要想同她竞争最受欢迎的女演员的话，肯定只能望尘莫及。这家电影院上影的是由意大利人罗伯托·罗西里尼导演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这部影片以它的现实主义和朴实风格扣人心弦。它和爱情、幻灭一起颤动，深深地震撼了褒曼的灵魂。她激动不已，感动得潸然泪下。她竟有了一个想同罗伯托·罗西里尼合拍一部影片的冲动，于是她给罗西里尼写去了一封信。没想到命运之神却作了如此的安排，当这封信寄到罗西里尼所在制片厂的那天晚上，电影制片厂失火了，一场大火把制片厂烧得干干净净。唯独褒曼的那封信除了烤焦了一些之外，仍然完好无损。褒曼自己也一直对此感到惊异不已。就这样，在1948年，褒曼同罗西里尼见了面，一见钟情地爱上了他，并且决定嫁给他。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她可以嫁的人了。她曾是那样急于摆脱彼得的束缚。爱情之火一旦熄灭，婚姻就变成了束缚自由的牢笼。褒曼向彼得正式提出了离婚。然而，彼得仍然爱着褒曼，他幻想着能把已经破碎的感情缝合起来，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同意离婚。直到1950年2月9日，他们法律上的婚姻才得以终止。而褒曼同罗西里尼的第一个孩子罗勃蒂诺却是在同年2月2日就出生了。这使得新闻界对她的攻击又上升了一个级别。

在整个褒曼与罗西里尼的浪漫史之初，褒曼是那么单纯、不谙世务。她天真地以为这件事不会搅乱整个世界。她没有料到作为美国电影界群星中最璀璨的一颗明星，她真正的个人私生活已经不再存在。她的生活是属于千百万敬慕倾心于她的影迷的。由于她历来扮演的角色已经使观众潜移默化地对她的冰清玉洁深信不疑，特别是由于她成功地扮演了贞德，人们早已把她当作圣女贞德的化身来看待了。她已经成为他们的偶像，他们心目中圣洁的女神了，他们不允许任何人亵渎它、侮辱它。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可怜的褒曼却丝毫没有感觉到。当她和罗西里尼的绯闻传到美国时，好莱坞愤怒了，疯狂了。他们象丧失了理智一样对褒曼进行攻击，因为她背叛的不只是她的丈夫，而是所有她的观众，她侮辱了他们神圣的信念，深深地刺伤了他们的心。从此，她的声誉一落千丈。褒曼从一片颂扬声中一下子被推到20世纪最大丑闻的下坡路上去。这虽然使她的事业遭到几乎致命的打击，她却并没有对这个世界有所怨恨，在她的心目中，世界永远是美丽的。面对所有恶意的攻击以及不公正的对待，她感到迷惑不解。为那些因为她的原因而受到损失的个人、遭到厄运的影片，她感到苦恼、深深的不安和愧疚。直到7年之后，好莱坞才逐渐恢复了理智，人们原谅了她。1957年1月20日，褒曼访问了好莱坞，并且受到了影迷们的热烈欢迎。

如果说彼得曾令她感到害怕的话，那么罗伯托则帮助她走出了害怕的阴影。罗伯托对生活采取的是一种很自由的态度，他把现实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放下了；生活具有了新的尺度，新的刺激，新的地平线，他给了褒曼从未有

过的勇气。在褒曼身上，他倾注了他全部的爱情，除了能让褒曼感到可以依赖之外，他还为她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浪漫的气息，让她感受到爱的热烈和甜蜜。罗伯托是一个勇敢的恋人，他为了爱情是准备好去牺牲的。他不顾一切、热情地迷恋着褒曼，他需要她，他不想让她跑出他的手心，或者离开其视线。一旦他下了决心，他的毅力之大是难以令人相信的。如果他真想做什么事，那么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他从来不会说：“我累了。”或者说：“这值得吗？”他只是埋头干下去，直到达到目的才算了事。这种决心和毅力也深深地影响着褒曼，使得褒曼在以后的艺术生涯中能不断孜孜以求而终生饮誉影坛，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最重要的是，在艺术的基本原则上，罗伯托和褒曼一样，都完全不能同意好莱坞的概念，那就是为了想取得成功，你必须保持你的典型形象，无止境地重复你所熟悉的表演。由于艺术信念上的认同，他们的心灵靠得才如此地近。褒曼终于能找到一个艺术上的知音了，为此，她是如此的欣喜，他们的爱也因之而得以升华。

然而，罗伯托不喜欢生活在平静中，他总是在混乱中生活，没有在混乱他就不能生活。而褒曼却在外祖母家受到熏陶，更喜欢过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因此，他们逐渐发觉他们在生活上不能达到完满和谐，他们俩人之间相对无言的时间越来越长，这表明他们的婚姻已经开始出现裂痕。终于，罗伯托厌倦了当褒曼先生，他在外面另外找了一个适合于他的女人。1958年褒曼与罗伯托和气地分手了。

同罗伯托分手之后，褒曼与拉斯·斯特密相识了。拉斯也出生在瑞典，受到的是瑞典教育，主要爱好是戏剧。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心理素质和爱好，使他们的心灵更容易理解和接近。褒曼再度堕入情网。他们在1958年圣诞节前，在卡克斯顿礼堂默无声息地举行了婚礼，因为拉斯不认为这件事非得登在报纸上。这时候，褒曼由于《安娜斯塔西亚》、《轻举妄动》和《六福客栈》取得极大成功，已夺回了失去的地位，成了那十年中的巨星之一。拉斯是这样评论他们婚后的前几年生活的：“同褒曼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惶恐不安。我热爱象一个褒曼这样身份的女人，而同她结婚的代价是放弃安静的生活——至少放弃一部分。我一直是一个不爱出头露面的人。”

1975年，褒曼和拉斯秘密离婚了。连她的朋友们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正如同当初他们秘密结婚一样。这是褒曼的最后一次婚姻，他们的分手同样是和和气的。拉斯后来生活在一座他曾钟情的宁谧的小岛上，过着他向往的安静的生活。

为了一个完美和谐的世界

褒曼的一生不仅在艺术上追求真、善、美，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从未放弃过对真、善、美的执着。

她从来不认为作为一个“人”，电影明星应该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即使是在她成为好莱坞最夺目的明星时，她也未失去自然、朴实无华的本质。在她身上没有一点通常电影明星所具有的那种傲慢神气，也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子。

在当时的好莱坞，电影明星都是乘坐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黑色高级轿车。而褒曼却拒绝这样。她不需要别人的侍候，而且也不认为显示与别人不同有

什么必要。她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用着那辆用她自己的话来形容是“破旧不堪、颜色象只老鼠、连任何人都不屑于朝车里瞅上一眼的”老爷汽车。但只要它还能使用，褒曼就舍不得抛弃。她最喜爱的首饰是一条镀金的链和系在链上的小盒。链上的镀金已经磨掉好几次，重新镀过好几次。每次她到镀金铺去，铺里的人总是说：“这件东西都老掉牙了，还要镀金，真好笑。”她则说：“敝帚自珍嘛。非常感谢。”

只要是自己能做的事情，即使再脏的活，她也不认为有必要让别人帮她去做，尽管她完全可以让别人帮她做。有一天晚上，褒曼发现别人的一辆汽车的保险杠卡在她的汽车里了。她手忙脚乱地折腾了老半天，才成功地把它们掰开。年近耄耋的米高梅公司摄影场的停车场管理员不无感慨地说道：“这是我一辈子所见到的第一个不在乎用自己双手去干脏活的电影明星。”还有一次，褒曼乘火车去某地，途中车厢里寒气逼人，没有一点吃的东西，前头还有两千里的漫长路程，旅客们就象被困在孤岛上一样，而她却利用第一次停车的机会，以冲刺的速度跑去买三明治，当她抱着东西回到月台时，火车已开动了，她急起直追，一进车厢就瘫软了。如果是别的电影明星遇到这种情况，绝不会有她那样的表现的。那是多么有失一个电影明星的风度啊！然而，在褒曼的意识里，明星只不过是社会给她的一种荣誉而已，她从来就只是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褒曼不仅坚持正义，而且敢于维护正义，热爱正义与和平，并且从来不会因为外界环境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执着和信仰。她一生都在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来捍卫她的信念，从未有过动摇。

1938年，褒曼应邀到德国去拍一部由卡尔·弗勒立希所导演的片子。长期以来，德国民族都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迷信的一个民族。他们对一个人的崇拜往往会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对权威的绝对服从是如此深深地根植于德国人的脑子里，甚至直到今天，在德国最受人尊敬的仍是身着将军制服的军人，当时的德国正置于纳粹的铁腕统治之下，大部分德国人对他们的元首希特勒顶礼膜拜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丝毫不怀疑他们元首的正确性，甚至不能容忍任何对元首怀疑和不敬的行为。就是在这位点燃了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流血最多、损失最惨重的世界大战的德国元首希特勒的煽动和领导下，德国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共、排犹、排外的浪潮。仇恨、报复的心理恶劣地膨胀，使几乎整个德国都丧失了理智。整个德国处于一种极度疯狂的状态，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恐怖、阴森的气象。军国主义的野心从这种气氛中得到了滋润、鼓舞，并迅速膨胀。1938年的时候，苏台德区、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均已相继沦丧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之下，犹太人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毁灭性的空前灾难。人类的善和美在这里遭到了玷污，人性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这一切都令褒曼感到悲愤；她对纳粹的种种暴行极为深恶痛绝。她要用她的行动来表明她的这种态度。导演卡尔·弗勒立希想给褒曼施加影响，带她出席了柏林的一次盛况空前的纳粹党群众大会。探照灯把全场照得辉煌明亮。在一片军乐声中，希特勒跨步登上了主席台，十几个小姑娘手捧花束蜂拥了上去；希特勒神采奕奕，容光焕发，他吻了吻这些小姑娘，这时全场响彻一片“Sieg, Heil”（德语：元首万岁）的欢呼声，人人都伸直手臂，行纳粹礼。唯独褒曼没有，她拒绝向这个丧失人性的恶魔行礼。当时，纳粹密探和“耳目”无处不在，而且他们心狠手辣，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在那个视人命如草芥的特殊情况下，不管是谁即使违心地

那样做了，今后也没有谁会去谴责她的。对于褒曼这样一个仅是在瑞典有些名气的电影演员来说，其时能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屈服于那种绝无仅有的压力而不去违心地做这些事情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卡尔·弗勒立希当时大惊失色地跟褒曼悄悄咬耳朵说：“天啊！你怎么竟敢不行希特勒万岁的敬礼？”她反驳说：“我干吗要行礼？”

虽然褒曼不能拿起武器去为正义与和平而战，但她尽她的努力做了一个电影演员挤能做的一切。1943年，她自愿到联合服务组织报到，为在前线作战的士兵服务。她没有象其他演员那样到前线去只同军官娱乐，而是切切实实一直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为他们带去笑声和欢乐，给了士兵极大的鼓舞、信心和力量，为士兵们在精神上筑起了坚固的堡垒和防线。

作为电影明星，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声誉，褒曼当然也不会例外。但她却不会震慑于任何邪恶势力的淫威。相反，她只会勇敢地加以反击。在好莱坞，名人琐事的专栏作家劳拉·帕逊斯和海达·霍珀这两个女人权势大得足以毁人前程和置人于死地，而且尤其嚣张跋扈。在一个晚上，褒曼正好和演员琴思·蒙尔妮坐在一起。当时琴思已经怀孕，但还看不出来。而且她自己也是不久前才知道。就因为这个情况没有告诉海达·霍珀，竟引至海达·霍珀对蒙尔妮大发雷霆，并且威胁地厉声说道：“等你拍完下一部影片你就明白了。可别想听我的好话！”好莱坞其他明星都对海达、劳拉两人畏之如虎，这使褒曼深感不满，甚至达到了厌恶的程度。后来有一次，劳拉过生日，好莱坞的明星每人都得交二十五元为她祝寿。褒曼扔掉了她接连两次发来的请帖，并坚决拒绝前去为劳拉祝寿。

褒曼就是这样坚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为此，她会丝毫不顾社会偏见的压力，勇敢地向社会的痼疾提出挑战并勇敢地为人类的尊严与平等而呐喊。

1946年，褒曼到纽约去排演马克斯韦尔·安德森的话剧《洛林来的贞德》。当她刚到华盛顿的时候，就听到个令她惊讶、震撼的消息：在华盛顿黑人是不许上剧院的！而这个戏演的就是提倡自由和人有凭良心办事的权利，而黑人却不许到剧院看戏。这令褒曼简直不敢相信。她感到了一种莫大的悲哀和耻辱。她对马克斯韦尔·安德森说：“真丢脸！明明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到华盛顿来演戏。如果我早知道不许黑人进剧院，我决不踏进这个城市一步。”马克斯韦尔希望她在接见记者时别再谈论此事。褒曼很坚决地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谈。”马克斯韦尔担心这样做会毁了这个戏。当时，二战已经结束，大量军人复员。社会提供不出那么多的就业机会，而经济上的竞争常常是导致偏见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再度升级，而且其势锐不可挡。褒曼却全力抗拒这种偏见的压力，她只相信人的自由和平等。在《洛林来的贞德》演出的前一天，褒曼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她一直期待着记者提出有关的问题，可是记者并没有提出有关的问题。大家纷纷起身告辞。褒曼突然说：“先生们，谢谢你们。可是我永远不会再来华盛顿了。”一听这话，大家又都马上回到原座位上问道：“不回华盛顿？为什么不回华盛顿呢，褒曼小姐？”褒曼激动地说道：“因为，如果我早知道不准黑人进剧院，我就不会在这个地方来演戏。我受到合同的约束，必须继续在这里演戏。可是，在黑人能与白人一样进剧院看戏以前，我是不会再来的，我们是为所有的人演戏的。为所有人演戏！”

褒曼深深爱着这个美好的世界，并且认为人类只有通过相互之间的爱才能达到真正的完美与和谐。她把她对人类的爱毫无保留地播撒在人们中间。

早在褒曼 18 岁拍摄了第一部影片时，一位老人从斯莫兰给她写了封信。信很短，老人在信里说他的母牛死了，她能不能寄给他钱再买一头呢？那时，褒曼的工资并不多，可是当天晚上，她整夜想的都是那位可怜的老人和他的牛，第二天早晨就把钱寄给了老人。从那以后，褒曼不断地做着类似的事情。

她一直都很关心怎样给别人带去幸福和欢乐。1976 年 5 月褒曼同罗伯托·罗西里尼离异已近二十年，这时罗伯托已临近 70 岁了，他的情绪很低沉，因为大家好象都忘掉了他，可是褒曼却精心地安排了他所有的亲人包括他的第一个妻子在一家饭馆里为他祝贺生日，并巧妙地给予了罗伯托一个又一个的惊喜。罗伯托大笑得流出了眼泪，在他一生中再也没有比这次更让他快乐、幸福的时刻了。

褒曼不仅是对人类充满爱，对于动物她也同样有一颗温情的爱心。在她心目中，动物都如同人一样是具有灵性的动物，它们同样是一些美丽而可爱的生命。任何对动物的残酷行为都令她感到难以忍受。

瘦骨嶙峋、满身疥疮的马拉着沉重的车辆，被主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鞭打着。这样的事情，褒曼在狭窄的道路上已经碰到过好几次了。而每当遇见这样的事情，吓坏了的褒曼就会停住车，从车上跳下来激愤地说道：“你怎么敢这样做，马上住手！看这个可怜的牲口！它那么虚弱、瘦小，你怎么让它拉这样重的东西呢？你应该感到羞耻……羞耻，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在西班牙的时候，她从不去看斗牛。因为为了人们的欢乐，而杀死那样好看的动物，她看不下去。

如果要找到褒曼对待社会的态度的最好诠释的话，我们只能说她是和平的天使，真、善、美的女神。

跋涉在通往艺术殿堂的道路上

艺术是一条源自生活的长河，人类凭着对生活本身执着的探索 and 追求为它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使它的细胞永远流动并具有无比旺盛的生命力。

就是凭着人类永恒的执着精神，褒曼勇敢地对固步自封的好莱坞提出了挑战，开创了好莱坞影坛上新的风格：真实、自然。

褒曼首先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执着于真实。她从来不使用化妆品，而且从不作任何整容手术来修整自己的缺陷。

1938 年，褒曼应大卫·赛尔兹尼克的聘请到美国拍片。当时的好莱坞有一套传统的做法：不仅要发现明星，而且要“制造”明星。为此，制片人不惜弄虚作假、夸张从事，对演员的面容、举止风度和形体特征都施以鬼斧神工的精雕细琢来制作一个明星。赛尔兹尼克同褒曼第一次见面时就提出让褒曼整容。褒曼坚决地予以了拒绝。她说道：“赛尔兹尼克先生，我觉得您干了一桩大错事，您不该隔着布袋买猫，不看清货色就买进。我想您当初是在看了《插曲》那部片子对我中意了，就派凯·布朗到瑞典去把我招聘来。现在你一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处处不称心如意，都要修饰更改。所以，我宁可 not 拍那部片子，我们不必再多谈了。不要再煞费苦心，大伤脑筋了。我们彼此把前事都忘掉算了，我乘下班火车回去。”也许是注定了要由褒曼来破除好莱坞影坛上弄虚作假，矫揉造作的陈规陋习。当时，由于拍摄了《蝴蝶梦》、《乱世佳人》取得了巨大成功、名望已经如日中天的大卫·赛尔兹尼克遭到如此前所未有的顶撞，惊怒之后居然象蒙受到圣迹显灵的启示一般心

平气和下来，决定保持褒曼的天然本色。就这样，一个真实、自然的艺术形象挣脱了一切陈规陋习的束缚在好莱坞脱颖而出，为好莱坞的影坛带来了一片新的生机与活力。

为了艺术上的进展和突破，褒曼从来不愿意接受任何有可能阻碍她的发展的约束。她总是力图为自己保留一分自由的天空任自己尽情地翱翔。她深深地懂得艺术只有在自由的土壤里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早在接受赛尔兹尼克的聘请之前，美国好莱坞的福克斯、派拉蒙、雷电华和别的几家电影公司都曾先后送来过聘书，但都只是提议签订合同的一纸聘书，而不提供角色和导演。然而，合同一经签定，便得整整7年受到合同的制约，羁留在好莱坞不得脱身，任凭电影公司的老板们摆布，完全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也许在这7年中，你只能扮演侍女或男仆一类的跑龙套的角色。虽然褒曼早就向往好莱坞了，但她绝不会拿她的艺术去冒险，也绝不希望自己的艺术生命窒息在这种无所作为的角色中。对此类嗟来之食，她毫不犹豫地一概加以回绝。

褒曼在扮演角色的时候，从不矫揉造作，总是力求做到感情和动作的真实、自然。为此，她付出了许多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

一旦要扮演什么角色，她浑身就洋溢着无比的热情，她就会集中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角色中去。她的潜心矢志会达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在拍片之前和开拍期间，她绝不分心去想别的事情，不赴任何应酬活动，甚至一分钟都不从拍片工作中分神出来。她几乎身不离摄影棚，甚至建议在她的化妆室里搭床，在拍片期间就住在那里。要是制片厂不把工作干到深更半夜，她就会不高兴。她从来不愿闲下来，她的最大兴趣就是拍电影。即便是在她的第一个女儿皮娅出生后，还在给婴儿喂奶的时候。她就在床上躺不住了，起来东奔西走，忙着排练她的台词。

她从来不单纯为赚钱而演戏。拍片时，她首先考虑到的都是角色。艺术对于她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在褒曼看来，表演就是要发自内心，是出于本能的反应，是出自固有的理解、感情的共鸣，自己以角色自居的心理状态和舞台信念。她总是强调演员应该演什么就像什么。每当她扮演一个角色时，她都会认真地对待这一角色，并能潜心专注地进入角色。

在《战地钟声》中，褒曼扮演女主角玛丽亚，为了能演好这个角色，她孜孜不倦地作出了许多努力。她潜心揣摩着海明威对玛丽亚的描写，她一连好几天关在屋子里，琢磨怎样演好这个角色。她认为：女人一堕入情网就忘了自己，忘了自己的爱好，在她心目中没有什么比她爱的人更重要的人，她心里只想着她爱的人，想她在他心中的地位，想着怎样才能使他高兴，她活着只是为了适应他的需要。因此，在拍片的时候，她凝望着男主角贾莱·古柏喜笑颜开。看到他，她心里就美滋滋的，就好象他真的是她的爱人一样。甚至连褒曼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在和贾莱·古柏一起拍电影。以至她的好朋友鲁思·罗伯茨因此而不无担心地说：“真的，褒曼，你可别再那样看他了，瞧你坐在那里看得多么出神！我知道，在影片中他是你的情人，而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不能真的爱上他！”

当然，也有褒曼不能很好地进入角色的时候，但是为了进入角色，她会甘心付出任何代价。

在《化身博士》中，她扮演了酒吧间女侍艾慧这个角色。其中有这样一个场面，这个姑娘要面对着面目狰狞的海德先生吓得心神错乱、魂飞魄散、歇斯底里地瘫作一团。然而她怎么也进入不了这个情境。为了帮助褒曼进入

这情境，导演维克多·弗莱敏恶狠狠地扑了上来，一把抓住褒曼的肩胛，死命地摇得褒曼晕头转向，并左右开弓打了她几个耳光，而且下手很重，他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深深知道只要能进入角色，无论怎样褒曼都不会在乎。褒曼当时被他这种粗暴的态度吓蒙了，直僵僵地站在那里哀哀哭泣。摄影师和在场的的工作人员也都被这种阵势唬住了，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而这正是进入情境的绝佳时机，影片终于取得了所需要的精彩效果。褒曼不仅不为此感到委屈，反而为她总算演好了这一个场面而感到无比的愉悦、高兴。

贞德——这位英法百年战争后期的民族女英雄，在祖国危亡之际，虽年仅16岁却毅然投身战斗，召集义军，并重创英军解了法国中部门户奥尔良之围，还恢复了北方一些城市，被誉为“奥尔良姑娘”。贞德的英勇之举成了爱国斗争的光辉旗帜，几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景仰。

褒曼从能记事起就一直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够扮演贞德这个角色。然而，由于贞德的故事中没有爱情情节，而且这部片子故事冗长沉闷，许多制片人认为引不起观众的兴趣而不愿拍制它。

终于，1946年的一天，马克斯韦尔·安德森打电话给褒曼，想让她到百老汇演个话剧。当她听说是“描写贞德的话剧”时，她激动得不能自己。话筒差点从她手里掉下来，长期以来，她一直渴望演贞德，一直都在研究着贞德，关于贞德的情况她几乎是没有不知道的。她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里面写得密密麻麻全是关于贞德的情况。她不厌其烦地在每次排演前对马克斯韦尔做些说服工作，最后，使修改后的剧本描写贞德的笔墨比原来大大增加，与原来的描写贞德的篇幅占百分之三十，空论占百分之七十相比，刚好倒过个儿。她只考虑贞德的形象——一个真实的贞德形象。在舞台上，她力求使贞德的形象真实、自然。她始终坚守着这样一个信条：“在舞台上，你是另一个人。你在扮演另一个人，你自己也变成那个人。”她的演出是如此精彩，如此的真实自然，观众为她的演出震撼，继而狂热了，因为褒曼再现出了他们心目中理想而真实的贞德。她让贞德在现实生活中起死回生了。所有对她演出的评价都可以归结到美国最优秀的剧作家罗伯特·舍伍德的一句言简意赅的话：“她就是圣女贞德。”

褒曼成功地扮演了贞德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几乎迅速传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在法国，人们欣喜地得知：贞德复活了。

1947年，马克斯韦尔·安德森开始把话剧《洛林来的贞德》改编成电影。1948年《圣女贞德》拍摄成功，褒曼在电影中扮演圣女贞德。在影片发行前，按照广告人的主意，褒曼按照贞德的行踪作了一次旅行。当她来到法国的东雷米——贞德的出生地时，学校全部停课，让孩子们上街夹道欢迎褒曼一行，向他们投掷鲜花，沿途所到之处，人们都把褒曼当成贞德的化身一样对待，他们热烈地欢迎褒曼到来不是因为她是电影大明星，而是因为她扮演贞德。好多年以后，褒曼回到法国时，海关和移民局的人员看着她还说：“啊，贞德……，欢迎你回来。”

褒曼扮演角色时所注重的是角色本身的真实程度，而不在于这一角色是哪一个有名人物写的。1946年，褒曼精湛的演技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戏剧家的注重。当听说褒曼将在美国第一个扮演圣女贞德的时候，肖伯纳很希望她能演他的圣女贞德。他把自己的剧本寄给了褒曼。可是褒曼认为他笔下的贞德与自己所了解的真实的贞德相去甚远，她最后选择了马克斯韦尔·安德森根据她的意见改写后的剧本。对此，肖伯纳一直耿耿于怀。

1948年,肖伯纳邀请褒曼到他家作客,当褒曼驱车赶到肖伯纳家时,92岁的肖伯纳早就靠在大门口里面等着了,在还没给褒曼打开大门的时候,就向她说:“你为什么不演我的剧本?”“哦,你好,肖先生。我可以先进来吗?”他打开大门说:“你当然能进来。我们还要一道吃饭。你为什么不演我的剧本呢?”“我没演你的剧本是因为我不喜欢。”肖伯纳凝视着她:“你说什么?你不知道它是杰作吗?”“我肯定她不是真正法国女孩的那个圣女贞德。你把她写得过于聪明了。你把她的话按你的意思写了,让她说了许多话,而这些话,真正的圣女贞德做梦也没有想到要说的。”接着她又同肖伯纳认真地讨论了贞德,她说:“我认为贞德是一个单纯的农村姑娘。你的语言词汇是了不起的,但那是乔治·肖伯纳的语言,而不是贞德的。圣女贞德所说的话我可以背诵出来,因为她当时受审时所作的回答已被转译出来,而且是个历史性的文件。她没受过教育,只是她那天赋的常识给她以勇气……你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我喜爱和男人在一起,我憎恨穿着妇女的裙子,坐在家里纺纱织布。’然而她真正的要求确实正是这个,也就是说呆在家里,照顾她的羊群,纺纱织布。她并不是想在战争中跑在士兵的前面。”正是由于褒曼认真对待她所扮演的角色,仔细地研究所扮演的角色,她才能把她的角色演得那么真实、自然。

为了开阔视野,寻求更大的发展,褒曼从不局限于只演一种类型的角色,因为那样只会扼杀演员的艺术天才。她一直在尽力使自己的戏路宽一些,她经常地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1941年的时候,褒曼在好莱坞已经一连演了三个类型相同的窈窕淑女。在《插曲》里她演的是温柔文雅的女钢琴教师。在《大家庭》里演端庄贤惠的女管家,在《天堂怒火》里演的是一个落难千金。现在将拍的《化身博士》派给她演的还是个蕴秀端庄的窈窕淑女。因为当时好莱坞时兴演员扮演的角色固定化,观众们看某个明星的电影并不是为了看明星所演的角色,而是为了看明星本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想去换演一个别的类型的角色,就会冒着失败的危险。但褒曼坚信只有换演不同的角色,才能掌握更多的技巧,才会在艺术上不断地超越,将自己的艺术水平激发到一个更高的状态,从而使自己的演技更趋尽善尽美。褒曼决定在《化身博士》这部影片里扮演那个风骚轻佻的酒吧女郎艾慧。她知道赛尔兹尼克是决不肯贸然地让他的明星去冒险的。在导演维克多·弗莱敏的帮助下,她瞒着赛尔兹尼克试了镜头。赛尔兹尼克早就知道褒曼的那股执拗劲儿,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就是因为她这种对于艺术的孜孜以求,她的艺术生命才这样持久。一直到1979年褒曼才结束了她的艺术生涯。凭着她对艺术的执着和孜孜以求,她为人类的艺术天空增添了一道绚丽夺目的光环。

“一位最伟大的表演艺术家”

任何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作为代价。褒曼在成功的道路上迈出的每一步虽然并不象其他许多成功者那么艰涩凝重,却同样地凝注了无数辛勤的汗水和努力的奋争。

1941年,褒曼通过自己的力争跳出了导演们为她计划定的高雅圈子,在《化身博士》中扮演了一个轻佻的小侍女,并在这部影片中表演得极其逼真、

精彩，使这部影片取得巨大成功。她从来没有象拍这部片子这样高兴过，从来没有象这样放得开，把自己的演技完全发挥出来。她第一次冲破了束缚她的樊笼，朝更广阔的天地打开了一个豁口。她已经触及了自己希望内心具有的、但是却一直不敢表现的底蕴。现在，困围她手脚的锁链已经化为乌有，她已经可以奋飞了，她可以飞得更高了。

1942年，褒曼主演的影片《卡萨布兰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并且风靡一时，成了经典之作。因为它涉及到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在胜利似乎渺茫，失败的影子隐约可见时，这部片子在人们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使人们心中即将湮灭的希望再次升腾起来，对盟军正在进行的战争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褒曼则正由于这部影片而一举成为20世纪电影传奇中的人物。

1943年，褒曼在《战地钟声》中杰出的表演被提名为奥斯卡大奖候选人。

1945年，褒曼因在1944年拍摄的《煤气灯下》这部影片中演技精湛而第一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同年，由她与平·克劳斯贝领衔主演的《圣玛丽教堂的钟声》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这部影片中她扮演修女本纳迪克特，这位修女笃信祈祷必能解决一切问题，然而这种神圣的境界并未得到多少做母亲的天主教徒的欣赏。她们怒不可遏地对褒曼群起而攻之，谴责她的表演使她们容易冲动的女儿受到影响，害得她们年纪轻轻就一心只想进修道院，去过那种与世无争的幽闭隐居生活。褒曼在表演中所达到的这种近乎超凡脱俗的境界使她身上平添了一层金光灿烂的“神圣”色彩。在好莱坞的影业界巨子眼里，她的价值不啻于美国联邦银行所在地诺克斯堡黄金储备的一棵摇钱树。1948年，《游艺界日报》举行了一次全国性民意测验，对200个25年或者25年以上影坛生涯的演员进行评选。这次民意测验把葛丽泰·嘉宝评为“无声影片时代”的最佳女演员，而英格丽·褒曼则被推上了“有声影片时代”最佳演员的首席，胜过了史宾塞·屈赛和葛丽泰·嘉宝。当时好莱坞流行的一则俏皮话是：“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居然看了一部没有英格丽·褒曼的电影。”作为一个成功者，褒曼的声名在好莱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1949年，褒曼的婚变给她的事业蒙上了一层浓重阴影，她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了。对于大多数演员来说，这意味着的将是艺术生涯的终止。而且早在1946年美国已正式开始了黑白电视广播。此后，电视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到了五十年代美国开始了彩色电视广播。电视以其内容量大、节目丰富多彩等诸多优点对好莱坞的电影业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已有取而代之之势。好莱坞已经走完了它生命的夏天，无可奈何地进入萧条的秋季了。然而，1956年，褒曼异军突起以她持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又一次征服了观众并激动了他们的心灵。她主演的影片《安娜斯塔西亚》一发行放映，立即取得了世界范围的轰动，褒曼重新得到了世界的认可。《纽约时报》上写道：“褒曼小姐的表演无懈可击，表演得活龙活现，值得给予一枚学院奖。”《纽约世界电讯》中写道：“褒曼小姐依然感情充沛，热情洋溢，同7年前离开美国的时候完全一样。”《每日新闻》中写道：“如果好莱坞把更多的时间、金钱和人力投入拍制《安娜斯塔西亚》这样的影片，那就不会象现在这样为电影业的前途忧心忡忡了。”就在这年秋天，几乎没有争论，纽约的评论家就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授予了褒曼。

1958年，电影《六福客栈》使褒曼又一次得到全世界的称赞。《星期日

泰晤士报》上载文道：“褒曼小姐纯朴真诚，温文尔雅，具有非凡的才能来表达崇高的善良品质……这是她拍的最好的、最动人的片子。”伦敦《每日简报》说这部影片是“自始至终尽善尽美的，褒曼小姐在片中的表演是她一生中最好的——嘉宝达到顶峰以来最美的表演。”

1974年，她又因演《东方快车谋杀案》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

1979年，当众多的评论家欢呼她因《秋天奏鸣曲》而获得成功时，她特别高兴。因为褒曼喜欢整齐对称，她认为自己的经历和生命即将结束，她希望最后一次的谢幕即使不能场面激昂动人，至少也要光荣体面。各国的评论家一致同意褒曼和利芙拍的这部影片和演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即使一向对人轻视的瑞典评论家也一致赞扬。在美国，从《花花公子》的“动人表演”到《新闻周刊》的“从好莱坞把她挖掘出来之后，我们甚至不记得看到过如此动人的表演魅力”，和《新闻报》的“强烈的尽善尽美”，到《时报》的“超级影星”，赞誉之词纷至沓来。而且，它们都一致认为利芙同褒曼的午夜相逢那场戏将作为不朽杰作之一而永垂电影史册。由于成功地演出了这部影片，褒曼获得了纽约电影评论家奖和意大利声望最高的影片奖：多纳莱洛奖。

在褒曼的影坛生涯中，她曾五次被提名为奥斯卡奖的候选人，并且三次获得了这项大奖。她还因主演电视片《梅厄夫人》而膺获艾米电视奖。

由于她在电影、电视、戏剧上的巨大贡献，早在1972年4月，美国参议员查理士·H·琅西在褒曼访问华盛顿时，在美国参议院发言对褒曼的艺术贡献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道：“我们的文化，如果没有她的艺术才能，将会变得贫乏，对美国公众来说，她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最伟大的表演艺术家。”

在她生命的秋天里，她仍得到这么多的赞誉，有哪一个演员曾达到这样的成功呢？她终于实现了她的宿愿：为她童年时的梦想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纯情瑰宝： 奥黛丽·赫本

欧洲某王国的王位继承人——年轻的公主到罗马进行国事访问，她被官场的繁文缛节和侍从的管束弄得心灰意懒，十分向往外界的自由生活。某晚她私自出去游玩，不想第二天早晨醒来却正躺在美国某报社记者的床上。这位想获得独家新闻的记者鼓励她逃出王公贵族的包围，公主接受他的意见后就和记者一道象普通市民一样在罗马尽兴游逛。结果两人渐渐堕入情网，无奈贵族和平民地位相去甚远，虽说两心相印，也只得抱憾而别。这就是曾轰动全世界、并使中国观众如醉如痴的电影故事《罗马假日》。亲爱的读者，您一定看过这部影片，它的轰动效应来自那个天真任性、不谙世情的公主的扮演者的精彩表演，她也因此于1953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她，就是著名的好莱坞巨星、世界五大女星之一的奥黛丽·赫本。她在片中那秀美的短发型（后被称为“赫本式”）竟风靡一时，世界时髦女性争相仿效。40多年来，她那修长的身材、优雅的气质、来去不惹凡尘、仿如凌波仙子的形象，一直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从芭蕾到银幕

1929年5月4日，奥黛丽·赫本出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一座豪华宅邸里，这栋房子的格局相当完美。与之相毗连的是一座美丽的花园。近旁是一个小果园，四周高高的用浅灰色石头砌成的围墙保护着这一切。

赫本的父亲是英国人，名约瑟·安东尼·赫本·拉斯东，是英格兰银行布鲁塞尔分行的总经理，他相貌英俊，衣着考究，政治上是极右分子，对共产党深恶痛绝，而对正在崛起的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则崇拜得五体投地。母亲是荷兰人，名埃拉·冯·希姆斯特拉，荷兰驻圭亚那总督的女儿，是荷兰王室直系贵族血统的后裔，所以在名字后还要加上男爵夫人的称号。与安东尼的结合是她的第三次婚姻。赫本的双亲是荷兰贵族与资产阶级联姻的一对不太合适的配偶。

当时的布鲁塞尔是欧洲最有吸引力的城市之一，是一个充满魅力、讲究礼仪、舒适而又优雅的城市，它既不是大得令人精疲力竭，也不是小得偏僻闭塞。这里每年都要举行国际音乐节，一年之中、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在这个城市的广场上举行着激动人心的火炬游行、假面舞会和精心组织的音乐戏剧表演，那番景象就和罗马的狂欢节差不多。另一方面，这个城市色调灰暗，气氛严肃而富有弹性，市容清洁，却与这些狂欢活动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放荡的20年代，布鲁塞尔竟是一块惬意的绿洲，给人们提供了高层次的音乐和戏剧享受。因此，稳健持重、不动声色是布鲁塞尔人的性格特点。他们总是衣冠楚楚、风度翩翩、从不酗酒，但是时机一到，他们就会尽情寻欢作乐，无所顾忌。

生身之地永远会对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正是在这种家庭和生活环境中，赫本自幼熏陶得认真严肃、气质高雅、性格坚毅，同时又能出人意料地谈笑风生，以无限的激情拥抱生活。她冰清玉洁、朴实无华，就象布鲁塞尔一样，集最古老久远的神秘时代的观念和奇异的现代观念于一身，她的举止总带有一种贵族气派。

为了让赫本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她四岁就被送往英国一所私立学校。赫本从小就非常文静，她一点儿都不喜欢玩具，宁愿与吱吱喳喳的鸟类、小狗、小猫为伴，她终日沉溺于梦想。在她的幻想世界里，她总是把一丛灌木、一棵老树或一所育儿室想象成一座美丽的城堡。赫本从小就喜欢音乐，对贝多芬和巴赫的作品，她简直是如醉如痴。然而与音乐相比，她却更喜爱舞蹈，看芭蕾舞剧对赫本是一种极为美妙的享受。她是她那一伙同龄少女的典型，梦想成为一名演员或芭蕾舞家。但是，能否实现自己的抱负，她没有多大把握。这个时候，她日益从芭蕾的角度来观察自己的身体。她开始对自己的外表不满。她特别不喜欢她的脸，因而害怕照镜子。她认为她的眼睛太大，牙齿长得不整齐。不知什么缘故，男爵夫人没有设法矫正她的牙齿，赫本那副有缺陷的牙齿，确实使她苦恼了大半生，而且也给摄影记者和摄影师们出了个特殊的难题。而且她对自己的体形也感到绝望。她又矮又胖，似乎一块饼干或蛋糕就会使她胡乱膨胀起来。从此她郁郁寡欢，且越来越孤僻、拘谨、与人疏远，她使幼儿园里的老师们完全失掉了信心。6岁时她父母的离异更使她觉得分外不幸。

但是，舞蹈的魅力仍然强烈地吸引着她。九岁时，她开始正规地学习芭蕾舞。她学习非常认真庄重，她下定决心总有一天要成为一名独舞演员，并最终成为舞星。她对电影毫无兴趣，对超级巨星嘉宝或者凯瑟琳·赫本一无所知，跳舞已成为赫本生活的唯一追求。

不幸的是，1939年9月1日，欧战爆发，赫本这时本由父亲监护，但她母亲男爵夫人害怕英国会遭到希特勒入侵，便向法院提出要求监护赫本，她从未想到荷兰也会有危险。结果，这一决定使赫本战时一直生活在法西斯的铁蹄之下。其间，她强烈地感受到了残忍而恐怖的战争和贫穷而凄苦的流浪生活。同时这段时期正值她10—15岁的发育阶段，由于食品短缺，许多人营养不良，赫本1米7的个头。仅剩一付骨头架子。战争在她身上留下了永久的创伤，造成她贫血、消瘦、肌肉单薄无力，并且她的体型后来始终清瘦修长，原先怎么减肥也减不下来的身体现在一下子却骨瘦如柴了。不仅如此，赫本的全家还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她的大哥亚历山大被投入集中营，两个亲戚被处死。赫本后来回忆说：

“战争把人变成囚徒，不论从肉体上还是从精神上说都是如此。我周围有同龄人，却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的想法和我不一样。我不知怎的，在枪炮声和杀戮面前，始终坚守着我自幼的梦想——音乐、芭蕾。”

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她的确从未放弃对芭蕾的追求。战争期间，为了糊口，赫本在公立艺术学校教女孩子学舞蹈。1951年出版的美国《舞蹈》杂志在对赫本的一次采访中说，她为了给荷兰地下抵抗运动筹款，曾在一些人家里演出古典芭蕾舞的片断，当时门窗紧闭，以隔绝一切会引起注意的声音。在这种艰苦环境里仍能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并以此来为反法西斯斗争作一点贡献，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战争结束后，男爵夫人把赫本送到了白俄芭蕾舞教师索尼娅·加斯开尔处学习。索尼娅很器重赫本，她那微微斜睨、吊眼梢的大眼睛，那高高的颧骨，秀气的鼻子，方方的肩头，苗条的躯干和修长的腿，这一切都预示着：这是一个舞蹈家的身材。她的舞蹈动作也不错，有很好的基本功。可是索尼娅对芭蕾有许多新的见解，但得不到荷兰政府的支持，她的学校被迫停办。于是赫本转到伦敦，找到了一份在教会值夜班的工作。同时，她一边当

广告模特，一边进了颇负盛名的玛丽·兰柏女士的舞蹈学校。年已 60 的舞蹈家兰柏女士对赫本很好，但是，在这里，赫本发现，自己的舞蹈技巧不如别同学。加之她个子太高，她看出，自己没有担任舞剧主角的前途。同时，多年的饥饿病侵蚀了她的身体，作为职业舞蹈演员体力不足。

经兰柏推荐，赫本参加了美国音乐剧《高扣鞋》的演出，在剧中当一名群众演员。她舞蹈设计的动作跳得很高，转动眼珠，向前伸出手臂，演得不坏，但赫本不喜欢这种形式，也不喜欢这种生活。她觉得她参加的戏莫名其妙，也不能忍受同九个愚蠢的、废话连篇的女孩子共用一间更衣室的生活。最主要的是，这个时候，赫本忽然明白了兰柏对她讲的肺腑之言。兰柏女士的话是：“你缺少芭蕾舞家应具备的天才。”至此，赫本终于明白了，干芭蕾这行，她永远当不成主角，永远不会成功，终于，赫本彻底放弃了当舞星的愿望。此时，她 19 岁。

当不成舞星，就要面对现实。当时，伦敦要拍摄一部 40 分钟的电影短片，是一部旅行风光介绍，片中需要一名会英、德两种语言的少女，装扮成空中小姐向观众讲解风光景物。经朋友介绍，赫本前往应试。十八九岁的她，长得文雅秀美、亭亭玉立。两位导演先后接见了她。导演林登后来回忆说：

“奥黛丽·赫本小姐光彩照人，愉快、亲切，很有教养。她象小鸟似地叽叽喳喳，讲她的芭蕾舞训练。我呢，立刻打电话把助手叫来。记得当时我对助手说：“快来！你看见过一个会走路的梦吗？我看见了。”

另一位导演马丁则极力证明：是她第一个发现了奥黛丽·赫本。

“她走进我的办公室，说她是学芭蕾的，要找个工作。我向她解释说，我不拍音乐舞蹈片。不过，我继续和她谈话。不知怎的，我被她那新鲜、开朗和难以置信的微笑吸引住了。她的小圆脸上一对大而明亮的眼睛使她成了一个太阳！最后，我恍然大悟：她就是影片中要用的人。我就对她说，我要让她担任一个角色。而她却回答说：不过，我不是演员啊！您会失望的。我和她签订了合同。”

这部短片，虽然再也没有听人说起过，但赫本却第一次跟演电影打上了交道。她体会到拍片的激动和乐趣。这件事也许正是她以后辉煌从影事业的开端。

从此，赫本就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致力于从事表演事业，但她从未正式学过表演艺术，因此，初入影坛，成绩平平，尽管有漂亮的脸蛋、姣美的身材，也只能演些跑龙套的角色。一次，一位美国导演来伦敦为古装巨片《你去何方》物色女主角，选中了她，尽管他反复要求，好莱坞的米高梅公司却坚决拒用她。但赫本不灰心，拍片之余，她投师于费里克斯·艾默门下，向她学习演戏技巧。艾默是一位有绅士派头的老演员，曾在电影《王子复仇记》中和著名英国影星劳伦斯·奥立佛合作，饰演波多尼欧斯一角。他教赫本用精确的英语发音，告诉她在舞台上应该有什么样的形体动作，怎样在舞台上保持沉默——虽不说话，也让观众从你身上看见戏，让他们的视线不离开你。

赫本潜心学习、用心领悟，从此她的演技日见长进，表演才华逐渐显露出来。在《野燕麦》中，她还只能充当小配角，做扶持“红花”的绿叶；在《拉凡德山的暴徒》和《少妇的故事》中，她象含苞待放的蓓蕾；而在《秘密的人》和《蒙特卡罗宝宝》中，她全力以赴，获一致好评，已能与名花争芳斗艳。

不懈的表演实践终于迎来了幸运女神。1951年，法国著名作家哥莱特夫人正为自己的名著《吉吉》（又译《金粉世家》）搬上百老会舞台物色女主角。一天，她到巴黎大旅社碰到正在那儿拍《蒙特卡洛宝宝》的赫本，哥莱特一看到她，心中就一阵暗喜：

“对！这正是吉吉！她就是我的吉吉！象一匹小马驹那样稚嫩而充满朝气，半是女人，半是男孩！她尚未定型，心中还不曾有作为女人的自我意识，是个真正的处女！啊，真是完美之极！”

哥莱特力邀赫本去纽约演戏；当她们途经伦敦时，好莱坞的派拉蒙公司对这位大名流看中的小演员也刮目相看了。例行试镜头后，便立即签约。然而不幸的是，《吉吉》的拍摄开始很糟，赫本表现得很不理想，但中间，她听从了导演的批评，导演的话很简单：“你得改好，要勤奋、努力。你要睡好、吃好，把全部精力投入拍戏，以一个专业演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席话使赫本猛然醒悟、她变好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好。她听从了导演的建议，她变成了真正的专业演员，终于，《吉吉》的演出十分成功，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赫本尽情发挥了自己的表演才能，她成功了！

成名的起点：《罗马假日》

中国观众熟习赫本，是从《罗马假日》开始，赫本辉煌事业的开端，也通常自《罗马假日》算起，这是她的成名作，也是她的代表作，对她有着特殊的意义。

就在赫本被挑选为《吉吉》一戏的主角时，在伦敦，挑选《罗马假日》饰公主的演员的工作正在进行。起初，导演打算邀请名演员琼·茜蒙丝主演该片，但琼想换换口味拍歌舞片，因而予以婉言拒绝。于是，导演决定采用电影《乱世佳人》公开招聘女主角郝思嘉的扮演者的办法来挑选演员。

这部片子由美国派拉蒙公司摄制，好莱坞的著名导演威廉·惠勒执导。赫本本无心去参加女主角的角逐，一来她已决定演《吉吉》，二来，俟《吉吉》一拍完她就准备结婚，成家立业过日子。所以她对《罗马假日》毫无兴趣。后来男爵夫人一再劝说，没办法，她才不得不去敷衍一下，即使选不上，她也会满不在乎。

测试选用的一组戏是：公主穿着睡衣，在一张大床上做仰卧起坐。赫本柔软得象只小猫，将双臂伸向装饰美丽的天花板。在此之后，她又极其自然地、孩子气地完成了一系列规定情节，当她做这些动作时，一架摄影机正悄悄地对着她拍摄，而她却全然不知。无论从现场还是从胶片上看，效果都是理想的。她当选为公主的扮演者，和派拉蒙公司签订了合同。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赫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结果对她的一生会发生多么大的影响。当时演记者的男主角已定下来，是好莱坞的著名影星、风流小生格里高利·派克。

1952年5月，《吉吉》演出刚一结束，派拉蒙公司就要求她赶到罗马，参加拍摄。公司为赫本和派克举行了隆重的招待会，在罗马的“精益求精”旅馆召开。赫本虽说主演了《吉吉》十分成功，但她同所有其他年轻姑娘一样，对格里高利·派克非常崇拜。当时，派克刚过完36岁生日，高高的身材、瘦削、英俊、作风正派、和蔼可亲，他主演过一些优秀的影片，这些影片使他声誉卓著，成了全美国人的偶像。

招待会上，当赫本和派克握手时，她完全被后者摄服了，一句话也说不出。在这儿，与其说她是电影演员，不如说她是个影迷。她似乎忘了，她自己也是今天招待会的主角之一。但派克从一开始就决定设法让这女孩子自信。同时，就在他看见她喜笑颜开而又温柔顺从的样子的一霎间，他就明白了：这年轻姑娘一旦作为女主角出现在银幕上，就是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导演惠勒也出席了招待会，他矮胖，长着一对招风耳，外表可爱，精力充沛，思想慎密。

《罗马假日》的拍摄是一个苦难的历程。因为一切都是实地拍摄，所以得清除人行道，把行人赶走，光这项工作就差点把副导演和制片主任累垮。好，竖起路障，汽车改线，有轨电车停驶，大楼腾空，赶走游人，公共纪念物的参观停止，为做到这一切，要向每个有关的人行贿。但有一件事最伤脑筋，那就是持续不断的噪音：电喇叭的尖叫，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的吵架声，头上飞机轰鸣，乞丐们讨钱的喋喋不休……这些噪音全得消除，使之沉寂。因为是同步录音，但是罗马硬是得不到完全的宁静，因为喷泉的溅水声和鸽群的振翅声还是无法控制。

此外，围观的意大利人既不听指挥又不肯安静，拍片日夜进行，他们则日夜围观，不论公主和记者到哪里拍片，哪里就有围观者。在拍摄一些表示爱情的亲密镜头时，似乎罗马城一半的人都来了。他们又是大笑又是大喊，冲着明星们指指点点，扮着鬼脸。

剧情要求演员们装出凉爽舒适的样子，而实际情形却是热得要命，那年是罗马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演员脸部化妆的油彩甚至受热都溶化了，没办法，他们只好离开镜头，把颜色洗掉。拍摄的时间很长，常常是从黎明拍到下半夜。大家都热得吃不下饭，只是为了保持体力勉强吃一点点。赫本几乎什么也不吃，只饮一点香槟。她不叫苦。公主严以律己和控制情绪的能力这时已为人称道。

更糟的是，罗马城的政治形势十分紧张，斗争激烈。拍摄期间，法西斯分子和共产党人在街上打仗。机枪嗒嗒作响，说不定什么地方会突然发生爆炸。因为这段时间正是五月选举刚过，发生了一些流血政治事件。当基督教民主党人夺取胜利时，抓住了携带黄色炸药的共产党人。在一座选为外景点的桥下竟发现了五名带炸药的恐怖活动者。工人的罢工也不断威胁着拍片工作，火炬游行、欢呼、唱着流行歌曲示威往往把拍摄日程打乱。

因此，工作进展很慢，难题多。有时为了重复拍一个镜头，一个下午要干上 60 回，赫本有点承受不了，但她并不怨恨，她也力求完美。不过导演为赫本也尽力克制自己，他用一切办法提高她的自信心，让她感到轻松愉快。他告诉她说，她必须忘掉自己是在演戏，应当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公主。他给她上了电影明星的第一课，他教她“要迎合内心的感觉而不要做戏。”这一点让赫本终生受益匪浅。

派克是一个风流大明星，赫本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年轻新星，因此，拍摄期间，总有些小报记者把两人用浪漫故事扯到一起，这让赫本十分恼火。其实，派克对赫本体贴、爱护、且始终如一，他体察她的感情和她对他的敬畏。拿下这部片子在他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他无私地哺育她一场又一场戏，因为他意识到，是她而不是他在这部片子中更有价值。他是一个有道德而大度的人，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浪漫故事。

拍摄工作最终还是圆满完成了。1953 年 8 月 20 日，赫本飞往伦敦参加

《罗马假日》的首映式，然后又飞往威尼斯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在美国，也为罗马假日的上映开了公众招待会。该片在全世界获得了极大成功。在日本，这部影片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赫本后来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偶像。赫本片中的短发型一下子成了国际流行发式。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罗马假日》是同期上映影片中最走红的一部。一时间，赫本成了国际知名人士，全世界都在播放她的新闻片，电视台用黄金时间赞美她。大量的报纸欣喜若狂地赞美她的美貌、活力、妩媚、典雅，人们称赞她是继嘉宝和褒曼之后的最佳女演员。据说褒曼在看该片时，竟发出一声惊叫，她丈夫罗西尼问她：“你为什么喊叫？”

这位大明星说：“我被奥黛丽·赫本深深感动了。”这个消息传来，使赫本大受鼓舞。

“真有点让人受不了”

因主演《罗马假日》，赫本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提名。依照惯例，凡获该奖提名者，全得出席该奖的终评颁奖仪式。此届颁奖仪式 1954 年 3 月 25 日在洛杉矶和纽约同时举行。全美广播公司电视网将两地联成一个有机整体。通用汽车公司出资 27 万美元买下了在颁奖仪式过程中做电视的权利。

这一天，赫本在纽约刚演出完《美人鱼》，谢幕完毕她就一头钻进一辆出租车，在一名警察护送下直奔颁奖现场——世纪剧场。她感到体力不支，加上希冀、盼望、焦虑、恐惧，那天晚上的一切对她都好像是一场梦，一切印象都是模模糊糊的。

在出租车上，她换掉了戏装，一下车，她穿过剧场外庞大的影迷群，她一路小跑，后面跟着男爵夫人。穿过门厅，那里簇拥着大批记者和倾慕者，闪光灯不断地发出耀眼的光。她马上躲进化妆间去洗脸上的油彩。那些性急的记者和摄影者们等了五分钟便不耐烦了，把门拍得震天价响。无奈，赫本只好先放他们进去拍上几张。赫本步入会场时，电视屏幕上正播放着远在墨西哥的主持人贾莱·古柏宣读最佳女主角提名的名单。赫本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接着看到古柏拆开一只信封，抽出一张什么也没有的纸条，做出宣读获奖者的样子，赫本内心怦怦直跳，她紧咬指甲，紧张地期待着最后的结果。只见世纪剧场的司仪走上舞台，宣布道：“获奖者：奥黛丽·赫本。”

赫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一片欢呼声中，她从座位上一跃而起，跑到舞台侧翼，由于过度兴奋，本应向右，她却向左跑去，司仪赶紧把她招呼到舞台中央来，在抓住奖品的当儿，她差点和司仪撞个满怀。她接过金像说了一句话：“这真有点让人受不了。”又说了几句官样的感激话后，她就逃离了舞台。

然后是到记者招待会去。赫本由于乐极发呆，竟把金像给弄丢了。她记得是放在什么地方来着，但谁也找不着它。这样，她拍照的时候就没法拿着金奖了。有人拿出另一个让她拿着。最后，她的那一个竟在女厕所里找到了。可惜的是，10 年后的一天，赫本在外地拍戏期间，小偷溜进她的家，偷走了这一座金像。

此刻，赫本兴奋得发抖，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完全没有了平日的冷

静。她吻学院院长琴·赫肖特时，本应吻面颊，赫本却吻了她的嘴唇。不过还算幸运，总算平安地回到了家。她不能入睡，一夜出神地摇来晃去，闹得她母亲男爵夫人也一夜没睡好。

几天以后，赫本又听到一个好消息：她荣获美国戏剧年度奖——托尼奖，从此以后，荣誉对她纷至沓来。事实证明，此时赫本已处于事业的顶峰。自1948年她拍第一部40分钟的短片以来，仅仅五六年时间内，她就获得如此殊荣，实在是很了不起的，简直成了荣誉“暴发户”，也的确“真有点让人受不了”。

誉满全球的窈窕淑女

赫本荣获第26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标志着好莱坞进入了新秀辈出的时代，人们为影坛出现这样一个清新隽永、纯洁可爱的形象而欣喜若狂，世界各地纷纷向她表示祝贺，赫本也十分愉快，她用各地发来的贺文装饰她的房间，以此来庆祝她的成功。之后，她一帆风顺，成为欧美影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

迄今为止，赫本已在26部影片中担任各种角色，包括一部电视影片，其中主演20部。《沙布里娜》、《战争与和平》、《滑稽面孔》、《在蒂凡尼早餐》、《黄昏之恋》、《丽人行》、《谜中谜》、《窈窕淑女》、《等到天黑》等影片里的角色都演得出神入化。

赫本一生共拍26部影片，这在欧美著名演员中应该算是最少的了。但她的几乎每一次表演都让人永久难忘。她拍片精挑细选，宁缺毋滥，从影26年，平均每年只拍一部电影。《罗马假日》成名后，她不但慎选剧本，而且只和一流导演合作。所以，赫本每拍一部片子都水准高，卖座也好，深得影界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罗马假日》自不待说！1956年《战争与和平》公演后，观众写信给报社说：“赫本演得如此出色，以致于我每次翻开小说《战争与和平》，一副赫本面孔的娜塔莎就跃然纸上。”《在蒂凡尼早餐》中，赫本饰演一位玩世不恭、肤浅虚荣的社会下层年轻卖笑女子霍莉·戈莱特丽。该片公演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几个大学生“被赫本弄得神思恍惚达一周之久，似乎有一种摆不脱的魔力，天天晚上把他们拉到影院去看霍莉·戈莱特丽。”该片的主题歌《月亮河》由赫本亲自演唱，后来不仅获得奥斯卡最佳歌曲奖，而且风行一时，成为欧美流行最广的电影歌曲之一。

赫本对待电影，最突出最感人的就是她在拍摄工作中从来都相当地刻苦、认真。她说：“我从来不拥有什么天赋才能，我崇拜我的工作，我尽了最大努力。”是的，她确实是这样做的。在为拍《美人鱼》试装时，为了使服装达到完美的程度，赫本在制作过程中一连几个小时地站着，纹丝不动。在拍《修女传》时，她突然患了肾结石，但仍强迫自己起床，继续工作。她曾在大雨中一连淋上好几个小时，也曾为骑马而摔断椎骨；她曾因学开车而撞了别人的车被推上法庭；还曾因拍摄需要花几个月耐心驯养一只小鹿，做它的代理妈妈……

因为她的天份和刻苦工作，她的演技日益纯熟精湛，也越来越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甚至那些要求苛严的影评家也对她推崇备至，授予她各种各样的电影奖。她先后五次被提名奥斯卡奖，亦即是说，她先后至少五年都在该

年度欧美影坛的五大女明星之列。她的知名度越来越大，人们给她的片酬也越来越高。1955年拍《战争与和平》时，她的片酬高达30万美元，这是当时演员片酬的世界之最了。1964年拍《窈窕淑女》时，她的片酬高达100万美元，成为继主演《埃及女王》的伊丽莎白·泰勒之后的第二个拿百万片酬的女演员。

赫本是世界影坛上难得一见的瑰宝，她的容貌清秀，不俗艳，而且耐看。她的身材苗条修长，她的气质永远那么高雅纯洁。在观众心目中，她从未在摄影前搔首弄姿，更不用裸露镜头和挑逗性的动作来取悦观众，色情电影更与她无缘。1976年在拍《俩人行》时，其中有一场海滨的戏，赫本和男主角必须身着游泳衣。然而对优雅、美丽十分敏感又十分苛求的赫本，想到自己首次将身体暴露在千千万万影迷面前，不禁紧张到极点。导演安慰她，给她打气说，她的身体是大多数妇女所羡慕的。而她还是忐忑不安。戏尽管是拍了，但她演的动作很做作，明显是装出来的愉快。她的这种洁身自重的高尚情操，在西方影艺界，尤其是在好莱坞女明星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正因为如此，导演和演员们、同事们都愿与她合作，并以此为荣。她与曾几度合作的大导演威廉·惠勒，比利·怀尔德以及特伦斯·扬之间都相处得十分愉快。而她似乎也有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一些商业气息很浓的导演一经与她合作，便得以净化、升华，拍出了艺术水准相当高的片子。如特伦斯·杨是著名的商业导演，曾导演过007詹姆斯·邦德侦探片集，而他与赫本合作拍《等到天黑》时，竟为赫本优雅的风度所感染，拍出的片子艺术水准很高，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同样也收到了很高的经济效益。摄影师们爱看她那毫不俗艳的美，都喜欢为她拍照捕捉那“无法比拟的美”，著名导演怀尔德说：“自从嘉宝以来还不曾出现过这样的人物：导演见了会忍不住再三为她大拍特写镜头——拍她那端庄的大眼睛，拍她那诱人而甜蜜的微笑，拍她那活泼的举止，拍她那炽热的感情。你离开了剧院，但她的音容笑貌，时时出现在你的眼前，挥之不去，欲忘不能。”

赫本不仅外形纯美，而且内心也清洁高雅，她为人很有教养，从不摆大明星的架子。因此，演员们都很愿意与她同台演戏。在《罗马假日》里，她与格里高利·派克合作就十分好。在拍斯坦利·多南执导的《俩人行》中，她与男演员扮演者艾伯特·芬尼合作得也相当愉快。两位主角甚至有时因为在摄影机前笑得太过火而只好重拍。艾伯特情绪极好，经常讲笑话，一场戏下来，检查录音时，忽然听见艾伯特说：“我和奥黛丽要当导演啦！不晓得斯坦利·多南还能挣到什么钱！”自然这段录音只好剪掉，重录。当然也有的演员因为赫本名气太大，与她一起拍戏还有些不适应。在拍《在蒂凡尼早餐》时，和她演对手戏的是年轻英俊的演员乔治·佩帕德。他非常紧张，在拍一场与赫本的床上戏时，他躺得过于靠边，不料扑通一声跌倒在地板上，后来，赫本热情主动帮助他，使他消除了紧张，终于拍好了这场戏。

赫本的人品和艺德也是为圈中人物和广大影迷所称赞的。她拿过百万片酬，但她认为，一个演员不该由于拿过百万片酬就非永远拿百万不可。在1966年拍喜剧片《如何盗窃一百万》时，她与著名导演惠勒第三次合作，赫本十分感激这位在《罗马假日》中提拔、启发她的恩师，主动地将片酬减为75万美元。至于拍摄巨片《窈窕淑女》一事就更能说明问题，来自英国的歌舞演员朱莉·安德鲁丝（后主演了《音乐之声》）在百老汇主演了根据肖伯纳《卖花女》一剧改编的《窈窕淑女》，十分走红。华纳兄弟影片公司见有利

可图，创纪录地花了 550 万美元买下了该片的拍摄权。但老板华纳觉得安德鲁丝名气不大，决定换由赫本主演卖花女艾丽莎，他们认为，仅凭赫本这个名字就足以使这部电影成功。凑巧的是，安德鲁丝应迪斯尼影片公司之邀主演《欢乐人间》。两部影片都获得巨大成功。但在 1964 年度评奥斯卡奖时，安德鲁丝获得最佳女主角，且《窈窕淑女》一片也获得奥斯卡史上少有的最佳影片等八项奖，而在其中作为顶梁柱的赫本却连提名都没有。个中原因有二点，一是投票者们认为片中歌曲是别人配唱的，用别人的歌声来为自己配音是赫本的欺骗行为，其实赫本在自己主唱上是尽了最大努力的，他们不了解实情。二是电影界人士对在舞台上扮演艾丽莎的大名鼎鼎的朱莉·安德鲁丝未被起用感到愤慨。这个消息虽然使赫本感到震惊，但她却觉得这些决定是公平的，虽然观众和影视界评论界对《窈窕淑女》反应很好，但她认为自己在片中的表演也不尽如人意。但赫本影迷们对此却愤愤不平，连安德鲁丝也公开表示：“赫本应当获提名”。颁奖单位学院为缓和众怨，让赫本主领本届最佳男主角奖，而该奖获得者就是在《窈窕淑女》中与赫本合作的男主角扮演者哈里森。赫本对此并不耿耿于怀，她表现得大度、自信和愉快，并千里迢迢专程从欧洲拍片现场赶来颁奖，还向安德鲁丝表示祝贺，甚至事后给她送去一大束鲜花。而赫本自己则收到了一大扎慰问电报，其中有一份来自好莱坞的另一个赫本——凯瑟琳·赫本，电报中说：“别为落选而烦恼，说不定哪天你会因为一个连提名都不值得的角色而获奖。”在颁奖仪式上，几乎每一个《窈窕淑女》的获奖者都在领奖时说：“我要感谢奥黛丽·赫本的精彩表演。”只有哈里森不知谈什么才好，因为两部《窈窕淑女》里他都是男主角，他在舞台上与安德鲁丝搭档成功，在影片中又与赫本配合默契，此刻他手拿金像不知感谢哪位“淑女”才好，终于，他结结巴巴地说：“我要向，唔……两位窈窕淑女表示敬意”。

由于赫本在银幕上的形象，广大观众十分喜爱她。在她声誉鼎盛的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地的影迷把她奉为“银坛女神”，对她的名作百看不厌。《罗马假日》成功后，全世界都赞美她的美貌，说她是仙女下凡，她那吊眼梢、高颧骨，迷人的、若隐若现的微笑，还有那小精灵似的下颏，都使男人女人们为之倾倒，她的一切都成了世界女性仿效的对象。她在《罗马假日》里那种清新秀美的短发型后被称为“赫本头”、“奥美佳”，竟风靡世界，无数时髦女性以做此发型为荣。许多年轻妇女都学着影片中公主的样子把头发削得短短的，不少理发店专理赫本头；大街上树起巨大的“赫本头”广告牌，一些男士也站在牌前摄影留念。赫本偏瘦的体型使得减肥美容业兴旺起来，就连赫本的服装、帽子、太阳镜也都风靡一时。赫本在《龙凤配》中，穿的是著名巴黎时装设计师吉旺希设计的一字领袍裙。这是一件袒露胸肩的白色长袍，胸部相当于衣领的部位是“一”字形的平直线条，它造型简练、明快，疏密相间的大花图案恰到好处地出现在应当出现的部位，这件长袍优雅美丽，仿佛神话世界里的东西，赫本穿上它一出现在银幕上，广大观众就如痴如醉，成千上万的妇女群起仿效，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赫本热”。

《时代》周刊在 1953 年 9 月 7 日那期封面上刊登了她的照片，这是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刊登一个初出茅庐的演员的照片。1957 年，著名的社会专栏作家把她封为世界 10 大杰出女性之一。她的形象甚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导演起用她时，是什么都不问的。他们认为，只要奥黛丽·赫本的名字出现在电影海报上，那就意味着完全可保证影片获得国际性的成功。事实也的确如此，除

了倒霉的《绿色大厦》（由其丈夫费勒执导）外，她还没演过一部不成功的片子。她一直是50—60年代票房价值最高的五大明星之一。

有趣的是，赫本虽然是国际风云人物，但她却是性格内向、天性敏感、内心紧张易怒、神经质，极易受到伤害，且胆子十分小，连开车和骑马都十分害怕。正因为如此，她十分喜爱小动物。她有一只小狗是她形影不离的伙伴，闪亮的眼睛，通身棕色长毛，十分可爱，赫本给它取名飞毛先生，每天都要给它用芳香的狗毛洗发香波洗澡，梳毛，修剪爪甲，与它一起散步，把它视作了家庭成员，无论飞毛到哪里，人们都要为它忙上好一阵子。在拍片过程中，如果飞毛不见了，她会停止拍片，发动所有的人去找。后来，飞毛一次上街，两辆迎面驶来的汽车相撞，祸及飞毛，它被压死。赫本的精神几乎崩溃了，极度沮丧，差点恢复不过来。她立即从好莱坞返回巴黎休息了好长一段时间。赫本对小动物的宠爱几乎到了依恋的地步。有一次，她心爱的宠物金丝雀从鸟笼逃出，赫本急昏了，有如丢了心爱的孩子似的，哭得象个小姑娘，她几乎叫了当时在身边的所有朋友去寻找，费尽无数夜晚的周折，最后终于找到，她高兴得不得了，又惹得泪眼模糊。

两次恋情 三度婚姻

赫本虽然在事业上一帆风顺，红极一时，但婚姻生活却比较曲折，且极为隐秘。这位大明星同任何一位普通妇女一样，渴望有一个“安乐窝”，渴望宁静幸福的家庭生活。

刚刚21岁左右，她恋爱了，那幸运的男子叫詹姆斯·汉森，29岁，英国人，出身于富裕的卡车制造业家庭，将来是家庭事业的继承人。他为人诚实可靠，性格坚强，业余爱好狩猎，骑射和捕鱼。赫本觉得，汉森是她理想的丈夫，会成为她的依靠和保护人。然而，这个时候赫本正在拍《蒙特卡罗宝宝》，正处于事业的起步阶段，所以这一事情在赫本心里是矛盾的：同汉森结婚，就意味着放弃影剧事业。何去何从？赫本心神不定。

男爵夫人态度十分明朗，她对女儿说：

“必须以事业为重。你不能生活在除了卡车就是马匹和猎狗的世界里。”

尽管母女对此经常争执不休，但赫本还是有自己的主见，她需要成家立业，需要有一个人来保护她。于是在《吉吉》首演四天之后，她还是和汉森宣布：《吉吉》一拍完，他们就结婚。

然而随着《罗马假日》的完成并获得巨大成功，同时拍完后她还得立刻参加话剧《吉吉》的巡回演出，戏票已全部预售出去。她很想飞往加拿大去看汉森，但却抽不出时间来。这个时候，赫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根本不可能放弃已经上了路的电影事业，她与汉森的关系，至少是目前已经谈不上结婚了。

同时，男爵夫人仍然坚决反对女儿和汉森结婚，继续对她施加压力。最后，赫本终于放弃了战斗，彻底投降。在《吉吉》的芝加哥首演式上，赫本宣布说，她与詹姆斯·汉森的一切全都过去了。而这个时候，可怜的汉森还正在做着他的结婚计划呢！年轻美丽、纯洁无瑕的吉吉，终于因为在罗马的假日而了结了她的初恋。

然而生活中的吉吉仍在追求向往着幸福美好的生活。第二年，她主演《龙凤配》，在剧中，她饰演一个受到老板两个儿子爱恋的司机之女。在拍摄之

余，扮演哥哥的著名演员汉弗莱·鲍嘉公开不喜欢赫本，而弟弟威廉·霍登却和鲍嘉相反，热烈地爱上了赫本。霍登当时是一名名演员，曾因主演《十七号战俘营》而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此刻正处于事业的巅峰。

威廉·霍登是个男子气十足的人，身材魁梧，匀称，有一双拳击家的手，同时也有一股叫人不放心的味道。他狂热地爱上了赫本。他爱她的娇弱、优雅，爱她的娴静；而她则被他的男子气概，他那双仁慈的、深深注视人的眼睛，他的苏格兰式的皱眉和他身上的香烟气味深深迷住了。结果是不可避免的，爆炸似的恋爱发生了。他们在片中默默深情，在一起听音乐、喝茶，也曾一起骑自行车环城绕游，侃侃而谈，互相倾吐心中积压的恋情。他们嘻笑自乐，爱情的种子不自觉地发芽生长着。

然而，霍登结婚多次，当时家里仍有妻子、一个成年的女儿和两个儿子。不过，关于这段恋情，朋友们认为是霍登有沾花惹草的倾向，是他搅乱了赫本的心。不管怎样，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赫本决定不再与霍登往来。圈中人分析，赫本富于理智，即或堕入情网，她也不曾有和霍登结婚的打算。即使霍登的婚姻已经发生危机，她也不会去做一个破坏他人家庭的人，何况还要同一个成年女孩、两个男孩打交道。她明白，孩子们会怨恨她，社会舆论会谴责她，她可不愿意卷入这种下贱的事件中；再说，霍登的性格太喜欢游历，这样，若是结了婚，两人会经常分离，这是赫本所反对的，也是当初她和汉森割断恋情的根本原因。渴望一个安静的家一直是赫本所终生向往的，她希望有一个稳固的婚姻，而和霍登这样的人结婚，则前途迷茫。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赫本想要孩子，她十分想要一个孩子，而霍登已丧失作父亲的能力，《龙凤配》终未能在生活中做成美妙的龙凤梦。

然而事隔不久，1953年8月20日，在伦敦《罗马假日》首映式结束后的晚会上，一个深色眼睛、高颧骨、下额轮廓清晰而美丽的男子向她走来，他就是格里高利·派克向赫本介绍他的朋友、导演、演员兼剧作家米尔·费勒，赫本看过他演的电影，对他的演技十分钦佩，出乎费勒意料的是，赫本对他的作品了如指掌。

费勒当时35岁，高瘦的身材，脸长得象16世纪大画家格列柯，如雕刻出来的一般。他在击剑上很有两下子，同时又爱好网球。他明智、善于体贴人，他在好莱坞的威望很高，甚至超过它的领导人。但由于他太多才多艺，涉猎面太广，分散了他的精力，使他在某一方面不能跃居首位。他终日忙忙碌碌，从不休息，永远处于高频率。费勒的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爱尔兰裔美国人。费勒曾在普林斯顿上大学，二年级时迷上话剧，遂中途辍学，上墨西哥写了第一部小说，后在百老汇表演舞蹈，舞艺相当好。他干各种各样的工作，而且都有所成。然而，当他的事业在百老汇发展之际，他患了小儿麻痹症，右臂因之萎缩，他握着熨头拚命锻炼，硬是使右臂恢复了正常。随后他来到了好莱坞，搞银幕测试指导，最后因在《失去的分界线》中扮演一名黑人医生获得成功。

然而，费勒在银幕上的形象严峻有余而温暖不足，总不能唤起女影迷罗曼蒂克的幻想。但是，在晚会上，他与赫本一见钟情，赫本喜欢费勒的机智、幽默和好看的外表，对这个具有领袖风范的人物有了依恋之情，她对费勒说，希望能有机会和他一道演戏，请他挑选剧本。

于是就有了话剧《美人鱼》，赫本和费勒分别饰演一对相恋的年轻水妖美人鱼和英俊的游侠骑士。在舞台上，费勒向赫本倾诉衷肠，而在实际生活

中，他也向她狂热地求爱，该剧后来拍成电影，也相当成功。观众评论说，赫本的表演“可爱得要命”，“米尔·费勒的表演也很成功。”而同时，俩人的爱情之花也越发芬芳吐艳。1954年9月25日，他们在瑞士美丽的卢采恩湖畔一个小教堂举行婚礼。那儿是世界上最豪华最文明的山区休养地之一，幽静、舒适、豪华、美丽，又能避开新闻记者。夜里，除了偶尔从卢采恩渡口传来轻柔的絮语声外，只有牛群轻柔的铃声，新婚夫妇感到惬意极了。

这是一对幸福的夫妻。赫本尽管一夜之间成了大名鼎鼎的人物，虽然她的天才远远超过丈夫，但她处处抑制自己，小心谨慎，给了费勒无私的爱，尽量使双方都幸福和满足。她渴望家庭稳定，幸福长久。她想到，同在电影圈的夫妇由于不在同一部影片担任角色时，往往被分离在不同的地区甚至不同的国家，而这时大部分人难免出些桃色新闻，所以，电影演员的婚姻往往不很牢固，鉴于此，赫本向代理人提出要求，让他保证：她担任的角色必须符合一个条件，即不离开费勒。

费勒也对赫本处处保护，维护她的形象，设法使她免受新闻界的伤害。他还专门为她编导了一部片子《绿色大厦》，片中的女主角玛丽纯洁、完美，具有人类少有的优秀品质。不用说，这正是费勒心目中的赫本。这部电影是两人爱情之光的折射。然而，可惜的是，它却成了赫本一生中唯一不成功的片子，当然这要归因于费勒。他还对赫本体贴入微，赫本两次怀孕，都因其身体太弱，臀部和骨盆过窄之故而两次流产。这个时候，费勒都无微不至地关怀保护，用男子汉的爱情控制她，用自己的思想和欲望感染她，使她从痛苦中渐渐解脱出来。无论什么时候，赫本生病或不适，费勒都永远在她身边，当时被誉为“形影不离”的夫妻，婚后第5年，两人有了一个男孩，取名西恩。

然而，这一对夫妻，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赫本对费勒忠贞不渝，温柔体贴，而费勒却对赫本控制得很严，且过于维护自己的男性权威，有时甚至是简单地凭直觉行事。他们的一个朋友评论说：

“费勒对奥黛丽好象有一种统治的权力，我觉得他所表现出的男子汉气概比一般人还要强，他对她那么生硬，说一不二，使旁观者都难以接受”。

他们的关系即使在最轻松愉快的时刻，也有某种程度的紧张。还有一点，作为一个国际知名人士和影坛巨星的丈夫，费勒不愿做她事业的陪衬和保护人，更不安于个人事业的暗淡。赫本力图忍让和克制。然而，尽管“她为挽救他们的婚姻关系已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尽管曾许下宏愿，要为影视界众眷属树立榜样，与费勒白头偕老，但是，使人无法抗拒的是，在结婚10年后，他们的婚姻最终还是在拍《窈窕淑女》期间出现了裂痕，赫本逐渐意识到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费勒对她的控制多于爱；费勒对她不忠的行为时有发生。赫本终于明白，她的白头偕老梦完全只是一厢情愿。1968年秋天，这对夫妻在瑞士相聚了，此间，赫本又经历了一次流产，这次流产象不祥之兆笼罩着他们的婚姻，至此，赫本与费勒的婚姻关系完全结束了。

赫本对此十分痛苦、失望，她说：“我一直尝试，极力想保住我们的婚姻，但太难、太难了。干我们这一行，常常要表演热恋、爱抚，有时就不免假戏真做。在这个圈子里，婚姻真难维持啊！请你相信，我是把婚姻、家庭生活放在第一位而把事业放在第二位的。”

赫本是一个坚强而热爱生活的女性，37岁的她，虽不乏青年女子的活力，却脱尽了少女的稚气，她出落得越发妩媚动人了。她的性格开朗，落落

大方，胸中洋溢着爱的萌动，她已准备好去迎接新的爱情。

1968年金秋时节，赫本决定独自到希腊作一次休息旅行。在蔚蓝色、发着粼粼波光的爱琴海上，一艘豪华的游艇平稳地行驶着。甲板上，赫本正与煤油大王、百万富翁保罗·威廉及其富有魅力的妻子奥林匹亚·托罗西娅观赏希腊神话传说中美丽的岛上风光，这时，一位高个子、金发碧眼、美得惊人的男子引起了她的兴趣。他是年仅30岁的意大利精神病学者安德烈·多蒂医生，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多蒂家族，他生长在罗马，当时正在罗马大学执教，同时也与人一起开业行医。

多蒂诙谐、生机勃勃而讨人喜欢，赫本成熟、妩媚、温柔而迷人。赫本与年轻漂亮的医生一见钟情，爱情象火药似地爆炸了，赫本不顾一切地投入到了这炽热的爱情之中。

圣诞节前夕，赫本与费勒办理离婚手续，此事办得极其谨慎、保密，目的是不想在社会上引起喧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双方都能将大宗财产保护起来。离婚手续办完，赫本就到罗马同多蒂及其家人共度圣诞节，同时两人订婚，多蒂送给赫本一枚巨大的保加利亚大钻戒，订婚仪式是两小时的招待会。1969年1月18日，婚礼在瑞士举行。赫本身穿吉旺希为她设计的粉红色针织连衣裙，在嫔相陪伴下，双手捧着一小束花，她显得苍白，但很美。有趣的是，当多蒂14岁时，看了赫本主演的《罗马假日》，跑回去对妈妈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娶那个漂亮的女演员。”不想今天却成了事实。

赫本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婚后她完全息影，照料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他们的生活如田园诗般优美，两人的娱乐是看电影、上夜总会和去豪华俱乐部，有时他们去某位伯爵夫人家拜访，有时到高价舞厅去跳舞。此时，赫本的心中洋溢着满足、兴奋和愉悦：“我又在爱中，又幸福了，……我已嫁给了一个我爱的人，愿意按他的日程表生活了。为什么还要重新去工作？去过那种我不想过的生活呢？”她对丈夫的专业精神病学也发生了兴趣。可以看出，赫本似乎在爱情面前忘了自己心爱的电影，她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家庭生活的爱和幸福之中。一年后，他们有了爱的结晶，一个重7磅8盎司的男孩路卡。

虽然，意大利、罗马，赫本的成功一生都要感谢这个地方，但是，赫本从一开始就不知道的是：在意大利人的观点里，一个男子不认为他一结婚就该终止他自由的性生活，有一部分人认为在结婚之后有一个甚至几个情妇都是很合适的。多蒂婚后时常弄出许多丑闻，甚至同当时罗马城里最声名狼藉、最妖冶的美女搞在一起。当时，一份刊物《国家调查》登载了这一事件：

“多蒂是个淫妇的儿子，而奥黛丽却是个圣人。多蒂时常带女人上夜总会。当奥黛丽在罗马时，他就装得象个天使。当多蒂和女演员、模特儿在一起被人拍照时，多蒂非常狼狈，恨不得把这些女人藏进汽车里。”

这对赫本的打击很沉重，她幸福生活的美梦又破灭了，她的婚姻又一次以悲剧告结束。赫本别无选择，她已为离婚作好了准备。多蒂对此很恐慌。他俩决定上夏威夷的火奴鲁鲁去度第二次蜜月，但事实证明这也是徒劳。

这个时候，她终于重返影坛，并与多蒂办理了分居手续。单身的凄苦和晚年的孤寂使赫本很想找一个男子作生活伴侣，朋友们对此很关心。其中一个好友为她介绍了一个男子——英俊的演员罗伯特·沃尔德斯。罗伯特适逢妻子亡故，他的亡妻是声誉卓著的好莱坞影星曼尔·奥伯朗。

两人一见面彼此就被吸引住了。赫本在外形和气质上都使罗伯特想起亡

妻。他们都是身材纤细，高颧骨、吊眼梢；感情都同样细腻灵敏。赫本与罗伯特两人也都经历过爱情的挫折和痛苦，且两人都是荷兰人，同样的荷兰人气质增加了彼此的吸引力，两人相爱了。在瑞士这安静、幽美的国土上，赫本和罗伯特再次重逢，他们把自己献给了对方。赫本对朋友说，她终于从她所爱的人身上找回了一个温柔的心灵，一个弟弟。罗伯特在心灵上是温和善良的孩子，需要一种母爱。而赫本身上兼有护士和母亲的双重品质，从这一点上说，双方都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1981年，罗伯特走了大胆的一步，他住进赫本在瑞士的家，开始了二人的同居生活。尔后两人正式结婚，赫本与丈夫住在风景幽美的瑞士共度晚年。赫本在罗伯特身边找到了幸福，她辛勤劳碌的一生终于得到了宁静的归宿。

“ 我们爱你，奥黛丽！ ”

赫本的第二次婚姻，与多蒂的结合使她息影七年，广大观众十分怀念她，电影公司和圈中的人物都希望她能再次出山。1976年，不安于“贤妻良母”生活的赫本终于重返影坛，与因演007谍报员詹姆斯·邦德而名噪一时的辛·康纳利一起主演《罗宾汉和玛莉安》，影片描写中古传说中随十字军东征归来的农民英雄罗宾汉与离别十八载的爱侣之间的一段深情。该片的首映式在纽约举行。当赫本前往出席之前，她非常不安，阔别影坛七年，电影事业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会怎样对待她？

在首映式之前，赫本还不得不尽快飞往好莱坞，在美国电影学院表彰威廉·惠勒接受终身荣誉奖的仪式上发言。她朗读了一首自己写的诗，结果博得满堂喝采，这使她又惊又喜。接着她又飞往纽约参加首映式。首映式在广播城市市音乐厅举行，赫本一到，约有6000人向她欢呼，用唱歌的声调齐唱道：

“ 我们爱你，奥黛丽！ ”

赫本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她被人们的热情感动得热泪盈眶，她说：“看到人们并未对我感到腻味，我很感动。”然后她再飞往好莱坞，出席该片在西部的首映式，并在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发仪式上担任授奖人。这对电影明星来说，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她这回是为当年即第48届最佳影片《飞越疯人院》授奖。赫本息影七年，感触颇深，但她最难忘的是，好莱坞没有忘记她，电影没有忘记她，广大观众没有忘记她。

她虽然息影多年，但演技并未逊色。继《罗宾汉与玛莉安》后，她又主演了《血亲》（1979）、《哄堂大笑》（1981）、《直到永远》（1991）。然而，进入70年代以来，欧美的妇女解放运动日趋高涨。妇女不再满足于做男人的玩物和附庸。她们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和男人一样工作奋斗。近年来不少女演员成功地塑造了这种新女性的形象，很受欢迎。相比之下，赫本复出后仍然跳不出天真无邪、活泼善良的少女形象，这就不能不给人一种落伍、怀旧的感觉，令人感到哀叹、惋惜，这也是她重返影坛后所拍四部影片均不很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奥黛丽·赫本的一生，是光辉灿烂的一生，她在黄金时代所创造的银幕形象，正如她自身一样，留给人们美好的印象太强烈了。她在电影史上所占的独特的一页，是不会被岁月所抹掉的。1991年4月22日，美国林肯中心电影协会向赫本授予荣誉奖，该项奖自1972年起每年向全世界最

资深望重的艺术大师颁发，获奖者先后有卓别林、劳伦斯·奥立佛、伊丽莎白·泰勒、詹姆斯·史都华等影界巨星，这是对赫本影坛生涯以及非凡演技的崇高褒奖。

赫本晚年，仍然老骥伏枥，为公益事业发着光和热。目前，她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在这个职位上，她不时举办一些音乐会和募捐慰问活动，并不时造访一些贫困地区的儿童，足迹遍及埃塞俄比亚、苏丹、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孟加拉等亚非拉许多国家，受到当地人民的广泛爱戴和欢迎。1992年底，她还以重病之躯赴索马里看望因饥饿而面临死亡的儿童。然而不幸的是，赫本因患结肠癌，于1993年1月20日在瑞士洛桑的家中去世，终年63岁，一代巨星从此陨落。但是人们不会忘记她，她的纯情、美丽和清新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我们爱你，奥黛丽！

好莱坞第一号美女 伊丽莎白·泰勒

在现代的文化生活特别是影视娱乐圈中，一般都是清晨黄花午时落、朝三暮四、喜新厌旧、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充满了无情的淘汰和残酷的竞争，人们的好奇心和胃口无底无边，无穷无尽。套用某著名影星的话说：要满足观众的胃口很难，要长时间地满足观众的胃口更难，而要长时间地以天才和功力、以不同的形象和趣味不断地满足观众的胃口、刺激观众的感觉则难上加难。我们本篇的主人公却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佼佼者，她以美丽的艳姿和形象感染和打动人们，更以其鲜明强烈的性格、屡合屡分的婚姻生活刺激人们的兴趣，一波三折、一咏三叹、高潮叠起频爆热门，极富戏剧色彩，令世人惊叹不已！现实中的泰勒，跟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富有情趣、欲望、梦想、冲动。她的形象本色和我们大多数人的天性内涵一样，而且是一种扩大，登峰造极，推向极致。

梅开八度的好莱坞“常青树”

临近世纪末期的 1991 年金秋 10 月，好莱坞鼎盛时期及其以后多年出足了风头似将归隐沉寂的伊丽莎白·泰勒再创纪录爆出新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迈克尔·杰克逊牧场的露台上，这位 59 岁而美艳依旧的大影星举行了第八次婚礼。这一回，她丝毫没有垂垂老朽的痕迹，象以往历次一样弄得隆重、热烈、华贵，身着著名设计师设计的黄色婚礼服，在两位前总统福特和里根夫妇及歌星、影星等贵宾的祝隔声中款款步入幸福的红地毯。新郎是比她年轻二十多岁的建筑工人拉里·弗坦斯基。三年前他在一个戒酒中心接受治疗时与这位比自己的母亲还年长两岁的大名人相遇。当时的拉里是一个十足的“蓝领”，邋遢而又粗鲁，尽管泰勒徐娘半老已历七届婚姻，还另有无数情人过往，但还是没有撑饱她那欲壑难填的胃口，她的芳心依然萌动了。颇有区别的是这次的对象是一个贫穷而地位低贱的小生。

泰勒爱上这个穷汉并想与之结婚。为了满足她的欲望标准，她向来不计代价，她要将他改造成一个斯文绅士，以使他能够游刃于她的生活圈子。首先，把拉里送到一家最好的牙科诊所，把他扭曲的牙齿磨平，前后约花了五万美元和一年时间。其次，又聘请了好莱坞最著名的和收费最高昂的发型师，指导拉里梳了一个狮子发型，以使他给人一种有实力、有冲动的成功者形象。泰勒还先后花了 10 多万美元聘请欧美著名时装师为拉里设计时装，也让他的穿着既性感又合潮流。为了让拉里保持良好的体型，他俩平时还经常在寓所中的健身房做运动或游泳，并在饮食上严格把关。除此之外，还送他到专门学校去学习，以使他的行为举止变得高雅。终于，这个曾因藏毒和醉酒驾车坐过牢的拉里被改造成了无愧于泰勒的“白马王子”。

反过来看，也许人们认为，拉里的这桩婚事旨在泰勒的金钱，而泰勒呢，则不过是心血来潮而已。但拉里一开始就宣布自己无意于泰勒的财富和地位，而在于两人之间融合欢心。尽管身属蓝领，拉里在这位大明星面前却全然没有别人常有的那种仰视和被慑之感。泰勒也并不是什么心血来潮，一来她确实喜欢这位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二来也是出于她自身的考虑。近年来，她经常身体不适，与其要护士常年陪伴，不如找一个年轻健康丈夫，既除病

患之忧又解孤独之虑。不过最新消息则说，这对新婚夫妇已开始分室而睡。而开始时的那种新鲜劲已经过去，那种变幻莫常的“泰勒现象”再一次发生，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年轻的芳华时代这种事儿多着呢！也许这只是她那大红大紫的鼎盛时期的回光返照。

还是把我们的视角投注于泰勒的黄金时代吧，这里，我们尽可以领略她那多姿多彩的生活风情。

艺苑有女初长成

幸运之神有时偏爱整个一代人。泰勒是绝对幸运的，她生长在一个很适合于她的时代。时代机遇不可再造，一去不复返。

泰勒 1932 年出生，在她成长并大展才情的年代，好莱坞也正好处于沸沸扬扬、热闹非凡的黄金时代（30—60 年代），可以这样说，正是一批批杰出的电影大亨、导演、明星将这个时代的好莱坞闹得隆重而热烈。反过来说，正是好莱坞那种竞争机制和明星制度激发和造就、培养出那大排大排的一流明星和超一流明星，为这个举世瞩目的文化天空凭添璀璨的群星。泰勒赶上了这个时代，挤进了这块天地，天生的丽质和各种机遇使她获得了成功。即使在她很小的三四十年代，好莱坞也有发现和培养童星的风气，这些童星在好莱坞各制片厂和剧组中以特殊的待遇被保护着，可谓真正的“宠儿”，身价也是十分昂贵，象秀兰·邓波儿，脸上长着著名的甜美的酒窝；裘迪·迦伦有一幅金嗓子，唱起来特别动听；简·鲍威尔善于舞蹈，玛格丽特·奥布莱恩那样叫哭就哭，都是一些特别惹人疼爱的小天使。作为一个儿童演员，泰勒没有达到她们那种轰动效果。她的母亲莎拉。泰勒为了使她走红可是费尽心机，她先是与丈夫经营画廊，到了洛杉矶立刻爱上了电影业的辉煌魅力和强烈刺激性。象许多淘金者一样把加利福尼亚看作可以大发横财的丰富宝藏，她不知疲倦地、精力旺盛地结交一切可能与电影业有关的人物，不论到什么地方都带着她那年方七岁的女儿，并且沾沾自喜地在旁边注视着人们第一次看到这小天使时所作出的反应。当人们看到那白瓷般的脸庞配上一头乌黑的卷发时总是禁不住出声地倒吸一口气。这孩子无暇的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长长的黑睫毛下的那对天蓝色的大眼睛，这对碧蓝色的大眼睛在光线的照耀下看上去甚至成了紫色。人们惊讶地倒吸一口气之后，往往都会接着惊叹着：“多美丽的孩子啊！”“天啊，她简直美透了！”“这真是举世无双！”这时莎拉就会自豪地微笑着看着女儿，然后以愉快的声调对女儿说：“说‘谢谢’，我的天使。”小泰勒也会微笑着说：“谢谢，”然后以她母亲教她的方式行屈膝礼。这套讨人喜欢的做法完全是莎拉为了给人们留下良好的印象而精心设计出来的。尽管家境不富裕，仍然送小泰勒到一个许多电影公司经理家的小姐都上的舞蹈班去学习，并通过舞蹈班一个同学的父母介绍，米高梅公司请小伊丽莎白去试镜头，环球影片公司也发出了邀请。莎拉自信而高兴地对欢天喜地的小女儿说：如果上帝要她上银幕她就一定能上的。结婚前她自己也在舞台上当过演员，自己的兴趣、梦想没有实现，就把它寄托在女儿身上。当然，她更主要地是想通过女儿的发迹而使自己富贵起来，以后很长时间内，她操持着女儿的事业和婚姻。她有自己尺度，那就是事业的成功。她替女儿选择有财富、有地位、有声望的情人以至丈夫。小泰勒的父亲是个十分驯服的丈夫，在她女儿的成功道路上，他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莎

拉花了不少时间为女儿在两个制片厂的初次面试作准备。她一边弹钢琴，一边训练伊丽莎白的举止行动，并要伊丽莎白对着屋里的每个角落行屈膝礼。不久，米高梅公司同小伊丽莎白签订了长期合同，每周工资 75 美元，莎拉欣喜若狂。从此以后，女儿的事业就成为她生活中的全部爱好。每天清晨她都陪女儿去摄影棚，让女儿学会不朝下看就能站到地下标定的位置上，并注意使自己在主要灯光区内表演，还陪女儿参加厂里举办的表演班、舞蹈、歌咏班以及化妆和试装活动。她总是在拍摄现场呆着，在导演身后向女儿投递微妙的暗示。由于她的不懈努力，公司指派她为合法的监护人和社交场合的伴随。这时期泰勒在《拉西回家来》等片里扮演了小角色。后来又被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借去拍《简·爱》，饰演一个配角。虽无大的影响，但莎拉相信女儿马上就会登上明星宝座了。

1943 年秋天，已经是十一岁的小泰勒被制片人考虑饰演一个主角了，但又嫌她还小了一点。有一部片子《玉女神驹》中名叫维尔维特·布朗的美国青年，幻想通过村里的有奖彩票赢得一匹叫德匹的马，她赢得那匹马后又产生了第二个幻想，那就是德匹能参加全国大赛。接着又幻想能在全世界最有名气的、要求最高的大赛马会上获胜。维尔维特的母亲曾游泳横渡英吉利海峡，这时鼓励说：“一个人活一辈子至少应该有一次机会去参加一件惊心动魄的蠢事。”于是在一定的驯马训练后，骑马驰向胜利时，人们发现她原来是女扮男装，于是她被取消了获奖资格。但是她毫不在乎，因为她的奇妙计谋已经完成了，她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她的这种计谋世界上任何小姑娘都会十分欣赏的，莎拉希望女儿得到这一角色，因为这是一个较重要、可以使她成为明星的角色。莎拉和米高梅公司为了说服制片人和引导观众接受这个小女孩，制造了一点小小的神话，说泰勒为了追求那个梦寐以求的角色，运用她的意志强行使自己在三个月内长高三英寸。小伊丽莎白也很欣赏这种诱人的说法，象真的发生过似的，她很早就有把幻想和现实交织起来的表现。

《玉女神驹》发行后，影片非常畅销。影评家赞美伊丽莎白的炽烈的渴望交织着甜丝丝的、娇滴滴的魅力。《纽约邮报》说：“伊丽莎白是你希望能看到的最自然、最优秀的小女演员。”《匹克》杂志则声称：“这部影片把十二岁的伊丽莎白造就成了一颗明星。”这部片子还得了两项奥斯卡奖。伊丽莎白终于成了一个小明星。米高梅公司为了感谢她的表演，发给她一万五千美元奖金。米高梅用了 5 年时间通过扮演小角色把裘迪·迎伦造就成明星，但现在制片厂和当演员的母亲却只用了一半时间就完成了把泰勒培养成为明星的壮举。

慢慢地，《玉女神驹》里的小女孩长大了。和她曾配过戏的成人演员说：“伊丽莎白身上那种幼稚的羞怯和甜蜜可爱的样子正在消失。”她不再羞怯腼腆并开始以一种非常正常的少女之心意识到自己的美。她很聪明伶俐，简直是一种非常超群的出众的聪明，在她那双紫色的眼睛里，似乎可以看出她总为自己打算，仿佛确实知道所要的东西，并且十分肯定她一定能得到它们。

这时，伊丽莎自己已经确定自己今后要当一个电影明星。她爱拍片，也很高兴能收到影迷的来信。当她看到自己出现在《生活》杂志的封面上时，兴奋不已。她很高兴自己成了米高梅的名人并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尤其是得以接近其他明星。伊丽莎白也想要在人们中间引起同样的反应。她穿一条长裙和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农妇式衬衫，把腰束得特别紧，乳房挺得高高地，她刚发现那种衬衫可以让人们一致行注目礼，于是会故意让人在吃午饭时通过

广播叫她出去，以便让每个人都看到她。就像在房里的花朵人为地提早开了花一样，伊丽莎白也在她的季节来临之前就盛开了。刚刚十五岁，已经出落成一个绝代佳人，并且具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有个著名作家见到她时被她镇住了：“她是我今生见过的最美的女人。”不久报纸专栏上声称：十五岁的伊丽莎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米高梅为了宣传自己花园里这朵最新绽开的花，便把这个刚刚吐艳的小明星投入新片《裘迪的约会》，这是一部画面漂亮的歌舞片，是一部捧金发碧眼的女歌手简·鲍威尔的戏。伊丽莎白在影片里扮演次要的角色：一个娇生惯养、矫揉造作的、年轻貌美的富家小姐。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伊丽莎白把这样一类富家女类型的角色简直演绝了。

是《裘迪的约会》把泰勒从童星擢升为银幕上的诱人女郎，并开始为泰勒的魅力制造舆论了。

《纽约先驱论坛报》说：“往昔在《玉女神驹》里出现的小姑娘消失了，而代之以一个真正十四克拉的、百分之百合乎标准的迷人美女，她的事业堪称前途无量。”这段时间里，她常常独自一个人躺在床上，长时间地作白日梦，贪婪地阅读影迷杂志里谈到的电影明星的趣闻、他们的住宅、衣着、裘皮、无价珍宝等。这些杂志里的东西塑成了她正规教育的基石，而影片则形成她对爱情、浪漫史和处世之道的观念。她开始把思想集中在风流韵事上，她画了许多自己在男人怀抱里的画，写了不少梦幻般的诗。这时世人还并没有接受她。

在第一个情爱的季节里小试身手

到伊丽莎白十六岁时，她的天姿绝色已广为人知，米高梅认为可以对她大量投资了。她比其他童星都顺利地完成了从童星到天真少女的转变，现在离真正的大明星只有咫尺之隔了，制片厂增加了她上银幕的次数，还把她的周薪增加到1千美元，并配送一些她想要的礼物。

对这位正茁壮成长发育成熟的美女来说，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和男青年约会。象这种个人感情的事，对于成长中的明星来说都是公司宣传人员保护并操纵起来的。制片厂很快用保护名义派去了一名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全美足球名星：葛伦·戴维斯，他是全美人人皆知的“后卫先生”。把美国的英雄和世上最美的少女配成一对满足了人们的理想，颇令人欢欣鼓舞。这是泰勒的情爱史上的首开记录。这段浪漫活动一本正经。戴维斯卧亿说：“我们不喝酒也不吸烟，我也没有对她动过手，我们当然做过接吻那类事，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在一起睡过觉。”有个熟悉内幕的人说：泰勒摸过葛伦两肩的肩章，仅此而已。很快戴维斯被送往朝鲜，伊丽莎白一心想把他搞出军队去参加职业球队，这样就可以不去朝鲜了。但是没有成功。戴维斯临走前把他的全美“金足球”标志送给伊丽莎白，她配上一副项链挂在脖子上，“这个足球意味着我和葛伦已经订婚。我要等他，等到我十八岁或十九岁，我就和他结婚。”这段时间里，伊丽莎白对结婚比对拍电影更感兴趣。但她在未等到葛伦回来之前，经人介绍认识了二十八岁的英俊小生小威廉·波利，他父亲是个亿万富翁，曾当过驻几个国家的美国大使，莎拉·泰勒见到他家的财富和非凡的社会地位时，便开始重新考虑戴维斯的事。当戴维斯回来时发现伊丽莎白正和波利约会。于是那个金足球成了一个永恒的纪念。新情人比尔·波利是个

典型的俊男，身材高大，皮肤黝黑，那双深邃湛蓝的眼睛可似和伊丽莎白的眼睛相媲美。波利给了伊丽莎白平主第一颗钻石戒指。波利一开始就对未来的新娘明确表示过要她当妻子而不是电影明星。伊丽莎白也迫不及待地同意放弃她的事业。她此时对拍电影已经腻味透了，她说：“我宁愿生孩子。”但是紧接着几个拍片计划送来时，泰勒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两方都吸引人，特别是1949年米高梅把泰勒借给派拉蒙公司在《名利地位》一片中扮演高度戏剧性的角色（这部片子是根据德莱塞的名著《美国的悲剧》改编），公报说伊将要和蒙哥马利·克里夫特以及谢莉·温斯特一起配戏，而传奇式人物乔治·斯蒂文斯任导演，这对泰勒母女来说是十分惊喜的，但却以同波利摊牌了结为代价。

派拉蒙公司马上安排克里夫特和泰勒作一次惹人注目的公开露面，两人一起出席克里夫特主演的影片的首映式。这也是他们二人首次见面。那天晚上泰勒十分迷人可爱，只是许多粗俗的脏话居然从这样一个看上去是世界上最美丽最贞洁的年轻女人的口里说出来，使克里夫特大吃一惊，他放声大笑，了无拘束。影片放映完毕，观众的欢呼声和掌声震耳欲聋，他抓住伊丽莎白的双手：“贝西·梅，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回到汽车里后，她问他为什么叫她“贝西·梅”，他说：“全世界的人都叫你‘泰勒’，只有我可以叫你‘贝西·梅’。”他不愿称呼她的明星名字。

《名利地位》即《美国的悲剧》原著1925年出版时，由于作者在书里直截了当地控诉了“美国梦”以及它所散布的腐朽影响而引起社会上相当大的轰动。伊丽莎白可不懂什么德莱塞以及片名的改变，她只知道自己要去扮演安琪拉这个角色，这位漂亮、富裕的交际花爱上了蒙蒂（蒙哥马利的爱称）主演的角色伊斯特曼，她只需要演好一个富家女的角色：漂亮的脸蛋，轻浮的举止，骄纵的性格。她所关心的只是穿游泳衣的场景和著名的设计师专为她设计的精美的夜礼服。斯蒂文斯需要伊丽莎白在这部影片里出现是由于她那种特别出众的、几乎是超现实的美。伊丽莎白在1949年是男性梦想得到的外在美的化身，她精致秀美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她的皮肤犹如丝绒般滑腻，在一对黑色的羚羊毛般的眉目下，是一双蓝得令人不可置信的眼睛，看起来常常是紫色的。她的鼻子是那样完美无缺，犹如精雕细刻过一般，鼻子下面那两片丰满而令人销魂的嘴唇，在成熟的男人中间会焕发起青春的梦想，在严肃的诗人眼中则会引起缠绵悱恻的诗句。她浑身散发出性的诱惑力，那种美会带来一个男人所梦想的一切财富、名誉、地位。斯蒂文斯知道使用伊作为她的明星就可以使观众明白：为什么“乔治·伊斯特曼”为了和她在一起享受名利地位而不惜杀人。

迄今为止，泰勒没有表现出多少演戏的才能。观众只要看看她的令人销魂的面相就行了。导演只要她漂漂亮亮地在摄影机前面出现就十分高兴了，而斯蒂文斯还是想尽各种办法暗示和激励伊丽莎白的表演。蒙蒂也设法帮助伊丽莎白，当他俩不在演戏时，他经常围绕她的性格向她提出很多问题，促使她思考她所扮演的那个女人。他对她的心灵深处进行探索，他很耐心，也温文尔雅。他在摄影机前能高度集中他的注意力，使伊丽莎白肃然起敬。他在他的精神激励下，超越了自己所具有的才能。导演试图向这位十七岁的少女解释，他想从她身上挤出原始的、性的强烈要求。这位杰出的天才马上就成功了，她一下子就提早成熟了。自从她在摄影机面前出现以来，这是第一次学习电影艺术。当她看到自己和蒙蒂在银幕上出现时甚为激动。他俩在银

幕上如胶似漆的关系是如此的炽烈，以致她在观看样片时在座位上都坐不住了，她的本能到现在才真正被激发起来。每个人都看到，泰勒也正在用其他女人所曾用过的方法逗引克里夫特。她与他调情，戏弄他，尽可能地多和他呆在一起，这为一种复杂的、非常亲密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这种关系是在影片拍完他们各奔东西之后，通过信函和电话发展起来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蒙蒂去逝的那一天为止。伊把蒙蒂当作偶像崇拜，在未来的岁月里她对她的爱慕之情始终交织着内疚、遗憾，从而使伊丽莎白在他死后多年，一提起他便不禁潜然泪下。在拍《名利地位》的时候，伊丽莎白认为蒙蒂是她所遇见过的最有才华的人，她根本不知道他生活中隐藏着同性恋的一面和以后暴露出来的可怕的自我毁灭。她当时只知道他似乎能看透她的内心，能理解她，并且还能就她的本色接受她。她觉得他们两人在很多方面都极为相似。那时她把少女的一切秘密全告诉了他，甚至那些使她害臊的事情。她知道蒙蒂是她最终遇到的唯一一个不指责她的人。他真心关心她个人的幸福。蒙蒂知道泰勒极想结婚，所以对她说：“贝西，梅，假如你和猴子结婚能使你幸福的话，那就和它结婚吧，可是你必须十分肯定，这是一个配得上你的猴子。”

这是她和希尔顿饭店——就是全球闻名的王牌饭店的继承人尼克·希尔顿约会以后得到的第一个忠告。希尔顿是她拍《名利地位》时遇到的，泰勒绝对相信希尔顿是合适的人。

老希尔顿的财富据保守估计约为一亿二千五百万。作为这种豪富的继承人，真是莎拉·泰勒梦寐以求的理想女婿。她对尼基的生活品性一点也不计较，或者根本不信。他是一个富裕的、受溺爱的、被宠坏的孩子，那种典型的花花公子，玩命地酗酒和赌博，毫无责任感。可泰勒根本听不进别人的话，她将不惜一切成为希尔顿的妻子。泰勒家宣布结婚日定在1950年5月6日，米高梅公司这时认为大好时机来了，陡然决定在一个月之后的6月6日发行泰勒参加演出的《新娘之父》，想利用婚礼刺激该片的票房价值。他们对外宣传：这个最美的明星同最富有的公子的婚姻已成为一个轰动全社会的新闻事件，任何单位都不得垄断任何信息。他们的目的是要利用这桩婚姻大事渲染，以确保它成为好莱坞社交史上最珍贵的事。于是立即授命著名设计师海伦·罗斯设计一件价值三千五百美元颇具梦幻般效果的结婚礼服。为了制做它，米高梅十五名女裁缝在婚礼前又缝又缀地足足忙了二个月。这作为米高梅公司的礼物让她的公司天仙般的新娘穿着可以飘飘欲仙地走下教堂的通道。接着大批制片公司及各种厂家老板纷纷宣布了送给新娘及母亲的各种各样尽可能想得到的昂贵礼品。虽然尼基颇感头痛，但伊丽莎白却欣喜异常，她每天同服装师争执要设计前胸开得很低的衣服。最后二人达成妥协：衣服的领口一直向下开到乳沟，但上面罩着透明的、可以看到皮肤的白色软绸。米高梅的宣传部门大肆吹嘘这是好莱坞最豪华的一次婚礼，公司全体人员及希尔顿饭店全体人员都在应邀之列。神话般的婚礼定于5月6日在贝佛利山的好牧羊人教堂举行。那天上午，据警察估计，有三千以上影迷拥挤在教堂外面。成千上万的人蜂拥着想一睹风采。伊丽莎白由她英俊的、白发如银的父亲挽着走出大门，进入春光明媚的阳光里，闪光灯闪烁着。在街上站着的至少有四层厚的人群中爆发出了热情和认可的掌声。电影界最美丽的新娘正在向等候着的高级轿车走去。没有人注意到一个高大、黝黑的青年，正站在人群旁对新娘怒目而视。

这是比尔·波利，他拒绝进入教堂观看伊丽莎白成为他人之妻。一小时

之前他冲到泰勒家，已经说过了他最后要说的话。他大步迈进泰勒的闺房，对着她复述了以前他的海誓山盟，诸如永恒的爱和永恒的结合等等。她流下了眼泪。他呆了十五分钟就离开了。波利毕生爱着他以前的未婚妻，二十多年来一直未娶，直到 1974 年逝世！

希尔顿夫妇乘坐“玛丽皇后”号于 1950 年 5 月 24 日起航前往欧洲旅行，同行的有温沙公爵夫妇，大概这对皇室夫妇当时认为这对著名的年轻夫妻之间也存在着如自己一样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动人爱情，所以执意要会见他们并邀其共进晚餐。一路上，伊丽莎白引起人们不断的轰动和包围，几乎把可怜的尼基挤倒在地以致使蜜月成为苦月。尼基对此极为愤怒，火气越来越大，被公众对自己妻子的阿谀奉承弄得不知所措。他在赌场里又喝酒又赌钱呆得很晚才回来。对伊丽莎白来讲，性是一种崭新的东西。也是奇怪的事儿，尼基正好以此对付她。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记者发出的消息中，透露出这对夫妇的麻烦婚姻问题。尼基是一个需要传统式主妇的那种丈夫，而他的妻子需要的则是一个殷勤的情人。他们两个都是被宠坏了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神话般的婚姻 8 个月后化为灰烬。这次婚姻大大弄僵了泰勒母女的关系，米高梅以保留莎拉的工资为代价撤销了她的保护人资格。

这时泰勒还在二十七岁的导演斯坦利·唐南手下拍一部《爱情比任何时候都好》的片子。她每天都在拍摄现场又哭又闹使拍摄工作只好中断下来，她经常泪眼汪汪，从家里也得不到任何帮助。唐南对她极为关心，结果他关照她的时间比拍片花的时间还多。新闻媒介马上暗示他有可能成为泰勒的第二任丈夫。为了补偿希尔顿的漠不关心，证明自己忠于他所承担的义务，他成了伊丽莎白日夜厮守的情人，给了她所渴望的体贴入微的关心和钟爱之情。但她仍旧情未销，时与希尔顿秘密会面、同居。几个月后尼基宣布将和一个德国演员结婚时，伊身心交瘁，悲痛不已。当唐南的妻子提出离婚时，十九岁的伊丽莎白突然却又成了臭名昭著的“第三者”。她自我辩解说：“一切问题就起因于我虽有一个女人的身躯，却仍然只有一个童心。”

迈克尔·怀尔丁：一个优雅的英国贵族

这个女人的奇妙身躯和那著名的童心在一天天地剧烈发展。

她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与前夫离婚后蒙蒂自然成了唯一的偶像。她从各地给他写来不少女孩腔十足的傻里傻气的信。甚至和希尔顿度蜜月时还想着蒙蒂。1951 年 2 月，婚姻关系破裂后，她飞往纽约去看他。两人住在一起，他们古怪亲密的关系简直令人不能置信。尽管他们二人之间有着十分深厚的爱情关系，但只安于一种唯一可能的关系——一种变得非常亲密而复杂的关系，直到 1966 年蒙蒂孤独地死去。

伊丽莎白坦率地承认想结婚。她和斯坦利·唐南的关系，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公司更担心它的明星的声誉受到玷污。米高梅最后决定把她送到英国去拍片，同片演出的有罗伯特·泰勒、琼·芳登、乔治·山德斯，这样做正是为了破坏二人之间的关系。但在英国，这个浑身透出欲望的年轻姑娘最关心的则是与迈克尔·怀尔丁约会。怀尔丁是英国日场戏观众崇拜的偶像。他和唐南一样都是有妇之夫，虽然都分居了。伊丽莎白要他与妻子离婚并和她结婚。为了造成既成事实，她给自己买了一枚大蓝宝石戒指戴在左手上，向世界宣称：她已和这位英国明星订了婚。“我最终向他求婚了，”她承认说，

“他具有我心目中一个男子汉应具有的一切，我认为他是非常了不起的。”

怀尔丁此时还爱恋着比他大八岁的玛琳·黛德丽。但伊丽莎白下定决心要让这位英俊古怪的男人作为她的下一任丈夫。这位美人的魅力确实难以抵御。这一下子使怀尔丁陷入痛苦的矛盾中，他同时爱着两个女人。伊丽莎白不断重复她的论点。她只有十九岁，能给迈克尔生孩子（他还从未有过），这是那位47岁的竞争者所不能做到的。更重要的是，她需要他！

迈克尔在感情上需要玛琳，但是泰勒对他的需要和眷恋使他感到有保护她的义务，这使他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伊丽莎白热情而友爱，”怀尔丁说：“人们忘了她曾经经历了非常难受的时光。她想要和爱她、保护她的人结婚。这个人，由于天大的幸运，结果是我。”

在《艾凡赫》拍完后，泰勒回纽约。她和蒙蒂主演的影片《名利地位》获得了好评。影评表扬蒙蒂“几乎太好、太微妙了”，称泰勒的表演是“空前的杰作”，此片获得了多项奥斯卡奖，但伊丽莎白还是象别人那样恰如其分地评价自己：我从来不认为我能演戏，我对表演喜爱得还不够。

泰勒自小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孩子，可到了十九岁，她身上滋生出一种敢做敢为的脾性。她全力以赴，不顾一切地追求迈克尔，对别人的忠告不予理睬，别人认为他们相差二十岁，怀疑他们是否般配。“不管别人怎么想，我爱这个人，我就要和他结婚，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

在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总是喜欢迈克尔式的人物，那种消极被动、温文尔雅的人。她总是让迈克尔和蒙蒂这类人物给迷住。这对一个强壮粗野、热情奔放的女人来说真是一桩怪事。还有她对那些有缺点、有毛病的人也特别感兴趣，象她后来遇到的吸毒成瘾的费希尔和嗜酒如命的伯顿，大概这是因为这样的人好驾驭好控制，就象她母亲控制她父亲那样。但是迈克尔和蒙蒂两个人都喜欢那种年岁比他们大的、富有魅力而又极度强有力的女人。迈克尔仍在犹豫之中，他举出的理由是金钱，说自己不能维持她在好莱坞的生活。此外他还得考虑他在英国的票房价值的领先地位。作为一个英国公民，他离开英国就会失掉他第一个妻子在离婚后给他剩下的一切财产。狂热之中的伊丽莎白找米高梅公司与怀尔丁签订了一份优厚的慷慨合同，迅速突破了迈克尔的抗拒。怀尔丁温柔宁静、他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不冒犯别人，从来没有想过要对伊丽莎白说个不字。他太顺从以致他从来不和人争论。泰勒的母亲莎拉在促成她和希尔顿的和解完全无能为力以后，只得接受那不可避免的事实：让她的女儿和一个酷似父亲的人结婚。这倒比唐南强。虽然迈克尔已经有些秃顶且又没有什么财富，值得安慰的是迈克尔出身贵族。

伊丽莎白毫不含羞地追求这个男人，强行地把婚姻推到怀尔丁面前。不久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两个懒懒散散的人只顾逍遥逍遥地过日子，并没有刻意去挣钱，终日沉湎于穷奢极欲的生活，毫无节制地买东西。伊丽莎白公开宣称她最大的爱好就是买衣服和首饰。怀尔丁给他妻子买了由她挑选的钻石项链、蓝宝石手镯和翡翠戒指，可是得由伊丽莎白自己付款。她有一次向蒙蒂诉苦说：她曾经梦想找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来照顾她、给她买首饰和皮衣，而现在才发觉得自己付账。泰勒毕生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可以说有一种狂热的癖好，一件首饰越昂贵越大越漂亮吸引人她越感到刺激，也顾不得什么俗雅了。按她的那种欲望和气质，恨不得太阳和月亮变成大宝石挂在她脖子上那才神气呢！这一点在演艺界有史以来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

迈克尔害怕任何矛盾，因而在结婚初期很纵容他的妻子。他给她画肖像

画，给她拍了几百张照片以满足她的虚荣。他们家屋子里的墙上贴满了伊丽莎白照片。在咖啡桌上堆满了以伊丽莎白照片为封面的杂志。但是这些敬意还是不够的，一个演员需要有多层次的爱，泰勒需要丈夫、孩子和双亲之外的爱。需要影评界以赞许表示的对她的爱。

这时她作为“替补”加入了斯蒂文斯导演的《巨人》剧组，与詹姆斯·迪安一起同台。迪安是马龙·白兰度之后电影界发掘出来的最精悍的人物。迪安拍完最后一场戏的四天后就在车祸中丧生，时龄仅二十四岁。当她知道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拒绝在他死后授予他在《无因的反抗》里的演出特别奖时，她再次发了脾气，“我不去参加颁奖仪式，”她义愤地说，“吉米是我们电影业里最杰出的天才，他是应该得到奥斯卡奖的，这些人不给他应得的荣誉，我也不给他们面子。”

当《巨人》发行以后，迪安成了英雄人物，对他的崇拜已远远超出了对他的祭奠。他那种耸耸肩以示反抗的动作在五十年代成为青少年模仿的对象。泰勒的表演也赢得了她长期梦寐以求的好评。《纽约先驱论坛报》写道：伊丽莎白所扮演的人物逐渐地衰老了，而她始终能保持那种优雅可爱的风度，这只会引起人们的敬佩与仰慕之情。《综艺》评论说：“过去，泰勒小姐的演技和情感变化的幅度似乎总是非常有限的。而这次她却作出了令人意外的满不错的表演，这在整部影片里随处可见。她既温顺又执拗，尤其奇怪的是，在影片的后半部，当她的头发开始灰白后，她演得比前半部更好，泰勒小姐似乎在扮演这样一位学会了适应各种不同社会环境的成熟妇女时，显得既漂亮又颇有吸引力。”

与此同时，她的情绪又是极为不佳的。她和迈克尔的婚姻正在崩溃，她对再次离婚感到苦恼，为自己独自一人没有男人而歇斯底里地哭泣。怀尔丁对妻子那种漫不经心、怠慢冷漠的态度感到羞辱。他对她说：“我们婚前最愉快的年月是当你需要依靠我的时候。我讨厌现在，我现在得跟着你转，现在我被遗忘在角落里。”伊丽莎白同时却说：“和迈克尔结婚五年之后，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用最适当的说法来说恐怕只是兄妹之间的关系。”

蒙蒂这时正好在好莱坞租赁了一幢房子，准备和泰勒合演《雨树县》（主演这部片子使伊丽莎白首次获得奥斯卡奖的提名）。他和怀尔丁夫妇一起度过了很多日子，不久之后便成了他们感情的裁判员。他们确实需要有发泄的渠道，而蒙蒂在将醉未醉的时刻也是个很好的倾听人。三人之间关系非常亲密，致使好莱坞许多人估计有三角关系。事实上，这种关系虽极为亲密，但丝毫没有性关系，蒙蒂是伊丽莎白和迈克尔相互争吵时使用的防护物，又是相互厌烦时用来调剂气氛的工具。

1956年5月12日怀尔丁夫妇邀请少数几个人参加他们家的周末宴会，包括《雨树县》的剧组人员和蒙蒂。蒙蒂喝得大醉时。反应迟钝起来，开车回去时一下撞在电线杆上，几乎车毁人亡。伊丽莎白听到消息后推开丈夫的阻拦，拚命冲出去，“啊，上帝！啊，上帝！……”见到失事的汽车后连声大叫。她听到蒙蒂从车内发出的呻吟声，就从后门爬到了他的座位上，把他的脑袋放在她的膝盖上。以后多少年她一直记得自己把蒙蒂血淋淋的头抱在怀中这件事，以致于蒙蒂1966年去世后，别人再提起他时，她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神经质反应，蒙蒂是她骨子里特别疼爱的人。当一群记者赶来后，泰勒用一种特别肮脏的语言阻止他们拍蒙蒂的照，“你们这些狗娘养的，”她说，“假如你们胆敢这样给他拍照，我就踢你们的蛋。不准你们靠近我，快滚开，

你们这些该死的杂种。”

这些记者被伊丽莎白喷出来的脏话给惊呆了，一步步向后退去。人们都很惊讶，世界上最美丽的面孔中居然也会喷出那种污秽不堪的语句来。

两个半月之后，蒙蒂才恢复工作。从这时开始，他吸毒酗酒成瘾，这个人也就几乎废了。

环游世界八十八天

环游世界八十八天是一部影片的名字，并不是我们的主人公真去做了恰好 88 天的世界环游。不过敏锐的读者应该由此感到某种高潮性气氛即将来临，这就是目前处于烦闷、抑郁、爱情伤感的低潮生活中的泰勒即将揭开生命史上高潮的一页，掀起新的波澜。在这里她的命运与一个颇有豪放气质的人连在一起。托德，一位五十二岁的有名的吸着雪茄烟的、西洋景片的制片人，这时正在拍《环游世界八十八天》，试图以此恢复他一生的财富。他准备选用五十位明星和六万八千八百九十四名临时演员，设计了七万多套服装，在十三个国家拍摄一部巨片，他要为美国电影史写下新的篇章。他采用一种命名为托德 A—O 的特殊摄影设备在伸晨至光学上无限远的特大宽银幕上，向观众展示迄今为止最为创新的电影场面。

当泰勒处于婚变的痛苦状态时，她灰心、绝望，感到恐怖与孤单。托德起初以一种慈父般的心情谈到她：可怜的孩子，她需要有人来照顾她。他感到自己应该保护她。

不久《展望》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描绘泰勒如何能够不惜一切，竭尽全力地把她所追求的东西弄到手：“当她缠住一个人，设法使他同意某件事时，她会用低低的甜甜的声调，说出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各种各样的、像鸟叫般的话语，她会咕咕地叫、咯咯地叫、吱吱地叫。她也会轻快而有节奏地笑，并发出期望的颤音。”

托德读完这篇文章后打电话给伊丽莎白说，他最近见到她几次，每次她都是哭哭啼啼的，“让我听听你像一只鸟似地咕咕、咯咯、吱吱地叫，好不好？”

泰勒笑开了。托德就是这样开始了他的一系列使她高兴的电话。接着就是托德提出要和她结婚，“可是我们连手指都没有碰过，”伊丽莎白简直有点儿受宠若惊了。此时托德的未婚妻正戴着他的订婚戒指等着圆梦呢！可怜的人儿还蒙在鼓里。

当时泰勒和蒙蒂正在拍摄《雨树县》，每周末都有一架包机把她从外景地接到纽约，前往托德在中央公园大道的楼顶公寓里与他欢度周末。蒙蒂也象他为泰勒和怀尔丁跑腿一样，现在又为托德与泰勒跑腿。

这种“友谊”在 1956 年作为新闻传遍全世界，待泰勒宣布说：“我爱迈克·托德，热情地爱他，极为热烈地爱他，”报纸上的标题就更大了，使正在瑞典拍片的怀尔丁很窘迫。迈克尔一直到最后仍然十分通情达理，他对妻子未加阻拦。他说：“勉强挽留她没有任何好处。不是迈克·托德把她偷走的，没有必要。在她和迈克开始往来的前几个月，我们的婚姻已经完了。”

米高梅目睹它的大明星被大肆渲染的婚外生活，只得宣布泰勒和怀尔丁即将离婚。而托德那个可怜的未婚妻也迅速垮了：“使我感到万分痛苦的是我自己早该想到这一招。”

泰勒拍完《雨树县》就飞往纽约。现在情人是最重要的，事业、孩子被抛在一边了。泰勒要向托德表明，她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演员。

托德本来是忌讳演员妻子的。泰勒为了证明自己不朽的爱情，决定宣布息影：“我要成为迈克式男人的女人。家庭、丈夫，一个真正的家对我来说重要得多。”这类话已不止一次了，对波利、希尔顿、怀尔丁她都冲动而虔诚他说过了。象她这样的女人充满了火热的人生激情和对男人的强烈欲望，无穷的需要，她可能疯狂地想干许多自认为“带劲儿”的事。然而对于一门较为严格和具有自身特点的电影艺术来说，她确实很少认真去追求。至少，艺术的成就感（不包括荣誉和获奖之类结局）、神圣的尊严、价值这些在很多严肃的艺术家心目中视为终极目标的东西很难进入她的芳心中。我们当然不能够责怪她，甚至怀着偏见。因为追求艺术与追求人生的模式一样，“自由”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东西。

托德未来的丈母娘刚开始知道女儿的这种发烧行为时着实震惊了一阵，但最后还是被迫接受。她原谅了他的鲁莽行为和粗俗的笑话，他毕竟非常有钱。这位托德原名阿夫洛迈德，七岁时在街上给人擦皮鞋，每次五分，还偷雪茄烟卖，每支三分。八岁的时候帮别的小贩叫卖低廉的手表，五美元一只。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玩越来越大的骗局。后来更名托德，作演出商。他说：“我写不好字，却有自知之明。我认为应该给顾客们最通俗的表演，女人和喜剧，高级女人和低级喜剧，这就是我的宗旨。”待他碰到泰勒时，已曾两次破产也随之两次离婚。现在拍《环游》一片，用朋友的话说是迈克向世界报复的办法，向所有的人表明他又一次东山再起，他又重新拥有他在经济上、社会上、专业上所失去的一切，而最大的收获则是泰勒。

五一劳动节，他花九万二千美元买了一个 29.7 克拉的钻石戒指，把它送给伊丽莎白，记者还以为是一个拍戏用的假首饰，象个熟鸡蛋似的。

10 月 17 日晚他们将订婚仪式和杰作的首映式同时举行。报刊文章的大肆吹捧使这两件美事锦上添花。在娱乐性行业中，没有人曾拍摄过如此规模宏大的影片，熟知影坛内情的人也不知他是如何弄出来的。

托德这部片子包揽了 1956 年的全部电影奖，象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全国评论委员会奖和纽约影评界奖，又获得了特丰的票房收入。他洋洋自得地吹嘘说：“我要让一切人都变成叫花子，现在我得想出一个办法来花掉这笔大钱。”

他一向有铺张奢侈的癖好，现在则更推向高潮，他花大笔钱购买豪华游艇和庄园，把每个星期六都视作必须庆祝的二人相识纪念日。托德又送给泰勒各种名贵首饰，服装。泰勒说：“迈克是世界上最具有刺激性的男子汉。他送我的礼物，我挡都挡不住。”两人也大肆地公开进行各种形式的情爱活动，引起人们的喷叹。由于伊丽莎白未婚已先孕，把这对鸳鸯急得不行。怀尔丁这优雅的绅士也讲义气地迅速配合他们办理离婚手续以成全他们的美事。1957 年 2 月他们举行了婚礼。托德对这位娇妻百般宠爱，他不象别人那样只是说说而已，他将她当一个真正的公主那样对待、装扮。他使伊丽莎白感到的美貌甚至超过了她实际的模样。泰勒不久又剖复产生出一个小女儿，使欣喜若狂的父亲遍世界到处张扬，甚至夸海口说为了感谢妻子的功劳，他想把泰姬玛哈陵买下来送给她，如果他们出卖的话。

这时托德又动员泰勒在《热铅皮屋顶上的猫》里扮演玛吉，指望这可能得到奥斯卡奖。这是田纳西·威廉斯的戏。泰勒也喜欢扮演被性欲驱使得活

象热铅皮屋顶上的猎那样的女人。她在戏中扮演一个诱惑力很强的妻子，她想方设法要让那个搞同性恋的丈夫使她怀孕。在所有卧室的场景里都需要穿一件富有挑逗性的带花边的肉色缎子衬裙晃来晃去。拍这样的片子，自然使得导演理查德·布鲁克斯再度顺便地巫山云雨一阵，他们曾有几这样的合作。

托德这时感到特别幸福，有那么精美的妻子和女儿，还得了奥斯卡奖，再次成为巨富，且名扬天下，鼎盛时期的他似乎又感到有某种不祥的事在等着他。乐极生悲，在他乘飞机出席一个专为他举行的盛宴时狂风暴雨使他化为灰烬。泰勒那次仅因患感冒未同去，他乘坐的那架飞机名叫“幸运的丽丝号”，这次特别不幸，使泰勒饱尝了失夫的巨痛，在痛不欲生之中她受到了各界朋友及美国总统和夫人的慰问。其中托德的挚友埃迪·费希尔——美国最走红的歌星的关怀和慰安最特别。

在悲痛中，泰勒断断续续地拍完了《热铅皮屋顶上的猫》。泰勒和托德这两个神经质天才洋洋洒洒地在全世界搅和了一大通后终于剧终人散。

托德去世后，浑身躁动着欲望的泰勒就在最亲密朋友费希尔的慰藉下找到了新的寄托和归宿。

埃迪对托德象父亲一样崇拜。托德之死使他和泰勒一样感到若有所失。因此二人相互安慰也是自然的。埃迪三十岁生日时，伊丽莎白送给他一件礼物：她以前送给了托德的钱夹子。埃迪也对泰勒神往：“伊丽莎白的那双眼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她那双眼睛炽热地燃烧着我的心。我从心里感到她需要我，我的感情和她一样。”

埃迪夫妇的婚姻本来已处于崩溃边缘。当报纸上披露他和泰勒的恋情时，举世哗然。埃迪的妻子成为国际同情的对象而泰勒受到大众的嘲讽：因为她刚丧夫不久便成了第三者。

泰勒不断辩解：“幸福的婚姻是破坏不了的，埃迪从未爱过戴比，现在也不爱她。”“迈克已经死了，我还活着，你要我怎么做，一个人睡觉吗？”有关这类报道把金门马祖问题的全国性辩论都从头版挤出去了，甚至连总统顾问因收受一件皮大衣而辞职的消息也被这桩美国最受宠爱的歌手和受欢迎的翘鼻子女演员及世界上最美丽的寡妇之间的三角恋爱消息所压倒而成了次要消息。

米高梅公司利用这一丑闻的轰动效应发行了《热铅皮屋顶上的猫》，银幕上主角那狐狸精一样引诱丈夫的形象使此片在米高梅历史上成为最卖座的影片之一，这是一种免费的宣传带来的意外收获。泰勒也第二次获奥斯卡提名，同时进入最卖座的十大红星之列。美国影院所有者协会授予她“本年度红星”奖，但是由于她日益臭名远扬，该协会慑于公众舆论，重新审慎考虑后最终表决收回该奖。

现在泰勒和埃迪又不顾一切地开始了他们的浪漫故事。当这位歌手在台上的表演引起轰动时，情不自禁的泰勒惊呼着投入他的怀抱：“啊，宝贝，你唱得棒极了！”一个记者揶揄道：“不对，是你太棒了。”

埃迪在得到离婚证书三个小时之后与泰勒举行了婚礼。于是满堂名流，一片哗然。大家象观赏一部N集的电视连续剧一样兴致勃勃。每一集都庄重华丽，令人大饱眼福。美艳夺目的主角新娘在每一集的高潮中都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要息影，一心一意当妻子和母亲。”专栏作家路瓦克第二天便发表文章攻击：这是托德死后：才五个月便发生的私通行

为所导致的结局，“这种公开破坏别人的家庭，无视居孀与婚姻等普遍信条，尤其无视女友间亲密友谊的行为，居然在教堂里大肆宣扬并为之树碑立传，实在有伤大雅。”

迈克斯·勒纳这位政治专栏作家则在《纽约邮报》上发表文章支持他们：“坦率地表示喜悦，总比伪善地表示贞洁要好得多。如今我们的世界上有许多人已变得如此淡漠，因此对于这种公然的赞美感性生活行为，我甚表赞赏。”埃迪夫妇深为勒纳的义举所感动，泰勒感动得像得到了真正知音的关怀。这位五十多岁的教授完全被泰勒所俘虏。泰勒从此和他又别有一段浪漫情史。

伊丽莎白婚后又拍《去夏突至》。这部片子对所有参加者都是一次精神折磨。它是根据田纳西的独幕话剧改编的、阴暗残忍的影片，描写同性恋、同类相食和精神病理学。蒙蒂、凯瑟林·赫本等绝大部分剧组人员都和剧中人一样充满了恐怖与恶劣感。泰勒的表演获得了影评家的高度评价，认为是空前杰出的。因此，她和赫本一同被提名为奥斯卡奖的候选人，这已是第二次了。

米高梅公司又强制泰勒主演《巴特菲尔德第八》，因为她想去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主演“埃及妖后”。显然这个形象比百万美元的酬金的吸引力大多了。如果说泰勒的事业感的话，对这个角色的角逐（仅仅是米高梅放不放人走的问题）可以谈得上。

最后她不得不留下来拍片，在打打闹闹中，拍完了影片，她又患了一次重病，差一点丢了美丽的生命。死亡冒险反而使她获得全社会自托德去逝后的首次善意关注、同情。大难不死带来厚福，她因在《巴特菲尔德第八》中的杰出表演而一举夺得1960年奥斯卡影后桂冠。

动完手术后休养时勒纳又来到她身边，她那时已对费希尔感到厌倦了。伊丽莎白对勒纳的专业地位颇以为荣，说他是智力方面的托德（如果从维持感情的忠贞方面上讲，不幸的托德却以善终，这是泰勒8任丈夫中最特别的），也是她认识的人中学术地位最高的人。她把与勒纳的关系比作索菲亚·罗兰和卡洛·庞蒂的关系。

勒纳给予泰勒的，正如阿瑟·米勒给予梦露的，是一种荣誉感，使她感到有这么一位在事业和学术上远远超出票房价值的学者爱她，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抬高。这是一种完美的肉体 and 智力的相互补充，一种理智和肉欲的结合，勒纳和米勒一样，都比对方老，根据传统标准看也并不怎么英俊，然而他们都得到了他们那个时代最美丽的女人。

泰勒在两性问题上那种肆无忌惮的冒险行为以及她的死而复生的传奇经历大大抬高了她的票房价值，使观众对她的一切所作所为更寄以莫大的兴趣和密切的关注。为此濒临倒闭的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指望她能起死回生，于是痛下血本拉泰勒主演《埃及妖后》，这家公司把宝押在她身上，对她唯命是从，异常慷慨。最终耗资四千万美元的片子以两件事闻名于世，其一是搞垮了一家大影片公司，其二是开创了影坛上最著名的丑闻。

“狂与髓”或安东尼与克里奥贝特拉

应该说连续剧的这一集将有更精彩的节目。这倒不是古罗马时期大统帅安东尼和埃及女王那段辉煌的历史故事充斥了泰勒的新生活，不，她没有沾

历史多少光，也没有依靠历史名人来为自己壮色。她自己的生活色彩已经是大红大紫的了。尤其是现在，当她经历了低徊咏叹、缠绵悱恻（相对于托德那种洒脱的硬汉子而言）的费希尔阶段后，又以更大的欲望和胃口投入新的剧情中。

《埃及妖后》一片赫赫有名，其实这片子倒真是沾历史的光。对观众来讲，一是满足眼福，欣赏到国色天香：不知女王和泰勒哪个更美，也不知究竟谁为谁增添了魅力。二是可以获得一种史诗般的刺激和享受。片子在拍摄过程中及以后的各种副产品倒是落下久久的话题。

男主角理查·伯顿，这位威尔士演员有“英国的马龙·白兰度”和“穷人的劳伦斯·奥利佛”之称，1961年在百老汇主演《加米洛特》一剧中的亚瑟王获得“托尼最佳演员奖”。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以三十万美元高价将他买进《埃及妖后》。

开始，新闻代理人颇为担心他被泰勒的光辉遮住了形象。他却轻松他说，“别担心，我会照顾自己。”朋友们又笑他可能被泰勒抓到手，他也连称不会，当然这完全是没有用的话。对他来说，绝对是本性难移，大家都知道他素以和女主角发生韵事著称。而泰勒在片子开拍时也宣称要成为伯顿唯一弄不到的女主角。她在心里还是有些胆怯：伯顿被认为是巨大的天才，是著名的莎剧演员。她认为此片女主角是所有女主角中最了不起的一个，也坚信这部片子是最重要的片子，在曼凯维茨（《去夏突至》导演）的执导下，她将作出最精彩的表演，也可能再获奥斯卡影后奖。导演也对她极推崇，认为她是世界上唯一的人选。泰勒对女主角的认识仅仅来自于一本普及读物。但她还是有一种较深的认识。导演认为她和女主角有相同之处。她解释说，托德对于她，就象凯撒对于克里奥贝特拉，凯撒死后，克里奥贝特拉被安东尼所吸引，正如托德死后泰勒被费希尔吸引二样。

当然对于女主角的最大“理解”是如何向制片人员提出各种各样奢华、铺张的生活条件以及无穷无尽的周到服务；在各种各样的酒宴作乐中分散了对丈夫的注意力，而心甘情愿地受男主角直接和间接的引诱、挑逗：“我承认我对这个男人是非常崇拜的。”他非常爱喝酒，泰勒现在也是这样，两人在一起更是相互感染，再加上他不露声色地劝和灌。等这位先生喝醉了酒之后便开始用洪亮的声音滔滔不绝地朗颂莎剧对白。泰勒夫妇着魔般地坐在那里听，别人厌倦了，泰勒感兴趣。这个满脸痤疮和斑痕的男人对女人确实有一种无法拒绝的诱惑力。现在又把能量往泰勒身上使。而他的妻子司空见惯只好忍气吞声，她知道这不过是和他对所有女主角一样活动他的男性神经而已。她知道他需要这种韵事来证明自己的魅力。这种戏过后，丈夫又会完整地归来的。这回她彻底地失算了，泰勒的力量超出了她的想象。

这两位主角迅速相互爱慕起来。假戏真作。她感到在他迷人的外表下，同样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怒火和寂寞的哀愁，似乎包括了爱过的男人的一切特点：和希尔顿一样富有、和怀尔丁一样机敏无常与幽默，和托德一样精力充沛、运筹帷幄。既象马翰森那样追求肉欲，又象勒纳那样才思敏捷，还象辛纳特拉和费希尔那样甜密可爱。泰勒在拍摄现场承认：“光听他的声音就足以使我达到情欲高潮。”伯顿也对泰勒着迷，“她用那双眼睛对你一看，你的血液就会沸腾起来。”

敏锐的记者向全球披露了这种惊人的消息，这种消息使赫鲁晓夫的有关报道都被从第一版踢了出去。蒙哥马利怀疑伯顿想以泰勒的名声及这种韵事

造成自己的轰动效应。伯顿确也一夜之间声名大震，身价翻番到 50 万元。

由于双方的配偶采取了很多措施，他们两人的事就更加曲折。但还是没能阻止住他们的浪漫故事朝前发展。除去罗马教皇去逝的噩耗以外，这是多年来发生在罗马的最重大新闻。《埃及妖后》一片得到空前广泛的宣传。各界都对此大加抨击、谴责。费希尔利用这一丑闻每天晚上到夜总会上演唱以追求一种特定的轰动效果。泰勒知道后马上要求与他离婚。由于伯顿对妻子和泰勒都爱，泰勒使出看家本领对他展开全身心攻势，她一生追求的主调可不是演员形象。似乎是人们（母亲、制片人、观众）把她簇拥上了银幕，操纵了她的演出活动，而她又驾驭着男人的感情，在情欲场上是一个特别主动的杀手，成功、失败，不断循环。

《埃及妖后》上映后，受到影评界一片围攻，满心想拿第二次奥斯卡奖的泰勒一无所获。

但她却得到了习惯性的收获。尽管有各种阻力，她和伯顿还是走到一起了。临行前，她将埃迪贬为前夫的非常差劲的化身，说这四年的夫妻生活使她在婚姻和感情上完全死去。只有同伯顿相遇才使她完全重新活起来，“他就象那位可爱的王子一样以一吻唤醒了沉睡的公主。”

1964 年 3 月，伊丽莎白迎接了她的第五次婚礼。尽管两人不道德的丑闻遭到全世界的非难，但观众还是对这两位天才演员十分好奇。1964 年伯顿扮演哈姆雷特获得空前成功，他们获得了大笔收入，不仅从丑闻中挺了起来，且得到很高的专业地位。1965 年伯顿终于跻身于美国票房纪录最高的十大影星之列，此年泰勒仅次于伯顿。在公众还对那桩丑闻记忆犹新的时候，伯顿夫妇两人的票房价值持续不衰。泰勒感慨他说：“成功是最好的除臭剂。”

制片人厄内斯特又邀伯顿夫妇联袂主演《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前他想让这位红极一时的美人扮演一个体态臃肿、语言污秽的浪荡女人的想法受到同行们的一致嘲讽。现在泰勒读了剧本后竟大加赞赏。剧中人语言粗鲁、污秽、性描写十分露骨。泰勒试用了 8 种不同的化妆方法最后才达到导演要求的那种臃肿、邋遢的效果。拍这部影片过程中伯顿夫妇相互折磨、蹂躏的暴虐行为又渗透到他们本来已十分粗暴的生活状态中。这种生活正在摧毁他们的婚姻。

1966 年《谁害怕》公演，这部影片由于包含有极不健康的语言和形象，成为最早的少儿不宜片，竟然也得到天主教会的接受，因为它是悲剧现实主义的范例。泰勒的表演达到了影坛生涯的高峰；夫妇二人都获得了几个权威学会颁发的奖项。1967 年泰勒又以此片再次荣获奥斯卡奖。

盛极而衰，1968 年起泰勒从十大票房收入最高的影星宝座上摔下来。二十多年来泰勒一直扮演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这一类角色，塑造了一系列阔小姐的迷人形象。拍完《谁害怕》之后，她塑造了一个新的形象，那种充满醉意的大笑和带有影射的台词使她成为银幕上最典型的泼妇。

在银幕上黯然失色后，伯顿夫妇不甘寂寞，又制造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生活喜剧来引起世人关注。伯顿为泰勒买了一系列昂贵的钻石及饰物，特别是泰勒毕生收集的珠宝中的王冠——价值一百零五万美元的钻石，重 62.42 克拉，这是她梦寐以求的有史以来拍卖的最昂贵的珠宝。《展望》杂志嘲讽她是一位贪得无厌的衰落皇后。有人说她象一个发了横财还把所有的财宝都背在身上的女人。

最使人们关注的是他们的婚姻游戏。1973 年他们在事业上落伍，个人生

活中更是充满了争吵、痛苦和凄凉，他们当初名噪一时的婚姻就在阴郁的气氛中解体了。

此时 40 岁的旧汽车商温伯格和马尔他广告商达梅宁填补了她的生活空白。在泰勒的数次婚姻以外交往的情人中，醒目者多达数十人，而每场游戏都别有风味。对泰勒来说，各种粗俗的、优雅的绅士、贵族、显要或平民——这些人都使泰勒有一种新鲜的感觉；使她在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感到充沛的欢娱和舒适的满足。虽不象托德、伯顿那样深入骨髓，也有他们取代不了的温馨、轻松。泰勒既是一个虐待狂，也是一个受虐狂，太宁静了她受不了。对于这些具有正常人胃口的情人来说，泰勒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对象。

参议员夫人

泰勒进入低谷时期，但她低而不沉：沉而不寂。银幕形象衰退了，但她还有更广大的空间，一个更诱人的舞台。作为一个女人，她是人们心目中的一颗不落的明星。人们高兴将她捧成一个神，她仍然对人们有极大吸引力。

象这样的轰动明星，走到哪里都能掀起狂热的波澜。与伯顿离婚、与温伯格等情人分手后，她走进政治明星的圈子里。通过基辛格夫妇，她认识了漂亮迷人的伊朗大使沙海迪。她来到首都与他约会时，这座曾被约翰·肯尼迪形容为一个昏昏欲睡的南方小城的城市被泰勒的到来惊醒了，并且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她就象克里奥贝特拉女王抵达罗马一样降临在华盛顿，”一家报纸惊呼道。她与大使的情爱迅速就提到婚姻的高度，这竟然惊动了伊朗国王。国王对这个信犹太教的平民十分介意且棒打鸳鸯散。泰勒又结识了 49 岁的前海军部长约翰·华纳。这个多年想当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的人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两人又迅速互相爱慕起来。尽管他很担心泰勒的名声中那些受人攻击嘲讽的部分因素可能影响到“的政治前途（选民们在狂欢时的态度与填选票时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但他还是无法抵御情爱游戏的魅力。谈起政见和政治生活模式，二人的差别很大。泰勒有些激进的民主党的倾向，尽管此时还不是美国选民（为了和伯顿保住巨款免交高税，二人脱离了美国国籍），但还是锋芒毕露。1960 年华纳为尼克松竞选大效犬马之劳时，泰勒投了肯尼迪的票。1976 年华纳为福特助威，伊丽莎白却支持卡特。象简·方达这样的激进人士泰勒非常崇拜。但他们夫妇二人在共同竞选那个参议员席位时竟然处理得象一个生活的细节问题那么和谐。这里当然有泰勒极想当一个荣耀的参议员夫人的欲望牵制因素。她最终如愿以尝。当人们为这一对竞选者欢呼时，大家都看到，目标是冲泰勒而来的，她在讲坛上的魅力有如银幕上一样。政治讽刺漫画称华纳为“参议员伊丽莎白·泰勒。”

1976 年两人结婚时（这是泰勒的第七次婚姻），新娘的名字已变成一条长龙了：伊丽莎白·泰勒·希尔顿·怀尔丁·托德·费希尔·伯顿·华纳。这名字依然是各大小报刊的大字标题新闻内容。政治上她为共和党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认为是艾森豪威尔以来共和党人中最了不起的人物。一个习惯于灯光、照相机和演戏的演员转向政治是很自然的，对泰勒来说也是轻而易举的。她知道名声的价值，这是丈夫最大的政治资本。只要克制一下她的冲动、调整某些策略、掩饰某种政见，她就会变成一个天才的政治演员。当然她是本性难移的。与华纳的生活模式和政见差别最终使她感到无聊、压抑。在参议员夫人的新鲜味过去以后，她又回到原来的行当里去。同时第七届婚姻也

被抛之一边。

在演艺圈子里，人们现在称她为“失去使用价值的珍奇古玩”。

1980年她主演《小狐狸》一剧。这是一出好几个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演员演出了名的戏。她大胆地走上百老汇舞台可引起了人们的惊诧。这是需要勇气的。她说：“我想给这个角色以新的特征。她是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女人。她确实是杀了人——但同时她也在对人们说‘对不起，伙计们，是你们把我逼到这一步的！’”

她首次登台引起的瞩目使剧场的票房纪录高这一百万美元。有人感叹道，人们想去看看泰勒的心情就象去看华盛顿纪念碑的心情一样。在伦敦，她创造了戏剧界有史以来预售票的最高纪录。当然报纸上也充满了各种各样尖刻的评论，连同她那衰亡的第七次婚姻。

《小狐狸》剧组来到华盛顿时，里根夫妇高高坐在总统包厢里也能清楚听到观众们对这个昔日以其无暇之美为二十世纪的美国确立了完美标准的女人走上舞台时发出的惊叹声。

戏剧的最后一幕中，女主角——美国戏剧史上野心勃勃的最大阴谋家——对濒临死亡的丈夫说：“我是有福气的，贺拉斯，从来都有福气，我还会再走运！”入迷的观众突然体验到一阵热血的冲击。大家明白，这同时也是对演员自身坎坷经历带来的悲欢的一种超度和升华。她的生命力为千万人带来希冀，也带来巨大感染力。是的，她是幸运的。整整三十多年来，这位美丽绝伦、名垂史册、福星高照的女人不仅完全以自己的力量赢得世人的赞美，而且勇于向传统的道德观念挑战，迎接更宏观的时代标准的裁决。

“我是幸运的。过去这样，今后也一样。”这是泰勒在舞台上的自信的宣言。

她是好莱坞鼎盛时期明星制度造就的许多大明星中最后一颗明星，一个活着的传奇历史人物，当与她齐名的繁星早已纷纷陨落之后，她还顽强地放射着光辉。

天生丽质难自弃： 玛丽莲·梦露

六十年代初，美国大众传播网排出一张名单，列举最受欢迎的十位名人，遥遥领先占第一位的，是玛丽莲·梦露；当时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只屈居第二位。

根据梦露的身世，人们把她说成“悲剧的主角”，而在电影里，梦露总是演喜剧，也有意识地以喜剧演员的身份说话行事。

有的人则把梦露看成“性感的象征”。其实，梦露是亲切的、纯真的、极具女性魅力的演员。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这位从孤儿院出来的姑娘红透整个好莱坞，使多少爱慕虚荣的女孩子羡慕；而她在三十六岁的风华之年突然自杀身亡，更是引起巨大的轰动，致使万千影迷困惑不解。

不知生父是谁

好莱坞的中心，有家电影胶片显像所，是一流的企业，生意颇为兴隆。还在无声片时代，1925年，显像所里有个女工，叫葛蕾迪丝·梦露·培克，按照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或雷电华影片公司的要求，剪接负片。当时，葛蕾迪丝正同该所的汽车司机斯坦利·吉弗特相恋。

1926年6月1日上午九时三十分，葛蕾迪丝在洛杉矶综合医院生下一个女孩，是个没父亲的女孩，所以姓母亲姓，叫诺玛·琼·培克——这就是后来的玛丽莲·梦露，梦露是她母亲娘家的姓。

外祖父是汽车工程师，精神失常，总自称是门罗大总统的子孙；外祖母黛拉神经也不健全，发作起来十分剧烈。母亲葛蕾迪丝可能有些遗传，常常给收容到精神病医院，在小诺玛五岁的时候终于住进了精神病院，据说，母亲葛蕾迪丝长得很美，颇象无声片时代的影星诺玛·塔尔玛吉。斯坦利·吉弗特同她相好了一阵，便把她遗弃了。

关于梦露的生父，母亲推说在她出世之前因车祸已经去世。等梦露长大以后渐生疑窦，当了影星之后，打听到地址，曾打过电话。接电话的是父亲的后妻，回答了一句话：“有话去找律师说。”这个答复，似乎对梦露刺激很大。在玛丽莲·梦露去世的前一年，吉弗特曾到洛杉矶给梦露打过电话，梦露也用同样的话回敬，不想见面。

高中时代，每当同学嘲笑她是私生子时，她便反驳说：“我呀，是克拉克·盖博生的。”后来，她同这个想象中的父亲，克拉克·盖博，合拍了《不合时宜的人》，成了两人的遗作。

玛丽莲出生后不久，母亲把她托给了一家私人托儿所，在外祖父母家对门。一天，外祖母黛拉从精神病院回来，突然把小诺玛接回家，用枕头堵住她的嘴，要把她闷死。小女孩拼命挣扎，好不容易才免于死。此后黛拉给送进精神病院，由于兴奋过度，引起心脏麻痹，不治而死。那时，小诺玛只有十三个月。有人说，玛丽莲后来得知险遭闷死一事，便得了睡眠恐怖症，开始服用安眠药。

七岁那年，母亲出精神病院，诺玛便和母亲一起住。葛蕾迪丝在好莱坞附近租了一套房子；一半转租给一对英国夫妇。可是，好景不长，还不到三个月，葛蕾迪丝又发起病来，给抬进精神病院。那对英国夫妇便负起照顾诺

玛之责，约有一年光景，后来回到英国去了。诺玛辗转寄人篱下，最后进了洛杉矶孤儿院，穿上灰制服，在那里开始上小学。后来，1960年4月，梦露在接受法国一家杂志社采访时曾回忆说：

“晚上，别的孩子睡了，我站在宿舍的窗子前流泪，因为在远处的屋顶上，看到雷电华影片公司的霓虹灯招牌，我母亲就在那里做影片剪辑工作。曾几何时，1951年，我在雷电华公司拍《夜晚的撞击》，曹爬上屋顶，想看看能不能瞧见那孤儿院。但这段时间里造出许多高楼，目光被它遮断。不记得在哪儿看到的，说孤儿院里，我们三四个人一间房。这是瞎说。我们一间宿舍，床铺有二十五张上下。谁表现好，可以往上挪，从一号床升到二十七号床；二十七号床，是荣誉床。换到二十七号床，如果乖巧懂事，就有希望搬到另一间宿舍，床要少一些。

在孤儿院，每天六点起床，上学之前得做好些杂事。我们每人一张床，一把椅子，一个柜子。所有器物要保持干净，擦得发亮，以防上面突然来检查。有一段时间，我打扫宿舍，每天挪动床位，扫地，掸灰尘，收拾浴室。我在厨房里也帮过忙，主要是洗碗。我们有一百个人，要洗一百付盘子、汤匙、叉子……没有刀和玻璃杯：各人有洋铁杯。只是在厨房帮忙，可以挣点零用钱：每月五分。但星期天上学，要扣去一分。如果一个月只有四个星期天，到月底还能剩下一分。这一分钱，省而又省，积到圣诞节，可以给好朋友买件小小的礼物。

在孤儿院，我得了口吃的毛病。进院门那天，人家强拉硬拖，我又哭又叫，到了大饭厅，突然看到上百个吃饭的孩子，眼瞪瞪地看着我，我一下子愣住了，这或许是一个理由，再加上母亲的事，孤儿的称呼，等等，总之，我开始期期艾艾，说不连贯。后来倒过去了。到上中学，又发作了。班上选我做英文课代表，每次报告上一课的情况，我就格格不吐……即使现在，只要心里一急，或过分激奋，也会发作。”

她去世前一年访问墨西哥时，曾向儿童福利部门捐了一笔款，说：我在孤儿院住过，知道吃不上早饭饿肚子的滋味。

诺玛出了孤儿院，住过几家亲戚家，这些亲戚无非看中政府按月拨给的那笔养育费而已。据说，她在十岁时曾给亲戚家一个老人欺侮过。

几经流落，诺玛还是回到母亲的身边。这时，葛蕾迪丝刚同一个比她小十岁的，名叫埃德温·戈达的工程师结婚。这是葛蕾迪丝的第四次婚姻。诺玛这时已上高中。因继父对诺玛不怀好意，住在附近的安娜姨妈是个狂热的信徒，见诺玛可怜，便领回到自己家里住。是她，第一个给了诺玛以人情的温暖和爱护。从诺玛十一岁起，直到姨妈七十岁死去，彼此关照、交往了十二年。

美色丽质初长成

诺玛年满十三，已长得珠辉玉立。男孩子总以别样的眼光看她。女孩子则暗暗生妒，怪她坏事，是侵越她们的“捣蛋鬼”。她到哪里都引人注目，是个惹事的少女。

诺玛不爱学习，功课大多不及格，高中只念半年就辍学了。不过，她男朋友不少，每星期都换。其中有个叫詹姆斯·多尔蒂的青年，就住在母亲家附近。母亲和安娜姨妈都想叫诺玛早些结婚，诺玛自己也不愿再过流落不定、寄人篱下的生活，所以，虽然没有多少爱情，还是接受了詹姆斯的求婚。诺玛十六岁的生日刚过三个礼拜，于1942年6月19日，与詹姆斯举行了婚礼。

詹姆斯在洛克希德航空公司有份工作，收入不错，两人新婚燕尔，卿卿我我。那时正值二次大战期间，詹姆斯应召去圣卡塔利娜海岛军事基地任体育教练。那段时间，生活尚算安定，但周围那群大兵，对诺玛个个馋涎欲滴，

而诺玛则 穿了游泳衣，招摇过市，卖弄风情，惹得詹姆斯大为光火。过了二年，詹姆斯奉命调往澳大利亚，派在军需运输船上。诺玛则回詹姆斯老家，同婆婆一起到军工场本本份份地干活，包装降落伞和涂绘标志。

当时，军队里有个叫戴维·康纳弗的摄影师来到工厂，一眼看中风骚肉感的诺玛，给她拍了一些照片，被不少士兵剪下贴在墙上观赏。戴维·康纳弗觉得她非常上照，适宜做摄影模特儿。诺玛言听计从，让康纳弗把她介绍给模特儿经理人艾梅琳·施奈普莉女士，开始接受正规模特儿训练。

于是，诺玛的照片，陆续披露于供男性阅读的杂志上。她曾和摄影家安德烈·道定滋一起漫游西部将近一个月，拍了不少野外照片。当时这些照片，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健康，比较含蓄，略带羞涩，同后来人们心目中的玛丽莲·梦露的形象，相去颇远。头发的颜色也不是金黄色，而是近乎茶褐色。

在模特儿中，诺玛开始小有名气。施奈普莉女士的训练相当全面。作为一个模特儿，仪表举止，至关重要，然而，首先还在于本人喜欢，肯于钻研。这时她赚的钱，远比在兵工厂挣的丰厚。广告照片、月份牌……兵营的墙上贴满她娇媚的芳影。有个连队称她为“喷火小姐”，一些士兵说她是“可以化开阿拉斯加冰川的热情女郎”。同一个月份里，五家杂志竟相登载她的大幅玉照。有张登在杂志上的照片，正好给雷电华影片公司经理霍华德·休斯看到。他因航空事故在医院休养。诺玛当时和丈夫詹姆斯偶有书信往来，对诺玛说来，她受不了詹姆斯那种嫉妒忌、好生气的脾性，便一个人上里诺办了离婚手续，那时她才二十岁。这是 1946 年的事。

霍华德·休斯培养出不少明星，有的成了他的情妇，如珍妮·拉瑟尔，金·哈罗等。他当即同施拉普莉女士商量，可是施拉普莉却同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做交易，权衡利弊得失，把诺玛让给了福克斯影片公司。

诺玛从影，是由第一流的权威，沃尔特·兰格导演。雷昂·尚洛伊摄影师等人进行考核的。福克斯影片公司副经理达里尔·弗·扎纳克同诺玛签订的合同，周薪定为七十五美元。本·莱安给她取了一个艺名，叫玛丽莲·梦露。

于是她开始在摄影棚里学习演技，接受训练，拍了无数照片。尽管她十分热衷，全神贯注，但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只把她当摄影模特儿使，并不想要她当演员。虽然上镜头考核时，尚洛伊说她“别有一功”，但沃尔特·兰格认为她没有演戏的才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之所以同她签订合同，并非要把她培养成明星，实则为了不让雷电华公司的霍华德·休斯把她挖去。

福克斯影片公司既付给了她工资，后来就叫她拍电影。不过，她在处女作《斯库达，嚯！斯库达，哎！》中的镜头，剪辑时大部分给扔进了废纸篓。她在第二部影片《危险的年纪》里，也只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然而，福克斯影片公司的老董事约瑟夫·显克态度却不同，老家伙年纪已过古稀，看起玛丽莲来一双眼睛还是色迷迷的。梦露同福克斯公司一年合同期满之后能转到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全靠老显克出力。

在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玛丽莲在《歌舞皇后》中所饰的角色，仅次于主角。这是好莱坞第一次把她作为一颗新星推上银幕。她尽了最大努力，的确演出了水平。不过，在哥伦比亚公司也只拍了这部片子。

裸体照风波

延捱时日之际，玛丽莲又重操旧业，做摄影模特儿，同时四处奔波，寻找拍片机会。有一次拍摄时间较长，汤姆·凯利提议为她拍裸体照，她接受了，因为不觉得有什么难堪，何况还能多挣点钱。具体他说，是五十美金。她一辆车撞坏在修，正够她把车取回来。她入不敷出，到期没钱交房租。据说，她当时曾说：并不是“什么都没穿……而是穿了收录机播放的音乐的。”那是1949年的事，当时在美国拍裸体照，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张遇逸闻名的照片过了几年才面世。为此，石油公司颇遭一些妇女团体和宗教组织的非议。那时玛丽莲开始小有名气，很可以弄得她下不了台；人家要她予以解释，她坦然道：“为了要填饱肚子！”叫人也无可奈何。拍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汤姆·凯利说，她的形体，堪称理想，无论从哪个角度拍，身段都十全十美，无与伦比。不久，福克斯公司的老板发现制片厂的摄影师争先恐后为玛丽莲拍照，许多杂志社相继登出她的照片，梦露的声誉正在造成之际，碰巧出了裸体日历照的事。也在此时，世界上最大的周刊《生活》杂志，出了玛丽莲·梦露的专号。

美国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国家，但是，在当时来说，一个女演员做裸体模特儿，简直是天大的丑闻。石油公司把日历偷偷挂在加油站的厕所里、酒吧间里隐蔽的角落，以引起男人的注意。不料妇女团体和宗教组织兴师问罪，要求一律撤掉。但石油公司金蝉蜕壳，巧妙地躲过了这场风波。因为这时有人发现，裸体模特儿就是雷电华影片公司所拍《夜晚的擅击》一片的女演员，于是矛头转向雷电华影片公司。而雷电华公司一想，玛丽莲是向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借来的，事情张扬开来对自家只有好处，即使受损害也是别人的事，于是反而趁火打劫。

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起初想息事宁人，不料玛丽莲本人却自认不讳，说“那模特儿就是我！”于是福克斯公司也不便藏头露尾，转而以攻为守，把玛丽莲一些风流韵事，真真假假大肆宣传，以扩大她的影响，再加上这时玛丽莲和棒球明星乔·迪·马吉奥之间的轶事在报刊上传扬开来。福克斯公司因势利导，进行了为期一年之久的宣传。

其间，《尼亚加拉》一片正进入剪辑阶段，福克斯公司决定增加玛丽莲的场次，推出“梦露步态”。她在片中扮的坏女人形象，更可抬高“丑闻”的声价！果然不出所料，影片场场爆满，玛丽莲大为走红。这时宽银幕影片刚开始，也以此片为契机，获得成功，福克斯公司的业务经营为之大振。同时，那张裸体照片也产生了奇迹：本可以弄得她身败名裂，想不到却为她赢得了名气。六百万份“玛丽莲日历”进入寻常百姓的家，有些还是相当古板老派的美国家庭呢。

1954年2月，梦露和新婚夫婿迪·马吉奥赴日本度蜜月时，在记者招待会上曾有人问：“你夜里穿睡衣吗？”

“哪儿呀，我穿香乃尔五号睡！”

“香乃尔五号”，是法国的名牌香水，意思正是一丝不挂，洒香水睡。梦露这句开玩笑的话正是裸体月份牌照片，是“穿着收音机音乐”一语的翻版。

因梦露这一句话，“香乃尔五号”一时成了热门货。

银幕玛丽莲

玛丽莲·梦露早期的角色，多半演“花瓶”一类的美人儿，带点疯疯颠颠。她这身份第一次出现在《爱的欢乐》一片中。格劳乔在片中饰私人侦探，看到金发灿然的玛丽莲神色惊愕拼命跑过来，嘴里嚷道：“有个男人追我！”格劳乔眼馋地把她从头顶量到脚，问道：“难道只有一个？”

在《去托马霍克的车票》这部音乐片中，她的角色纯属摆设，只参加了一个歌舞场面。相反，《当城市沉睡的时候》一片，在她电影生涯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约翰·休斯顿看到玛丽莲的照片，第一个起用她在自己执导的影片里扮演一个角色。这是一部以芝加哥为背景的暴力片。在阴森可怕的强盗世界里，唯有她使人感到一点欣慰。她迷人的风情，征服了观众，不过她的角色也不算重要，饰恶讼师的“外甥女”（“情妇”一词，在五十年代尚需避讳），撒漫使花，几乎把人弄得倾家荡产。丽莎·威尔逊在《故事影片》杂志上写道：“影片里颇有出色的表演……片中有位光艳照人的金发女郎，有她出场，便精彩纷呈。”

导演约瑟夫·曼凯维奇看到玛丽莲在《当城市沉睡的时候》一片中的表演，便邀她在《伊芙的底细》一片里担任配角，《伊芙的底细》这部影片，触及百老汇戏剧界的内幕，是颇富机趣的喜剧片，曾获学院奖和奥斯卡六项奖。与蓓蒂·黛维斯和安娜·巴克斯特配戏，玛丽莲毫不逊色。由于该片大受欢迎，福克斯影片公司又跟玛丽莲签订七年合同。

拍《伊芙的底细》的前后期，她还在几部影片中扮演一些小角色。《地球》里她的出场，引起了一个运动健将的爱情风波；《罪有应得》里，她与一个闲散的体育记者作短暂的邂逅；《家乡的故事》里，她饰地方报馆的一位迷人的女秘书。

当时她的名声还没大到每部影片里要换不同的行头。在《罪有应得》和《家乡的故事》里，她穿的是同一件紧身上装，同一条黑色喇叭裙。与福克斯影片公司签订的合同，从拍《青春长驻》一片才开始生效，虽然角色不脱迷人的金发女秘书，但她的镜头逐渐多起来了。

接着，她拍了几部喜剧片，片子本身没有多大价值，但她的名声由此树立起来。她总扮演“娇艳的金发女郎”，利用自己的姿色，达到预想的目的，片名如《爱之巢》、《让我们堂堂正正离婚吧》、《我们并未结婚》、《敲门也无用》等。只有《猴子于的好事》还值得一提。她扮化学实验室主任的秘书，但怪在这位秘书不会打字，要说引起化学家老婆妒忌，则没有人比她更擅长了。

玛丽莲·梦露在观众中越来越红。几本声誉很好的刊物，也拿她作封面。她演的影片，卖座就好，即使演的是次要角色。1952年，玛丽莲·梦露身份增高，列入“明日明星”的首位。但她的志向首先是要成为一名与众不同的演员。这一年拍的两部影片，使她摆脱“傻乎乎的美妞儿”这种戏路定势。她在《夜晚的撞击》一片里，跟巴巴拉·斯坦威克、保罗·道格拉斯、罗伯特·琼安等老演员搭档，表演出色，人们第一次承认她不愧是个好演员。导演弗列茨·朗格做事精细准确、按部就班，受不了这位女郎的拖拉作风，弄得拍片进度一改再改。但巴巴拉·斯坦威克对玛丽莲·梦露从不守时倒没有什么怨言。他对朗格说：“你别糊涂，这小娘们不出几年准是大明星。”玛丽莲那张印在月份牌上的裸体照正在这期间问世。这桩新鲜事非但没有把她搞得名誉扫地，公众反而对她另眼相看。

在《敲门也无用》这部影片里，玛丽莲得以施展她另一方面的演技。她

饰一精神失常的少妇，帮人家看孩子。影片结尾处有一场戏，她被逼到一扇门边，手里拿着剃刀，突然神经病发作，站在她对面的人越聚越多。这个场面，箭拔弩张，玛丽莲的戏剧情绪大起大落，与以前甜俏的表演大不一样。

1953年，导演亨利·哈撒韦在拍《尼亚加拉》一片时，第一次擢用她担任主角。影片以有名于世的大瀑布为背景，烘托玛丽莲优美的体态。该片上映以来，场场客满，不过，玛丽莲扮演的角色，并不令人同情，因为是表现心狠手毒的尤物，借情夫之手谋杀亲夫。她或穿瘦腰身连衣裙，或穿淡灰色连衫裙，绷在身上象第二层皮肤，一组组镜头显示她婀娜的身腰和轻盈的步态，其走路的样子被誉为“梦露步态”，称颂一时。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到：“梦露步态是怎样给你苦心孤诣想出来的？”玛丽莲娇憨地一笑：“噢哟，我生下来六个月就是这么走路的呀！”

《尼亚加拉》是玛丽莲·梦露的成名作。她不仅一跃而为第一流的明星，而且成了好莱坞一手炮制的最了不起的神话。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不惜耗资巨万，使玛丽莲的“娇模样”日臻完善，只想靠她的姿色、鲜嫩、性感来赚钱，而对怎样使她的表演更有色彩变化则不感兴趣。

接着上映的两部影片《金发女郎，君子好逑》和《怎样高攀百万富翁》，同《尼亚加拉》相反，一改玛丽莲坏女人的银幕形象，变得天真烂漫，活泼可爱，表现了其能歌善舞的一面。

《在君子好逑》、《轻歌曼舞好营生》、《大江东去》三部片子里，玛丽莲歌声婉转，为此，还特地接受声乐训练。

这类大多数毫无意义的影片，玛丽莲曾竭力要推托不演。厂方为示警戒，把她冷在一旁，暂不安排拍片。但玛丽莲声誉日隆，制片商觉得把她长期搁置在一边，对于自己的权益，也是不智之举，于是对她的条件全部接受。

这时，乔治·阿克塞尔罗德的剧本《七年的渴望》演出很成功。梦露提出要把此剧搬上银幕，福克斯公司为她买下摄制权，派好莱坞最好的喜剧导演毕利·王尔德执导。这是玛丽莲最出名的一部影片。剧情描写一位生活安定的编辑理查德·谢尔曼，送妻子和儿子外出度假，一个人住在纽约的公寓里。他楼上住着一位娇滴滴的时装模特儿，她无意闯了进来，惹得他神魂颠倒，掀起轩然大波。玛丽莲在这部喜剧片里的表演，可谓神乎其技。角色还是傻里傻气的金发女郎，不过她从未演得这样出色，男人对她风魔，可她还一派天真、毫无觉察。

影片拍完，玛丽莲的婚姻也告破裂。她就往纽约一躲。她的好朋友、时装摄影师米尔顿·格林知道她不愿再演“没头没脑的金发女郎”这类角色，便建议合伙办制片厂，成立“玛丽莲·梦露影片公司”。为了改变戏路，梦露想进演员讲习所，听李·斯特拉斯伯格的戏剧课。于是这位已经红极一时的明星，为了完善自己的表演，便上门甘当学生。这时，她与阿瑟·米勒过从甚密，米勒作为剧作家，与李·斯特拉斯伯格学派比较接近。美国斯氏体系的开山祖师，尽量向玛丽莲传授她自己认为欠缺的职业素养；其夫人。葆拉·斯特拉斯伯格，后来就替代玛丽莲原来那些戏剧导师，亲临摄影现场实地指导。玛丽莲在纽约一躲十四个月，决定要是她的条件不答应，就不回好莱坞。1955年7月，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跟影片公司的斗争，不是一个报酬的问题，而是涉及人权问题。他们只把我当一个模样可取的女人，我受够了……我要向他们表明。我能演戏，而且演得很好。”

回到好莱坞，玛丽莲·梦露影片公司跟福克斯公司谈判，达成协议，订

七年合同，条件是只演四部电影，同时可为别的制片厂拍片。

根据新合同拍的第一部影片，便是在百老汇舞剧《公共汽车站》基础上改编的同名电影。在所拍《公共汽车站》一片里，玛丽莲的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影片描写一个酒吧间小歌女和蒙大拿地方一个愣牛仔之间的恋爱故事。她利用演员讲习所所学到的东西，使自己的演技更加丰富，更有色彩，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她虽然早已大得广大观众喜爱，却因这部《公共汽车站》开始得到知识阶层和电影行家的欣赏和认同。

1956年7月1日，玛丽莲和阿瑟·米勒结婚。婚礼只在诸亲好友小范围庆祝一番，却在国际上轰动一时。婚后不久，夫妻双双飞赴伦敦，拍摄玛丽莲·梦露影片公司的第一部影片。年初，劳伦斯爵士和玛丽莲·梦露合拍影片的消息一出，引起公众极大的兴趣，成为报纸的头版新闻，在报界受到的重视，不亚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艾登首相之间的新年会谈。劳伦斯·奥立佛是当时世界公认的最佳演员，影片由他执导，并扮演“王子”这个角色。但这次高层合作，却未达到高层水平。《王子与舞女》原是戏剧，一直由劳伦斯·奥立佛与其夫人费雯·丽合演：劳伦斯对导演手法有固定成见，未能充分考虑玛丽莲的演出风格。另一方面，葆拉·斯特拉斯伯格老是喋喋不休，进行所谓现场指挥，与英国的演法正好方枘圆凿，不相为谋。玛丽莲左右为难，神经高度紧张、紊乱。《王子与舞女》这部影片，1957年夏在纽约隆重举行首场演出，在大西洋西岸评价很高。但终因故事性不强，票房价值不高。当事人心里明白，《王子与舞女》打了个败仗，玛丽莲·梦露影片公司也随之偃旗息鼓。玛丽莲从英国回国，不光技艺，身心也大受震悚。“蜜月”完完全全告终了。

因而要不要拍《热情如火》一片，玛丽莲踌躇再三。她的角色，又是被百万富翁看中的没头没脑的美人儿。但出于对导演毕利·王尔德的尊重，以及经济方面的考虑，她才狠下决心。这部喜剧片。叫人从头笑到底。玛丽莲的表演滑稽、俏皮、有情有义。她在个人私生活里很不顺心，但影片里二点也没有流露出来。开拍不久，她流产了一次，疲惫、烦躁，得费很大劲才记住台词，弄得搭档非常恼火，简直跟她闹翻了。然而，《热情如火》却是部很过瘾的喜剧片。玛丽莲又唱又跳，天真烂漫，表演出神入化。还没有一部影片，她显得这么漂亮，这么动人。1958年11月，《热情如火》拍完不久，她又第二次流产，婴儿已有三个月。她神色大为沮丧。

接着拍的《让我们相爱吧》上映后颇受冷落。报刊上花的篇幅倒不少，却大肆渲染她和男主角伊夫·蒙当的“关系”。玛丽莲确实很欣赏这位法国演员。难得有人把她当一个人来尊重；而伊夫·蒙当就属于这种难得的人之一。玛丽莲当然颇有知遇之感。拍片的时候，跟伊夫·蒙当一起演出，她心里踏实，配合默契。这部影片，今天再来看，就不懂当年为什么会受冷遇了。而玛丽莲和伊夫·蒙当的“关系”，也无法说得很清楚了。

往事历历，接续下来就是《不合时宜的人》这部片子了。这是玛丽莲完成的最后一部影片，也是她从影生涯的收煞。这次她的搭档是克拉克·盖博。她终于如愿以偿，小时候她曾把克拉克·盖博当成父亲的形象。电影剧本是出自阿瑟·米勒之手，使玛丽莲有机会充分表现她的戏剧才能，显示她的秉性气质，她的柔荑脆弱，以及过分的敏感。片中，她时而狂喜，时而绝望；人家对她恭维奉承，她也恋恋于人。但摄制过程特别艰辛。那时，梦露和阿瑟·米勒的关系已开始恶化，晚上，要靠安眠药和镇静剂才能入睡。

鉴于身体状况，还住院治疗了十几天。拍完影片，她感到精疲力尽。停机没几天，克拉克·盖博因心脏病猝发而不治身死。盖博的死，对玛丽莲是个可怕的打击。不久，她又和米勒正式宣布离婚。接近她的人，说她常常神思恍惚，心力交瘁。

后来，她又出入公众场合，似乎慢慢恢复了好莱坞生活，布置新居，还计议拍摄新片，片名倒不无挖苦意味：《濒于崩溃》！从已拍的几组镜头看，她出落得更美了。自从那出名的月份牌照片以来，她第一次同意在片中拍裸体镜头。她不久前刚荣获世界最知名女演员奖，不料在1962年8月5日清晨，人们发现她僵卧床上，一只手抓着电话……

喷得出火焰来

从1950年到1952年，玛丽莲·梦露拍了10部影片，真正使她崭露头角的是1953年的《尼亚加拉》，此片描写蜜月旅行的新婚夫妻尔虞我诈相互谋杀，最成功的地方是以尼亚加拉大瀑布为背景，影射男女的情欲冲突。梦露是第二女主角，她首度亮相于瀑布前，其扭腰摆臀婀娜前行的镜头，是这部片子的魅力焦点。

当时梦露的私生活已被花边新闻渲染得很不堪了。《尼亚加拉》以毒攻毒，特别设计她的出场与她的走路姿态，利用丑闻烘托她在片中的性感角色，果然获得了强烈的反响，梦露被一举推上了“性感女神”的宝座，开创了“MM”（玛丽莲·梦露）时代。的确，她容光焕发，喷得出火焰来：唇上口红，红艳如火；金发灿然，象闪光的黄金。她身穿紧身缎子衣裙，轻歌曼舞，既华贵又窈窕，浑身上下发散出一种“性的魅力”。她成了公众心目中的偶像，成了每个美国男子梦寐以求的“该死的女人”。纽约的通衢大道，洛杉矶的繁华街市，妙龄少女一个个穿着紧身裙子，扭摆着腰肢，学走“梦露步态”！

同时，她也做摄影模特儿，出现在好多摄影师的镜头面前。艳丽、妖调、丰姿绰约，间或眉挑目语，但总是那么清新可爱，巧笑嫣然。一张接一张的照片，制成成其为玛丽莲的玛丽莲，有目共赏的玛丽莲，一代容华的玛丽莲。她的芳姿倩影，时至今日还在成百万张地印行，印成明星照、招贴画、明信片，印在汗衫上、器物上，倾销到市场上……

1953年11月，梦露出席二十世纪福克斯剧场举行的《怎样高攀百万富翁》的首映式，数万观众为一睹梦露的风采，把有八条车道之宽的维尔夏大街挤得水泄不通，交通堵塞达三小时之久。

在一次赴日度假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道：“影迷给你的信有多少？”

“每周不下五万封，少说也有三万封。”

《七年的渴望》是玛丽莲·梦露银幕生涯的里程碑。在喜剧名家比利·王尔德编导下，她是个永远睡眠惺忪、步态慵懒的美女。她并没有做什么或想做什么，不过几次惊鸿一瞥，那种不落言诠的撩人媚态，就令住在楼下的中年编辑一直搔不着“痒”处，直到生发无法抑制的种种绮思恋念，这就是男人婚后七年的通病。梦露的性感正是比利·王尔德嘲谑男人的工具。梦露在纽约地下铁路的时代广场通风口上，让风将她的大篷裙掀起一朵鼓鼓的裙花的镜头，成了好莱坞性感场面的商标。这个镜头，放出的时间很短，拍摄可谓很费事。玛丽莲的大名气，不是没有造成麻烦。首先，她飞抵纽约机场时，

就几乎引起骚动，这场戏是在第五十四号街与麦迪逊大街的交叉路口拍的。在拍摄的现场，看热闹的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这场戏来来回回拍了几次。观众拥挤不堪，争着要她签名。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只有一个人对这种围观深感不快，那就是她的丈夫，乔迪·马吉奥。

自《七年的渴望》公映后，梦露的魅力所向披靡。提起梦露的性感魅力，很多人都会想到她的花容月貌，而这花容月貌又来自她的天生丽质。其实这里有不少误解。玛丽莲·梦露的天生条件并非是十全十美、十分理想的。她的身高只有1.61米，体型有点胖，腿也有些短，只有胸部比较丰满。梦露有着清醒的头脑，当别人称赞她无与伦比的美貌时，她却时时注意自己的缺陷。她有着点金术般的秘密武器，能让自己的自在气质，自发地表现出来，她舒展大方的动作，透发着一种活力，给人一种神奇的魅力，她那愉快的表情和朗朗的笑声也极富感染力。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当代女性美的象征。有人曾问她在运用和产生自己的魅力方面有什么诀窍，她否认自己的魅力是修饰和雕琢的结果。他认为美不是人工的产物；只有天然和自发的美，才具有吸引力。

一位摄影记者证明她的说法，他曾经看到梦露读一本人体解剖学，上面记满了笔记。她正在研究人体的骨脉，认为，只有了解人体的构造，才能掌握人体的自然和谐的运动。这位记者说：“她就像一架性感机器一样、行动自如。她的魅力决不是象某些女人扭扭屁股、挺挺胸那种歪报。”尽管人们的审美观念不同，但没有人对梦露的魅力有过异议。她的一位朋友同行在向她致哀的悼词中说：“所有的男人都是不同的，而梦露在这些男人面前也变成了同样多的不相同的梦露。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她的永远的魅力。”

玛丽莲·梦露是鼎盛于五十年代的“性感艳星”，电影公司把她当作摇钱树，接二连三抛出新片。对老板来说。这年轻的女子是新的肉体，能提高票房价值，专派她演“白痴美人”，而且把她本人也看作“白痴美人”。可是，玛丽莲并不喜欢这一角色。她愿意观众欣赏她，是因为她是演员，而不仅仅是肉体；是因为她有灵性。而不仅仅是身段好看。对时下的声价，她颇愤愤不满。一次，梦露把自己的一张照片赠给友人，一反她在电影银幕上的作态，她不施脂粉，不露大腿和胸脯，而是身穿晨衣，头发自然，还有点睡眼惺忪。她在照片旁边题字：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真情的破灭

玛丽莲喜欢有人爱她，但没有人把她想望的爱奉献给她。在银幕上、摄影棚里、水银灯下，她擅长表演生活的欢乐、身体的灵巧、女性的优美；在现实生活里，她却是优柔寡断、烦躁不安、神经衰弱。她常躲开众人，有种自趋毁灭的倾向。

玛丽莲在人生中孑然一身，没有父亲，没有丈夫，没有孩子。她要个男人，要个真正的男人。他应该是男子汉大丈夫，身强力壮，能安慰她，娇宠她。在她生活的这一特定时刻，美国国内倒真有这样一个人，跟她一样出名，甚至更为出名。棒球是美国传统的体育项目；他是棒球明星，青年中最受崇拜的偶像。他叫乔·迪·马吉奥，祖籍意大利。他打的球最有力，能打得最远最远，打破所有记录。乔·迪·马吉奥是个朴实、安静、感情不外露的男

子。多年来，有些男人常前来挑逗、歪厮胡缠，所以玛丽莲愈觉得乔这个人可亲可近。据说，梦露和马吉奥是1952年结识的。当时她正在参拍《不用敲门》。朋友介绍她和马吉奥认识之前，她还从来没有看过棒球，也不知道乔·迪·马吉奥是何许人。当时她只是一个劲地望着马吉奥笑。

两个明星，邂逅相遇，往来频繁，自然招来一帮记者采访报道。他们因各自的职业常四处奔波，一有空闲便约个地点聚首。1954年10月14日，他们在旧金山突然宣布结婚，婚礼场面热闹非凡，这当然是国际级的新闻。一个明星跟另一个明星，谁都知道这种联姻往往会为好成歉。但玛丽莲不愿理会。

那时，马吉奥的运动员生涯已经结束。对梦露来说，丈夫魁伟又多情，可谓百里挑一。无奈这位球界巨星醋劲也不小，不准玛丽莲穿袒胸露臂的衣衫，裙子也不能箍在身上，就连在记者招待会上（这对演员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也不许做出楚楚可人的风姿。可怜的梦露受不了这种限制，弄得神经衰弱，两人最终只好分道扬镳。

梦露是单纯的女子，开始爱上迪·马吉奥时，她简直象被捕获的小窿一样显得怯懦而可怜，仿佛只有这样强壮的男人才能保护她似的。婚后，她心甘情愿地把所有家务一人承揽，只要她的壮实的丈夫生活愉快。马吉奥对朋友说过，“玛丽莲把拍片事丢过一边，专做管管家务的普通女工，感到非常有趣。”马吉奥曾想把梦露禁锢在电器设备齐全的新房里。而且他本人也象中了电视毒一样，成天坐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即使偶尔出去和朋友们交谈几句，也超不出运动或野营之类的话题。他对戏剧、音乐、艺术毫无兴趣，除了迷恋电视外，喜欢的就是细面条。

当然，梦露作为家庭主妇是低能的。她不拘小节，事事都不在乎，每次刷牙都忘记了盖牙膏盖。她认为，像她那样的名演员，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为什么马吉奥老把没有关电灯或胸罩掉在地上之类的小事看作人生的大事而吩咐不休呢？……结果，就象他对她的不拘小节不堪忍受一样，她对他为这些生活小事而大动肝火也感到吃不消。

当《七年的渴望》公演后，梦露在地铁的铁栅栏撕破了裙子这一场面被马吉奥看见了。妻子在众目睽睽下被风卷起破裙叫人看胯下，嫉妒心使他变得歇斯底里。尽管梦露安慰他说：“要紧的不是眼睛看到的，而是心里想到的。”但马吉奥不这样认为，于是两人便分手了。这也可能铸成了梦露一生的大错。迪·马吉奥对这段婚姻始终怀着一种美好的感情。梦露死后，是他为梦露举办了葬礼，每年忌日他都要到梦露的坟上献上一朵红玫瑰花。他73岁那年宣布：“我死后要葬在梦露的身边。她是我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妻子。”他对梦露的一片痴情，在美国已传为佳话。

梦露与马吉奥分手不久，便与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相爱了。不久，这对“美国最漂亮的女人与美国最聪明的男人”结成了夫妇。

梦露早在和乔·迪·马吉奥结婚之前，就认识了阿瑟·米勒。有一回在好莱坞常有的酒会上，她看到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正和导演伊力·卡山在角落里谈话。她走过去，卡山介绍说：“这是百老汇著名的剧作家阿瑟·米勒。”

米勒比梦露大十一岁。1949年2月10日晚上，他的《推销员之死》在百老汇公演，由伊力·卡山执导。剧评家说看了这出戏，“好比脸上挨了一拳。”《推销员之死》简直震惊了美国剧坛，在百老汇演了742场，才告功

德圆满，并获得了普利策奖。他从此声誉雀起，成为战后美国剧坛拔尖人物。这回来好莱坞，就是为了《推销员之死》改编电影事宜，没想到和风靡全美的性感女神梦露结下了孽缘。

这次偶遇后，他们经常约会。米勒的家庭本来就有裂痕。亲近他们的朋友以为这回要出事了，可几个星期后，米勒却离开了梦露回到纽约妻子身边。

不久。梦露遇上了迪·马吉奥，两人迅速结婚，又迅速离婚。

1955年，梦露演完了《七年的渴望》突然飞往纽约，投报演员讲习所，听李·斯特拉斯伯格的戏剧课。由于她长期在纽约居留，和米勒又旧情复燃。他们不断地躲避记者进行秘密约会，毕竟这是顶尖的热门新闻，各地的银色记者蜂拥而至，搞得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一家法国杂志的女记者，为了跟踪他们的汽车，竟遭车祸丧身。

这种桃色新闻，终于逼得米勒夫人下堂求去，1956年6月12日，结婚15年的米勒夫妻，到雷诺城办妥离婚手续。14天后，梦露和米勒结婚的消息，就刊载在全球各地的报纸上了。

在“知识与美貌相结合”的初婚时期，梦露心情愉快，很少服用安眠药。可是这段婚姻也很快出现了裂痕。玛丽莲·梦露在感情上并没有得到满足。她有时半开玩笑，有时又一本正经地管米勒叫“爸爸”。的确，米勒身上似乎多了点什么，又似乎少了点什么，他还不是她理想中的恋人，只是她的“爸爸”丈夫。

梦露希望丈夫对她打开知识的大门，可米勒认为她有神经质的心理病态，不宜那样做。

当然，当玛丽莲先生可也不容易！每次一下飞机，就给摄影记者包围，采访、对谈、调查、刺探、流言蜚语，不一而足，似乎都在破坏玛丽莲想建立的家庭。所有这些，对做丈夫的都是沉重的压力。他并不天生适合跟一位得神经官能症的影星一起生活，正象这位影星并不生来就配跟一个沉思默想、生性高傲的男人共度岁月一样。他们想有个孩子——给她不慎堕落了；又怀孕一次——再度流产。她神情十分抑郁，夫妻间的感情也在冰化。

就在此时，又一个男人闯入了她的生活，这个人就是法国演员伊夫·蒙当。那是在1960年，34岁的梦露和蒙当一起拍摄电影《亿万富翁》，她第一次领略了“法国式的爱情”。此时，米勒到英国去创作他的剧本《变态人》。梦露不能没有爱情，正象米勒不能没有工作。她和蒙当度过了秘密的、没有明天的狂欢之夜。梦露是这样一个人，当她爱上一位男人的时候，就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爱他。所以当拍片结束，蒙当告诉梦露，他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妻子的时候，梦露止不住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可怜的玛丽莲。娇弱的洋娃娃！她容光艳丽，讨人喜欢。随着时光流逝，脸上开始出现皱纹，曾是明亮发光的眼睛，现在只用来流露无可告慰的迷惘和忧伤。抑郁深重，就忘情于烈酒、咖啡和安眠药。她真成了“不合时宜的人”！——这正是一部新片的名字。这部黑白片，是阿瑟·米勒为她写的电影剧本，当时夫妻关系处于破裂的边缘。拍完片子，她身心大受损伤。1960年11月，梦露与米勒宣布“友好的分屠”，次年1月终于正式离婚。

两个月后，梦露因为精神分裂企图自杀未成，被送进纽约的一家医院，不久又接受胆囊炎手术。这段时间，那位棒球健将、忠诚的乔·迪·马吉奥，了解他的前妻，知道她并无大病，只是需要人情温暖，因而常常来探望她。

玛丽莲除三次结婚外，有过关系的情人，也不在少数。这一年，梦露很

少工作，据说她又正忙着谈恋爱，对方是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恋情在避开众人耳目的地方快速滋长，这也是梦露人生的最后一年。

人生最后一天

她最后几个月的情况，比较模糊。她孤身一人，偶有风流情事。接见过记者采访；摄影师们给她拍下了人生最佳照片，因为情致哀婉，楚楚动人。

1962年6月1日，玛丽莲在《濒于崩溃》一片的摄影棚里，庆祝她三十六岁的生日。大家送她一个精美的生日蛋糕。七月下旬，为了证明自己丰腴如初、风韵依然，玛丽莲在伯特·斯特恩的摄影机前，取一幅透明纱巾略事遮掩，拍下生平最后一组极具魅力的照片。十五天之后，8月4、5日之交，她却永远闭上了眼睛……香消玉殒！

关于玛丽莲·梦露的死，洛杉矶8月5日拍发的快讯电报，全文如下：

“好莱坞著名女影星玛丽莲·梦露于5日晨3时许，死于布伦特伍德自己家中。警方公布，系服用过量安眠药致死。”

玛丽莲的死，出人意外，在世界各地引起震动。有些妇女，觉得是可怕的打击，痛不欲生。报刊加上黑框，深表悼念。玛丽莲死后第三天，即8月8日，在魏斯特伍德举行了简朴的葬礼。葬礼由乔·迪·马吉奥主持。按“故人生前遗愿”，影界名流一律未请，出席者共二十四人，都是梦露生前的熟人。迪·马吉奥一人伤心地走在灵柩之前，痛哭流涕，连连说：“我爱你！我爱你！”

这位艳丽的女星，生前使那么多人着迷，死后使那么多人流泪，究竟靠的是什么？为什么辞世多年之后，依然使美国的男女老少心弦震颤？是因为长得美？生得娇？还是别有才情？

或许，跟堂堂肯尼迪兄弟那种奇特的关系，给她的死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麦迪逊乐园里，气球冉冉上升，交响乐队乐声大作。美国总统偕其娇妻出现在包厢里，君临于这番盛况之上。时为1962年5月19日，正值约翰·肯尼迪总统四十五岁生日。但晚会上大家注意的，已不是雄姿英发的总统，几百位来宾翘首而望，等待晚会真正的主角，等待自有电影以来世人谈论最多的艳星——玛丽莲·梦露。

这一年早些时候，玛丽莲得以结识美国现任总统。英雄美人，一拍即合，相见恨晚。所以，当约翰·肯尼迪请这位红极一时的影星赏光，出席他的生日庆典助光，梦露便一口允诺，欣然接受。

这时，走道的一端，突然豁亮，灯光炽烈，帷幕起处，她终于光临，侧身骑在大象背上。玛丽莲身穿紧身長袍，所缀珠玉和光片闪闪发光。雍容华艳，仪态万千。她走到舞台中央的麦克风前，漫声细调，唱起：“祝你……生日……快乐……”清歌一曲，彩声四起，把总统生日晚会的热闹气氛推向最高潮……

在玛丽莲·梦露与约翰·肯尼迪极具传奇色彩与罗曼蒂克的秘史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的不是别人，而是肯尼迪的妹夫彼得·劳福特。彼得不但把肯尼迪介绍给梦露，甚至还把他在加州的海滨别墅作为他们约会的地点。

梦露对她和肯尼迪的风流艳事深感兴趣。彼得教梦露戴一顶棕色的假发，穿粗鄙服装和戴粗鄙的眼镜，并交给她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然后，

她便以彼得私人秘书的身份潜入肯尼迪住处。这种以秘书作掩护的策略非常成功。一般的人对彼得非常好奇，因此注意力常集中在他身上。梦露反而不会被注意。在这段时间里，梦露的身边留有肯尼迪总统的私人电话号码。这条线通到白宫的个人住宅，此一事实更加强了梦露的信心，以为这一段恋情绝非一般的逢场作戏。

由于她有了肯尼迪的私人电话号码，而且可以随时与他谈悄悄话，因此使梦露心里产生一种幻想，以为肯尼迪会跟他的太太离婚，不久，她本人也许可以当上美国第一夫人了。

显然，她这个想法是极不清醒的，这使她陷入了爱情和政治的漩涡，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时肯尼迪正忙于选举，他不能考虑和梦露的婚事，于是把她推给了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后者同样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不可能和梦露保持公开的、长久的关系。肯尼迪兄弟的政敌正死死地盯住他们，他们又岂能为一个女演员而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本来他们和梦露的艳遇就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梦露在这场爱情游戏中，注定是失败者。梦露的幻想又一次破灭了，这些现实中的男人太虚伪了，但他们也太强大了。在他们面前她只能是一个小小的弱者。

1962年7月，梦露频频给华盛顿司法部门打电话，但一直无法接到罗伯特那里。她被告知，不要再纠缠罗伯特，然而她不明白为何遭到遗弃。

梦露通过公用电话，提心吊胆地乞求马吉奥前来会面。当他俩坐在海滩上时，梦露掏出一个红色小笔记本。她读了本中的内容，马吉奥不禁惊恐万分。原来梦露在本中记录了罗伯特·肯尼迪告诉她的许多事情，这些显然都是超级机密。

这时，马吉奥明白了，梦露为什么如此惶惶不安。当他听说罗伯特原来许诺要和梦露结婚，如今又切断了与她的电话联系时，心中又是一惊。马吉奥告诫梦露，绝对不要对任何人提起笔记本上的内容。但她还是给马吉奥挂了电话，并且声称：“我已经动用了笔记本，我将公开里面的每一件事情。”

但是，她不可能有时间这么去做了……

梦露死后，警方没有发现自杀的遗书。尸检由汤姆斯·诺古奇医生执行，他发现梦露的血和肝里有浓度较高的巴比妥，而她的胃里却毫无此药的痕迹。这表明，毒药绕过了胃，也就是说，进行了注射，但在卧室内并没有发现注射器。另外，因巴比妥过量的死亡者，在失去知觉的最后一刻，往往由于疼痛反复扭拧，死时无法平直安详地告别人世。而玛丽莲·梦露两腿平行伸直，显而易见是一种摆弄的姿势。

马吉奥在私人侦探米洛·斯珀格里奥的帮助下调查了此事。他发现许多蹊跷之情，其中之一是，罗伯特·肯尼迪在梦露死前一天下午曾探访过她。但官方却说，那个周末罗伯特和律师一直呆在旧金山的私人牧场里。

马吉奥还听说洛杉矶警察局曾保留过一份长达723页的《玛丽莲·梦露谋杀案》卷宗。卷宗中有一份罗伯特·肯尼迪的声明，他承认在梦露设法和他通话后，他星期六下午曾拜访过她。当时，梦露非常愤怒地对他进行了攻击，他制服了她。随行的医生为使梦露冷静下来，给她打了一针。罗伯特还在证词中说，卷入梦露事件是他哥哥约翰而不是他，他是奉总统之命前来探访梦露的，事后即去了彼得·劳福特家。这份卷宗如今下落不明。彼得太太也矢口否认罗伯特·肯尼迪曾在梦露死前到过她家。肯定有人在撒谎。但许多当事人和见证人都已撒手而去。梦露死了，约翰死了，罗伯特死了，彼得

也死了。

还有那本神秘的笔记本，梦露死后就不见了。据认为，这本笔记本可以证明梦露的死因。1962年，有人愿向任何一位能提供这本笔记本的人支付8万美金，如果谁能证明罗伯特或中央情报局杀死梦露内幕，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奖赏。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星期六下午五至七时梦露的精神分析医生格林森大夫和梦露谈话的内容。格林森拒绝泄漏任何秘密。但他和地方检察官讨论过这一情况。据检察官讲。格林森“不同意梦露自杀的说法”。由于职业道德，检察官也拒绝披露这一秘密。

那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住的那座乡村别墅里有谁来过？知道她自杀后，是谁怕她的信件会有牵累，都窃了去？再说，难道真是神经抑郁而自杀吗？亦或是眼药过多意外致死？还是耐人寻味的政治谋杀？这些疑窦，大概永远成了打不开的闷葫芦，世人永远不得其详了。但有一桩事确凿无误：她死去之际，手还抓着电话筒。这天夜里，她拨电话喊人，特别是男人。而且是要人，或许是总统的弟弟，或许就是美国总统本人。然而，电话的另一头，没有回音。

天荒地老，这将始终是个谜。

但玛丽莲·梦露并没有死。作为电影业的产物，好莱坞的神话，玛丽莲·梦露永远是生气勃勃的。

走出好莱坞的青春艳星： 简·方达

她的父亲，亨利·方达，可以成为一座美国丰碑，一尊电影偶像；但她却无可争议地统治着好莱坞。过去的电影皇后没有一个出身于这样的王朝般的电影世家，更没有一个像她这样名扬各个角落。

简·方达并非天主如此杰出。

缺乏自信和恋父情结

1937年12月21日，在纽约市的妇产医院里，简·方达来到了人间。她是典型的方达家族血统：稍稍突出的前额，稍有些扁的、非常明显的美国鼻子，大大的嘴和厚厚的上唇，突出而坚毅的鄂部线条。

简·方达出生后，大家几乎立即就叫她“简夫人”，这是随简·西摩夫人的叫法。她是英王亨利八世的第三位妻子，虽然早逝，但却是英王亨利六位妻子中少数几个保持身首完整的王后。大家这么叫简，显然对她抱有厚望。尽管简·方达具有十足的方达家族血统，却和其父亲亨利·方达一样腼腆而缺乏自信心，尤其在童年，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简的生母弗兰西丝·西摩·布罗考，是一个信心十足、有自制力、大胆、主动的美丽女子。她曾是个寡妇，如今却成了亨利·方达的五位妻子中的第二位。她具有一种冷若冰霜的贵妇人般的美，但当你接近她时，还是很平易近人的。不过，在男女问题上，却是少有的大胆，“假如一个女人真要喜欢一个男人，就应该去追求他，得到他，让他知道你爱他。”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可惜简·方达没有继承这些优点，倒在很大程度上步了父亲的后尘。亨利·方达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一生结过五次婚，也许有人会用这一点来非难亨利，这确实在冤枉。除了第三位妻子，其余的各位都是在追求亨利，他只不过是被动的接受而已。“上帝知道，世上没有比我再腼腆的人了，可是演戏是治疗怕羞的良方。”

他们一家的生活是相当豪华，相当舒适的，以至于他们的同僚们都认为他们十分富有，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家庭问题上，他们共同度过了七年美满的时光。事业上也是成功的。

简就生活这样的环境里。在孩童时期，简就长得十分健壮，举止也很漂亮。她看上去总是兴高采烈，喜欢热闹和从事一些侠活的事情，但是，简却认为自己又胖又丑，有一种难以清除的自惭形秽的感觉，并受这种感觉的影响，产生了较强的自卑感，缺乏自信心，并日益形成了一种独来独往的习惯。即使是在她很拿手的表演问题上也是如此，因为亨利·方达在《愤怒的葡萄》中成功地扮演了汤姆·乔德，成为最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也是使他在以后的年代里成为银幕偶像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使他的女儿简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对表演的恐惧感，“你如何能与他竞争呢？”简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克服这种恐惧的心理。所以简十分崇拜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在三年后简的弟弟彼得出世后，彼得立刻成了母亲的宠儿，母亲对彼得娇宠过份，注意力大都放在儿子身上，而简则被放在了次要甚至无所谓地位，大大地刺激了敏感的简，所以，她很早就向父亲寻求她极为需要的安慰和抚爱。有时当父亲没法满足她的需求时，她就拼命干一些淘气的事来引起人们的注意。简后

来说：“她是在一位全国闻名的巨人的影子下长大的。”只要父亲扶着她或注视她，她就感到安全和满足，父女之间日渐形成了一种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简日后的生活，尤其是她对待婚姻的态度。说得更确切些，在对待男人的态度上，她总是拿他们与亨利比较，这不但影响了她同他们之间的正常来往，甚至也影响了父女之间的感情，以至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心里头疙疙瘩瘩的，不能象以往那样亲密地生活。

在这段时光里，简学会了看大人的脸色行事。父亲常常在家，这使简心花怒放，可是不久简就发现父亲的脾气变化无常，他常常沉默不语，简觉得十分烦恼，就拿许多问题去打扰他，他有时也能回答一些。但更多的时候是沉默，一言不发，甚至会冷冷地绷紧他那著名的下巴。所以简决定以后向他提问题一定要多加小心。她的父亲虽然能做到有问必答，但注意力却放在彼得身上。口里回答着简，心目却望着彼得，时刻关心着儿子，一旦他有越轨的或是母亲看来很危险的行为时，就大声呼唤他，跑过去把他抱过来放在卧室的床上。这样的时刻，简会气愤得不得了，因此再次地告诫自己没事别去招惹母亲。不过，这却使简在学校里大受人们喜欢，在她刚就学的那所学校里，任何过分的淘气行为或违反校规的行为都会遭到一星期没人理睬的惩罚，简因为家庭生活的缘故，很快就学会了遵守校规，注意绝不违反任何清规戒律。她被大多数教员认作是很顺从的孩子，从未受到过无人理睬的处罚。

但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的，是简为了适应环境而被迫形成的。其实，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有着很深的压抑感，希望找机会把它发泄出来，或者不妨把她叫做表演欲。譬如放学以后，简会和她的一位好友骑上高头大马，在旷野地放缰奔驰，领略自然平等的抚摸，发泄心中郁积的闷气。更有甚者，她们会一丝不挂地骑在马上，穿过相当荒凉的森林，去惊吓偶尔去观雀的人和那些牛仔以及游戏的印地安小男孩。当她换了新的学校后，这种欲望就很自觉地演变成了反叛行为，她不再是那种在学校里很听话，只是下课后才骑马穿行森林去撒野的学生了。她的同学回忆说：“学校当时施行一种学生自治制度，并以其成功为骄傲。我们大多数学生都很自重，只有简被认为是当时最有反叛精神的。她不但喜欢破坏校规，而且还唆使少数几个伙伴也这么干。她是一种与环境格格不入的人。”

心灵的创伤

二次大战结束后，方达一家又团圆了，表面看来似乎恢复了和谐，其实，这个家庭的主人之间正酝酿着一场危机。亨利在动身服役前，没法拍完一部根据沃尔特·范·梯尔伯格·克拉克的小说《牛轭事件》改编的影片。亨利在这部影片里扮演牛仔吉尔·加特，本来可以大大发挥一番，但是该影片是在没有得到制片公司总裁达里尔·扎努克支持的憎况下拍摄的，所以公司一再加压、迫使亨利他们妥协，影片尚未拍完，他已经觉得累得不行了。现在更是四面楚歌，再加上战争，亨利的忧伤是越来越深了。当他和朋友们议论电影界时，更多的是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自己是在出卖自己。生活的不如意，战争的阴影，前景的黯淡，带给方达一家的将是一场悲剧。

亨利退伍后，摆脱了和福斯公司的合约，而开始主演了一部舞台剧《罗伯茨先生》，因为相当成功，方达一家迁居到了东海岸。这时候简已经读七年辍，并开始和班上的男生来往，同学们尤其是男生都很乐意接近她。

但是，她的父亲亨利让她的母亲坐下来说他要离婚，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年轻姑娘苏姗·布兰查德，亨利说结婚十三年他一直不幸福。弗兰西丝这时已步入中年，她知道年岁不饶人，尽管她仍不缺乏意志和信心，能说出她要是年轻一点，不是四十一岁，肯定能把亨利夺回来的话，但她却感到彻底失望了。这是四九年的事，那一年，简和彼得觉得糟糕透了，圣诞节也过得非常不愉快。父亲自从对母亲讲了那番话以后，就一直呆在别的地方，没有回过家，家里只剩下痛苦和绝望的母亲，茫然不知所措，全家笼罩在凄凉的阴影之中，没有一丝生气。据前来作伴的弗兰西丝的好友说：“当我熟睡时，我感到有人离我很近，等我睁开眼睛，只见弗兰西丝的脸就在我的上方，看着我的脖子。她说她正在研究人的颈动脉长在哪儿。”当然，弗兰西丝并不想杀害自己的好友及任何人，她是别有所图。随后的几个月，孩子们的心灵上留下了极大的创伤。简开始对父母失望，甚至根本不作任何幻想，她开始较为实际地考虑自己以后的问题，并决心自己维护自己。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她更有理由认为动物才是最安全最亲密的伴侣，通人性的狗在任何时候都会忠实于主人，或献媚，或取悦，总之，决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改变自己的感情。至于马，除了通人性外，较之狗，更有自己的个性，更能保护自己的尊严，何况在必要时，可以供孩子们驱驰，用以帮助他们发泄心中的忧愤，所以这一段时间，狗和马成了他们亲密的伙伴，也确实安慰了他们心灵上的创伤。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人们发现弗兰西丝奄奄一息地倒在疗养院卧室的浴池里，喉管用刀片割断了，血流了一地。待医生们赶来时，已经无法抢救了，简和彼得被告知母亲死于心脏病，但简已经懂事，她明白这一事实的真象，她很想当众说出她要说的话来。当她看到关心她的人们紧闭着嘴巴，不愿公开讨论此事时，她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她觉得她能够承受这些重压，但这一切对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来说的确太重了。亨利心里虽然也很难受，却认为弗兰西丝是不能原谅的，她用自杀毁了他们活着的人的一生，简对父亲的这种态度十分不理解，她甚至一度认为是父亲的过错造成了母亲的毁灭。直到多年以后，简接触并参与了政治活动，通过自己的认识，把那件事和更大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时，她才认为母亲是时代的牺牲品，而不是父亲的牺牲品，她才开始谅解父亲，不过，这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同时，在当时，她和父亲一样认为弗兰西丝不该选取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家庭纠纷。几年以后，当她去看望母亲生前的一位好友时，对方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她的妈妈，可简却这么回答：“别提她！我不愿再听到她的名字！”

那人大吃一惊，过了好几分钟才缓过神来说：“可是，她爱你。”

“她怎么会爱我？她要是爱我，那为什么要去自杀？”

显而易见，母亲自杀这一残酷的事实，造成了她终生最可怕、最痛苦的创伤。她觉得自己当时已经很成熟了，能勇敢地面对一切，甚至包括照顾生活中的弱者，但同时，在她的内心深处，她确实是在强烈呼唤着爱抚和安慰的。这一点，在她以后所玩的爱情游戏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爱情试验

简在父亲第三次结婚后，上了瓦莎学院，也许是受了父亲生活的影响，她在男女问题上大大地觉醒了，上课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更多的时间是和附

近的男生约会，偷情。开始只限于周末，后来干脆发展成了平时的夜间幽会，即使包括奉献自己的躯体的事，她也很大胆主动。她认为自己不具备最优秀演员的条件。尽管偶尔也很想从事表演事业，但她这个时候只想成为一名校园里的热门姑娘，有足够的男生围着她追逐就够了。她不停更换约会对象，从来没有认真过一次。这个时期简充满魔力和阳光。她是个很好的美丽姑娘，真正的瓦莎派姑娘——非常可爱，还具有一种特殊气质。她还没长开，胖胖地，踝骨非常粗大，然而你却可以看到那修长的身材和美丽的双手。她还没有显出骨架来，满身孩子肉。可是你却可以看出她将出落成为一个极特殊的女子。她说起话来十分直率，眼睛里有那么一股神态，很象她父亲。她涉世尚浅，却渴望学习；而且让人感觉到她具备有一种才华，但无人说得清是哪一方面的才华，亨利不鼓励她从事表演事业，而当地站在父亲身边时，就觉得自己缺乏的正是表演才华。但是从父母两个家族所继承下来的强烈的自我意识要求在表演方面暂时受到压抑，但却在男女问题上着力地渲染出来；她的身边总是围着一大堆青年男子，她可以和许多异性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当对方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推进他们的关系时，简却能使他们心灰意冷，泄起气来。她显得变化无常，让人捉摸不定。她愿意这么被人宠着，成为大家谈论的中心，但对谁都不认真，即使她的风流韵事上了纽约的闲话栏，她也没有收敛一下。而亨利看了却气得脸都变了色。不久她就在曼哈顿当模特儿了，据她自己说因为这行业收入多，其实她并不缺钱用，母亲自杀时，曾遗留给给她一大笔钱财，足够她舒舒服服过一辈子。这完全是她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在作怪，她希望更多的人认识她、了解她、爱慕她。

有一段时期，人们认为她似乎真的在爱情问题上动真格的了，简认识了亚历山大·怀特洛，他二十八岁，身材颀长，阅历很广，远看颇象亨利·方达，简对他有说不清的好感，除了她对他平静的外表和从不自吹自擂的作风外，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是一个情场老手，谈情说爱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他们频繁地约会，几乎每晚都有，甚至干脆同居。亚历山大认为自己已爱上了简，别人都这么看，可是，有一天晚上，简在半夜里说起梦话来，吓了他一大跳。她疯狂地抱着他反复大叫：“爸爸！爸爸！”亚历山大听得目瞪口呆。她和情人同床共枕，心里想的却是父亲，这搁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心烦意乱，大惊失色的。后来简就突然中断了和他的交往，亚历山大左思右想了好几天，实在找不到遭到拒绝的理由，于是某天晚上，他从浴室爬进了简住的公寓，在她的镜子里找到日记本一看，里边其实是美化了约会的记录，并且说明是亚历山大不想和她结婚，她才停止和他约会的。亚历山大很是生气，带着日记本离开，再也没有还给她。简最终还是决定试一试表演，她和别人探讨表演技巧，并问李·斯特拉斯堡她是否可以投考李办的表演讲习班，李便为她安排了一切。李此时正处于事业的顶峰，对美国戏剧和电影具有左右形势的影响，许多著名的演员如马龙·白兰度，詹姆士·狄恩，保罗·纽曼以及达斯廷·霍夫曼，弗伊·邓那威等均来自演员讲习所，特别是李和玛丽莲·梦露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轰动性的新闻栏里，玛丽莲自杀后把大部分的财产和个人物品全部遗留给了他。在当时的美国，他被奉为一代体系大师。

简成了李的门生，“我第一次在全班面前表演时，李·斯特拉斯堡为了某种原因让我停下来，我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但是他是在称赞我，我的一生从此彻底改变了，他说他看出了我有巨大的才能。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我能干好什么事。”但同时，她意识到大家对她有点敬而远之的味道，因为她的

父亲不仅是好莱坞的超级明星，也是百老汇的一名最优秀的演员。她的头上笼罩着父亲炫目的光环。所以简不得不主动去接近他们，在同他们接触时，她的同情弱小者并愿意关心和爱抚他们的毛病又死灰复燃了，其中有一个叫铁米·艾弗雷特的年轻演员兼舞蹈演员，长得很漂亮，一脸的男孩子气，很腼腆，每次总要简说上几句，大胆地鼓励他，他才能壮起胆来说话，偶尔瞅简那么几眼，所以简十分喜欢他，象情人又象姐姐那样地关照他，他们确在相爱，并且显得十分认真，不过看上去，他们的外形特别扎眼：简很引人注目，骨架较大，充满活力，铁米却娇小玲珑，一头金发，而且显得十分敏感。有时简把他带到父亲那儿，亨利对他十分友好，但眼光却充满了好奇。

同时，简也喜欢上了安德烈斯·伏希纳斯，在演员讲习所工作的导演中一位孑然独处的人，他待人接物非常生硬，他不允许别人亲近他，而且总是把头仰得高高的，鼻尖朝上，使别人觉得他十分傲慢，不愿也不可能和他亲密相处。但简却发现他为人非常真诚，坦率地直接指出人的性格特征，不论好坏，尽管有时显得相当粗鲁，粗鲁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热诚、敏感软弱的心，何况他看上去那么孤独，医生说他是一个阴阳人，而且将永远如此，所以，一开始，他试图把简和他的关系保持在柏拉图的精神恋爱的范畴，更何况，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小男孩——铁米。

值得一提的是，安德烈斯一眼就看出了简的巨大才能和潜力，并把她同玛丽莲·梦露相提并论。他愿意为了简的才华而奉献自己的才能，使她的才华得以充分展示。他却不知道，正是他的这种念头及以后的行动，使他战胜了亨利·方达。而把自己推上了那种特殊的宝座。他在《与我无关》一剧中第一次导演了简。在别人看来，他似乎在无情地挖掘她的内心世界，并试图触及她的内心深处，这使简高兴得无以复加。所以，他们拍片回纽约后，铁米就被人遗忘了，而以前一直等在一边的安德烈斯终于搬进了简所租用的公寓。在随后的日子里，在一切重要问题上，简开始完全由安德烈斯作主了，她象小孩依赖父母一样地依赖安德烈斯了。

《与我无关》一剧并不成功。简当时就很清楚自己拍的影片是平淡无奇的，她乐意让安德烈斯解剖自己。《时代》周刊这样写道：“这部影片是无可救药的，不论是风度翩翩的帕金斯表演他那有名的尴尬场面，还是第二代的方达带着酷似他父亲的微笑展示她那双群舞女郎式的美好大腿，全部无济于事。”不过，这部影片至少录下了简所扮演的天真少女的形象，这在以后并不多见。

铁米被抛到一边以后，简对安德烈斯似乎认起真来，她甚至想让父亲理解并接受安德烈斯，她把他带到家，介绍给亨利，亨利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安德烈斯非常傲慢，所以弄得大家都不愉快。随后，亨利通过几位影片公司的朋友，打听安德烈斯的情况，当他得知安德烈斯来自斯特拉斯堡时，他就更不高兴了，尤其是当他了解到或者不妨说是观察到简非常依赖安德烈斯时，他甚至嫉妒起来，并把这种情感渗进了父女之间，使得他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每当简不得不去看望父亲时，回来的时候总是一付垂头丧气的样子，而安德烈斯非常有耐心和热情，很快就能使她重新振作起来，他很巧妙地扮演了她的代理父亲的角色。

情人“导演”

20世纪60年代，新一代的年轻人开始崇尚奔放、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并很快形成强大的势头，对清教徒主义的各个方面发起了强劲的正攻强，一夜之间，似乎动摇了美国的社会基础：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直到现在也没有能恢复以前的样子。

简也是其中积极的一员，她公开鼓吹一种其实并不新颖的主张——自由同居，并宣称婚姻制度早已过时了，“我认为人并非是天生的单配动物。我认为婚姻制度完全违反人的基本天性，但是不幸的是它恰恰却是社会所必须的制度，这纯粹是一种假设的前提。我现在对于婚姻丝毫不感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适当的情况下不结婚。我所反对的是人人都认为女人就应该结婚，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包袱强加在妇女身上呢？为什么一个女人就必须结婚呢？我今年二十四岁了，我所有的朋友个个都已结婚了。现在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结。”她似乎要为女权而高呼了。她甚至还说：“如果要废除婚姻制度的话，现在是有史以来的最好时光。我认为废除婚姻制度就可以消除三大社会弊端：情妇、私生子和通奸。”

简可以不结婚，因为她有一个忠心耿耿的安德烈斯，而他是一个极富说服力的人物，他终于使简看到自己的价值和洋溢的才华。他时刻守在她身边，傍晚时在她的公寓里充当她的艺术指导，夜晚在完全另一场合充当她的伴侣和情人，而她又是那么年轻，充满朝气和活力，她当然有理由强烈排斥婚姻，再加上安德烈斯并不在婚姻问题上纠缠她。

这个时候，她在事业上也有了进步，当她主演的《切普曼调查报告》于1962年10月公映后，《新共和》的评论第一次表现出极大的赞赏：“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她就是简·方达。她锋芒毕露，但从恰当的鉴赏观点来看。她完全像那种情窦初开的少年。我如今看了方达小姐三部影片。在三部影片中，她的表演不仅迥然各异，而且堪称演技精湛而不落俗套。通过她的表演，你可以听到一切。譬如说，你似乎可以听到她那富有魅力的哼哼声，没有这种声音，聪明的表演、精湛的演技固然令人可喜，却缺乏一种强大的力量……她在该片里扮演一位缺乏性感的中产阶级寡妇。简用那种在情感上的神经质般的发作体现了这位寡妇对两性生活的变态恐惧，而她对爱情的渴望更加剧了这种恐惧心理。简的表演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其真实程度远远超过影片的要求……”

就是在这种令人兴奋鼓舞的时期，简周围的人仍然有意无意地把她视为亨利的女儿，这对要强的身后有情人撑腰的简·方达来说，是很痛苦的事实，所以，她开始有意识地向外界泄露父女之间的不和，渲染他们不密切的关系，并说了许多不利亨利的话。她表示：“我现仍然在摆脱亨利·方达的女儿的这种身份。我认为自己必须进一步努力设法摆脱掉。”她的种种表现和安德烈斯是分不开的。并不是说安德烈斯操纵了她，但他确实影响了简的行为。简总是把自己和安德烈斯关在自己的化妆间里，从不出来。对于她来说，他似乎是一种安全电褥。她很有决心，废寝忘食，而且有她自己的一套想法。她对安德烈斯言听计从，两人形影不离，安德烈斯和谁也不往来，简则比他灵活一些，当简在当年4月拍摄《走在荒原上》一片时，安德烈斯几乎成了她的导演。他帮她分析角色，准备台词，甚至每一场戏，但安德烈斯从不涉足现场，这一点，当时同台拍摄的贝克斯特小姐十分清楚，对他们和简所扮演的角色也很钦佩，但贝克斯特小姐还是生了一次简的气，因为她未经主人许可就借用了贝小姐的乳罩，贝小姐当时身怀六甲，乳房比平时丰满得多，

而简居然穿起来像自己的一样合身，这使贝小姐十分生气，这里边嫉妒的成份大于愤怒。安德烈斯见了只轻轻一笑，不过他也不愿简过于招摇。他愿意独享而不愿与众人平分秋色，因此，当后来的剧本中有过多的涉及两性问题的内容时，安德烈斯劝告简一一加以拒绝了。她对一位记者说：“朋友们说我拒绝演这类戏是疯了，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我来担任这种角色，但是我不想干，我只是剧坛新手，如果我因此而不得不长时间地陷在我并不喜欢的角色里，我想我很可能就再也不能演戏了。”

她的这些言行前后互相矛盾的地方很多，可见她没有成熟到足以控制自我的程度。她过份依赖安德烈斯，并把他的主张当作自己的见解。正因为如此，她把自己的成功归于安德烈斯的指点。她不满意只让他作幕后指挥的角色，于是，他们一起挑了一个名叫《滑稽夫妻》的剧本，并认为这部戏定会在使简获得好评的同时，也使安德烈斯获得赞扬。这出戏的男女主人公是一个毫无经验的年轻姑娘和一个显然刚跨出管束森严的基督教大学的青年人，他们在四小时之间相识，相爱并结了婚，他们结婚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夫妻之间才能同床共枕。可惜这出戏里缺少人们喜爱的故事情节，他们选中这出戏是基于制片人同意简的要求请安德烈斯来导演。

或许他们期望太大，或许他们过于紧张而束手束脚，尽管他们都希望《滑稽夫妻》公演以后，安德烈斯能成为一个轰动的名字，甚至认定这是一出决定生死存亡的戏，因为对简来说，成功失败的影响不会太大，但对安德烈斯来说，戏的失败就意味着巨大的损失：不可能再有如此好的良机，倘若成功，则可继续和简同居若干年，但他们还是失败了。他们在威明顿剧院首演时，安德烈斯在幕间对简和其他人说“一切顺利”。但是第二天当地的报纸这样评价道：“该戏缺的是一次大手术。如果说对舞台上的胡闹不感兴趣是衰老的表现，那么我们昨晚像是老了十年。”《纽约先驱论坛报》甚至这样写道：“我简直无法相信这出戏居然不曾在外地演出过。这戏如果在外地上演过，那早就该停演了。”

安德烈斯变得更抑郁和沉默了，尽管他们还是一起同居，但简已开始对这个情人有了新的想法，不过简是个不愿伤害别人的人，她没有听自己周围的任何人说过安德烈斯的一句坏话，然而情人的关系是非常脆弱的，这出戏的失败注定了他们的分手。

1964年，简在新片《爱情樊笼》中任主演，这部片本来打算拍成一部惊险片，但在拍片前作了部分改动，弄得毫无意义谁也不懂。男主角是法国的阿兰·德隆。他的脸长得十分俊俏，虽难以称英俊，但许多女人一见他就神魂颠倒，简也是如此。他们在配戏的过程中开始调情，并且悄悄约会。阿兰·德隆一向以登徒子的形象闻名远近，所以好事的记者们总喜欢盯他的梢，弄点花边新闻取悦读者。当他们约会的时候，也没能逃脱老记者们锐利的眼睛，不久，小报上就有了关于这两个著名影星的风流韵事。安德烈斯看了报道后，大为发火，和简狠狠地吵了一架，然后，说他的身体极为不舒适，不能继续担任简的戏剧指导，要回纽约了。

在性形象大师手下

安德烈斯离开后，简轻松了一段时间。她似乎为这种干脆决绝的断裂感到高兴，但是，她是一个离不开男人的影星。这时候，瓦迪姆介入了她的生

活。

瓦迪姆在女人问题上有些类似简的父亲，总不走运，但总有女人围着他转。他的第一位妻子布丽吉·芭铎比他小十多岁，但他很有耐心，直等她年满十八岁才和她结婚。他是一位极有名气的导演，他的所谓名气并非来自他的思想，而应得力于他对表现床上镜头的热心，即使对自己的妻子也不放过，何况芭铎既年轻又美丽，浑身洋溢着性感，所以他利用妻子的优势为自己铺好了基石。他第一个把裸体镜头当作家常便饭。他的第二位妻子以及第三位女人都很漂亮，并且愿意俯就他去拍裸体镜头。

简早在 57 年在巴黎就认识了瓦迪姆，不过那时候简还比较守旧，对瓦迪姆怀有一种偏见，所以曾经拒绝过瓦迪姆要她拍片的邀请，瓦迪姆事后这样分析到：“她对我的恶名深信不疑，认为我是一个玩世不恭的道德败坏者，一个爱吞食处女肉体的魔王，一个恶魔般的魔术师。”但瓦迪姆却对简有很深的好感，他为她洋溢的尚未为世人所熟知的性感所吸引。“在我一生中，我第二次成为那种奇怪疾病的俘虏——一见钟情，这种疾病在直接感染三至五秒以后，就出现第一次症状，这时候就知道你自己完蛋了。有些人因此而成为傻瓜，有些人却因此施展才华。”我们不知道瓦迪姆属于他所描述的哪一种人，但由他执导的，简主演的《争名夺利》一片却使他接近了重要导演的地位。

瓦迪姆念念不忘简给他的印象。在安德烈斯离开简以后，他又一次碰到简。这一回他们谈了很久，并邀请简在《轮舞曲》中扮演女主角，简犹豫不决，不过，她觉得瓦迪姆其实很逗人喜欢，尤其是他的声音，具有十足的魅力，音色变化无穷，能表达各种感情。简在回去的路上，满脑子那种魅力无穷的声音，她在上床睡觉前，终于打电话给他同意主演那部电影了。

他们交往了一段时间，发现彼此都在向对方靠拢，和瓦迪姆同居的女人被法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而且他们还生有孩子，而简不想让别人讥笑她刚离开那个男人的怀抱，就投入到另一个男人的怀抱，所以他有意识地放慢了节奏，有几天甚至避免互相见面。可惜，他们都没能坚持多久。

“有人告诉我说简来了，门突然打开了，简气喘吁吁地穿着一件来不及扣起来的风衣跑进屋来，突然停住了脚，为过于明显地表露了自己的爱情而害羞，然后才向我走来。她的胸部剧烈起伏着，她的头发刚让影片公司理发师做好，却在院子里弄得又湿又乱了。她的两颊化了妆，但看得出已涨得红红的。她看上去是那么美丽、敏感、脆弱、神圣。那天傍晚我们一同从艾匹奈回到巴黎，以免再度分离。”瓦迪姆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然后简在巴黎租了一处极宽大的公寓，他们同居了，而且一住就是六年多。

简有着典型美国人的思维模式：崇拜成功者，而在法国，瓦迪姆是一位极受欢迎非常成功的导演，他以擅长塑造性形象而闻名，在他的眼里，此刻的简在银幕上的形象尚未定型，但她天生丽质，体态丰满，完全可以成为一位性女神。这位大师不仅热爱她，并且急于把她和全世界共享。她开始在瓦迪姆执导的《轮舞曲》中担任主角，法国报刊对此作了大量的报道。当有记者问她是否一丝不挂地拍片时，简回答说：“我在拍片中应该是一丝不挂的躺在床上，但是我还是穿着胸罩和三角裤。虽然角色要求我赤身露体，但是摄影棚里有九十五个人啊，我感到害羞，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干过，以后也绝不会这么干。”不过，这句话说得过早了。因为后来她不但一丝不挂地拍了

镜头，而且干得相当出色。不仅是她，几乎所有的女演员都习惯拍床上镜头了，简当然不能例外。瓦迪姆最大的功劳，大约在于改变了她的习俗观。

但《轮舞曲》并未获得巨大成功。尽管简在拍戏时极为投入，也表现得相当朴实，但早有人捷足先登，占据了其所扮演的那种角色，何况在拍片时尚不敢赤身露体，相对地削弱了竞争力。因此，瓦迪姆为了把这部影片打红，招徕观众，将之更名为《爱情之圈》，同时在首演的剧院门口竖起一幅巨型广告，上面的简一丝不挂，用特写式的手法表现她迷人的臀部和面容。这一切都是在未征得简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当她发觉这一阴谋时，已经引起很大的轰动，简十分生气。跑到法院告了一状，要求将广告牌撤回。官司还没有结果，裁决尚未下来时，她却和瓦迪姆携手入了洞房，诉讼也因此而不了了之。

他们于1965年8月在拉斯维加斯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即飞到法国拍摄《争名夺利》，这个剧本是瓦迪姆根据左拉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早期的拍摄是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村庄进行的。由于简的身份，制片人给了他们很多的经费。瓦迪姆在这部影片中非常注意简的表演。他发现简正在拼命寻求自我。“她在摄影机前进行自我分析，把自己闭锁起来进行内省，为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微笑，每一个行动寻找思想根据。从根本上说，她很害怕自己，她的最大弱点总是缺乏自信心。”但简这时已对拍裸体不再害羞了，因为她现在是有夫之妇，何况正是自己的丈夫在鼓动她去拍。所以对她来说，一点心理障碍也没有。她在剧中扮演的蕾奈是一个渴望通奸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的妻子，但她荒唐到要和丈夫的儿子睡觉，尽管他不是自己亲生的。瓦迪姆和他的助手们以极大的热情来表现这位纵欲主义者。不过，简坚持拍裸体镜头时不能让任何人参观和拍照，所以，当她和男主角拍床上镜头时，摄影棚是紧锁的，可是，有一位猎奇的记者买通了门房，竟躲在摄像机支架机上，拍了十来张入戏的镜头，一口气卖给了《花花公子》杂志，得了好价钱。简得知后大喊大叫，坚持要瓦迪姆去起诉，结果，对方给了两万美元的赔偿费才算了结。

他们于六七年再度携手合拍了《芭芭莱拉》，这是根据当时十分流行的一套滑稽连环画拍摄的，人物生活在4000年前的时代，但在性的问题上非常开放。该片在第二年放映后，获得一致的好评，《纽约人》杂志这样评论到：“简·方达在《芭芭莱拉》里不论是在零乱的羽毛上还是在粗糙的皮毛上做爱，都显得那么生动有力、新鲜迷人，正如一个美国姑娘以她的天真无邪战胜了淫荡下流的连环画里的未来世界。她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喜剧演员。当她最滑稽时，也是最富性感的时候。”

说明白了，这部影片只是一部原始的色情影片，影片拍摄将要结束时，瓦迪姆建议让简的裸体镜头作为片头的幕景。简有些犹豫，瓦迪姆随即又说不要紧，字幕会遮住某些部位，简同意了，但当她第一次看片时却发现自己一丝不挂，根本没有字幕的遮挡。简开始对瓦迪姆动摇起来，但她三十岁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怀孕了，怀上了她和瓦迪姆的孩子。

简另一半的觉醒

在美国，种族歧视历来十分严重，六十年代，随着民权法的强制执行，黑人的自豪感明显上扬，并为进一步争取合法权益而不懈努力。另一方面，

白人保守派的势力依旧十分强大。两派之间的对立日益严重；并演变到了白热化的程度。1966年秋，简到路易斯安那州拍外景，片中的黑人主角一到达当地，立即得到警告不得使用白人的游泳池，他们置之不理，当地三K党便以死相威胁。简和其他演员支持导演不能向他们屈服，他们依旧拍片，并雇用特别警察来保护他们的住地和户外景地。

有一天，当瓦迪姆上街散步时，发生了一件令简非常气愤的事，一个小黑孩跑到简跟前，送给她一束鲜花，简便吻谢了她，立刻周围的人们停下来默默地瞪着他们，前一分钟还充满欢乐和生气的街道，竟因这一吻，马上变得沉闷，并隐含着威胁的意味。一小时后，该城行政司法长官闯进了外景地，不顾导演的愤怒，告诫他们必须立刻撤出该城，否则后果自负。他们离开时，子弹打碎了其中两辆车的玻璃。

事后简在回忆的时候，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不久，出于愤怒和同情，她有意识地和黑豹党的领袖休伊·纽顿接触起来。休伊是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黑人领袖，他十分精通革命文学，尤其是弗兰兹·费农的《大地上不幸的人》、毛泽东的著作和格瓦拉的《游击战》，他主张黑人为了自己而武装起来。

这是简第一次介入政治。不久，她就这样说自己：“我满三十二岁时才发现自己浪费了一生中的三十二年。我之所以醒悟是由于越南战争。越南的问题迫使我扪心自问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国家的行为意味着什么，我们究竟在干什么。”

种族歧视和越南战争使简·方达人性的一部分苏醒了，她开始厌倦拍摄表现肉体 and 欲望的影片了。现在有了孩子，她是一位母亲，这是不可改变的身份，但同时她也是一位演员，而演员的身份是可以改变的，因此她决定做更有意义的工作，要把电影与现实世界以及其它一切问题联系在一起。但瓦迪姆在影坛上的地位是独特的，由他执导的片子总是突出性的一面。他们能和平共处白头偕老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没有什么比瓦迪姆在他们拍摄《仁慈的杀害》一片时所作的日记更有说服力，“她几年是病态地、全神贯注地生活在她的角色里，使我感到两人之间的距离越离越远，好象中间出现了一道不可名状的冰冷的隔膜。我感到自己似乎生活在恶梦之中。”

影片拍完后，简去了一趟印度，没有和瓦迪姆一起去。在归来的途中，结合她在印度的所见所感，她对两件事得出了结论。首先，名誉和声望都是过眼烟云、财富她已积蓄了不少，以往的时光都是浪费了。其次，印度之行使她相信世界上被压迫的人们无法自救，他们需要像她这样的幸运儿的帮助。

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一种新的战斗风格形成了。简开始凭借自己无穷无尽的精力，参加群众集会，支持社会活动，忍受无数的不眠之夜，从一个讲台赶到另一个讲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对政府和社会的一些恶习猛烈地批评和抨击，同时她还坚持拍片。一个叫弗雷德·加德纳的左倾电影编剧成了她的导师，希望借助她的名气向穿军服的士兵宣传反战思想。与此同时，几个相互有联系的好战分子组织包围着她。

政府开始注意她了，并由总统下令直接对她进行监视，她的电话和电报受到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或截获，其他电话电报记录在政府的高级官员中传阅。一位政府雇用的告密者曾这样透露：“简·方达说的话和勃烈日涅夫说的话受到同等对待。”她被标明为“颠覆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对她监视的许多材料被列入“绝密”级，上面还注明“不准向外国人或国外扩

散。”

但简似乎不知道这一切，她依旧为黑豹党募捐，把自己的钱大把大把地捐赠给他们。她往返奔走于美国，进行反对越南战争的讲话，要求大学生抵制征兵工作，要求士兵拒绝作战。这期间，她参加了《克卢特》的拍摄，人们把这部影片称之为是一部心理惊险片，它不仅使观众感到惊险，而且力求向观众揭示一个聪明的妓女的内心世界，揭示这个敏感的有教养的高价应召女郎的内心矛盾。她一方面听任自己作为腐败制度的一员而受摆布，另一方面她却真正渴望摆脱这种生活而和一位男人朝夕相处或结为伴侣。简在拍摄这部影片时，从新的角度理解了妇女革命，“唉，我整个思想和思想方法都变了……我开始意识到，妇女革命不仅是她们的革命，也是我的革命。我是说，如果我不为之战斗的话，那就没有人会为之而战斗了。”

这部影片也有相当露骨而毫不动情的两性镜头，但由于简对影片角色的理解，出色的分析和心理表演，《克卢特》为她赢得了许多荣誉，其中包括奥斯卡金像奖。这是1971年的事。这时的简·方达已作为一名激进女演员而闻名全球，用她自己的话来讲是“一位具有革命政治思想的女演员”。

1972年7月，简飞往河内，开始了她的越南之行，表面看来似乎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实际上她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巴黎的官员们仔细洽商了很久。只有一个人不觉得意外，他就是简·方达在反战活动中的老朋友汤姆·海顿。他们的关系当时非常密切，密切到了无人可敌的程度。他们一同前往河内。

她在越南访问了一些经过挑选的美国战俘，在河内作了至少十次广播讲演，她说：“你不知道，当你拉操纵杆，按电钮时，你的炸弹会导致什么后果？”她当时对一些美国士兵强调说她要“公开谴责尼克松，因为他背叛美国人民的心愿，背叛美国悠久的自由与民主传统。”

她还参观了被轰炸的村庄，访问了医院，全世界的报刊以醒目的标题对简的访问加以报道。这件事成为头号新闻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她是一向以挑起争论而闻名的大明星，一是对越南官方来说，她是最好的宣传工具。

她回国以后，受到了司法部门的控告，控告她背叛祖国，但没有胜诉，因为这场战争本身是非正义的。但简的河内之行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她的朋友甚至包括父亲都对她的越南之行持批评态度，更多的人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超级爱国者和成千上万认为战争是非正义的人，支持并赞扬她的这一壮举。简对记者说：“什么叫叛徒？我在越南时每天都哭，我为美国痛哭，炸弹落在越南，但却是美国的悲剧。”

因为瓦迪姆并不热衷于这些活动，所以，终于有一天，简·方达打电话给他，约他前来一谈，于是他们开始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谈离婚的事宜，当瓦迪姆驱车离开时，他显得孤独而有气无力。

二度梅开

汤姆·海顿身材矮小，五官长得比瓦迪姆还粗俗，鼻子象蒜头，一脸粉刺，他非常冷静，锐利的目光象刀一样能穿透人的躯体，他的个性并不具备一种超人的魅力，但他头上有一层神秘的光环。简立即为他这种特征所吸引，并愿意依靠他的神秘的力量。他们在七二年后半年就开始同居了。

海顿比她小两岁，出身于下等的家庭，由他的母亲——位学校里的电影资料员带大。他在天性中强烈地憎恨金钱社会的罪恶，所以他年轻时就积

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之中，并成为美国最瞩目的青年行动主义分子。

简的第二次婚礼是在1973年1月。她嫁给了海顿。他们是那样的繁忙，以至结婚三天就奔赴波士顿参加群众集会。他们依旧受到官方的监视，但他们也有了更多的朋友，这些朋友大多是海顿圈里的人，他们力劝简脱离影坛。不过，没有人坚持这个建议，因为不久他们就发觉继续利用她的大明星的地位会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诸如募捐、造舆论及其扩大影响和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关心等。因此，简得以双重身份生活在现实中，她在不断地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时，也参加拍剧的工作，甚至包括到敌对的苏联去演戏。这期间，她主演了《狄克和简的趣事》、《米莉娅》、《归来》和《中国综合症》等影片，其中尤以《归来》一片成就最高。

这部影片费尽了周折。先是没有办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直到她争取到了制片人的支持和赞助后，这个问题才算解决。该剧以中西部为背景，描写两个高中时代的情人再度相会。女主人的丈夫从越南归来后，起了很大变化，他的妻子也变了，她在附近的军医院里发现了以往的情人，后者已成为一个下肢瘫痪的残废军人，他们的友谊使她对战争充满了深深的恐惧。他们旧梦重温，几乎没有什么对白。事实上，他们在床上交流最好。影片以极为巧妙的手法使观众强烈感到他们进行了口淫。他们在床第间的大胆尝试主要是出自残废军人的需要，因为他想要证明任何残疾绝对不影响全心全意的床上生活。

《归来》在好几个方面都是成功的。无论是作为一部描绘美国最不受欢迎的战争片，还是作为一部爱情故事片，都是非常动人的。它囊括了七九年的全部奥斯卡男女主角奖。这是简第二次获此殊荣，人们似乎因为她艺术上的成就而原谅了她某些过激的言行。加州的州长指定她进入加州艺术委员会，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但被艺术委员会拒之于门外，理由是她曾在最近一次战争中有过“叛国行为”。

尽管如此，简和她的第二个丈夫汤姆依然不停地在各城市之间巡回演讲，不过，她开始对政府持温和的态度，演讲的主题仅仅围绕经济民主而进行。同时，她把积蓄的财富投入她所相信的事业中，比如简·方达锻炼馆，汽车修理店等等。上帝似乎十分宠爱这位年届中年的女人，她的健美馆十分成功，在世界各地拥有不少的崇拜者。她的健身术也广为人们所接受和推崇。

八十年代初，简通过自己的公司——印度支那和平运动影片公司买下了《金色池塘》的拍摄权。

简·方达的艺术道路

让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简·方达所走过的艺术道路。

在她生活的早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会从事表演艺术，这可能和她的性格有关：缺少自信使她认为自己既不逗人喜欢，更不会在艺术上超越自己的父亲，亨利因为在《愤怒的葡萄》中杰出的表演树立了他稳固的名星地位，而使女儿望而却步。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发育，简出落得越来越美丽，人们的关注和异性渴慕的目光多少使她振作起来，恢复了自己的信心和优越感。同时，母亲家族注重行动的血统开始在方达的身上起了作用，她不愿作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但她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应该是职业。她学过绘画，

但一事无成，从事过服装模特儿的工作，仅仅因为这行职业赚钱多，但人们对她在时装照片上的那种高雅风度很感兴趣，不少的人劝说她从事舞台表演，这似乎打动了简的心，于是她便投身到斯特拉斯堡的演员讲习所，接受系统的训练。这便是她从事表演艺术的开始。开始仅仅是舞台上的表演。《皮革行业历险记》大约是她从事该项职业的第一次排练，同行们都认为她的表演有些失真，对戏的把握深度不够，甚至冷言冷语地嘲弄她将来会沾父亲名气的光。但演员讲习所的创办人李·斯特拉斯堡独具慧眼，认为这个热情、充满活力的姑娘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力，并直接对简说她有巨大的才能，这无疑给了她极大的鼓励，她终于冷静下来，确立了事业上明确的方向。

在她认为取得了一定的舞台表演经验以后，她就向好莱坞进军了，这便是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资拍的《海外奇谈》，也是简的第一部影片，时间是1960年。《海外奇谈》原本是一出舞台剧，在百老汇获得了小小的成功，华纳公司决定把它搬上银幕，他们想利用简的名气——其实是亨利·方达的名气，因此极力想把简捧红，使电影叫座，便换掉了原本默默无闻的男主角，而要另一位名演员在简的处女作时帮她配戏，但结果并不成功，评论界没有给它什么好言语，甚至把简大肆挖苦了一番。不过，这对简没有什么影响，她还是得以照样排舞台剧和拍片，而且一部比一部进步，就这一点来说，她父亲的名气是起了保护作用的。假若是别人，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运气和机会。有不少的作家和评论家认为简以后的成功是靠她的天赋和勤奋，而实际上，她的起步是完全得益于父亲的。电影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制片人都十分看重这一点，因为这样利用老一辈的名气既可以省下不少的开支，又可以扩大影片的影响，大赚其钱，所以，简在以后的日子里，总有戏拍，总有角色，而不必担心坐冷板凳，有了这么多的锻炼机会，稍有点出色的人都会有所建树的，何况是简这样充满激情，悟性很高的女性呢。这段时期，除《海外奇谈》外，她还拍了《调整时期》、《走在荒原》、与雷伊·丹顿合演《查普曼报告》、《星期日在纽约》，以及与阿兰·德隆在《爱情樊笼》中同时出演男女主角等影片。

总的来看，这段时期的表演并不十分出色。一部分原因是影片本身并不出色，另外的原因则应归于她在探索中的表演功夫。如果要划分一下简·方达表演艺术的阶段的话，不妨把六四年以前的时间归入第一阶段，即积累经验的阶段，但由于她及其家庭的影响，她在影坛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并且呈上升趋势。因为她不断地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些充满活力，令人喜欢的青年女子的形象，颇为引人注目。

六五年到七零年左右可以算作第二阶段。由于她这段时期认识并嫁给了注意塑造性形象的大师瓦迪姆，得以在他精明的生意人的头脑的导演下，主演了一系列极为叫座的影片。剧中的女主人多是妓女或性欲受到压抑而又耐不住饥渴的形象。似乎这类人物更对简的胃口。她的表演细腻而真实，被人们当作性感明星对待，从而为全世界所公享，巩固并提高了她的明星地位。主要的影片有《凯特·巴卢》、《赤足在公园》、《芭芭莱拉》、《仁慈的杀害》以及《孤独的青春》等，其中《孤独的青春》一片荣获六九年度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提名。不过，她并没有胜利地登上领奖台，其金像奖为主演《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的英国演员玛吉·史密斯夺走。第三个阶段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的，到现在尚没结束，也是最成熟的时期，并由于她精湛的演技，潇洒自如，独特的风度而登上艺术表演的顶峰。七一年因在《克卢特》

一片中成功地扮演一个妓女，而首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这是她主演性感影片的继续，不过简自己矢口否认这一点。她公开声明这是一部抗议迫害妇女的影片，并且说：“这个制度迫使妇女卖淫。”她所以这样说，因为她那时早已投身于政治活动之中，积极参与反战活动和鼓吹妇女解放而更进一步地提高了她的知名度。这之后，她一方面不断参与政治活动，一方面自己开办了影片公司，既当老板，又作演员，主演了不少的影片，但影响都不很大。七八年度她自己请人写了《归来》这个剧本，筹集了必要的资金，自己主演女主角，男主角则由乔恩·沃依特扮演，影片上演后受到一致好评，男女主角分别获得本年度奥斯卡金像奖。

简至此已成了具备有国际知名度的大明星。不过，她有一桩心愿，那就是与父亲同拍一部片子，后来，她们终于合演了《金色池塘》，这是八一年的事，主演该片的三个人获得了那一年的奥斯卡奖的提名，后来，七十六岁的亨利·方达在得知自己终于第一次获奖后，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这段时期，她开始了新的探索，不再拍男贪女爱毫无内容的影片，而选择具有社会意义的、有一定深度的影片。思想上的觉醒，斗争的磨炼和生活的阅历使她在表演艺术上更趋成熟，在风格上更加开放。她的银幕形象也更加放射出她所独具的异彩。

附录：十大影后主要影片拍片年表

葛丽泰·嘉宝

《安娜·卡列尼娜》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35
《茶花女》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37
《玛丽·瓦列斯卡》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37
《妮诺契卡》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37
《双面女人》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41

凯瑟琳·赫本

《帕特与迈克》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52
《夏日的时光》	联艺影片公司	1955
《播雨者》	派拉蒙影片公司	1956
《编辑部同仁》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57
《突然在去年夏天》	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1957
《长夜漫漫路迢迢》	恩伯希公司	1962
《猜猜谁来赴晚宴》	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1967
《冬之狮》	艾维科公司 (AVCO)	1968
《夏洛特的疯女人》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1969
《微妙的平衡》	美国电影剧院	1972
《雨中情》	美国广播公司	1975
《鲁斯特·科格本》	环球影片公司	1975
《气球旅行》	桑雷公司	1976
《金色池塘》	环球影片公司	1981

费雯·丽

《魂断蓝桥》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40
《汉密尔顿夫人》		1940
《医生的抉择》		1942
《凯撒与克娄巴特拉》		1945
《安娜·卡列尼娜》		1948
《欲望号街车》		1950
《罗马之春》		1962
《愚人船》		1965

蓓蒂·黛维丝

《宁望莱茵河》	华纳影片公司	1942
《斯克芬顿先生》	华纳影片公司	1944
《禾苗青青》	华纳影片公司	1945
《冬日的相会》	华纳影片公司	1948
《来取即付》	华纳影片公司	1949
《慧星美人》	华纳影片公司	1950
《伊丽莎白女王一世》	华纳影片公司	1954
《蓝闺惊变》	华纳影片公司	1962

琼·克劳馥

《他们全都吻过新娘》	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1942
《重重疑云》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43
《欲海情魔》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1945
《诙谐曲》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1946
《黛西·凯尼恩》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47
《伟大的感情》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1949
《红颜祸水》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1952
《突然的恐惧》	雷电华影业公司	1952
《哀伤的恋歌》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53
《海滩上的女人》	环球影片公司	1955
《秋天的树叶》	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1956
《你干的事瞒不了我》	环球影片公司	1965
《类人猿》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1970

英格丽·褒曼

《郎心如铁》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44
《风尘双侠》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1945
《意乱情迷》	塞尔兹尼克联美公司合作	1945
《圣玛丽亚钟声》	雷电华影业公司	1945
《美人计》	雷电华影业公司	1946
《凯旋门》	企业公司和联美公司联合	1948
《圣女贞德》	塞拉制片公司和雷电华影业公司	1948
《1951年的欧洲》	国际电影发行公司	1951
《真假公主》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56
《多情公主》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1957
《六福客栈》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1958
《何日君再来》	联美电影公司	1961
《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1961
《贵妇怨》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64
《人类的呼声》	美国广播电视公司	1967
《仙人掌花》	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1969
《春雨中行》	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1970
《东方快车谋杀案》	派拉蒙影片公司	1974
《秋光奏鸣曲》	新世界电影公司	1978

奥黛丽·赫本

《秘密的人》		1950
《蒙特卡罗宝宝》		1951
《金粉世家》	派拉蒙影片公司	1951
《罗马假日》	派拉蒙影片公司	1952
《龙凤配》		1953
《沙布里娜》		1954
《战争与和平》		1956
《美人鱼》		1956
《不被宽恕的人》		1956
《修女传》		1957
《滑稽面孔》		1958
《在蒂凡尼早餐》		1960
《窈窕淑女》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1964
《如何盗窃一百万》		1966
《等到天黑》		1967
《黄昏之恋》		1968
《谜中谜》		1968
《俩人行》		1976
《罗宾汉和玛莉安》		1976
《血亲》		1979
《哄堂大笑》		1981

《直到永远》

1991

伊丽莎白·泰勒

《裘迪的约会》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48
《小妇人》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49
《名利地位》	派拉蒙影片公司	1951
《艾凡赫》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52
《富家女》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53
《象步》	派拉蒙影片公司	1954
《我最后一次见到的巴黎》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54
《巨人》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1956
《热铅皮屋顶上的猫》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58
《去夏突至》	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1959
《巴特菲尔德第八》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60
《埃及艳后》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63
《显要人物》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63
《矶鹬》	米高梅影片公司	1963
《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1966
《驯悍记》	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1967
《繁荣！》	环球影片公司	1968
《离婚》	美国广播公司	1973
《青鸟》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76

玛丽莲·梦露

《让我们堂堂正正离婚吧》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51
《夜晚的撞击》	雷电华影业公司	1952
《我们并未结婚》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52
《敲门也无用》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52
《猴儿干的好事》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52
《欧·亨利的五个短篇》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52
《尼亚加拉》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53
《金发女郎·君子好逑》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53
《怎样高攀百万富翁》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53
《一去不复返的河流》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54
《轻歌曼舞好营生》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54
《七年的渴望》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55
《公共汽车站》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56
《王子与舞女》	玛丽莲·梦露制片厂	1957
《热情如火》	艺术家联合影片公司	1959
《让我们相爱吧》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1960
《不合时宜的人》	艺术家联合影片公司	1961

简·方达

